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联合国论坛演说精粹



编者的话

首先十分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和黄华副委员长特为本书作序。

记得10年前，我在美国纽约首次参观矗立于宁静的东河之滨的39层乳白色联合国总部大厦之时，就曾萌发了研究联合国的浓厚兴趣。去年秋，在受邀组织编选一本《联合国论坛演说精粹》，作为奉献给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的礼物之时，感到这一工作完全符合本人志趣，可以此为契机对联合国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也就欣然应允了。

然而编选这样一部书决非易事，因为联合国成立50年以来，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浩如烟海，有关历史文献堆积如山，似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之感。好在王寅通君和沈永林君表示愿鼎力合作，也就打消了疑虑。于是我们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这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遴选出上百篇演说，力图展现联合国50年历史画卷。我们将有关联合国及秘书长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开篇，继而分为“联合国与世界和平”、“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与国际人权”以及“联合国与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与联合国”等6个部分，力图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现联合国的历程和业绩，供读者赏析和参阅。

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演说不但时代跨度较大，而且又有长期冷战政治的背景，况且演说者又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对于同一事件或者同一个问题，往往看法大相径庭，甚至相互抵牾，望读者明辨，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联合国及有关问题的来龙去脉，我在每一部分前写了简短的导言，并归纳国内外对联合国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我们还对所有演说者的简历作了必要注释；每篇演说之后，我们都注明出处和编译者姓名，凡未注明的，均由我译编。我想，这些导言和注释仅属学术探讨性质。由于我们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书中不当或缺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可谓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王寅通和沈永林两位先生，没有他俩的努力和帮助，是很难如期完成本书编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学群先生为本书献计献策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田国培、黄德兴、庄建明、王惠初、叶玉珍、王刚诸君也为本书的编写出了大力。

为使本书早日面世，《世界著名演说文库》顾问张仲礼与钟启煌先生，主编陈燮君、邓光东、王建华光生，以及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有夫女士，从选题到编写以及最后定稿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谢忱。最后，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办事处主要执行官丽莎·伯特海姆女士给了我们慷慨的帮助，欣然提供了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演说。

王德华

1995年4月于沪

序 言

黄华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

联合国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产物，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渴望世界和平与要求发展的共同心声。中国人民在 8 年抗战中历尽艰辛，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从而为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绝的贡献，这为举世所公认，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中国共产党反映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积极支持联合国的事业。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就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5 页。）

和平与发展问题乃当今世界两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也是联合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半个世纪以来，联合国走过曲折的道路，也有过严重失误，但总的说来，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在反对侵略和干涉、维护国际和平、发展各国之间友好关系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我本人在联合国曾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我在联合国任中国常驻代表期间，曾亲身经历联合国之巨变。一大批被人瞧不起的小国、穷国、弱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意气风发，团结合作，冲破重重障碍，在一系列问题上，敢于伸张正义，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从此，结束了少数大国摆布联合国的日子。可以说，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跟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但是联合国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尚未充分贯彻，联合国的全面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目前，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努力受到阻挠，整个国际合作发展体制面临空前挑战。我国代表团曾经说过：“联合国发言盈庭、决议如山，却过问不了它应过问的问题（例如防止核战争问题），对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例如中东问题）的解决，又无能为力。”（《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73 年，第 22 页。）我认为联合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国，那就须能够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真正实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为个别超级大国所左右。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工作，中国同联合国的合作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必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一起，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联合国将更有效地履行其重要职责，不辜负世界人民寄予它的厚望！

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在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编辑这本《联合国论坛演说精粹》，精心筛选出半个世纪以来从联合国历届秘书长到各国首脑和外交人员在联合国的演说。虽然他们观点各异，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唇枪舌战，但这都是联合国历程的真实记载。无论是关心世界大事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国际问题研

究学者，都可从中了解联合国与国际新秩序的关系，了解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更自觉地支持联合国的事业。演讲爱好者也可从中领略某些演讲者的佳作，或许会有所启迪。

序 言

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罗期-加利

50年前，世界各国放下武器，结束了历史上一场最残酷的冲突。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决心维护和平，为各国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们聚集在旧金山，讨论、起草、签署了《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讨论和协议，这个世界组织诞生

如今，对话、讨论和协议仍然是联合国工作的中心。只有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全球论坛，使所有大大小小的会员国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都能参加世界事务的决策，参加制定我们大家都是其中一分子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和指导原则。只有联合国肩负着全球性任务，处理国际社会关注的各种各样问题。

本书收录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发表的许多最著名的演说。主题包括国际安全、和平协议、裁军、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等等。整个而言，这部演说集不仅是对联合国这一真正独特的全球性机构的赞誉，而且也使人们能了解世界的紧迫问题以及谋求解决的途径。我们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选出版这部书，其中也突出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创始会员国对联合国作出的特别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伟大的智慧、古老的文化以及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带头作用，继续丰富国际外交的实践，充实世界事务的演变。

联合国是为未来世界服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然而，只有得到各会员国及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联合国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本书作为增进理解、争取支持的工具，是一个最值得欢迎的贡献。

总 序

周保城

演说就是向听众发表时某个现实问题的见解，或阐明某种事理。每个人一辈子要听许多次演说，也要作不少演说，可见演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活动。

演说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四千多年前，古埃及的法老就说演讲比打仗更有威力。在古代希腊、罗马，演说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产生过希腊的伊索格拉底、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罗马的昆体良、西塞罗等一大批演说家，还办了“演讲学校”。在我国古代，演说也曾经辉煌。所谓“左史记言”，《尚书》中就有不少演说名篇。《国语》、《战国策》中之言，颇与古希腊之演说词相似，亦治政治、历史、文学及雄辩术于一炉者也。《论语》其实是孔子向三千弟子传授知识时的演说精华。孟轲、商鞅、苏秦、张仪俱为雄辩的演说家。在《盐铁论》中，则可以读到西汉政治家桑弘羊精彩的经济演说。据此，窃以为演说之在中国，实有久于希腊、罗马者。

演说不仅源远流长，且有重要作用。一篇好的演说，或事实有据、逻辑严密、或慷慨激昂、豪气凌云，或声情并茂，引人入胜，或机智幽默、妙趣横生，或数者兼而有之，足以使人坚定对崇高理想之信念；足以使人增加知识，明白道理；足以动人心弦，催人奋发；足以给人欢乐，得到美的享受。历来名家演说，不仅风靡当时，且对后世实有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进行两个文明建设，要做好各项工作，都离不开演说，各级党政领导，各行各业负责人开会做报告，科学家的学术报告，群众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教师向学生讲课，检察官提起公诉，律师为当事人辩护，这些都是演说。此外接待来宾，介绍经验，发布消息，讨论问题，无不要用到演说。演说要有好的效果，就不能照本宣科，而必须掌握演说的艺术。掌握演说艺术别无他途，除了从实践中学习外，再就是借鉴前人演说的成功经验。由此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共同组织力量，翻译和汇编古今中外演说名篇，成套出版《世界著名演说文库》，以飨有志于演说者，此举确系一种有益的尝试，且为文化积累所不可少。

古今中外的演说名篇数量甚多，要想一下子收集得齐全，并同时出版，难免旷日持久，甚至是不可能的。不妨成熟一批，先拿出一批来。“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这样分期分批积累起来，相信反倒易于较快、较好地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演说文库。

至于每个分册的选录范围，无妨不拘一格。既可拿演说性质作标准，如就职演说，竞选演说，外交演说；也可以演说者的身份为标准，如将帅演说、律师演说、作家演说、科学家演说。既可着眼于演说之历史影响，也可着眼于演说之趣味性，如幽默演说。凡此种种，均不成问题。

此等演说，就其演说艺术而论，固有可供借鉴者。然不独止此。历来演说名篇，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或反映时代风貌，或阐发深刻哲理，或含有丰富知识，实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成为文化遗产。唯其如此，鄙意以为阅读这些演说，非独有助于掌握不同性质、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场合下的演说艺术，抑且有助于了解历史，丰富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

这些演说既成历史文献，即有其时代烙印，需要读者独具慧眼，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特别有几种演说，由于性质关系，尤其如此。如演说有足以影响历史者。观夫《礼运大同》，则可知人类之追求理想社会，固不自今日始；观夫伯里克利、柏拉图之演说，则可知西方政治制霞之由来。其影响历史者，均可谓至深且远。然而有正必有反。历史不断进步，亦必有曲折。只讲进步，不讲曲折，则历史不完整。演说有促进历史发展者，亦必有促退历史者。只见前者而不见后者，则演说不完整。故适当选录一些具有反面意义的演说，以证历史道路之曲折，社会发展之艰难，人类前进之不易，实亦有其必要。

不揣冒昧，即以为序。

联合国论坛
演说精粹

一、联合国、秘书长与世界新秩序

导言

“联合国”这一概念，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的有名的“检疫”演说中最先提出的。他说：“所有爱好和平之国家，应即起而合作，反对违反条约与人道之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现正造成国际混乱与不安局势。欲避免此局势，并非严守孤立与中立所能收效。”1942年1月1日，26个反侵略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协定，通常称为《联合国宣言》。这种提法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得到了确认。

联合国的宗旨概括了各会员国所赋予它的神圣使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等。

为了实现这些宗旨，联合国宪章亦规定了各会员国必须遵循的原则。从理论上说，联合国应该代表“全人类的最佳希望”。

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秘书长，在联合国的活动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特殊的影响，其权限亦非常广泛，诸如：在解决争端中进行斡旋和调解；管理维持和平行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人权和自然资源等专门问题；组织国际会议等等。

联合国自创立至今已产生了6位秘书长。他们相继为挪威的特吕格弗·赖伊、瑞典的德格·哈马舍尔德、缅甸的吴丹、奥地利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秘鲁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和埃及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50年来，联合国在促进和平、维护和平、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特别是60年代以来，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后，使其更具普遍性、代表性。联合国一直是并且继续是维护国际安全不可缺少的工具，也可以说是世界和平的同义词。然而，现在的联合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其成立时的初衷。联合国50年来的活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过严重的失误。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主要选收了有关联合国的宗旨、章程，秘书长的职责、作用，以及联合国的活动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等问题的演讲。在关于联合国的问题上，尽管有的演说也谈到它应当成为一个“国际和平机构”，但在这漂亮的言词背后，却隐藏着各自的目的。杜勒斯于1953年9月17日在联大的一篇演说就是一个例证。那是他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次在联大论坛上讲话。他用动听的语言，大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美国的政策辩护，并鼓吹联合国应该成为按美国意图运作的“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通篇演说由于假装忠诚的伎俩和竭尽狡辩的能事，既具煽动性，又具欺骗性。但从演讲的角度看，亦具可听性、欣赏性。

莫洛托夫作为老资格的外交家，多次代表苏联政府在联大讲坛上发表演说。这里选收的是他于1945年4月26日在联大旧金山会议上的讲话。旧金山会议是审议关于建立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机构问题的一次大会。他从国际联盟的失败教训谈到将成立的联合国的任务，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新的国际机构决不能“用冠冕堂皇的契约作幌子来犯旧日的错误”。通篇演说有理有据，铿锵流畅，充满正义感。

在这一部分里，还选收了哈马舍尔德、麦克米伦、尼克松、英·甘地、德奎利亚尔、尼雷尔、拉·甘地、里根、撒切尔布什在联大庆祝成立10周年、25周年和40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联合国的作用作出了各自的评估，演说也各具特色。这几篇演说可以让读者了解到，联合国如何从成立之时作为维护各国

人民和平机构的初始愿望出发，而演变成为两大阵营的斗争场所，继而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操纵的讲坛。此外，还选用了钱其琛和叶利钦在联大的讲演。钱其琛的讲演表达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正常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叶利钦的演说中，我们亦可听到俄罗斯总统关于“联合国必须改革”的呼吁。

联合国秘书长乃是联合国机构的核心。在这一部分里，选收了赖伊、哈马舍尔德、瓦尔德海姆、吴丹、德奎利亚尔、加利等6位秘书长的演说，可谓辞切意深，令人深思。从他们的演说中，可以看出秘书长的工作之艰巨，历届秘书长力求献身于联合国事业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们对国际和平理想的追求。为此，我们同时选收了肯尼迪于1961年在联大为了纪念殉职的哈马舍尔德秘书长而发表的演说，和瓦尔德海姆于1974年在联大为纪念已逝的吴丹秘书长而发表的演说。

肯尼迪在演讲中说：“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死，问题在于联合国的生命。”这篇演说通篇读来使人浮想联翩，兴致盎然，不失为一篇成功之作。而瓦尔德海姆的演说则简短明了，情真意切，令人对吴丹的精神和人格肃然起敬。

联合国毕竟不只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它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机构。不管它在50年中有过多少次成功，多少次错误，更重要的还是要注视未来。这一部分选收的演说，不仅能使读者了解联合国的昨天、今天，更能使读者去思考它的明天。

维·米·莫洛托夫，苏联政治活动家。190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等职。1957年起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2年退休。本篇是他在联合国旧金山制宪会议上的讲话。

苏联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强 前力的国际安全机构 1945年4月26日

主席先生、各位先生：

苏联政府对于这次在旧金山召开的国际会议极为重视。战争快结束了，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次战争的主要侵略者即希特勒德国的溃败已成为事实。现在是关心战后、关心将来事情的时候了。这次会议将审议关于建立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机构的问题。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所担负的责任该是多么重大。今天正如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我们又不免要想起罗斯福总统的英名。他在为争取持久和平和准备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方面所作的贡献，博得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极大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军事行动规模、参战军队数量，伤亡牺牲人数，造成的巨大破坏及其使许多国家人民生活所遭受的深重灾难，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动这次战争的希特勒德国，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以迫使欧洲各国屈服于它的统治，并为德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开辟道路。

德国法西斯主义不仅把自己的军队和武器作为进攻和平国家的强盗手段，而且肆无忌惮地使数百万德国人的思想适应于对其它各国人民实行奴役的目的。他们那些极其荒谬的、憎恶人类的理论，即妄说所有其它民族都应该替“德意志优秀种族”服役的理论，就是为此目的而杜撰出来的。

希特勒主义在公然赤裸裸地侵犯各个邻邦以前，早就明目张胆地为罪恶的战争作准备，而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响应希特

勒主义的还有一些毫无廉耻的走狗和杀人不眨眼的同谋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原先在欧洲各国横冲直撞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势力，一闯进苏联境内，就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苏维埃国家在与德国法西斯势力浴血奋战中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因此，她现在完全有权利提醒各国政府，她们必须牢记这场战争结束后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未来命运所应负的责任。之所以必须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在这场战争爆发以前所发出的警告和呼吁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现在不用再详细考察此事的原因。没有证据可以说，有人曾经不愿意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有一点却是很清楚的，即那些曾以欧洲领导者自居的政府若不是表明了自己不愿意，至少也是表明了自己没有能力防止这场对全人类造成浩劫的战争。

这次会议应该为建立保障各国人民未来安全的机构奠定基础。这项伟大的任务至今为止尚未顺利解决。众所周知，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它曾使那些相信过它的人大失所望。当然，现在谁也不想恢复毫无权力和毫无力量的国际联盟，因为它不仅一次也没有阻止过侵犯爱好和平国家的战争，而且有时还直接麻痹各国人民，使他们丧失对已临头的侵略危险的警惕性。当有些人肆无忌惮地企图把它变为专供某些反动势力和特权国家利用的工具的时候，国际联盟更降低了自己的权威。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国际联盟的沉痛教训，那么也只是为了将来不再让人家用冠冕堂皇的契约作幌子来重犯旧的错误。可是，假如各国政府将来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国际机构，藉以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保障人们的国土与青年一代不致重新遭到强盗帝国主义的战争灾难，那末各国人民是决不会长此忍耐下去的。

苏联政府诚恳和坚决地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安全机构。苏联政府决心竭尽全力，来完成建立战后国际和平安全机构这一人类的共同事业。我们将同其它所有真正忠于这项崇高事业的政府实行全面合作，以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我们深信，不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征途上有着多少困难，经过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一有历史意义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去年，我们在美国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所做的尽人皆知的工作，乃是对于这一事业的重大贡献。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那里制定了国际安全机构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为新型的国际安全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不久以前，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根据美国伟大总统罗斯福先生的建议，对这一草案作了重要补充。所有这一切，为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当然，新的国际安全机构应该建立于联合国在这次会议所确立的原则上。

大家知道，各民主国家在欧洲反对共同敌人的艰苦斗争过程中结成了伟大联盟。由于苏美英三国联盟的建立，才确保能把德国法西斯势力及其走狗消灭。在这个伟大联盟领导下，欧洲其它各国人民也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争取本身解放的斗争。列强为坚决捍卫本国民族权利和为其它各国遭受残酷侵略苦难人民的利益而结成的联盟，正在完成消灭联合国共同敌人的任务。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一方面是由于它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是由于它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运用了本身所拥有的大量人力和物力。但我们应当牢记，要是忘掉某些消极的东西，如忘掉国际联盟方面的教训，或是忘记各民主国家在这次战争中共同对那个以欧洲主人自居、并几乎想把全世界征服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战的教训，那么已经树立起来的威信很快将丧失殆尽。这一联盟经历斗争烈火的考验，而且它对联合国的共同事业

也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不得不承认，苏联参加这一联盟具有非常重大和根本的意义，因为苏联是一个根据民族平等和真正民主原则彻底解决了各个大小民族相互关系的国家。美国积极参加这一联盟也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美国过去对国际组织从来是抱旁观态度的，现在她对这件事情却扮演倡议者的角色，并运用着她所拥有的巨大国际威信。这一联盟没有英国参加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英国在民主国家的国际领域中发挥着卓绝的作用。中国在亚洲方面和法国在欧洲方面都是巩固这个联盟的两个伟大国家，她们能保证这个联盟在战后时期也成为一种强大的世界力量。

假如各主要的民主国家在战后时期也表明自己能够协同行动，那么就可以说，国际和平安全事业终于获得了最可靠的支持和最有力的保证了。但这还不够。究竟其它各爱好和平的国家是否愿在这些主要的民主国家周围联合起来，以期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安全机构呢？这就是应在本次会议上解决的、于未来世界和平安全有利的问题。

问题在于要建立一个拥有一定权力以保障世界和平利益的国际机构。这一机构还应拥有武力以保障国际安全的某些必要条件。

只有当这种前提已经具备，破坏和平的行动或破坏和平的威胁不会免遭惩罚、且有相应的惩治办法的时候，国际安全机构才能担负起维护和平事业的责任。由此可见，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真正能保障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这种机构是早已为一切真诚主张国际和平事业发展的人士所渴望的，同时又是从来为最富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阵营中许多人所坚决反对的。

受过这次战争的浩劫之后，受过近几年来许多灾难痛苦之后，各国人民要求建立这种机构的愿望更加强烈了。然而，反对建立这种国际机构的分子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至今还在进行破坏工作，尽管他们现在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法。为此，他们往往利用表面上极为民主的口号和论据，乃至在口头上拥护弱小民族利益或拥护公平正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但归根到底，问题并不在于建立有效国际安全机构时，他们究竟运用何种理由或何种藉口来进行破坏。如果这次会议仍然不能建立此种保卫战后和平的有效机构，那么就将再次证明，运用现有力量还不能解决这项伟大任务。这决不是说，建立这种机构的时机尚未成熟；也决不是说，这种机构在将来也不会成功地建立。我们不应忽视建立国际安全机构的困难。在这方面，视而不见是找不到出路的。我们应当告诉大家要正视这些困难，以便将其克服，并要丢掉任何幻想，力求找到一条达到此崇高目的可靠道路。

同时，我要向这次会议坚决表示，我国全体人民对建立坚强的国际安全机构是满怀信心和决心的。同样，我还要向这次会议坚决表示，苏联人民将仔细地倾听世界各国所有诚恳地赞助这一伟大事业的人士的意见、愿望和建议。你们知道，苏联有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愿意拿起武器誓死捍卫自己的祖国。同时，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的人民也一心忠于建立巩固世界和平的事业，并决心全力支持其它民族在建立可靠的国际和平安全机构方面的努力。你们应清楚地知道，在保卫国际和平安全的事业上，苏联是坚定不移的。坚决拥护这一伟大事业的有我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有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有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代表团所肩负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向你们表明苏联人士所怀有的这种情感和心情。

我在结束演说的时候，特表示热烈希望我们大家能在这次会议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特吕格费·赖伊，联合国首任秘书长（1946～1953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历任挪威工会联合会法律顾问、挪威工党全国执行书记、司法大臣、商业大臣。1940年纳粹入侵挪威后，任流亡政府外交大臣。1945年代表挪威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著有《为了和平的事业》、《在联合国的七年》。本篇是他在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闭幕时的讲话。

联合国是许多人 梦寐以求的国际议会 (1946年12月15日)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联合国全体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处和本人的友好言辞。

请允许我向所有会员国在过去8周的时间中对秘书处和我本人所表现出的体恤和耐心表示感谢！你们已忘我地工作了8周。请允许我说，我从未见到过像你们这样从纽约乘车来到成功湖和弗拉兴草坪日以继夜地工作的人！

我记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摇晃国会》。电影给了我当时历史上的国际合作的某些印象。但是，回顾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大会第二阶段的会议，我认为你们向全世界昭示了各国代表能在联合国共事的范例。那么，今日之联合国与大约一百二三十年前摇晃的国会有何区别呢？

今天几乎每个国家，不管是大国或小国，都加入了联合国。今天联合国的代表来自每个国家的各个阶层，有工人、知识分子、各党派的政治家、共产党人、保守党人、自由党人，等等。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经过8周来的日夜观察，你们认为这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许多人曾梦想有个全人类的国际议会，我认为我们正在开始建设我们长久以来渴望的国际议会——按国民议会最佳原则建立起来的议会。

我们考虑追随民主进程。人们的思想有异，观点有别，但对大部分重要的问题，所见趋同。我们中没有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批人，能够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如他自己认为的一样百分之百正确。民主的议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妥协构成的，我认为你们在大会的进程中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

我可以这样说，今天比起今年2月我刚被选为你们的秘书长时前景更加光明了。

我认为我得感谢大家。此时此刻，我认为我的职责是向来纽约的外交部长们表示感谢，是他们解决了如此多的困难问题，我们占用了他们如此长的时间。

我们认为和平不仅仅是悬在空中的东西，而是多多少少正在初见端倪。我感到比以前心中更有数了。

我认为世界各国可以为他们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感到自豪。在此我特别要表达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意见，我向会议主席斯巴克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要向斯巴克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和万分感谢。没有您，我不知该怎么克服所有的困难，感谢您的耐心，感谢您对我、对所有工作人员的理解。

我还要对一批人说几句话。他们从来没有来到大会上，但他们坐在新闻发布会的边座。我认为，作为秘书长有权感谢所有记者、报界与电台人士。我认为没有哪一次国际会议拥有本次会议这么好的服务，他们自始至终和我

们呆在一起，常常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我表示赞赏的不仅是他们孜孜不倦的精神，而是他们所表现出的对于报纸和电台重要作用的高度责任感！

亲爱的各国代表们，你们行将归国见你们的家人和亲朋。祝你们万事如意。你们务必不要停止这种国际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你们国内的议会和官员中工作，如果需要，你们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努力地将联合国思想贯彻到现实中去！

译自《联合国文献选集》，
1946年12月15日，第68—70页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本篇是赖伊在联合国日发表的演说。

联合国五年来的经验教训

(1950年10月24日)

恩蒂扎姆总统，杜鲁门总统，尊敬的参加第5届联大的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

联合国宪章生效以来的5年对那些相信联合国的人们来说是进行斗争的5年，也就是努力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运用于国际生活现实斗争的5年。

我们多次感到失望。常常看起来快失败了。大灾难的危险总是伴随我们——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我们还没有消除这种危险，但我认为，我们已懂得一点如何防止这场战争及如何持久地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也开始懂得为什么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联合国都是和平所不可缺少的组织机构。

我们正在记取的5年来的痛苦的经验教训之一是，如果会员国将联合国看作仅仅是一种可以任意地加以利用或置于一旁的工具的话，那就不可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们正在吸取的另一个经验是，只要会员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将联合国的成功作为他们外交政策的真正目标，即使联合国就像今天这个样子，不作体制上的变化，它也是可以有效地为和平而发挥作用的。

我们正在吸取的第三个经验教训是要有耐心。我认为我们在尊重联合国的建议、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方面已开始取得一些进展，但要每个国家都这样做尚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要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那样提出各国政府行为的新准则，是一件很花时间的的事情。

我们不能忘记联合国宪章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原则。这一世界新秩序一方面必须使以战争作为改变现状的手段非法化，而另一方面要增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实现以和平方式进行改变和取得进展的机会。

在联合国所坚持的世界秩序中，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权利和愿望均同样地得到保护和尊重；在这一世界新秩序中，各个国家和人民将拥有改善他们在世界上地位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将使他们拥有更多摆脱贫穷和恐惧的自由度。

我相信在建立真正和平的世界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的机会比1945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好。如果我们想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我们就必须在各个方面高举宪章的旗帜。

我们必须在对付武装侵略方面有强有力的集体行动。我们还必须有坚强的决心一步一步地往和平地弥合依然分裂着世界的深而危险的鸿沟的方向努力。

今天，在联合国诞生5周年的时候，我想，作为秘书长的我向过去5年中在帮助联合国成为一个更理想、更强有力的组织方面作出过贡献的所有人们表示感谢是正确的，也是恰当的。

我们想到的是那些和联合国站在一起、支持其工作的会员国，我想到的是尽管遭到不少挫折但一直在以实现宪章为目标而工作的秘书处的成员，我想到的是世界各地无数人们，他们通过民间组织，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为联合国的前进呐喊。

在联合国 5 周年之际，我想到的是所有为联合国的和平献出了生命的人们及他们的家人——妻子、孩子和父母。第一批在光荣榜留名的人是两年前牺牲的，他们来自很多国家。在过去 9 个月里，光荣榜的名单又增加了不少人。如果我们有可能问牺牲者有何遗愿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要求为他们报仇。他们会要求我们坚持联合国原则，以实现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目标——在全世界实现联合国所主张的和平。

作为秘书长，我代表联合国总部对在过去 5 年中纽约市和纽约州的很多合作表示感谢，也感谢美国政府帮助我们在纽约设立联合国总部并解决 5000 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及各国代表的很多具体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尚有待解决，但我深信我们可以找到使美国和联合国均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一些国家的元首将参加联合国日的庆祝并将向大会发表演讲。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美国总统杜鲁门今天能亲自来参加大会。大家知道，美国被挑选为联合国总部的永久所在地。

这是杜鲁门总统第三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了。他本人在联合国开始组成时就参加了这项工作。就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 12 天，由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开创的伟大工程的重负落到了杜鲁门先生的肩上，他接过了继续这一工程的挑战。

他接过了担子，迎着挑战上。10 周以后，1945 年 6 月 26 日他目睹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他也被挑选为接受批准文件的国家首脑，使得宪章能在 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杜鲁门总统将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而载入史册，鉴此，我们今天向他表示敬意，而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译自《联合国文献选集》，第 355—357 页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约翰·F·杜勒斯，早年曾任律师。自 1944 年起任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1953 至 1959 年任美国国务卿。他是美国侵朝战争的主谋策划人之一。在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他一直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言论，为美国当时的政策服务。本篇是他出任国务卿后在联大讲坛上的第一次讲演。

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

(1953 年 9 月 17 日)

现在又和诸位聚会，我感到很荣幸。作为在旧金山的创始者的一分子，我曾分担了使这个组织降生的工作。过去各届大会我多半都参加了。在这届新的大会上，我感到很兴奋，能和你们当中许多人——为和平斗争的老战士——在一起。

美国是重新抱着决心参加大会第 8 届会议的，它决心要利用这个组织所给予的机会来促进和平与正义。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联合国具有深切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他常常说这样的话，并且还要我再说一次：他希望联合国成为日益有效的和平工具。

美国代表团将本着这种精神在这里进行工作。我们将尽可能清楚地说明我们认为解决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问题的公平正当的办法。我们认为美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不应当含糊其词。但是我们同时也恪守我们独立宣言中所表示的美国的信念：我们应当“对人类的意见予以适当的尊重”。我

们准备向别人学习。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见解也许不会总是被别人接受。在发生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将感到遗憾，但是不会生气。我们将竭力抱着冷静的态度来接受这种结果。我们知道智慧和德性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我们也知道，时间才能作最后的裁判。

我们将时时记住宪章对本组织的指示，要“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对这种协调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各国之间分歧的后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紧张局势这一事实是不能不加理会的。那样做将是危险而且不现实的。同时，对这种紧张局势的根源必须加以研究，否则就找不到纠正的办法。但是，不论美国在这里采取什么行动，它都将竭力避免会不必要地使目前这种危险的紧张局势加剧的任何言语和行动。

联合国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是，朝鲜战争进行了3年多，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到处都没有安全的感觉。由于这些事情，有些人说，联合国失败了。

我们必须承认，联合国没有实现它所抱的所有的希望。这大半是因为在这些希望之中有许多是不现实的。而之所以产生不现实的希望，是由于低估了在建立国际和平秩序和正义的道路上存在极大的障碍。联合国主要建立在曾为胜利而合作的伟大联盟的领袖们将会继续自愿为和平而合作的期望上。这种期望已被证明是没有很好的根据的。由于法西斯侵略而产生的这种联盟已消失了，当这种侵略被粉碎时，盟国的团结也便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分裂和新的恐惧。这种分裂和恐惧在朝鲜侵略发生时达到了最高点。

自然科学家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如果加以发展的话，可以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我说的这些话差不多是可以照字面去相信的。这的确是蕴藏在物质中的破坏力量、必须由人类的精神理想和人类的智慧加以控制。只有这种理想与智慧才能阻止我们免遭毁灭。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其中的许多问题又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任何问题都不能和使人类免于灭亡这一中心的世界性的问题相比拟。

各国都在摸索能使人类支配物质的精神和制度。不幸，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提供这种精神和制度。因此，一些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集团措施，以阻止侵略并保护它们所珍视的道德价值。在大家同意之下，这种应付措施包含共同使用设备，有时还把一国的军队驻扎在另一国之中。

苏联领袖们对这些安排表示不满。但是他们应当知道，或许他们也的确知道，集体安排是最不会成为侵略性的。完全在一个国家控制之内的军事力量可以只依照一个政府、有时甚至只依照一个人的命令就被用来进攻。分布在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除非有关国家一致同意则不能有效地使用；除非为了用来对付明显的侵略威胁，否则这种一致同意是完全不可能获得的。

集体防御体系有两大优点。它使甚至小国和弱国也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并且它保证甚至大国和强国实际上也不能滥用这种体系来进行侵略。这是一种开明的办法。我们宪章的目标就是凭藉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害怕的方法来获得促进的。

可能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害怕？我可以详细说明这一点。但是为了避免可能表现为挑衅，我只谈一件综合性的事实：自从1939年以来，约有15个国家的6亿人民已被纳入苏联独裁阵营，而这种事情的发生没有一次是由于有关国家和人民的自愿行动所促成的。在历史上没有更可怖的事实记载。

苏联新总理 在今年 8 月 8 日的演说中，两次提到了共产主义制度与非共产主义制度世界的和平共处。这种表示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我所提到的这种背景下，徒托空言是不能立即或完全使我们安心的。我们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话、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的学说规定利用这种话作为诡计。如果苏联领袖们老老实实的话，他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要让世界上有一种新气氛，他们必须要作出比以往所作的更多的贡献。

美国非常愿意探究结束目前紧张局势的方法。艾森豪威尔总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在寻求和平的工作中将永不厌倦或气馁。但是美国所作的事是不能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的，除非有一种相同的响应。

目前时局危急，这种时局允许、而且的确需要苏联领袖们更可靠地表明他们目前的意图。

整个东欧和中欧的局势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关注。那里的各国人民大体上都是信仰宗教的人民，他们大体上都是爱国的人民。他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这种信仰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持久而伟大的传统。曾经是独立的欧洲各国人民，感觉到他们已不再能按照他们的传统与他们的信仰而生存下去，这是不符合和平的利益或者我们宪章中的其它目标的利益的。

有人指责说，他们中间之所以有不安，完全是由于人为的外来的煽动。这句话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是真实的：信仰是有传染性的，即使有铁幕，也可以透过。美国人民正如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坚持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在独立宣言中所表示的信念，就是一切政府的正当权力只能由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而获得。而且，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我们相信：“这个宣言不仅给予本国人民以自由，而且还给予全世界以永久的希望”。政府必须建立在人民自由同意的基础上，任何和平如果否定这种观念，或者不给其他的人以相信这种观念的机会，那么这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我们不隐讳这种信念，而且美国的任何政府，即使需要的话，也都不能隐讳这种信念。

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要求我们输出革命和煽动别国人民进行暴动。让我强调这一点。我们认为，暴力造成的改变每每破坏了它将取得的东西。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和平改变的广大可能性上面。

我们希望，苏联的领袖们在为时尚不算晚的时机失去之前将认识到，对上帝的爱、对国家的爱和人类的尊严感是永生不灭的。镇压措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愤怒和痛恨，也许还会引起更加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人为的煽动，而是因为创世主对全体人类赋予了精神生活的活力。

我们可以了解俄国人民需要朋友的希望。过去，美国人民经常以慷慨的行动表现出他们对俄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可以了解，俄国人民特别希望有友好的近邻。我们也同情这种愿望。美国不希望看到苏联处于敌对国家人民的包围之中。但是，我们预见到：除非苏联改变它的政策，否则，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会产生苏联政策显然希望避免的那种四邻的仇恨与敌视。

使联合国这个组织更适合于我们的人民的需要，当然是可能的。他们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东西。他们希望有机会能够依照他们的良知崇拜上帝；他们希望有机会能够按照他们的理智进行思考；他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和旁人交换意见，凭他们的理智和良知说服人家和被人家说服；他们希望有权利安居乐业而无所恐惧；他们希望有机会能够过亲密无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树

立有价值而光荣的传统，并把这种传统传诸子子孙孙；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为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中，有效而创造性地劳动，并享受他们劳动的成果；他们希望有一个他们所同意的政府。当然，要满足这样的希望并击溃那种巨大的非人性的力量，并不是人类智慧所不能做到的。那种非人性的力量似乎专横地要求人类筋疲力竭地仅仅从事生产毁灭它自己的武器。

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的简单的希望之所以不能满足，是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存在。解决这些紧张局势不一定属于这个大会的直接权限之内。我所谈到的种种问题中，有一些问题是由其它国际团体负主要责任的。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是大会会员们所不能施加影响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谈到这些问题的原因。联合国大会是唯一的世界讲坛，是世界各会员国表明它们的态度场所。没有一个参加大会讨论的人能不感觉到道义力量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藐视这种影响。

在即将来到的时日中，我们能够——而且我想我们将那么做——形成一种力量，使各国向人民所渴望的目标走近一步。这应该是出席大会的各会员国超乎一切之上的努力目标所在。我可以向大会保证，这是我所荣幸地代表的代表团和国家的努力方向。

节译自《八届联大正式记录》

叶玉珍 译 小宇 校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第 44 任首相(1957~1963)。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1919 至 1920 年任加拿大总督副官。1957 年出任首相，1963 年因病辞去首相职务。本文是他在联合国 10 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论联合国

(1955 年 6 月 23 日)

……从过去国际联盟的失败中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教训。它的成就——它有很多成就——和它的缺点，构成了重建一个国际组织的坚实基础。自从 1941 年大西洋宪章发表以后，在剧烈的战争和混乱中，各大国奠定了建立联合国的基础。我们的一贯目标是要努力达到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共同的人性得到普遍接受，而自由将只能由法律的规则来加以调节。可惜，这种想象

的实现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但是，我们组织的创始人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忽视生活的冷酷事实。国际联盟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力量不能大于它的主要成员国希望它拥有的力量。他们认识到，联合国不能有效地起一种保障集体安全的作用，除非各主要国家同意使它起作用。在 10 年前的旧金山会议上，政治家们就已看到企图把联合国建成一种世界政府将是不切实际的。目前的世界没有建立这种政府的准备。它也不能成为战争大联盟这类的机构。他们清楚地看到，既然不能设立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就必须依靠说服、讨论与调解来解决争端，因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是不能以武力相逼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联合国不应该并且也不能有干涉各会员国内政的企图，这将使会员国和联合国组织本身避免遇到灾难。

创始者本着同样现实主义的精神了解到，这个世界组织不可能成为一个把敌视这个组织的国家以及它的盟国排斥在外的组织。实际上，1945 年建立

的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组织。它是一个可以具备普遍性的国际机构，这个机构现在包括了 60 个国家，这些国家都赞成宪章的一般宗旨，但是并不丧失它们的个性。

联合国可以正当地自称是一个世界组织，也就是说它应该完全表现为爱好和平同家的世界大家庭，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并没有达到这种理想。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也许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联合国要实现它的真正目标，那就必须在适当时期找出一个解决办法。虽然联合国的创始者是有先见之明的，然而他们却没能预见到世界会分为两个阵营。在 1945 年时，我们认为各大国之间将会有一些继续存在的和谐关系，以及它们将一起来确保侵略将永远不会再发生。安全理事会连同它的军队，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应该成为执行这个政策的最好工具。不幸的是，联合国的军队从未组成，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安全理事会本身一直未能履行它的真正职能。我认为，于 1945 年在旧金山时就能预料到的紧张局势竟迅速达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世界几乎分裂为二，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在今天这个场合判定责任是不适合的。但是，它所产生的后果却是联合国本身不能提供集体安全，而且，在各大国愿为此目的而实行合作以前，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度过了 10 个忧心似焚的年头。在这些年中，世界上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地区性战争，或企图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公然进行侵略的一次大胆尝试。在全世界所有人的头上笼罩着恐惧的阴影——害怕兵刃相见以及核战争的新威胁。

如果联合国不能有效地处理所有这些由于各大国间的紧张关系而引起的对国际和平的威胁，那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是一个两大集团都派有代表出席的世界组织。

因此，自由世界的国家一直不得不采取步骤以确保联合国目前还不能提供的安全。它们缔结了一系列的地区性防务公约，以便加强它们自己的信心，并确保有充分的力量去遏制、并在必要时击败任何可能的侵略者。这些特殊的防务组织显然是符合我们的宪章的。它们的目的是旨在加强而不是削弱或绕过联合国。

当然，联合国已经很成功地制止了许多地方性的战争。这些战争象星星之火，极易燎原。联合国在调解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且取得了许多成就。因为，联合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讲坛。在那里，经过耐心的讨论后，恐惧能够得到慰藉，怀疑得以冰释。只有通过思想的交流，才能消除误解，从而达成谅解的协议和采取必要的决策。

这种工作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为澄清和缩小关于世界裁军原则的分歧而作的努力。这种努力最近已在裁军委员会在伦敦召开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了进展和成效。如果对广泛的裁军方案能在相当时期内达成完全的协议，那必须要感谢联合国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即使是缓慢的——工作。

联合国进行的许多辩论有助于人们记住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他们鼓舞世界政治家们在全世界人民的殷切期望中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并不是也不自称为是谋求世界和平的唯一国际机构。没有人会要求一切国际关系事务必须直接在联合国之下进行。诚然，旧式外交方法也许更适合于处理某些国际问题。但是，不论它是直接或间接的行动，不论它是否作为对政治侵略者的一种威慑力量，或是作为对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人们的一种鼓励而采取的行动，联合国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及的。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曾经发生过很多次令人失望的事情，也曾经有过严重违背宪章的情形，但是联合国还很年轻。它已经证明它能够通过过去10年的经验而成长并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它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工作方面也有发展的余地。就会员国而言，联合国的主要价值是在于提高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灭颠覆活动，并对消除迅速滋长的愚昧与绝望给予鼓励和物质上的援助。我坚信，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经济和社会工作，虽然还不太出色，但却是建设一个和平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不论最近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组织必须加以维护、珍视和加强。联合国政府及其人民将继续努力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利用这个我们称之为联合国的国际合作机构，并使之日臻完善。尽管它现在离1945年成立时对它所抱的希望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能把全世界的问题全部加以讨论的唯一场所。目前，联合国为各大国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提供了最显著的作用。当然，它仍然在完善中。宪章所规定的愿望、希望和行为准则是符合世界要求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组织也是适合20世纪所需要的。

如果我们要想避免第三次、并且也是比以前更可怕的战争的话，如果我们要想保持和平并建立起人民的自由的话；我们就需要联合国。不论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因此，让我们一起来向将来看，不要向过去看，除非为了学习和应用过去的教训。我记得丘吉尔爵士在不久前曾说过的话：“应当宽恕过去，即使不能忘记过去。如果不能忘记过去，也不应当把过去作为将来的榜样。”这些话是明智的。作为“联合国国民”——我们60个政府去签署宪章时是用这个名义的——让我们重新致力于这个组织所怀抱的崇高目标和理想。我们并不觅求一个现成的乌托邦。让我们站稳脚根，让我们注视未来吧。

节译自《当代重要演说集》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达格·哈马舍尔德，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1953～1961）。瑞典人。法学和哲学博士。先在大学任教，后从政，1951年任瑞典国务大臣。1961年9月18日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61）。本文是他在联合国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和平 （1955年6月20日）

联合国应该表现出它的灵活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自由的条件；同样它也应该表现出共同一致的目标，这种一致是以和平为基础的。然而，近年来，过多的多样性成了分歧和敌对的根源，从而损害了与各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共同命运。

但在最近有可能表现出向较好的趋势发展，如业非国家在万隆召开的首脑会议，关于奥地利的协议，以及今年夏季将召开的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此次会议的合作精神将成为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理由重新抱有希望。

希望这个纪念会以及会议期间会员国政府之间的直接接触，将有助于使世界事务向较为平静的气氛发展，这种会员国之间出现的谅解趋势具有深刻的意义。

各国政府的决定，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影响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各机构把握局势发展的因素。决定之权操在它们手中。联合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像它的创始人所预朗的那种结果，即在一切情况下成为为争取和平而努力的中心，是有其原因的，这些原因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那些了解过去10年历史的人，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很熟悉的。但是，联合国的建设历程在过去10年中也在悄悄地进行着。我认为，我作为秘书长，在这里提请在座的诸位注意这一情况是适当的。

节译自《纽约时报》，1955年6月12日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民主党人。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第二次大战期间任海军上尉。1946至1960年间历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1961年发动侵略越南战争。1963年11月被刺身亡。著有《英国为何沉睡不醒》、《当仁不让》、《力挽狂澜》等书。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达格·哈马舍尔德死了，可是联合国仍活着 (1961年9月25日)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及来宾：

我们是在悲戚与面临挑战的时刻集合。达格·哈马舍尔德死了，可是联合国仍活着。他的悲剧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头，可是使他殉职的任务却置于我们议程的最前列。一位崇高的和平公仆不在了，追求和平的工作却仍在我们面前。

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的死——问题在于联合国的生命。它或则壮大起来应付我们这时代的挑战；或则随风消逝，没有影响，没有力量，不受尊重。如果我们让它死掉，摧毁它的活力，削弱它的权力，那便等于是自毁未来。

发展这个机构才是取代战争的唯一真正选择——战争已不再是合理的选择，无条件战争不再导致无条件胜利，它对于解决纠纷不再能有作用，它也不再仅是大国能过问的事。因为一场核浩劫，通过风、水及恐惧蔓延之后，大小、贫富、结盟与不结盟国家都会同样深深地卷入其间。人类必须消灭战争，否则战争将消灭人类。

因此让我们在此下决心使哈马舍尔德既未白活，也未白死。让我们叫恐怖停止。让我们祈求和平之福。而且当我们在缔造维持和平的国际力量时，让我们共同一致解除国家进行战争的力量。

联合国在这方面需要新力量与新作用，因为没有查核的裁军形同虚设，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只是空壳。联合国已成为人类最为宽容的气度的尺度与工具。它已在中东、亚洲、非洲——今年又在刚果——提供控制暴力的方法。

但是这一机构在1945年所遭遇的重大问题仍摆在我们面前：是否让人们们对进步及和平所怀的厚望被恐怖及分裂所毁灭，是否能及时驾驭“战争的恶风”以便受到理智的凉风的吹拂，以及是否履行或藐视我们的宪章立下的关于保卫和平、进步、人权与世界法律的种种誓言。

在这会堂里没有三派势力，只有两派。一派是由想建造宪章第一和第二两条里所叙述的那种世界的那些国家组成。另一派谋求建造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久而久之这个机构将被它所破坏。

今天，尤其是今天，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对宪章的奉献。不过要加强这种奉献，首先必须遴选一位才干的卓越的公仆担任秘书长的职务，一位既有睿智义有魄力，能使国际社会的道德力量变得有意义的人物。已故秘书长曾经培养并且加强联合国采取行动的责任。但是那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宪章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仍然有这样的规定。

不论填补哈马舍尔德先生的遗缺有多难，由一人填补比三个人填补好。连三头马车也不会由方向各自不同的三名马车夫驾驶，它只有一名马车夫，因此，联合国的最高行政官也必须只有一个。在联合国的行政部门里设立三个委员会或设任何小组，或是任何方式的轮流执政，都将使联合国失去秩序而酿成无政府状态，工作瘫痪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失去信心而产生混乱。

秘书长实际上可以说是联合国大会的公仆。削弱他的权威，便是削弱国家不论强弱而在里面一律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唯一组织的权威。在所有强国讲公正之前，弱国只有倚仗本大会的力量才能得到安全。

有效而且独立的行政措施与平衡代表权并非同一个问题。自从联合国创建以来，这机构的成员已有巨大变化，凡迅速检讨并修改联合国各机构的组织的任何努力，美国代表全都愿意参加。

然而要是让这机构变成三驾马车，允许每一强国都可以决定和它本身有关的事件，那么冷战将盘踞这和平总部。这样一个计划无论对身为列强之一的我国有什么好处，我们都拒绝之。因为我们喜欢自决时代的世界法治远甚于喜欢集体灭绝时代的世界战争。

节译自《肯尼届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1961年9月25日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早年曾就读于杜克大学法学院。1937至1942年在惠蒂尔城当律师。1942年参加海军，历任中尉、上尉、少校，1946年退役。1947和1949年两次当选为众议员。1950至1953年任参议员。1953至1961年任美副总统。196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回故乡重操律师旧业。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1974年8月10日因“水门事件”而辞职。主要著作有《六次危机》、《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等。本篇是他在纪念联合国成立25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走和平竞赛的新路 (1970年10月23日)

尽管在过去25年中，联合国做了不少事，但国家之间的合作还差得远，和平这个中心问题也未获得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核大国之间的关系，除非美国和苏联表现出能使他们的关系符合人类愿望的意志和能力，否则就不可能解决。美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带根本性的分歧。他们在很多方面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和平的和有创造性的竞争。在他们的关系中起作用的实力，应加以控制，应用于和平目的。

有四个因素为美苏合作提供根据：谁也不想打一场核战争；军备的代价太高昂；双方均是工业国，可以通过相互的贸易得到好处；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可以将它们的竞争引向创造性的方向。美苏能为世界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限制他们的毁灭世界的危险，能够使更多的资源用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工作中去。

大国可以被无意识地卷入冲突中去。比如，在中东，和平的责任是在当地的国家身上，但两个主要大国在中东的行动必须有利于加强和平的力量。美国敦促继续停火，并确立信心，以便进行和平的努力。我们邀请苏联领导人一起来走一条新路——进行和平竞赛而不是军备竞赛、并传播进步。

防止进一步扩大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鸿沟是符合世界的利益的，帮助联合国发展实际的方法来维持和平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保存和恢复我们的自然环境；把海洋资源用于为全人类谋福利；确保人口的增长不影响生活的质量；制止贩毒；制止空中劫机行为和制止对外交人员的绑架和杀害；保证战俘的人权不被剥夺。只要成员国有此愿望，以上这些均是联合国可以取得很大进展的领域。人们敦促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往前走。美国将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不管有多少分歧，也不管情况如何，世界人民要和平。让大炮无声无息吧！在东南亚，让我们同意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在中东保持停火，建设和平。通过军备控制协议，我们可以进行有利于和平的投资。不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还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均应表现出有利于和平的相互尊重。我们应该下决心在未来的25年中让联合国给世界以一整代人的和平。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0年第10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英迪拉·甘地，印度前总理（1966～1977，1980～1984）。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学习并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38年加入国大党。在1952年印度首次大选中，随父参加竞选活动。1959年2月任国大党主席。1964年尼赫鲁逝世后首次入阁任新闻广播部长。1966年1月出任总理。1907和1971年两次蝉联总理。1979年3月在大选中失败，辞去总理职务。1980年1月、在大选中获胜，再次出任总理。1984年10月31日遇刺去世。本篇是她在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联合国遭受着当年国联同样的弊病的折磨 (1970年10月23日)

联合国遭受着和当年国联同样的弊病的折磨——有人企图指挥和控制其活动，将其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形式这一条仅仅在名义上被接受。强国滥施淫威，无情地企图扩张其势力范围。强国将它们的军事承诺延伸至新的地区，又不可避免地遭到其它大国的反击，过去25年中所打的那些局部战争就是这种政治所结出的苦果。

在中东所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允许用武力将国家边界改变。用武力占领的领土必须退还。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支持安理会1967号决议。

必须在尼克松总统的建议和越南南方临时政府的建议之间找到某些共同点。印度希望双方均不要把自己的意见看作是无可更改的最后立场。也许一项从越南完全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协议——从美国撤军开始——会导致有目的的谈判。

如果联合国解体，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同样目标的国际组织来替代它。所以，让我们向这个组织注入新的意义和目的，这样它可以创造出一种如使用武力便会自取其辱的秩序。

由争取民族独立而掀起的伟大革命斗争并没有完成。有些国家还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联合国必须设法解放这些国家，并实现种族平等。印度不能对向南非供应军火置若罔闻。彻底废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先决条件。

离开了经济机会的政治自由是不完全的自由，而更多的经济机会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有可能。即使少量裁军也可腾出大量的物资和技术力量。

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它们的缺点，但它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富国在资金流出问题上的态度和将穷国拒于其市场门外的做法。只要技术上的新殖民主义还存在着，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就很难成功。

对第二个发展10年的充分支持就能为宪章目标的实现作出实际的贡献，就能使人们对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信心。不论这个战略成功与否，发展中国家均不应成为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是应该尽最大努力，在相互之间发展贸易和合作。

有些国家用人力，财力加宣传将其经济观念强加于其它国家。联合国不应当自动地接受这种前提。每一个问题均应从其背景角度加以考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抛弃其经验。它们的发展规划必须从其本身经验出发。

人们越来越明白，技术和专业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能丰富人类的特点。如今迫切需要对世界的资源、经验和人类的创造力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我们的时代震撼着人们的是人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觉醒。

发达国家也有来完成的革命：妇女解放运动，年轻人的反叛，大学里的骚动，黑人和有色人种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目前这种残酷无情的行为能被引上正路，那就可以树立历史的榜样、使人类获得新的发展方向。

今后 25 年将对所有国家的领袖和人民提出很多要求，也会对联合国的管理人员提出很多要求。很明显，会员国应重新对联合国的理想作出承诺，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制订出必要的计划，这可能有助于避免旧世界所犯的错误。

联合国应该保证从探索外层空间生命的本质所获得的资源不仅仅用于增加个别国家的财富，而要为人类大家庭的福利服务。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0 年第 10 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库尔德·瓦尔德海姆，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奥地利联邦前总统。1936年高中毕业后加入奥地利军队服役，不到一年退伍、入维也纳领事学校读书。毕业后到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1939年应征入德国军队，1942年受伤后退役。重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奥地利外交部政治司任职。1951年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和人事处长、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加拿大公使和大使、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和政务室主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8至1970年任外交部长。1970至198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6月当选总统。著有《奥地利的精神》。本篇是他在纪念前秘书长吴丹大会上的讲话。

吴丹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联合国

(1974年12月2日)

吴丹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联合国。他具有献身精神、深深的信念和精神素质，始终恪尽职守。他在1961年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是在联合国因前刚果（现扎伊尔）的局势而经历着深重的史无前例的危机的时刻。联合国秘书长办事处本身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这场危机造成了联合国成员国之间严重的分裂和分歧。吴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力图在这些分裂和分歧之上架起一座恢复心平气和融洽的桥梁。在随后的二年中，刚果局势的发展依然是秘书长主要关心的问题。

1962年吴丹在解决占巴导弹危机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场核国家之间发生的最为危险的对抗。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部队是在1964年该岛受尽暴力和争斗折磨的时候组建的。1965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时刻，吴丹前往南亚次大陆进行调停以实现停火。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开始了长时期的个人努力，帮助结束越南的悲剧。吴丹在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最后几个月中为1971年南亚次大陆的局势呕心沥血。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他那沉静、坚毅的品格起了作用。由于他从不装腔作势，表面沉静，不想马上引起社会轰动，因此他的办事效率往往被缩小或忽视。他敢于对困难问题坦陈己见，他无畏地走他认为正确的道路。国际社会不仅对此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一致地推举他连任秘书长一职的事实来看，是对他的正直和人格表示的极大赞赏。

除了承受政治方面工作的巨大压力外，吴丹对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道问题方面的工作也深感兴趣。他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远远超过其前几任联合国领导者们的期待。吴丹是这方面发展的不倦支持者。他始终不渝地对国际社会提出警告：迫切需要的在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进行合作有失败的危险。

吴丹最重要的品格是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他认为在日趋复杂和人口众多的世界上更应如此。他主持联合国工作的10年是世界上混乱、困难的10年。人们将记住他的成就和他的坚毅不拔，也将记住他是一个明智、诚实的人，对世界的进步、正义与和平事业充满勇气的人。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11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鲁外交家、政治家，联合国第 5 任秘书长。出生于利马，毕业于利马天主教大学，主修国际法。1940 年进入外交部。1960 年起历任外交部法律和人事司、礼宾司、政治事务司司长，驻瑞士大使、奥地利公使、驻苏联大使兼驻波兰大使。1971 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安理会代表。1981 年 5 月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82 年 1 月起任联合国秘书长，1987 年改造连任。

从言词走向行动 (1983 年 9 月 12 日)

我在去年的报告中，对联合国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的工作情况及改进其工作的途径提出了意见。对我的建议，大会进行了广泛讨论，安全理事会进行了十分详尽和长时间的讨论，我对此表示感谢。目前确实急需建立能够处理我们时代各种严酷现实的国际机构。尽管大会对我去年的报告表示兴趣，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也决心要改进和加强安理会的工作，但去年的发展情况远非令人鼓舞。我认为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对世界某些重大问题进行新的集体审视。基本问题仍是建立和支持某种国际安全体制，作为推动裁军和限制军备的必要补充，以及在最高一级加紧努力，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增长和发展。

当前有若干问题影响着国际和平、安全和合作，急需有一个合作努力的中心机构，使各国政府能够通过这一机构控制冲突并找出解决办法。尽管许多国家作出了种种努力，但 1983 年至今，对寻求和平、稳定和正义的人们，对相信联合国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现有的最好国际机构的人们，都是令人沮丧的一年。我相信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日趋衰落的势态必须加以阻止和扭转。

联合国宪章将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所有国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此目的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的承诺明显置于优先地位。正是对这种承诺的削弱，大概甚于其它因素，导致了联合国这一国际和平与安全护卫机构的部分瘫痪。

不仅如此，当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和区域冲突相交织并使其激化，本就带有破坏性的这种争端就更形恶化，纷争行将扩大，前景凶多吉少。有时候这一过程竟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许多区域冲突已被视为强国之间通过代理人进行的战争。遇有这种局势，联合国的各审议机关往往被置之不顾或避而不理，甚至只被当作对骂的讲坛。

无论安全理事会或其它国际机构，都不能在各种情况下均期待在短期内解决涉及当事各方之间以及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之间重大利害关系的尖锐国际冲突。但根据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协助各方寻求国际争端的解决办法。但首先安理会有责任确保这一过程是和平的过程，以免危及更广泛的和平。安理会各理事国即使对某一问题的是非曲直存在深刻分歧，他们也有责任找出控制局势、不使最后解决办法受到损害的途径和方法。从这一点看来，控制冲突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职责的一项基本内容。

对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和其它当事方本身而言，首要的义务是在争端的所有阶段同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合作，以适当形式控制冲突。然而各方是否愿意同联合国合作，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联合国作为有效的和公正的和平工具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只有具备了上述的关键条件，各会员国才会认为当出现麻烦时，它们可以依靠联合国帮助恢复或维持和平状态，使各种基本问题得

以协商解决，成为文明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的主要目标，除了控制冲突以外，还应逐渐制定一种对付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的有效共同办法，协助冲突各方以及必要时对其施加压力，以便公正地用和平手段解决其分歧。这样的一致方法需要有使人心悦诚服的大智大慧，在必要时，还需要有实际的斡旋能力。这的确是制订宪章的人所考虑到的解决重要冲突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要在实际上发展成一套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以便消除军备竞赛、军事及其它形式的冲突以及最终灾难的内在危险，还任重而道远。归根结底，这就是宪章的基本思想。

遗憾的是，我们正陷于对截然不同的情况习以为常的危险。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对手头上问题的看法往往壁垒分明，对相互之间的反应又忧心忡忡，因此很难就如何着手处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发生这种情况实在是太经常了。我们在考虑如何改进联合国的工作时，必须优先注意使各会员国在国际和平受到威胁时团结一致、相互合作。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威胁的重要地位应当是超乎各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之上的。安理会的基本作用必须是防止武装冲突和寻求解决办法。否则，它对重大问题只能是旁敲侧击而已，最终世界可能像过去一样，因为没有接受历史教训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这种分析看上去太理想化了，那总比另一种行动方针好，那种行动方针由于派别偏见，存在着将地方冲突上升为世界性对抗的危险。事实上，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一种共同方式的习惯可能导向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弥补我们国际社会当前的巨大分歧，在诸如裁军和军备控制这类关键问题上力挽狂澜，都是十分重要的。

今年我们看到了安理会在一些具有高度爆炸性的问题方面维护团结和采取现实态度的令人瞩目的努力。我特别想到的是，安理会对于尼加拉瓜的控诉和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过程显示了在困难和有争议的问题上建设性地谋求一致意见。这确实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但下一步可能更加困难，这就是给予安理会的决定以必要的影响和动力。

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努力从言词走向行动。在这方面，同时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所表示的意见，我已在这一年期间随时将委托给我的职责和我履行这些职责的努力通知安理会。我还在秘书处内部创立了各种步骤，以便在问题萌发之前就能有所警惕。我盼望与安理会进行合作，以便发挥出在潜在冲突地区调查事实的一种更广泛更有系统的能力。

我作为秘书长，负有各种使命，要竭尽全力与各方进行接触，并且就种类繁多的、无人能够解决的各种问题提出报告。决议一项项地通过，有时需要提出报告，而这些报告又将构成新的决议的基础。这种过程往往取代了行动，事实上适得其反。我想再次敦促，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和政治上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各种问题。我欢迎朝这方面发展的任何趋势迹象。

自然，我和同伴们都尽力设法处理本组织所收到的各种重要问题。但是我不能不感到，联合国关于重要问题的决定所需要的并不止于这点，我认为各种机构的决定应当是政府的关心和行动的先导，而不是其结束。

当我作为秘书长致力于解决这个或那一个问题时，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有些国家政府对其本身在联合国所参与的决定有时并不怎样重视，这点使我深感不安。反过来说，去年我访问了许多国家的首都，发现对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的基本信念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这使我深受鼓舞。我想在这里尽量强调地重申，走向加强联合国的基本的第一步，将是一切国家政府有意识地对宪章重新承担义务。在维护和平这样一个捉摸不定却又至关紧要的目标上，亟需有一种共同分担的目的感和方向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38 年，争取建立有效、和平以及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动力似乎已经松懈下来，发展与当前的现实和风险相应的国际机构的动机似乎也日趋微弱。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真正的政治意志已经在各式各样的竞争、对抗和冲突中烟消云散。对共同运命的信念几乎在目前令人忧虑的四分五裂的同势中丧失。短期的国家利益、过去的怨恨和恐惧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遮盖了宪章的高瞻远瞩。在大多数冲突情况下，求同存异的意志似乎很微弱，甚至不存在；另一方面，从国家安全的考虑来衡量世界事务或将它视为意识形态力量之间大规模无休止的斗争的看法，似乎取代了宪章所构想的那个新型的开明国际社会。

不可否认，我们经历了一段世界发生基本变化的时期——地缘政治的变化、技术变革和具有战争性质和规模的革命变化。但是，面对这一切，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恢复而不是放弃战后数年间那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风范。究竟谁会相信一个由核均衡主宰着的世界，一个在军备上每年耗费 8000 亿美元而大部分人却在赤贫和绝望中生活的世界是走在正轨之上？然而荒谬的是，至少在目前，就许多主要问题而言，为处理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联合国，却经常陷于抽手旁观、束手无策的境地。

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多边外交的价值被怀疑、国际机构无法发挥它们本来的作用的时期。机器在开动，轮子在转动，联合国理应向前进，但它却停滞不前。联合国的情况是如此，在不同程度上，各区域组织和许多国际机构与集团亦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双边外交和多边努力显然填补不了空缺，不能提供稳定今后局势和普遍国际利益所必需的那种将国家政策相互联系起来的力量。我们必须设法再度开动机器。否则，在新的国际风暴里我们就会有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和毫无准备之虞，而我们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风暴。

让我们在这里指出一个令人鼓舞的源泉。也许最能代表这个鼓舞力量的是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主席英迪拉·甘地总理的建议——应以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来加强联合国，集体地重新审查一些主要的世界问题。在人类关系史上的这个关键时刻，令人鼓舞的是不结盟运动积极提倡采取多边办法，大力拥护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种看法决不仅限于不结盟运动。在同世界各地许多领袖的会晤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家显然都希望联合国发挥它本来打算发挥的作用。

因此，建立一个旨在为全世界提供和平、安全、稳定和正义的国际体制的历史努力，被目前的竞争弄得四分五裂，并受到腐蚀，实在是一大讽刺。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尽管在短期内，没有这种努力，世界还可能勉强这样应付。但从长远而言，如果我们要避免前所未有的混乱和灾难，就必须有这样一种由所有国家作出积极的政治努力而发展成的体制。这不仅是为了应付当前的冲突问题，同时也是为了给将在拥挤的地球上生活的后代建立一个可行的体制。

节译自《联合国纪事》1984 年第 1 卷第 1 期

刘珍 译 叶图 校

吴丹，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1962~1971），缅甸外交家。仰光大学毕业后，赴英国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事教育事业。战后任政府新闻广播官员，并任缅甸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著有《国际联盟》等。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记者协会为纪念哈马舍尔德举行的年度午餐会上的讲话。

秘书长的作用 (1971年9月16日)

10年以前的明天，达格·哈马舍尔德死于非洲。他在联合国8年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办事处在国际生活中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地位。他是在联合国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有关其性质和作用的争论达到高潮——这争论至今没有解决——之时逝世的。今天，我将谈到在哈马舍尔德逝世10年以来我作为秘书长所起的作用和我作为他的继任的经验体会。

哈马舍尔德带给秘书处的是学者、幻想家和富有公共事务实践经验者的天赋。他把这些天赋生气勃勃地、现实主义地用于秘书长工作上，他抓住国际生活的挑战和机遇，发挥了联合国作为多边外交工具的潜力。他是一位技艺非凡、感觉敏锐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个不屈不挠、谋略超群的谈判好手。他干的一切工作是基于透彻地研究将要面对的问题，深刻地调查处理这些问题将遇到的困难。在其学术生涯中掌握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学识经常在实际运用中得到检验和提高。他具有把握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把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秩序的萌芽体系的无与伦比的睿智。

这些伟大的天赋再加上他的人品，使哈马舍尔德成为世界上非凡的人物。他感到当秘书长是尽其天职，是用一切力量和技艺解决问题。他虽然称不上道德家，不爱对公共问题在道理上评头论足，但他刚正不阿，看法坚定，对什么是正确的从不糊涂。他知道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替代个人的勇敢和坚定；他贪己严，待人宽。他对公众舆论和批评虽很敏感，但他为名望之故，从不以原则作妥协。

某些人品造就了哈马舍尔德誉满世界的特殊地位，从他逝世后出版的《印记》一书可以看到他为那些追求和平的人制订的某些准则。对于我们为联合国工作并为更美好的世界斗争的人来说，这些准则仍然有效。

哈马舍尔德写道：“了解你自己行为涉及的范围比了解别人的动机更重要。”

“其他人的‘脸面’比你自己的脸面更重要。”

“假如以另外的原因为由，你同时为己有所谋，那就不可能指望成功。”

“你能指望找到持久解决冲突的办法，只要你客观地了解他人，但同时必须主观地经历他人的困难。”

“‘爱人民’的人，应一劳永逸地清除掉藐视人民的人。”

“所有第一手经验是宝贵的。不再执着追求的人迟早有一天会发现缺少他所需要的。闭关自守的思想是个弱点。对于在了解他人或鉴赏诗画时再无学习新的语言、了解他人生活观点的兴趣的人，就要让他觉悟。”

“成功的谎言是加倍的谎言，必须纠正的谬误比真理负担更重。只有不屈的‘刚正不阿’，才能使你找到你老是期望找到的即使埋在深层的恶言下的体面的岩基。”

“外交‘策略’永远不是害怕声名狼籍之托词：即以牺牲现实为代价寻

找表面影响。”

每位秘书长将自己的人格、思想和方法带到了联合国办事处。历任秘书长的努力与经验和成功与失败，构成了多年来联合国办事处在联合国宪章总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而宪章的根本宗旨仍然在。但情况在变，新的发展机会出现了，而有时出现新的困难。一任秘书长能办到的事情，其继任不一定再能办到；而继任办得到的，其前任也不一定能办得到。有时候要求行动、活力和改革；而另一个时候，各国政府像躲瘟疫一样避开他们。联合国办事处需要经过考验或在错误中得到发展，要适应过去几年的要求和挑战。历届秘书长必须将他继承的机关建设好。如果他不指望重塑前任们的辉煌，那么，也就不会害怕重犯前任们的错误。

没有一位秘书长担负得起丧失对人类社会负有的广义的责任感——即努力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竭尽所能改善各国社会的一般条件——的罪责；哈马舍尔德时刻恪尽职守。而我本人在任 10 年间，把它视为来不得丝毫马虎的首要法则。秘书长是否代表——或是应努力成为——人类的良心，是可以争论的，但他当然必须永不丢失强烈的正义感、仁慈感、人的尊严感。

秘书长另一个永远不能丢失的品质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紧迫感。按宪章规定，秘书长正在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上运作，那里尽管思想和科学技术在变革，尽管明显存在放纵的民族主义的威胁，但是民族利益仍然占支配地位。秘书长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工作，因为这些主权国家事实上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民族主义势力常常导致他们之间彼此越来越激烈的角逐争斗。

秘书长的世界有两个极——一极是极端理想主义和宪章规定的全球目标；另一极则是重实效的国家彻头彻尾的自私性。秘书长在这两极间周旋，负不起丢掉哪一极的责任。我猜想，这就是为何首任秘书长赖伊在可理解的局势恶化的时刻，把秘书长职务称之为“世界上最办不到的工作”。我虽不同意他的评价，但很容易理解他的意思。

在每一个紧急关头，秘书长的活动对某几个国家政府似乎显得太多，而对别的政府又显得太少。秘书长必须以宪章为指南。如果碰上运气，他或许能够以他的审议机构的指令为指针，穿过相互冲突的国家政策的密林。但即令有审议机关的指令，也不能确保他逆某些政府的反对而动，因为对有争议问题作出明确坦率的决议，必然包括某些妥协、沉默不语或者含糊其词，联合国机关是不太愿意这样措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府让秘书长干什么或不干什么与其它政府和国际舆论对他的期待之间常常存在很大分歧。在困难时刻，对各国政府和报界随意作出的词藻华丽的判断和道德宣言，秘书长必须要发伪誓，如他跟一些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合作，而通过此种合作最终会取得某些结果。假如秘书长拒绝作出公开的道德评论，那么人们就会谴责他麻木不仁或者更甚。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人道主义考虑、政府的敏感性、宪章原则组成了无法解的方程式，不过在种种情况下秘书长必须继续设法解决之。我认为这就是赖伊心中想的。

不断有这样的错觉：秘书长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与政府首脑相当，秘书长理应采取鲜明果断的措施解决公然蔑视 127 个成员国政府集体智慧的问题。而实际情况当然是联合国和秘书长没有掌握任何主权，也尤独立的权力。秘书长虽则有权，而且必须保持独立判断，必须永不当某国政府或某政府集团的代理人，但没有议会给秘书长制定详尽的可施行的法规，也没有内阁总理拟制精确的、持续不断的指示。秘书长的行动步骤没有明确的政策作依据。

秘书长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常设机构支持，缺乏政府赖以制定计划的第一手信息源。秘书长经常要面对目前的冲突、未来的问题作含糊不清的指示或者根本没有指示。而预算又太少。如果要执行维持和平任务或者大规模的赈灾，所有资源仅是基本靠自愿捐献。这些就是对秘书长职务的某些限制。

宪章短短的 5 条（97—101 条）规定了秘书长作用的法规基础。第 97 条规定秘书长是该组织的行政酋长。这本身超过了专职工作。有时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联合国要处理的主权政府的问题，其中许多是几百年的老问题，而联合国仅创建于 26 年前。一方面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官组织，并在效率、权限和诚实之间维持必需的平衡；另一方面又需要公平合理的地理分布范围，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挑战。要处理堆积如山的行政与政治事务，使复杂的、刚萌芽的国际文官体系在日常的世界性政治进展和其它进展的背景下确实实地起作用，可以说是件任重道远的工作。跟我的前任一样，我常常有理由感到遗憾的是，来自其它方面的压力使秘书长很少有时间从长远角度考虑对联合国机构成功发展和实绩有决定性影响的任务。

第 98 条规定了秘书长的职责。这规定大大不同于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秘书长不过问政治的概念。第 98 条规定安理会、大会和其它主要机构可授予秘书长没有明文规定的“其它职责”，将秘书长及其秘书处推上政治冲突的舞台。正如我刚才所说，即令最直言不讳的决议也往往包括含糊其词和种种妥协，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部分，多数有争议的决议就不可能得到通过。这样，秘书长常常不得不按第 98 条规定要求采取某一个政府或另一个政府不喜欢或反对的行动。秘书长唯一的行动指南是尊重投决议票的大多数会员国的意向和判断，运用宪章原则处理面临的局势，并且深信即使对决议有不同意见，秘书长的诚实将得到尊重。我自认为幸运的是，在我任秘书长的 10 年内，许多国家政府前前后后在我对主要机关所作决议或所采取的行动表示异议时，也都承认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我强烈地感到，秘书长尽管对任何问题有个人看法，但他有义务贯彻执行联合国主要审议机关的每项决议或决定。我多次说过，在联合国的会员国遵守联合国的规定，真正注意到它的决定或者决议之前，联合国不可能成为其创始国所期望的那样的有效工具。这在处置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形势——比如中东问题时，尤为正确。中东问题之所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并不是由于联合国没有作出决议，而是由于联合国会员国们不遵守这些决议。在这方面秘书长别无其它选择，尽管这会暂时影响到他与个别会员国的关系。秘书长也不可能由于联合国机关的含义似乎不切实际或者不公正而设法避开之。联合国组织只能通过对集体决策的体验和合作来培育和发展一种责任感。在此过程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另一个基本过程是纠正这些错误，然而至今联合国活动中纠错之举屈指可数。

宪章第 99 条明确规定了秘书长本人的政治责权。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对第 99 条作了如下解释：

“秘书长可以起调解者和许多政府非正式顾问的作用，毫无疑问将时时要求其履行行政职责，执行可称为政策的决议。此外，宪章第 99 条还授与了其它任何国际组织首脑所没有的特权，即可以将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任何问题（不仅争端和局势）、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虽然无法预料这一条怎么使用，但是授予秘书长的职责将要求他具有政治上老练得体和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这实际是秘书长可按第 99 条的意思办事的唯一官方

指南，足以令人惊奇的是旧金山会议通过这一条时没有多少辩论。有权把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是指就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调查及进行非正式外交活动监察和广泛的处置。第 33 条告诫各方自己选择和平手段解决任何争端，是跟第 99 条规定的秘书长的职责相关连的。

宪章第 99 条既有深远的意义，又含糊不清。仅有一次，秘书长求助于这一条款，即哈马舍尔德根据这一条召开安理会有关刚果问题的会议，这一条以及对于秘书长日常政治作用的规定，是极为重要的。1966 年 12 月，安理会请我继续当秘书长，大会主席告诉我：安理会成员“完全尊重秘书长在将联合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和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提请他们注意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我继续按照我对宪章第 99 条的解释办事，最近向安理会主席递交的关于东巴基斯坦和邻近的印度省邦的局势备忘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秘书长采取独立主动行动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宪章第 99 条使人坚信，秘书长必须关注任何对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并有义务尽其所能减轻之。

当然，有许多办法按宪章第 99 条规定履行秘书长的广泛而含糊其词的责任，这些责任必须从秘书长职务性质的来龙去脉通盘考察，因为它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在起草宪章的初期，罗斯福总统建议联合国首长应称为“仲裁人”（Moderator）。我不知用哪个更贴切的简洁的词语描述我对联合国办事处的看法。我总以为秘书长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在于宪章第 1 条第 4 款规定的集中精力发挥联合国的协调作用。我努力使用我的办事机构，以重要任务所需要的审慎，减轻不必要的害怕和猜疑，沟通争执各方之间关系，尽我之所能弥合东西方的鸿沟。我怀着这样的目标，一直努力理解所有有关政府并保持合作关系。甚至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简单而得人心的方针会出偏差以至需要作一番公开评判。我倒希望在写详尽的记录时，这种持续不断的、审慎的活动会对世界和平和了解我们的时代作出某些贡献。

我从不怀疑，应牢记宪章第 33 条，即使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其它机构没有授予特权，秘书长也必须通过斡旋解决争端或者克服困难。1969 年 3 月，我向安理会主席指出了赤道几内亚事件。我告诉他，根据有关政府的请求，我想派代表去赤道几内亚，而这决不是与他相商，我仅是根据约定俗成的做法采取行动并将我正在办的事向安理会备案。

斡旋有是为时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分歧酿成严重危机，将敏感问题解决在其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之前。在过去此类预防性外交比起任其发展到严重阶段再试图解决要有效得多——有时又便宜得多。这要求有关各方审慎合作、克制和友好。这还要求他们既有勇气又有远见卓识，相信秘书长的审慎处理和他的诚实。当具备这些条件时，很多事可以悄悄地干。解决巴林问题就是恰当的例子，最近安理会一致同意巴林申请加入联合国。

秘书长还有些值得一提的作用。可是，我觉得——而且我过去常说，世界人民应该清楚这一过程意味着什么，这个过程是联合国特性的一部分，是各国政府利用联合国方法的一部分，是联合国机关对局势的处理的一部分。联合国没有任何主权标志，开展工作时必须用说服、辩论、谈判，百折不挠地寻求达到意见一致的办法。为实现宪章的高尚理想，联合国是一个切切实实地、重实效的组织，其大部分机构与其说是在讲讲动听的理由或者讨论大道理，倒不如说是在处理困难的政治现实。给受灵感支配的领导活动或者给从事改革活动的机会特少。秘书长如果想获得任何成果的话，就必须在这非常现实的范围内运作。

对于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来说，联合国是个分担责任或者推卸责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公开表达其关注；可以找到不采取单方行动的正当的正式理由。联合国是一个能改变公众道德要求与舆论导向的场所，而对于个别政府来说，此类要求被认为不堪重负。联合国是一个在耗尽全力进行辩论的烟幕后面，立场逐渐转变而面子得到保全的理想的地方。在此过程中，在做私下工作方面，秘书长可起某些有益的作用。

大的问题之所以常常拿到联合国来，是由于某些政府认为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它们。中东问题和环境问题就是例子。联合国总是不得不面对最难缠的事务、因此联合国常遭非难，说它没有解决某些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这就是联合国以各国成员国利益为重的一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消极方面。补充说一句，联合国或秘书长无法为放弃就明显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寻找借口。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9期

王德华 译 劳桃 校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应付挑战的独特工具

(1985年10月24日)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各国领导人在这里聚会，而作他们后盾的，是构成独一无二的集体选民的全人类。每逢在历史性时刻举行的这样一次聚会，都要求向全体选民汇报，向人类的广大沉默的多数汇报。人类的多数要求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世界里，人们将享有正义与尊严，免于恐惧，并可望明天更加美好。

纪念40周年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还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本身就促使人们去作出新的开端，努力打破当前在重大问题上存在的僵局。这一纪念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际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紧要阶段。现在是考虑从多边主义倒退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的时候了。

大会已进行了一场全面和论点明确的一般性辩论。来自各个地区的各国代表团都对联合国的成就和失败作出了全面的估价。关于怎样使联合国更为有效这一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一直是辩论的主题。答案可能各种各样，但是人们一致承认联合国这个真正表达国际社会的意愿的机构的价值，尽管人们的评价各有不同。任何一个国家的观点都不能在这个论坛上垄断或排斥别国。然而，难题是怎样达成协议，弥合不同立场，协调各国的行动，以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

联合国40年来的工作使它成为一个独特工具，各国政府可以用它来应付这一挑战。联合国创立之初有51个创始会员国。随着108个国家的加入，联合国的合法性大为提高了。今天的联合国的代表性远远地超过了宪章生效的时候。与此同时，联合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由于科技、通讯和社会觉醒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引起人类日益关切的大量问题。它现在的议程中包括了影响国际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所有问题。

可是，奇怪的是，随着合法性的提高，权力与协调一致却减少了。这一奇怪现象具有讽刺意味，但却不是固有的。如果各会员国之间的团结思想足够牢固，联合国这一工具就可以按其性质的要求得到有效利用。现在，世界的政治家们正在面临着考验。

看来，可以实现更大的协调，并加强团结思想。但条件是，必须减少对抗的态度，而且当会员国面临问题时，应同时注意到有关的各项原则以及实际情况。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多边主义是建立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的，这种追求产生于遵守联合国的原则。如果联合国认可任何忽视或绕过宪章原则的交易或行为的话，就等于是对联合国的自我否定。但是需要以具体可行的建议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来表示对这些原则的忠诚。如果联合国发言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如果原则或实际的考虑受到忽视，那就要在调动各国政府的支持和调动人民的热情方面付出代价。

人类付不起这种代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紧张局势并受到暴力折磨的世界。未解决的争端继续恶化。恐怖主义祸害仍未得到制止。滥用毒品象瘟疫一样扩散。犯罪行为已经国际化了。尖端武器可以很容易得到。对这种局面的唯一合理的反应是各国政府进行合作，以实施一个将使国际生活恢复文明的行为守则。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纪念会议的时候，人民普遍希望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紧张局势会得到缓和。国际舆论并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所想象的那样玩世不恭，但国际舆论决不容忍只说不做和希望落空。在本届会议上许多国家重申对宪章的承诺，并同意把 1986 年定为和平年。它们的承诺还需要落实到为解决主要冲突而进行的负责任的谈判上，特别是在制止军备竞赛、克服发展危机和促进人权等关键领域里的谈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公众舆论会认为在这里所作的发言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是一种虚伪的表示。只要多国政府一起行动就可以防止出现这种失望情绪。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忆及联合国所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有关消除原子武器和为和平目的使用原子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40 年后的今天，这个目标似乎仍然很遥远，核军备竞赛所造成的最终危险增加了而不是减弱了。与此同时，常规军备竞赛还在快速进行，并且造成了战争和大量伤亡。

一个每年为军事目的花费无数亿美元，但却不能将一部分钱用于消灭贫困的世界，是一个严重颠倒了轻重缓急的世界。由于每年生产大量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使得不安全因素增加了，因此这个世界又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在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军备竞赛是不可逆转的。近年来所达成的一些限制军备的具体协定表明妥协是可能的，共同利益感可以战胜取得单方面的优势的幻想。

我肯定地说，正是这种共同感将促成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进行双边会谈。我对在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即将举行的会谈表示欢迎。他们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有责任，而且对全人类甚至后世都负有责任。整个世界都希望：他们的会谈将会在摆脱核灾难的恐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将会改变历史的潮流。

发展危机，特别是反映在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中的危机，是全球性经济不平衡的令人震惊的表现。危机要求我们寻求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探索这些问题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充满伙伴关系感。所以有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上——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此必须将其作为更广泛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来有效地解决。如不能开始这一进程，将会导致广泛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工业化国家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因为全球经济现在很难说是以有益于它们自己的增长繁荣的方式运转的。

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辩论和分析。下一步将是由各会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对设计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给予必不可少的推动。此种努力还需要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个机构来加以适当推进。

联合国所树立的精神的特色之一是国际社会关注促进人权。一方面有必要结束一些社会中侵犯人权的现象，同时更应看到存在着唯一的并且受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那里的种族歧视是由国家组织的。这种局面清楚地表明，当人类受到侵犯或压迫时，就会产生反抗：当反抗遇到暴力时，政治和经济代价就会变得难以承受。我认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将树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榜样，即我们多么严肃地对待联合国宪章第一条中所提出的宗旨。

简而言之，现在不是我谈及世界各地紧张局势的焦点的时候。形势是很严重的。今天的政治气氛可能是暗淡的，但这是可以改变的。不论是在战略地区还是在全球一级，政治家们，特别是大国的政治家们共同行动，他们表现出的一种共同利益感，都会产生这种变革作用。

最后，让我们提醒大家：联合国宪章——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它生效 40 周年——是一个不同于其它任何条约的条约。它体现了 159 个国家所作的保证——不仅是对彼此作出的保证，而且是对世界所有人民作出的保证。这个保证的条件不是仅仅由理想主义产生的。由于受到一场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的损害，宪章的制订者十分了解冲突的根源，并且了解和平的必要性。我认为，如果宪章的主要原则今天仍然适用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原则是符合精明而讲求实际且又具有远见的现实主义的。如果我们能够重新体验一下宪章的远见的话，联合国的能力将会加强，它的权威也会得到恢复。

任何政府都不能独力解除对核灾难的恐惧、冲突的受害者的痛苦、穷人的绝望、受到迫害和被赶出家园的人所受的苦难、暴力行为的猖獗、危害秩序的混乱以及危险和乐园并存于整个人类世界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证明迫切需要加强这个国际合作的机构——联合国。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6 年第 1 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朱利叶斯·坎巴拉格·尼雷尔，坦桑尼亚前总统。曾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和经济学硕士学位。1952年回国，从事议会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1953年任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主席，后又任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主席。1960年起任坦噶尼喀“责任政府”首席部长、“内部自治”政治总理。1961年12月坦噶尼喀独立，出任总理。1962年12月坦噶尼喀成立共和国，就任总统。1977年任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1986年任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经济南方委员会主席。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特别纪念会上的讲话。

会员国都有发言权和投票权 (1985年10月24日)

坦桑尼亚对联合国一些非常强大的会员国日益把国际主义丢在一边并因此使整个联合国系统受到削弱表示关切。

国际霸权主义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国和穷国如果在联合国的投票没有使一个强国感到满意，它们就要公开受到遭受惩罚的威胁。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发言权和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投票的权利。

有关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应根据所有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进行讨论。外层空间核战争的威胁这一问题甚至还没有在联合国讨论过。然而外空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

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纳粹主义一样，是以种族优越论为基础的。但对于甚至最近在南非发生的暴力事件，安全理事会也只是通过了一些鼓励各国对南非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决议。必须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帮助南非人民迅速结束种族隔离。结束种族隔离的时间越晚，苦难和动乱将越大。对南非进行强制性经济制裁是本组织应该采取的起码行动。

近年来，一种新的得到经济力量支持的正统观念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世界经济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飞速的技术进步以及过去建立的国际结构的不适当和不相适应。

事实表明，甚至不可能就全球谈判问题举行会谈，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阻碍了一切进展。世界贫困问题已被从国际议事日程上取消。国际金融制度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而受到威胁。一些国家的债务如此之大，以致它们自己的债务保护了它们，但是没有一个是非洲国家处于这种地位。非洲输出数十亿美元去偿还债息，还由于贸易条件恶化又失去数十亿美元，而一些非洲国家则乞讨粮食来使自己的人民免于饥饿。非洲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债务问题，但得到的反应却不令人鼓舞。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6年第1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拉吉夫·甘地，印度总理。早年在台拉登杜恩贵族子弟学校就读。1960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曾在印度民航公司当飞行员。1980年6月步入政坛。次年5月加入国大党（英）。1983年任国大党（英）总书记。1984年10月31日其母遇刺身亡后，于当天接任总理。同年11月当选国大党（英）主席。1991年5月1日遇刺身亡。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特别纪念会上的讲话。

国际合作与发展 (1985年10月24日)

当联合国成立时，人们既抱有希望又怀有恐惧，希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将再也不会重演，恐惧的是人类的智慧和才能可能无法控制原子弹。因此，一种世界秩序便逐渐地开始形成。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许多国家都摆脱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并取得了平等的权利。人们早就一致认为应寻求发展。一个可行的财政和金融制度出现了，国际合作的结构也形成了，人们共同努力实现裁军。

联合国是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起作用，这个世界的特点是核对峙、经济上的贫富悬殊和似乎无法消除的不信任。敌对的军事集团瓜分世界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核国家集团之间尚未发生战争，但是军备竞赛还在疯狂地继续进行，新的外空武器被认为是最终的威慑力量。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相信共处，但是国际秩序同核武器不能共处，自由同种族主义不能共处，科学同贫穷不能共处。当联合国纪念40周年之时，难道我们应该逆来顺受地接受世界分裂、危险和不公正现象吗？让我们开始发起一场争取和平、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吧。

当世界就要进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比勒陀利亚政权却拒绝汲取第二个千年的教训、即所有人平等。印度人民同南非人民有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正是在南非，圣雄甘地制订了他的大众蔑视非法法律的战略。受圣雄甘地影响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话：

“我坐在一个人的肩上，掐着他，使他窒息，迫令他背负我。可是我却对自己、也对别人表示，我非常同情他，愿意尽力减轻他的负担、只是不愿从他的肩上爬下来。”

只有制裁才能使种族隔离“从黑人肩上爬下来”。

正当世界和平遭到核战争的威胁的时候，世界的繁荣也遭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经济危机的威胁。发展中国家是这场危机的最严重受害者，印度非常有幸能够维持甚至加快其经济增长率。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遭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非洲遭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拉丁美洲国家负债累累，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边缘。富国也同样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它们继续陷入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发展达成的一致意见已经消失了，我们应该重新在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6年第1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英国前首相（1979～1990）。毕业于牛津大学。大学时代加入保守党。1947至1951年从事化学研究工作。1953年取得律师资格。1959年起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以后历任年金和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教育和科学大臣。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出任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本篇是她在联合国特别纪念会上的讲话。

联合国过去 40 年的工作一直是卓有成效的 (1985 年 10 月 24 日)

如果在这个纪念的时刻仅仅赞扬并表示支持，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联合国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联合国的不足之处，并加以纠正，以使其更加有效。

不错，我们幸免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但这对于在 140 多起冲突中被杀害、造成残废和无家可归的千百万人来说，是很难令人欣慰的。现在仍有一些国家政府公然无视基本人权，因为在它们的政治制度中是没有人权的地位的。联合国的决议不总是客观的。某些决议有双重标准之嫌。南非由于可耻地拒绝给予黑人以基本的人权而受到了人们的谴责，这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苏联对犹太人的作法又通过了什么决议呢？联合国至今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能力来有效地处理恐怖

主义。在某些国家，正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如果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要对某一个会员国的政府施加影响，那么它们就不应当仅仅是空谈和谴责，而应当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步子的时候给予鼓励。例如在南非，如果在谈判的同时，各方停止暴力行动，那么就有取得进展的机会。

在过去 40 年中，联合国的工作一直是卓有成效的。安全理事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讲坛，处理意外的危机和棘手问题的讲坛。大会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这里任何会员国，不论多么弱小，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联合国还表明它是一支采取行动的力量。它能够以三种主要的方式维持和平：第一，为谈判铺平道路；第二，作为催化剂，说服冲突各方进行谈判而不是对抗；第三，起到维持和平的作用。联合国可能是某种形式上的世界议会，但它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像某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样的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只不过是一面镜了，反映出我们自己这个不平衡、无秩序、四分五裂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咒骂镜子是没用的，我们最好从改造自己做起。

译自《联合国记事》1986 年第 1 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美国前总统（1981~1989），共和党人。毕业于尤里卡学院。毕业后曾当过电台播音员和好莱坞演员演过《老鼠兄弟》，《墨菲中士》等 50 多部电影，曾 7 次当选为电影演员工会主席。1954 至 1962 年任通用电气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1962 年成为共和党人。1966 年弃影从政。1967 至 1974 年连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80 年 11 月竞选总统获胜。1981 年 3 月遇刺受伤。1984 年再度当选。1989 年 1 月卸任。著有《里根回忆录》。本篇是他在庆祝联合国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要认识到组成联合国的国家并不联合 (1986 年 10 月 14 日)

联合国宪章之远见，即“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它也要求我们采取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即要认识到组成联合国的国家并不联合。

美国和苏联之间有着“深刻而恒久的”分歧。但是下个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的会谈可能是一个“新的开端”。美国所认为的违反赫尔辛基人权协定、禁止生物和毒气武器协定以及战略武器协议的行为是必须讨论的。坦率的谈判能够取代愤怒和紧张。

美国也在寻求同苏联在日内瓦讨论进攻性系统和防御性系统之间的重要关系，包括讨论是否有可能逐步实现一个防御在其中发挥日益重大作用的更稳定和更安全的世界。

弹道导弹是人类历史上威胁性和破坏性最大的武器。在弹道导弹消除之前，西方将继续研制出一种遏制弹道导弹的非核系统。则果历史注定我们要在军事方面进行竞争以维持和平，那么就让我们在维护我们社会的制度方面竞争，而不是在能够摧毁我们双方并连同上帝创造出来的大部分东西的武器方面竞争。

没有任何政府对其人民的生命操有生杀之权，或拥有使用武力输出其意识形态之权，这一信念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各种分歧的核心问题。

日内瓦首脑会谈的一个中心问题将是区域冲突。阿富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尼加拉瓜的事件表明：从外部强加的意识形态赞成国家分裂，然后，同人民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变成了同他们的邻国进行的战争。要解决这些冲突，必须有一个和平进程，这就要在美国和苏联所支持的各方之间进行谈判，而谈判的目的是消除外国的军事存在和停止武器流向该地区。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便欢迎每一个国家回到世界经济中来，使其公民能像其它和平的发展中国家经历的那样，共同参与生机勃勃的发展。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6 年第 1 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摘录。

论联合国工作 (1986年10月14日)

1985年我们在庆祝联合国40周年的时候，对联合国在这改天换地的40年期间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深远而严峻的审查。虽然对于联合国的长处和短处看法不尽相同，但显然大家都一致承认联合国宪章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并且承认有必要加强联合国，以便使它能更多更好地满足未来的需要。隆重的周年纪念形式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作努力，解决存在于重大问题上的僵局，并加强联合国这个进行国际合作的机构。但是，我也提出过警告，对宪章原则的信守需要见诸具体的行动，而不能徒托空言。

遗憾的是，与纪念40周年期间所表现的情绪相背反，联合国在1986年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其偿付和存活能力都受到了挑战。正当重新作出努力以加强本组织的时候，由于会员国不履行宪章义务而造成的财政困难却使它的工作笼罩了一片乌云。必须祛除这片乌云，联合国才能于现在和今后较长的期间内成为我们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极其需要的处理世界事务的坚强的建设性力量。巩固多边组织的现存结构并恢复其活力，是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安全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忽视这一必要条件必将有损于更美好世界的未来前景。

联合国在今年余下的几个月能否应付开支，尚不清楚。就算能够，也绝不表示财政危机已经克服。相反，我们必须预计1987年初的累计赤字将超过1986年，而且储备金仍然枯竭。

我认为必须正视造成财政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是政治性原因，因而对本组织的影响远超过财政状况。对联合国工作方案的意见分歧，不仅影响到预算编制过程，也使一些会员国不愿依靠联合国作为积极推动区域和全球变革的主要工具。前面提到的长期列在联合国议程上的严重政治冲突如果解决，将大大有助于减少对预算的意见分歧。在没有这种基本政治变化的时候，会员国必须以符合宪章规定的方式，作出更大的努力，通过妥协和自制，存异求同，就预算方案和优先事项达成广泛的协议。如能对预算编制程序作出某种改变，从而促成这种广泛协议——包括有关所需资源的协议在内，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可保证联合国将来能够有效地处理只能通过多边渠道解决的多种多样的问题。

虽然联合国预算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原因，但联合国的结构和行政效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有人说，本组织规模太大，过分复杂，开支太多。大会40届会议设立了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负责彻底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事务，以期拟门措施，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的效率。这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效率。专家组的分析和建议必将得到大会的重视，我希望本组织因此更趋巩固，赢得会员国更普遍的信任。

一个发挥作用的世界组织的确存在，它包含一个政府间机构和一个为它服务的秘书处。为了应付新的全球性问题，政府间机构规模扩大，日益复杂，秘书处也同时扩大，主要是因为它所服务的政府间机构日渐渐扩大，需求增多。这种扩大速度很快，无论在数字方面和等级方面，都嫌过分。需要有条

理地作一些裁减。除此以外，除非政府间机构同时实行精简和合理化，受命执行的方案又有更清楚的优先次序，否则裁减秘书处工作人员免不了对各政府间机构及全体会员国希望得到的服务产生不利的影晌。

企图用削减工作人员福利的方法来解决本组织的财政困难，乃是眼光短浅，得不偿失，对共同制度会产生普通的不良后果。

良好的管理需要工作人员有更大的流动性，需要一个有效的职业发展制度。同时必须改善妇女在秘书处的前途。

今年的经验非常清楚地显示，没有一个以尊重宪章为其根据的丰富而可靠的财政基础，联合国将无力应付将来的需要和时机，这当然不符合全体会员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7年第1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在哈马舍尔德逝世 25 周年敬献花圈仪式上的讲话。

哈马舍尔德鼓舞着我们

(1986 年 9 月 17 日)

哈马舍尔德先生于 1953 年至 1961 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 年在刚果执行一项和平使命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然而，哈马舍尔德以其成就和榜样以及才智的力量继续鼓舞着我们大家。

哈马舍尔德先生曾经说过：联合国是这样一个机构，“在与谋求和平这一基本目标相统一的更大范围内，这里可以允许思想交锋。”“创立联合国不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入天国，而是为了把我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这两种说法今天仍然非常恰当。

哈马舍尔德先生在谈到联合国时写道：“坐上这艘新的‘圣玛丽亚’号，我们不得不应付那些想在明天就看见地平线上出现陆地的海员的急躁情绪，还得应付那些可能会撒手不干而让我们只好任凭漂流的人的无可奈何或无能为力的情绪。而在岸边，还站着所有反对这次远征的人，看来他们对埋怨船只遭到暴风雨倒是特别津津乐道，而却不去责备气候……我们还必须费些口舌来说明为什么进行此次远征。”

在 25 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遭到一阵阵暴风雨，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去摆明我们的道理。但是，我们还必须时刻牢记联合国的存在所代表的那些更崇高的目标和很重大的利害关系。这里我们主要关切的问题是人类的生存、和平和人人都享有一个不错的未来。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7 年第 1 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前总统、副总统、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毕业于菲利普斯学院。第二次大战期间，参加海军当飞行员。退伍后到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业，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60年代初开始从政，先后被选任国会众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84年再度当选连任副总统。后任总统。曾历任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华联络处主任。本篇是他在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从论战转为维护和平

(1989年9月25日)

联合国是44年前在战争的废墟上和极大的希望中成立的。联合国可以做许多大事。当然，联合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不是解决世界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议事场所，世界各国都可以在这里寻求一致的意见以取代冲突——它必须始终是一个争取和平的议事场所。

联合国正在逐步接近这个理想。它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近年来曾经常回响在这间大厅里的唇枪舌剑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心态。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可喜的转变——从论战转为维护和平。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构的创建者们相信，在这里，世界各国可以逐渐获得一致意见，认为法律——而不是武力——将主宰一切。联合国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有一种思想正在全世界各地发生影响，这就是——自由。

自由的进展到处明显可见。在中欧——在匈牙利，国家和社会现在正处在朝着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曾经强制性地把匈牙利和它的西部邻国人为地分开的障碍已经拆除，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新的希望，也就是对自由所怀抱的新的希望。

我们还看到自由在波兰发生作用。在这里，共产党遵从人民的意愿，放弃了权力的垄断。在苏联，全世界都听到了不再害怕说出内心的意见或要求自治权利的人们的呼声。

但是，自由的发展并不仅仅限于一个大阶——或者说仅仅限于发达国家。我们看到，自由精神在拉丁美洲高涨，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权正在让位给民主政权。我们在非洲大陆也看到了自由的发展，在那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挽救由于国家过分控制而瘫痪了的经济的希望在于实行私营企业自由经营竞争制度。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在每个大陆上，在所有的地平线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个自由的新世界的轮廓正在展示出来。

当然，自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看到的这种趋势还不是全球性的。一些政权仍然在抵挡潮流的前进。一些统治者仍然不给人民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但是现在，偏见和专制主义的权力受到了挑战。

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即关于那种无所不知、全权在握的国家极权主义思想的死亡。出现这种土崩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蒂，只有一个事实能解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那就是极权主义思想鼓吹者们曾认为，这种思想的必然胜利是写在历史规律中的，但他们没有看到人们对自由的热爱是写在人们的心上的。

200年前的今天，美国国会提议通过一项权利法案，即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自由权利，这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样的权利已经在这

个由世界各国组成的联合国中得到了承认，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承认，这是衡量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的成就的共同标准。

从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即处在即将出现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形势来看，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撰写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人看来，20世纪将作为国家的世纪为后代人所铭记的话，那么21世纪必定是一个解放的世纪，个人的世纪。

必须明白，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自由的向前迈进。全世界都认为自由是每个人——不分男女、种族和职业——与生俱来的普遍权利的这一天终会到来。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最黑暗的时代，自由的信念也始终活在人们心中。

今天，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到来已为期不远了。这对世界几十亿人民来说，还是第一次。看，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现在存在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就是一个由各个自由的政府和自由的市场组成的满足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日益增长的愿望的世界，而这种愿望便是有尊严地生活和自由地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现在该是我们共同努力使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了。

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加强自由的基础，鼓励自由向前发展，并正视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各项挑战。21世纪的全球性挑战是：健全的经济，保护环境不受污染和破坏，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在本10年期间，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进入世界最先进的经济的行列。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是以私人企业自由竞争作为动力的。在今后10年，其它国家将加入它们的行列。但是对许多国家来说，前进的路上有种种障碍。就一些国家而言，这些障碍是它们自己设置的，即不必要地设置种种限制和各种规章制度，这些限制和规章制度对它们的经济形成重大压力，并且妨碍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还存在着妨碍经济增长的其它障碍，克服这些障碍也需要采取有效的行动。今天有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挣扎着，致使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世界各国应该有较好的机会对自己的经济命运获得一定程度的主宰权，并为自己的人民创造较好的生活。

美国已经提出的办法——布雷迪方案——将有助于这些国家减少债务，同时鼓励进行将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行自由市场制的改革。

贸易的力量就是推动进步的力量。开放的市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不断增长的关键。今天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发达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中，占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购买的。现在该是其它经济发达的国家予以仿效、扩大贸易机会的时候了。我相信，在下个世纪里我们会懂得，世界上许多国家仅仅刚刚开始开发它们真正的发展潜力。自由市场及其成果并不是少数国家所独占的东西，它们是人人可以分享的。

除了实现全球性经济增长这一挑战以外，还存在另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即环境问题。在地图上划定任何界限都无法阻止污染的蔓延。我们的环境受到威胁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制定一种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国际方针，即一种寻求共同办法来解决共同问题的方针。联合国已经在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并寻求防止石油渗漏及其它灾难污染我们的大海和我们呼吸的空气。我现在想告诉你们：美国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已致力于在2000年以前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停止生产一切含氯氟烃。我们建议修

改我们自己的清洁空气法，以确保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便做到使我们的公民呼吸清洁的空气。我们已禁止象牙进口，以保护大象和犀牛不遭受为了赚钱而滥施捕杀者的杀戮。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管理好我们的行星这两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与以往一样，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是联合国的首要问题。

我们心须朝限制并且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向前进。5年前，我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裁军会议上提出了美国关于宣布化学武器为非法的条约草案。自那时以来，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威胁在增加。现在已有20多个国家拥有化学武器或具备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而且这些可怕的武器现在正在区域性冲突中出现。这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人类，我们必须制止并消除这种威胁。今天我想宣布美国准备采取的步骤，即为全世界摆脱这些真正可怕的武器、为签订一项从签订之日起10年内在地球上禁止并销毁全部化学武器的条约而准备采取的步骤。

这个倡议包括三点主要内容：

第一，在化学武器条约签订以后的8年中，美国准备销毁我们的几乎全部化学武器，即销毁其中的98%，如果苏联同我们一起禁止化学武器的话。我认为，他们会这样做的。

第二，一旦凡是能够制造化学武器的国家都在这项全面禁止条约上签字，我们就准备在10年内销毁我们所有的化学武器，100%地销毁，每一件都销毁。

第三，美国准备现在就开始动手，在我们正努力完成条约起草工作的时候，我们将销毁我们库存化学武器的80%以上——如果苏联同我们一起把化学武器削减到同样的水平，而且我们双方商定了包括核查在内的销毁库存的各项条件的话。

我们知道，监督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实施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是我们从最近的军备控制经验和我们在这方面加速进行的研究中得到的知识使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能使我们有信心继续进行禁止化学武器工作的那种核查水平。

我们对待实现常规武器削减的态度也是认真的。这是我们刚刚于上星期四（9月21日）在维也纳欧洲常规武器谈判中提出新建议的原因。这些建议表明，我们决心迅速采取行动，缓和欧洲的军事紧张局势，使欧洲大陆的国家离实现它们的共同命运——即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更接近一步。

美国确信，开放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措施能够推动裁军前进，能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提出开放天空建议就是出于这种信念，苏联方面现在已表示愿意实行这个建议。我们提出开放陆地的建议也是出于这种信念，这项建议已使得所有苏联外交官和美国外交官彼此得以在对方国家自由通行，这还是从未有过的。

请允许我在此谈谈最近几天我们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会晤情况。我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满意。苏联在削减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问题上撤除了许多取得进展的障碍。我们在从核查到核试验的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协议。

这些成就的每一项本身都很重要。但是这些成就作为表明在美国和苏联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新的态度的迹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严重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愿意建设性和坦率地解决这些分歧的新态度，是我们，而且还

有全世界都应该欢迎的消息。

今天，各国面临的对和平的威胁也许正在改变，然而却没有消失。实际上，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一种危险的结合正在出现：即一些政权怀着昔日的难以平息的怨仇，同时又拥有大规模摧毁性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在这种情势下，一旦爆发战争，会使各方下的赌注提高。地区性的冲突很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威胁世界和平。

对聚集在这个大厅中的所有人来说、维护和平的重任是切身相关的任务。秘书长先生，我知道，你已把这项重任作为自己的任务承担起来。联合国可以充当调停者，可以作为冲突各方前来谋求和平解决的场所。为了和平，联合国应该加倍支持现在正在全世界各个冲突地区进行的和平努力。我向你们保证，美同决心在解决地区性冲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的世界还面临着另外一些对国际和平和稳定同样危险的威胁。非法贩毒活动不论在哪里有了立足点，就成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和人们痛苦的根源。蒙受这种灾祸的国家必须联合起来与之斗争。

最后，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同恐怖活动的威胁作斗争。每个国家，还有联合国，都应该向世界上的亡命之徒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扣留人质和任意使用暴力的恐怖活动是不能赢得世界人民的赞同的。任何一种恐怖活动都是同文明世界共同持有的所有准则不相容的。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不管目的如何正当，都不能证明采取恐怖行为是正当的。

我在今天开始讲话时，曾向诸位谈了维持和平的问题。现在我想向诸位谈谈缔造和平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从未享受过和平与幸福的人们带来和平。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年坐在这个大厅里的情景。我记得我们那些几乎是无休无止的讲演、安理会的会议，那些招待会和迎宾队列，联合国大会的正式会议以及在代表休息室里的非正式讨论。我们那时所谋求实现的目标，现在已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了，请问大厅里在座的各位：难道我们不能使联合国目标一致吗？难道我们现在不能把这种新的自由的世界作为我们谋求的共同命运吗？我相信我们能够。我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天，我郑重地表示希望，在这里的联合国各成员国之间，这种精神能占支配地位，各国人民、各个国家都使自由来临的时刻成为自己的时刻。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1980年9月26日

王惠初 译 叶仁 校

钱其琛，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徐汇区学生区委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1953年后，曾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高教部工作。1972年后，任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副部长、部长。本篇是他在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正常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 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 (1989年9月29日)

中国一贯致力于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同许多国家，特别是同周围邻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今年5月，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一致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本来也都在稳步地发展。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同某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难。今年春末夏初，北京发生了一场以颠覆中国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动乱。不言而喻，处理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表示理解。只有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顾事实，单凭一些歪曲的报道和错误的情报，程度不同地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施加压力。还应当指出，有许多事实证明一些外国敌对势力卷入了这次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国插手中国的事件，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违背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中国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理所当然地坚决予以拒绝。

在过去几天里，有几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在联大发言中，继续对中国政府进行毫无道理的攻击。口口声声讲“民主”，讲“自由”，可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却惯于对别人指手划脚、强加于人，这种做法正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不能不令人遗憾。

正常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是信守这些原则的。只要别的国家也信守这些原则，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就可以建立和发展。解决一些西方国家目前同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其出路也在这里。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以武力侵犯别国主权、破坏别国领土完整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在国际交往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利用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企图，这是违背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的。

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各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又如此互不相同，而它们的利益又决定了需要互助交往。这就要求各国采取现实的态度，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在内政上互不干涉，在交往中遵循彼此都能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样各国才能和睦相处，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共同繁荣。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样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应该促进各国的友好合作，而不应该成为施加压力和干涉内政的手段。企图把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努力，是经济上的强权主义。

选自《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长期从事党务工作，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失宠被解职，但他积极活动，并于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本文是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高级会议上的演讲。

联合国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1992年1月30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
尊敬的安全理事会成员们！
尊敬的秘书长先生！

当代世界政治奥林匹克——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首脑间进行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会议，是一个重大的和具有不平凡意义的事件。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世界正经历着一个既充满希望、又一再令人感到不安的时期。

我相信，人类在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悲剧和蒙受巨大损失之后是会抛弃这一积垢的。再不许21世纪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更多的损失了。

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的深刻改造过程已经开始了。

这不仅仅是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私事。这是全人类的问题。要知道，受意识形态操纵而扭曲了的、不顾理智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也是极权制度的主要物质基础。

对这种联系的深刻认识，促使俄罗斯的领导开始进行极其复杂的经济改革。我们已决定在几十年来一直对经济利益开展总体战的国家里进行这种经济改革。

民主已成为人类文明取得的重要成果。

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曾经有一些人物，他们不吝惜自己的生命而奋起保卫民主。俄罗斯人民就曾在我们莫斯科的白宫墙旁捍卫了民主。

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即将开始：为民主改革的不可逆转建立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保障。

由于相互间很不信任而使我们大家都受到了连累。直到最近被人称作超级大国的国家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这已经不是秘密。

应当消除这种分歧。这就是我们各国人民的愿望，这就是美国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意志。

世界新的政治形势不仅有助于提出独创性的主张，而且也会使这些主张中最大胆的主张得以实现。

我认为，已经到了提出成立保护国际社会的全球系统问题的时候了。重新确定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方针和利用俄罗斯防御体系研制成功的高技术，可以成为这个系统的基础。

我们愿意积极参加筹备和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进程，包括维也纳谈判和在第二次赫尔辛基会议后即将举行的讨论欧洲安全合作问题的新的谈判。

俄罗斯不单单把美国和西方，东方各国看作是伙伴，而且也把它们看作是盟友。这是一个重要前提，我要说，这是文明世界各国间和平合作的一次

革命。

我们不需要使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服从意识形态理论，无须把对外政策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原则简单明了：民主和人的权利与自由、法律和道德是第一位的。

我希望，它们也能符合我们独立国家联合体伙伴们的心意。我们支持他们尽快加入联合国，并认为这将对联合国本身的发展产生良好影响。

我们的绝对优先任务是：保障人的所有权利的自由，其中包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以及人们生活应有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条件。

我认为，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公约应负的义务。我们主张这种观点能成为通用的准绳。安理会有义务强调文明世界对捍卫人的权利和自由所负的重大责任。

俄罗斯打算最近通过法律决定，决定中将包括捍卫人的自由、荣誉和尊严的最高国际标准。

这首先涉及到确保人身安全、刑事诉讼法和劳动改造法、保护海外俄罗斯公民、有选择服兵役等问题。

我们准备签署有关移民问题的国际法令，参与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专员的活动。我认为，国际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将有益于俄罗斯及独联体其它国家。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一项命令，最后 10 名政治犯已于近日得到赦免。

自由的俄罗斯将不再有政治犯！

尊敬的主席先生！

在世界建立国际新气候方面，联合国负有特殊作用。

联合国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即使在对峙的酷寒中，也能保护其宪章中包括的世界文明社会准则的幼芽。

联合国对加强全球和地区稳定、建立以所有大小国家平等为基础的世界民主新秩序的积极性日益增加，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俄罗斯愿意继续同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保持伙伴关系，该机构工作中目前的气氛有助于使人从事友好的、建设性的活动。

我们特别珍视联合国的调解经验。

俄罗斯的新外交将大力促进彻底解决在联合国帮助下已解除封锁的地球上各个地区的冲突。我们愿意更充分地参加这一工作。

依靠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有效作用，我们将参与寻求有效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和阿富汗问题的方案的工作，参与使近东和中东、柬埔寨以及其它地区局势正常化的工作。

我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法国总统密特朗所说的迅速反应特别机制，以保证和平与稳定。根据安理会决议，该机制可以在发生危机的地区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愿意实际参与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行动，参与对这些行动提供物质技术保障的工作。

我国坚决支持在加强法制方面采取的步骤。必须提高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工具的国际法院的威信。

总的来说，我认为，到了考虑对联合国进行认真改革的时候了。世界变了，联合国活动的某些领域失去了其迫切性。看来，应当放弃那些不能给会员国带来实际利益的机构。

我们准备提出自己的改革联合国的建议。

尊敬的主席先生！

历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俄罗斯国家，即俄罗斯联邦，这一具有几个世纪开展对外政策活动和外交活动经验的国家刚刚出现在世界政治地图上。

我相信，国际社会将看到俄罗斯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去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世界各国人民的成熟以及他们采取负责的、合适的解决问题办法的能力。

波斯湾事件（——由于共同努力终于使事态沿着公正惩罚侵略者的道路发展）和反对莫斯科 8 月叛乱的胜利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巩固当今世界发展中的积极趋势并使之具有不可逆转性，我们大家要共同去完成困难的工作。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我们各国人民和每个人具有正常而平安的生活。

俄罗斯愿意为达到这一目标竭尽全力！

最后，请允许我祝愿您——加利先生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一重要的职位上取得成绩。

谢谢各位。

节译自俄通社—塔斯社 1992 年 2 月 1 日电讯稿

王惠初 译 苏复 校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出身于埃及宦官之家，祖父当过埃及总理，父亲当过财政部长。他于1949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母校开罗大学任国际关系法和国际关系教授直到1979年。

他从1977年起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先后于1979年、1982和1990年率埃及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从1979年起担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他获得过24个国家的奖章和荣誉称号，写过关于国际事务、法律、外交、经济和政治科学的100多本书和文章，他任秘书长受到广泛的赞扬，有的说他是“非洲杰出的儿子”，拥有“像尼罗河一样奔流不息、不受约束”的精神遗产，有的说他是一位“国际主义者”；还有的说他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人。他上任后不久即重视筹备联合国50周年庆典，他说，“务必使联合国诞生50周年成为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给我们的机构谱写新的一章。”

秘书处改革的关键目标

(1992年11月2日)

我一直在期望这一辩论的开始。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向大会讲讲我对于联合国作为推动发展的一股力量的一些想法。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的报告涉及到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为我提供了我的纲领。我还将谈到一些与该会议的后续行动直接有关的事情，也就是你们现在要处理的事情。

在我上任的第一年中，我荣幸地参加了三项处理全球发展问题的联合国重要活动：卡塔赫纳贸易和发展会议、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高级别部分会议。我也参加了各个区域委员会的工作。

最近我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总结了我对这些活动的评价，评价的结果更加强了我对本组织潜力的信心。里约全球问题首脑会议就是一个例证，表明联合国有能力围绕全球发展的关键问题，调动政治、公众和机构的力量。只有联合国能够这样做，它的潜力是独一无二的。

里约会议之后的挑战，是致力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把它落实为政策与实践，并且给予有效和协调的组织支持。

我感觉到，“冷战”的结束，为采取建设性行动创造了机会，这更加强了我的信念。我们现在可以致力于开创一个不受意识形态和东西方政治紧张所扭曲的南北合作时代。和平与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它们受到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严重不平等的威胁。均衡的“全球发展”不仅是一个开明的目标，也是所有社会持久进步的基础。发展方面的合作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同时要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帮助从前实行计划经济的那些国家进行过渡。

这个新时代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挑战。尽管指令式经济已经不为人们所信，但是市场经济的潜力也还没有发挥出来。市场是促进效率和物质增长的工具。但是发展不仅仅是增长而已，它是要改善人的福利。

经济增长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发展要持久，这种推动力就必须以公平、公正以及社会和生态责任感作为指引。我认为，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含义。

在这个领域，各种思想概念正在进行新的较量。在民主政治对话之中，许多问题还没有定论。即使在比较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紧张和环境恶化仍对国家的治理带来严重的问题。世界各国都还没有找到同时对付失业、

通货膨胀、债务和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的政策。

在两极对抗的时代，很容易用刻板的成见来解释一切，但是这都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民主和市场经济不能仅仅是口号。各国都向这些形式汇聚，这种新局面带来一种义务，就是要对在不同的国情之下引导各种市场力量以期达到民主决策的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与失败，作出清醒的分析。

这需要重新作出承诺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面向市场的社会，也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索能够使这种社会兴旺发展的国际环境。

围绕着各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民主治理和发展的内涵而进行的这场辩论，为重新确定联合国在这些领域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场辩论中，本组织应该作为一个主要的思想源泉。它必须忠于它的使命，但是同时要使自己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需求。它必须从全球着眼，找出世界大家庭的共同利益所在。它必须以人和他们的权利及才智作为中心。它必须突出那些贫困的人所未能表达出来的各种关切和未来世代的各种需要。

从这个观点出发，联合国必须把各种重大的问题提出来请会员国加以注意。它们必须是属于联合国职权范围的各个领域、帮助会员国应付当今时代的各种问题。会员国本身则必须努力维持从大会特别会议到卡塔赫纳和里约、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逐渐形成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制定新政策和更新组织体制时所需要的指导和决心的一个源泉。

我确信，联合国能够应付好这个实质上 and 结构上的双重挑战。从才智上和管理上来说，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有卓越非凡的宪章作为指引，它在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方面的条文规定是那么丰富、那么灵活而又那么简单明了。

联合国必须把它在发展方面的目标摆在与它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同样重要的地位。各个政府间机构必须促进相互间政策的一致性和方案的协调。各种不同种类的方案活动——特别是分析性和业务性的活动——要做到相辅相成，互相支持。

政府间改革和秘书处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共同事业中，会员国也有它们的一份责任。在政府间结构的改革问题上，需要你们采取前后一贯的立场并作出决定，我则只能敦促快些采取行动，并就改革的内容提供意见。

我非常重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在继续进行的改革。我希望看到它真正负起宪章交给它的中心责任。经社理事会应该处理影响到国际安全的发展问题，并把这种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为此，必要时在闭会期间也要进行工作。需要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所有向发展行动提供经费的方案的管理和优先秩序——包括所提供经费的数额和可预测性——进行综合监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应该支援经社理事会促进一致性和协调的努力。

虽然经社理事会必须照顾到会员国各种不同的利益，但是要合乎逻辑地确定优先秩序，使它下面的附属机构体制能够逐步精简下来。现在大约有 40 个机构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直接负责。这些机构许多又有自己的附属机构，所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专家委员会和政府间委员会总数接近 200 个。我确信，这些附属机构都是有正当的技术性和实质性理由才设立的，但是有多少个政府能够真正应付一个这样庞大的机构体制？这个机构体制超过什么界线就会变成一个累赘，而不是向各国政府和为国际决策提供有用投入的源泉呢？我相信，在当前就政府间机构体制的改革问题开展的辩论的情势下，大

家会有必要的政治意志来正对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需要由会员国来决定的事情。但是，秘书处也能作出贡献，就是改进它的运作。一个更有效的秘书处，能够更好地为会员国和政府间机构体制提供服务，还能够推动和促进这个机构体制的改革。秘书处的改革，不应该因为精简政府间结构的过程而受到拖延。经过改组的秘书处，可以一面更好地为现有的机构体制服务，一面等待新的机构体制出现。

秘书处不应该根据它的立法历史或者它所服务的各个政府间机构的地理分布来加以分割。所有工作人员，无论是属于一个部、一个方案还是一个基金，都必须统一在秘书长的权力之下。我们要把整个秘书处、包括在总部和外地从事分析和业务工作的所有能力激发、动员和结合起来。采取这些步骤，将使秘书处能够在联合国系统内起更明确的领导作用，并且更有力地提供帮助以满足会员国的需要。

在对秘书处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工作施行进一步改革的可选择的各种做法进行审查时，我亲自征求了一个独立顾问小组的意见。鉴于这个小组的成员的崇高地位，我毫不怀疑他们的意见的宝贵价值。随着他们工作的进展，我已经在实际上考虑到了这些意见。我期待着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收到他们进一步工作的成果。

我今天向大家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改组的想法，是由我自己个人负责的。秘书处的改组和精简化，是我就任以来常常想着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作为秘书长的整个任期内，它们都会是我决心要做好的主要事情之一。改革没有自然的终结点，而应该协调一致地、系统地进行。

我的关键性的目标之一，是把本组织经济、社会和环境部门的目标统一起来。这些部门已经越来越变得支离破碎，互相分隔。我还会采取步骤加强这些部门与本组织的政治和人道主义部门之间的联系。联合国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复杂的外地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应该综合一体地处理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在过去的改革努力中，与这一次一样，有一个引起关切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确保秘书长在发展领域的管理和协调职责得到充分支持。人们提出的许多不同的模式，各有其长处和弱点。我打算从这个问题的根源来着手解决。

一个先决条件是，对于这些职责，秘书长要抽出必需的时间来亲自加以关注。我有决心要这样做，并且要从秘书处的所有各个部门争取到我为了做好这件工作而需要的支持。

在管理方面，我的策略是明确地界定哪些发展和合作工作应该由本组织自己在其专门机构和其它机构的系统内进行。首先，我正在着手确定哪些职能应该在总部这里进行。然后，我将进一步决定如何在总部与联合国设在日内瓦、内罗毕和维也纳的各个中心之间，以及在各种全球性、区域性和外地机构之间，更合理地分配各种职责。在重新分配各种活动的时候，应该使联合国的每一个方案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并且使每个中心的实质重点更加明显。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体制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制度，同时采取步骤消除职责上的重复和重叠，可以大大有助于解决协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可以作出主要的贡献。

基于上述的考虑和第一阶段改组所获得的经验，我认为纽约总部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有三类职能。把这些职能组合体现为组织结构，有多种

不同的做法可供选择。但是这样进行分类，就必然要把相当数量的活动分散到总部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也需要把一些活动调来总部进行。

第一类职能包括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供协调和实务帮助。把这两种职责结合起来的理由，源自《21世纪议程》的广大范围以及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帮助，主要是针对它在政策协调和对业务活动的管理方面的职能。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向环发会议的后续行动提供帮助，显然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职能。

第二类职能包括数据收集、方法研究、政策分析和阐明各种发展观点。秘书处必须被人们确认为对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发展趋势及其国际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最佳中心。

精心细致地制作的统计资料和数据，是进行经济和社会分析不可缺少的基础，而这正是联合国的财富之一。必须维护和加强这一集体财产，并且使它适应各种新的需要。要确保它得到广泛的利用和传播，特别是提供给自己自身能力不足的国家。

第三类职能是在技术合作方面。这种职能应该只在同联合国的其它部分和整个系统相比有明显好处的时候，才在总部进行。它应该把重点放在跨区域和跨部门的方案上，以及放在最不发达国家和需要特别援助方案的国家。

这些中央结构还应该具有能力来推动与在联合国及政府圈子之外能够提出主意和行动建议的各种来源进行交流。知识界、民间社团和工商业界，都可以作出宝贵的贡献。环发会议就很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联合国必须接纳文明社会的各种民主力量，而又不丧失它的政府间接性。

在总部和其它各个中心与各个区域之间找出恰当的平衡点，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是过分向中央倾斜的。是给予各个区域委员会新的生机的时候了。要使它们成为改组后的联合国的真正代表，而又同时把它们更明确地置于中央监督的范围之内。

各个区域委员会的长处，在于它们的活动范围具有多学科性质，又能够在全球一级和国家一级的活动之间起一种中介作用。它们也必须在一种连贯一致的组织策略之下运作。为了适应这种策略，为了适应其区域内不断变化的需要，它们也需要进行改组和精简。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各种分析能力和业务能力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结构之间的分配情况。很可能要从前者调拨一些到后者。例如，大多数技术性咨询服务在区域一级提供会更有效。这样分散职权，将意味着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并且要采取措施确保责任的履行。

接下来谈谈国家一级的情况。我决心改进联合国在实地进行的工作。集体配合是关键所在。我们必须在每个地方形成一个单一的联合国业务机构，把属于我的直接权力范围的方案，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都包括在内。这个联合业务机构将使在联合国从事活动的每一个国家执行一套综合一体的战略。它将由秘书长任命一位联合国代表来领导，这位代表还将兼任联合国系统的驻地协调员。这样可加强驻地协调员的功能，这是符合会员国所表达的要求的。

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六个国家建立了统一代表权。我们同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的同事们在一起，在如何拟订共同国家战略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这些综合一体化的措施，需要在实践中加

以检验，并根据经验加以修改。我希望它们取得成功，这样就可以证明，在每个会员国的面前都只由一个声音来代表整个联合国系统说话的做法是可取的。

这些关于把总部的职能集中成几大类，把职权分散，和把业务活动与外地活动加以重新组织的想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然后落实为具体组织安排。专家小组就这些问题提出的进一步意见，对于帮助我作出决定将会有很大的价值。

提高明确性和一致性，将可增强联合国在整个系统内促进政策协调的能力。我要再次强调，我是很重视行政协调会的，也很重视我作为它的主席与联合国系统各个专门机构和其它机构的行政首长的关系。对于我的这个角色，我将继续给予它应有的时间和关注。

行政协调会已经着手对它自己的作用和运作情况作一次全面的分析，并且彻底地精简它的附属机构体制。这样，行政协调会应能更有效地应付时代的挑战。利用联合国系统的能力来促进《21世纪议程》的实现，就是这样一项挑战。

里约会议确定下来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可以成为综合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工具，使各种不同的方案活动具有一致性。《21世纪议程》本身为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发展活动和动员系统外的组织提供了一个框架。

全世界人民和每一个社会，都渴望实现发展，也渴望得到和平，人权和民主。这些基本的价值标准，在所有各种文化之中，都是人类幸福的理想。它们是联合国宪章的四根互相依靠的支柱。一个领域的进展，对其它领域有支援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些正是大会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这些价值标准正在向后倒退，以致不但人的尊严甚至人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决心在所有各条战线都发挥领导作用，把秘书处改革成为一件有效的工具，以期实现宪章的各目标，为各国人民服务，因为这些目标正是为了他们而制定的。

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本组织这次雄心勃勃而又十分必要的改革的几个主要重点。这个我们自己的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也许终于能够把它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都知道，和平与繁荣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当心，以免它们因为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受到威胁。

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为此它必须处理好改变其思维方式和改革其体制结构这一双重挑战。同时，会员国也要承担起它们的责任，因为秘书处的改革与各种政府间机关的改革只是同一件现实事情的两个方面。在这方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改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振兴它的众多附属机关。

把联合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部门的目标重新统一起来，是我优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但是要想成功，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第一，秘书长要抽出必需的时间，亲自关注这些部门的事情，我在此承诺，我将会这样做。第二，要简化体制结构，消除重复和重叠，并使职责的分配合理化。因此，我将尽力把各种职责在纽约总部——它的活动主要围绕着三类职能——和设在日内瓦、内罗毕、维也纳三地的总部与各区域办事处和外地行动之间作出合理化的分配。

为了分散职权，我希望加强各个区域经济委员会的作用和增加它们的职责，并同时密切它们与总部的联系。最后，在国家一级，凡是在有可能的地

方，我将设法为本组织建立单一的代表权。

对于调和联合国系统以内的各种政策，行政协调委员会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我将继续以尽量注重实效的精神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工作。《21 世界议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总体框架来协调联合国在发展方面的活动，并把联合国以外对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极大贡献的良好意愿调动起来。

我希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能够受益于曾经鼓舞里约会议工作的政治意志、思想活力和伙伴精神。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协助我工作的将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刚刚决定设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机构间委员会。

作为总结，我希望在这里重申，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都渴望发展、和平、享受各种基本权利和民主。这些基本的价值标准，在各种不同文化之下都是人类幸福的理想，它们构成联合国宪章的四大支柱。它们是互相紧密依靠的，在一个领域取得任何进展，都能推动其它领域的进步。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其中有一些是这个庄严的大会所熟知的——这些价值标准还有可能被削弱到连人的尊严或甚至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胁的地步。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上的一个坚定目标，就是在所有各条战线上捍卫这些价值标准，并把秘书处改造成为一件有效的工具，不仅用来为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服务，也用来为缔造了自己的联合国的各国人民服务。

二、联合国与世界和平

导言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宗旨。战后 50 年来，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壮大，各国的核恐怖趋于平衡、然而联合国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尽管在不少地区的危险局势中，联合国遇到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但它一直在发展自己作为促成和平与维持和平的组织的能力。

冷战时代，在控制地区冲突和调解地区争端方面，由于美苏两大集团在许多事件中各支持一方，致使安理会的职能遭到削弱、联合国显得软弱无力、它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往往被束之高阁，或弃之不顾。而且它往往为一些大国所控制，甚至被用以充当某些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公然侵略朝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毛泽东曾经指出过，在美国眼里，联合国只不过是它手掌里的工具而已，“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但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由于国际和平力量的努力，它在调停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在中东问题、两伊冲突、塞浦路斯问题、柬埔寨问题、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等方面，都起到了作用。

自 90 年代初始，随着两极对抗的结束，“一起四强”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在审议和处理国际重大事件中加强了协调和磋商，从而开创了安理会发挥集体作用的新局面。

维持和平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新事物。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字样，但它与现时的“维持和平”的定义并不完全一样。“维持和平”一词的正式使用是在 1965 年 7 月联合国大会建立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时开始的。按秘书长的报告，维持和平行动的定义是：“为了帮助维持或恢复冲突地区的和平，由联合国组织的有军事人员参与、但无强制执行权力的行动”。（《联合国手册》第 10 版，第 108 页。）

联合国最早的维和行动是 1948 年 6 月因阿以冲突而建立的停战监督组织。此后，联合国又采取了 29 次维和行动。目前，联合国正在进行的维和活动有 17 个。从 1948 年至今，联合国共组织了 60 多万名官兵和文职人员参加维和行动，有 1000 多名维和人员在监督停火、非军事区巡逻、缓冲区任职或平息冲突过程中丧生。目前约有 6,2 万名军事人员和 1100 名民警在执行维和任务。联合国关于维持和平的预算达 36 亿美元。提供军事和警察人员的国家已达 74 个。

自 1989 年以来，我国已派遣了近 1000 人次的工程兵、军事观察员和文职人员参加了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柬埔寨等国的选举监督，为和平解决柬埔寨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通常认为，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大致经历了初创、发展、停滞和再发展四个阶段。

初创阶段（1948—1955）。第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中东危机等许多问题提上了联合国的议事日程。这一阶段先后展开了两次维和行动，建立过两个联合国军事观察团。维和行动仅限于派遣军事观察员，且具有中立及非强制特点。

发展阶段（1956—1977）。这一期间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国或宗主国残酷镇压，于是战争不断。联合国先后展开了 10 次维和行动，无论从形式上或功能上相比，均较初创阶段明显扩大，维和主要遵循的原则也得到了确认。

停滞阶段（1978—1987）。这一时期的世界局势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

对抗。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对侵略行为仅限于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软弱无力，只组建过一次部队，即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其行动一直处于重重困难之中。

再发展阶段（1988 至今）。这一时期整个国际局势的特点是从对抗走向对话，从紧张走向缓和。联合国面临着新的任务，维和行动引人注目地增多和扩大，先后进行了 16 次之多。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选收了铁托、肯尼迪、基辛格、乔冠华、黄华、西哈努克、沙米尔、穆加贝、希拉克、里根、阿拉法特、卢泰愚、加利关于联合国与世界和平的演讲。尽管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代表不同的国度，但演说中都可以听到同一个声音：和平。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是世界一致的愿望。化剑为犁，让血与火的战车在和平的林荫大道上为世界人民的和睦安全而行进吧！读者可以品味到其中那呼号的激越、祝福的虔诚；还有那幽默、睿智、让人开怀的比喻，令人向往的憧憬。不同肤色的人、不同种族的人，在联合国这个讲坛上，迸发出的是全人类的心声：和平。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缔造者，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1910年加入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1915年作为战俘到了俄国。1920年9月回国。1937年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1941至1945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3年当选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1945年全国解放后，历任联邦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共和国总统和最高统帅、终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主席、终身主席，并兼任联邦主席团主席。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世界和平和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愿望和要求 (1960月22日)

主席先生！
代表先生们！

请允许我表示我在这里——在联合国的所在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特别愉快的心情。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政府一贯特别重视联合国这个最广泛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它的基本宗旨，特别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反映了国际共同体的基本愿望和需要。

我还想代表南斯拉夫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达我们高兴的心情，因为联合国的新会员国，特别是不久前取得自由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大量代表参加了第15届会议。会员国的增加之所以具有特殊意义，还由于这在积极意义上充实了联合国会员国的整个结构。因为我们这一组织的这些新会员国的基本愿望，无疑是巩固已经取得的独立，加速内部发展和在各国人民的世界共同体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并对维护和平和稳定世界局势作出贡献。这些愿望完全符合宪章的精神和条款。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会一方面通过实现所有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另一方面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使联合国具有真正的和充分的普遍性。

第15届联合国大会之所以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有多种原因，首先是由于本届大会面临着十分重大的和困难的任务，并且是在一个真正令人不安的国际气氛中，在恢复冷战和对这一切完全不知今后去向的渺茫气氛中召开的。我们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在这里注意使我们这个组织的活动及其进行的方式永远符合宪章的精神和原则，符合每个成员国和那些尚不是成员国的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主权。否则，这些行动无助于联合国的宗旨，而且可能大大地损害它的威望和对它的信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去了15年了，可是，这场战争所留给我们的一些大的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引述事态的过程，但我仍想说明一下早已多次讲过的东两，即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从实力地位出发来解决国际争端的错误道路，在于某些有影响的人士今天还在顽固地坚持这观点。

这种政策今天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后果呢？老的问题愈积愈多，这些问题使本来就很严重的国际气氛愈益严重起来。

一年前曾期望国际紧张局势将会得到较大和较长期的缓和。遗憾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与去年本着戴维营精神、即东西方谈判精神举行的会议不同，今年我们是在高级会议失败、日内瓦裁军谈判中断、不断拖延就禁止核武器和热核武器试验达成必要协议的阴影中召开会议的。简言之，是在东西方关系尖锐化和恢复冷战的趋势增长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东西方关系发展中的这一危险趋势正造成愈益互不相信的气氛。

这方面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也表现在不久前提出以核武器武装西德国防军的要求，这种要求揭示出目前国际形势的全部严重性。假如这种要求得到满足，就必然会缩小争取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前景。

人类所达到的发展程度以及随着这一发展而出现的决定命运的问题，增加了我们的责任，但是同时也增加了我们把历史进程引向积极方面的可能性。人们常常说，人类的眼睛注视着这个大厅，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大厅之外还有亿万人民。他们坚决支持我们任何一个建设性的行动，并以自己的意志和人数的力量把这种行动变成前进的新步伐，去争取各民族、各大陆人民的和平与更美好的生活。

二

尽管裁军问题是所有悬而未决问题中的最大问题，我仍然想在我的讲话中首先谈谈最迫切的问题——殖民地问题。非洲和其它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突飞猛进，特别是刚果最近的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涉及那个国家，而已也涉及整个非洲和独立的非洲人民的今后发展），证明我的上述立场是正确的。

前殖民地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解放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消灭构成各种殖民主义形式的实质的过时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才使许多新的国家有可能作为建设性的一元和积极因素出现于国际共同体中。为此，不但不要阻挠这些过程，而且应该建设性地对待它们，并鼓励这些新独立的各国人民出现于国际共同体中，因为消灭当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殖民关系是全人类为实现普遍和平与进步而努力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这些进程仍然得不到谅解并遭到反对。许多殖民主义大国和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能容忍非洲和其它不发达地区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在某些比较广泛或狭隘的地区，它们甚至企图依仗既得的阵地，依靠其物质和其它的优势，阻止上述过程，或者以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手段改变其进程。由于这些历史地受到谴责的、因而归根结蒂也是枉费心机的企图，冲突和危机正在产生和加深。例如在阿尔及利亚顽固地继续进行的战争，南非发生的事件，不久前在刚果发生的事件，以及在其它方面，如老挝的紧张局势和古巴的同势。在古巴，人民在自己的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多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现在正努力巩固自己的独立和完全的平等。这些危机震撼着世界的本已不稳定的和平，尤其是因为它们表明了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趋势：它们与东西方的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这些冷战的冲突有席卷过去的和现在的殖民地区的危险，并使新独立国家变成国际冲突和战争危险的新的策源地。

特别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所谓新解放国家无能和不成熟，以及它们在经

济上的不发达，都成为外来干涉的借口。但是，最不发达的国家通常都是不久前不自由的国家，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尽管在新解放国家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困难是事实，但上述困难首先来自多年来的殖民统治，而殖民关系的加深只能增加和加剧上述困难，这同样也是事实。

三

我想在这里谈的下一个重要和迫切的问题是裁军。

裁军是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问题之一，其重要性是普遍承认的。然而，这种认识在迄今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中并未成为必要的具体行动。这样，就出现了裁军在国际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情况。我认为，这种地位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紧迫的意义。

因此，我们应当确定最紧急的方针来着手解决裁军问题。在这里应该经常记住，军备竞赛在现在这个时候正不断地、愈益激烈地进行，其结果必然使任何新的裁军措施日益困难和日益复杂。天天出现愈来愈新式和愈来愈危险的武器，对这些武器建立监督也愈益困难，因为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和圈子在扩大。当谈论裁军的时候，光说军备竞赛在继续，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正在不断加速、加强和加剧。

可以用许多方法来说明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达到何等荒谬的规模，以及它对人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后果，但我不想在这里这样做。

我要提出一个我们愿意采取的、对大家都是迫切需要的行动的具体例子，即不允许拖延达成一个已经具备了所有客观前提和全世界公众都要求的协定。这就是禁止核武器试验。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再有什么真正的障碍，只要大国取得政治上的一致，使已进行了两年的谈判及早结束，并达成各国都应参加的阶定。

我们坚信，全面彻底裁军不是不现实的目标，而恰恰是唯一可行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去年整个联合国大会也一致持这种立场。

有鉴于此，我们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南斯拉夫政府一向全面地、积极地致力于在联合国工作范围内和其它地方顺利地解决裁军问题。

四

为使当代世界能够顺利地解决我所谈到的问题以及决定和平与人类未来的一切其它问题，必须使各国人民一律接受共处原则，尤其必须在相互关系中，在一切场合下，处处都运用共处原则。

我们认为，积极和平共处的实质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今天在国际关系中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因此，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不同的形式日益受到损害。

根据我们的理解，共处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应该成为战争冲突的原因，也不应该成为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合作的障碍。和平共处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执，并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抛弃实力和战争。第三个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干涉他国人民和他国内政的义务，尊重每个民族自己处理自己的内部发展和生活的权利。

我相信，为了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发展国家间的和平睦邻关系以及全面

发展国际合作，这次会议应该就所必须作出的努力和准绳通过某些一般性的指令，这也许可以用大会宣言的形式通过。

我们在这里，大小国的代表全都肩负着一项重大的共同的任务：共同努力促使全世界各国人民去迎接更晴朗的明天。

译自《联合国英文稿》
王惠初 译 叶仁 校

本篇是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两桩对和平的威胁 (1961年9月25日)

最后，作为美国总统，我认为有责任向大会报告两桩对和平的威胁。它们都是你们的繁忙议程上所没有的，然而我们最关切的，而你们大都也有同感。

我所要报告的第一桩威胁已引起广泛的误会，那就是东南亚方面战烟已起。南越现已遭受攻击，有时动手的是一名刺客，有时是一批游击队，近来则是整个整个的营。缅甸、柬埔寨和印度的和平边疆一再遭受侵犯。和平的老挝人民则有丧失他们获得不久的独立之虞。

无人把它们称为“解放战争”。因为这些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政府统治下的自由国家，即使人们是在家里被刺死而不是在战场上中弹而死的，那也是侵略。

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简单问题就是能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弱小国家，使这种策略不致于向他们肆虐。因为要是这些策略在老挝及南越成功，那么这些国家将门户洞开。

美国自己在东南亚并不想要基地、领土及任何特殊地位。

我们支持老挝真正中立与独立，支持它的人民能不受外来干涉，他们的土地保证不会被人用以攻击其它国家，使他们能在堪与柬埔寨及缅甸相比（这是赫鲁晓夫先生和我在维也纳议定的）的情况下安居乐业并与邻邦和睦相处。

如今关于老挝的谈判已达到决定性阶段。停火情况危如垒卵。雨季即将终止。老挝领土正被人用来向南越进行渗透。国际社会包括所有国家在内必须认清，对老挝和平与自由的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与各国本身所遭受的种种威胁是分不开的。

第二，我想向各位报告关于德国及柏林的危机。这并不是畅所欲言的适当时机或场所，但是国际社会有权利知道我们对那些简单问题的看法。要是确有危机存在的话，那是因为和平正遭受威胁，一群自由人正因为有人漠视庄严协议而遭受压力。既定的国际权利正受到片面复杂的威胁。和平的交流被铁丝网与混凝土的障碍物所截断。

我们不禁想起普希金在他的诗《鲍里斯·戈东诺夫》里所描述的沙皇的命令：“立即在边境上架设栅栏，不让一个人、一只兔、一只乌鸦越过或飞过。”

有人指责我们以战争相威胁，用意只是防止苏联与东德签署“和约”。这纯属无稽之谈。苏联如果想与在他们军队占领的领土上所设置的、而且由他们自己的特务统治的政权签署任何文件，跟西方国家根本无关。这种行动既不能影响我们的权利，也影响不了我们的责任。

要是柏林现在有紧张危机的话——事实上确实如此——那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与深重承诺以及西柏林的自由受到威胁，我们不能置这些利

戈东诺夫（1551—1605），原为沙皇费多尔一世的谋臣和摄政官（1584—1598），即位后残酷镇压政敌，向西欧派遣留学生，允许基督教新教在俄国修建教堂和传教。

害于不顾。我们也不能不履行这些承诺。我们不能断送我们对其负有责任的这些人的自由。具有毁灭和平条款的《和约》将是个骗局。一个并不真正自由的“自由城”将使自由受到窒息，而为人所不齿。

一个城市或一个民族如欲真正自由，便必须有自由选择过自己的生活的牢固权利，而不受经济、政治或警察行动的压力。我已经说过，如有任何人怀疑西柏林人民需要我们实地庇护的殷切心情，我们随时准备让整个柏林——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让所有德国人民自由表决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危机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那根本上全无必要。和平解决的根本办法必须到联合国宪章里去寻找。按照宪章，一切协议必须遵守，除非所有订立这些协议者加以更改。既定权利必受尊重，各民族的政治意向须按照他们在公民投票或自由选举里所自由表示的愿望去决定。如有法律问题可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如有武力威胁，必须加以拒绝。如想改变主意，必须举行谈判；如举行谈判便必须互相尊重，顾及他人的权利。

西方国家已镇静地决定，将以被迫采取的任何手段，根据他们的义务，保障他们和西柏林自由公民接触的途径和这些公民的自决权利。这一代人已经从沉痛经验里得到教训，深知进行威胁或是向威胁屈膝都只会导致战争。坚强与理智则能导致许多国家深深相信的和平解决。

我们并未矢志坚持任何硬性方案。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我们深知部队及坦克能使一个国家被迫分裂一段时间。然而，这种政策在我们看来是多么不明智。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做到既维护西柏林的自由、盟军的驻防与通达，同时又承认他人在历史上保证欧洲安全的合法权利。

我们正在探讨举行谈判的可能性。前途如何现在一时还无可奉告。就我方来说，我们极希望能在适当时机报告已获得解决办法。对于柏林，根本没有制造危机，威胁和平的必要。如果制造这个危机的人想要和平，柏林便会有和平与自由。

各位，决定在于我们自己。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将这么重大的得失维系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共同合作便能挽救我们的世界，彼此相争便会同归于尽。我们能够自救而且必须自救，这样我们将获得人类的永恒感激。而且作为共谋和平的人，也一定能获得上帝的永恒保佑。

译自《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1961年9月25日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犹太人后裔。第二次大战后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校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任哈佛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1969年至1974年曾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1年7月首次秘密访华。1972年又随尼克松总统来访。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等。本篇是他在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寻求真正的和平 (1973年9月24日)

美国致力于实现世界共同体这个目标，并将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全人类的议会——来使这个目标变为现实。它寻求真正的和平，并努力争取使世界成为法治的世界，使基本人权成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超越最近的双边外交和重实效的协议，美国设想一个全面的、制度化的、包括所有国家的和平前景，而联合国在培育这种思想并使之在人类的心中扎根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

曾经使联合国大会心力交瘁的很多危机已经过去了，柏林问题已达成协议，中东实现了停火，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支配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那种僵硬的对抗和削弱联合国的行为现在已有所改变。美苏两国认识到在避免发生毁灭人类的大破坏和建立更广泛的建设性关系网络方面有着共同利益。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在放慢军备竞赛的速度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美国希望继续进行的谈判将产生加强国际安全的作用。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20多年的相互疏远，现在已让位给建设性的对话和富有成效的交流。很多国家抓住了这一机会并为缓和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欧洲和北美国家正在开会进一步加强安全与合作。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开始了有希望导致他们之间的和平与安全的对话。冷战中的很多对抗已结束。可是，大会上互相猜疑的言词并未消失。在原来的两人集团之间的集团——不结盟国家正在结盟中。

美国永远也不会满足于建立一个靠不稳定的停战维持的世界，它努力争取实现的和平不是仅仅靠力量均势维持的和平，而是建立在共同抱负基础上的和平。一个无视人类价值的机构将被证明对人类大多数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正义不能被国界所限制；真理是属于全体人类而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或某种意识形态的私产，美国希望联合国大会进一步将大国之间的缓和推进到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

美国并不想支配世界，但它也永远不会背弃其盟国或朋友。它将给西半球伙伴政策注入新的活力，并通过联合国和双边关系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它承认，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在为世界受纷争折磨地区（如中东）帮助寻找公正的解决方案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虽然直接当事方对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替代的责任。美国准备运用其影响倡导一种和解精神，敦促各方采取实际步骤使问题的解决能有所进展。

在稳定、增长、政治问题获得解决的情况下，生活质量的意义越来越大。我们的体制处置不了技术发展每天在产生的成果。政治想象力必须赶上科学的视野。这是联合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最好的机会。

国际社会要求制止冲突。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并不总是袖手旁观的，在执

行对中东、南亚次大陆和刚果的事实调查、调停和维持和平的任务中，它表现了它的能力和效果。在开展维持和平活动及安理会对维和机器的控制程度问题上已经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辩论。现在是就维持和平行动的指导方针达成协议的时候了，只有这样，在危机发生时联合国才能迅速、果敢、有效地行动。为了打破僵局，美国准备考虑安理会如何在维持和平活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问题。

联合国应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南北朝鲜都应有合法的席位，这不影响他们将来的统一。美国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国际社会要求人人有饭吃。世界食品供给的威胁日趋严重，值得大会立即注意这个问题。美国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于 1974 年召开世界粮食会议，讨论保持足够粮食供应的办法。大会应当为发展问题寻找一种新的有想象力的解决办法。

美同愿意认真考虑墨西哥提出的关于制定国家经济权利义务的宪章的建议。科学技术必须由全人类共享；必须找到通过合作审慎地发展能源资源的办法；必须负责地面对人口增长的问题；必须发起一个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科学革命。联合国大会的会议记录可以充斥老掉牙的口号和刻毒的言语，但也可用新的理想写成。像世界共同体理想这样具有伟大建设性意义的意见往往被人诋毁为不现实。但现实是从理想中诞生的。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3 年第 10 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乔冠华

一九一三——一九八三

乔冠华，笔名乔木、于怀。1929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华商报》工作，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著有《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和《乔冠华国际述评集》等。本篇是他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的两次发言。

关于美、苏所谓“中东停火”提案的两次发言 (1973年10月23日)

第一次发言

今天上午，安理会主席通知中国代表团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在中东的破坏停火问题，中国代表团到达会场以后被告知，说是安理会不开了，让美苏两家达成协议，经过所谓协商一致通知秘书长执行就行了。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种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做法。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安理会其它成员国家极大的不尊重。中国代表团不能容忍这种做法。我们是有话要讲的。我们相信安理会其它成员国从他们内心来说也是有话要讲的。中国代表团愿意再一次说明自己对中东形势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安理会的看法：

一、10月5日以来，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广大军民在反击以色列侵略的英勇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埃及的国旗重新飘扬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被侵占6年多的领土上。叙利亚军民在戈兰高地予敌军以重创。巴勒斯坦游击队也英勇出击。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为了反击侵略，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而进行神圣战斗，突破了两个超级大国为各自利益而在中东地区蓄意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粉碎了所谓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显示了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强斗志，人心为之大振。同时，许多阿拉伯国家先后派出了部队开赴反侵略战争的前线，同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并肩作战。还有许多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和声援这场反侵略的战争，显示出阿拉伯各国同仇敌忾的空前战斗团结。事实证明，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自10月6日以来所进行的斗争是完完全全正义的斗争。联合国以及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支持和援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进行阻挠和破坏。

二、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愤慨地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世人皆知，在中东地区造成事态危险发展的不是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而是在两个超级大国支持和怂恿下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挑衅。在这次以色列发动新的挑衅以后，两个超级大国就纷纷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绝不是为了真正支持他们反击以色列的挑衅，而是为了控制中东形势的

发展不致于超出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所商定的范围。苏联还特别起劲地大叫什么阿拉伯人民反抗侵略斗争使所谓国际“缓和”的局势正“面临事态的危险发展”，说什么局势的发展同最近取得的所谓局势的缓和“背道而驰”。这说明什么？这就表明苏联的所谓“缓和”是建立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人民伏伏贴贴拜倒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联合统治面前的基础上的。美苏两家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对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击侵略的正义斗争进行种种责难和阻挠，并想方设法力图加以扼杀，其目的就是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停止斗争，捆住双手，听任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10月22日，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进行了紧张的幕后交易之后，为了进一步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和重新把“不战不和”的局面加在阿拉伯人民的头上，向安理会抛出了一个“决议草案”，企图利用联合国和安理会为其御用工具，为两个超级大国的肮脏交易加盖橡皮图章。一切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所谓决议草案是较之242决议更加含混的一纸空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骗局。中国代表团从根本上来讲是不赞成这个所谓决议草案的，只是为了照顾某些当事国的愿望，中国代表团才没有予以反对，而未参加投票。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这个所谓决议草案被采纳之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肆无忌惮地对埃及和叙利亚进一步扩大侵略。可见，苏联的所谓“公正”是偏袒以色列的。

三、我们坚决支持埃及、叙利亚对以色列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正义控诉。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被占领的领土上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收复失地都是正义的。而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微小的挑衅都是犯罪行为。我们认为一直对埃及和叙利亚军民的正义斗争横加阻挠破坏和炮制了上述决议草案的两个超级大国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最近扩大侵略的行为负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美国和苏联继10月22日的决议草案之后，今天又提出一个新的关于所谓监督停火的决议草案，这是对联合国的又一次侮辱。这个决议草案同前一个决议草案一样，是一纸空文，对以色列扩大侵略毫无谴责，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放在同等地位，只字不提要以色列侵略者从一切被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立即撤退。从根本方面说，中国代表团是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我认为，还应当指出，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但是，出于对有关国家的尊重，对于这个决议草案我们愿意加以考虑，但决不愿意被强加。草案未发下来，马上就要强行通过，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如果当事国——我重复，当事国——要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最多只能做到不反对。但是我们深信，广大的阿拉伯人民是绝不会同意由两个超级大国永远控制下去的。历史是发展的。人民总是要斗争下去，生活下去的。所有这一切，过了几十年回头一看，只不过是一段插曲。

五、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和主宰世界事务的时代毕竟在根本上已经过去。无论是一个超级大国也罢，还是两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也罢，都不可能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强加于第三世界，强加于安理会的其它成员头上。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是有觉悟的人民，是有着坚强意志的人民。经历了多年来以及最近这一次反侵略斗争考验和锻炼之后，他们更是决不会任意听任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和愚弄。7亿中国人民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是在他们一边。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

族权利没有恢复，阿拉伯国家的失地没有收复，中东地区就不可能有什么持久和平。英勇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必将从两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中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继续突破两个超级大国所企图重新加给他们的“不战不和”局面，进一步坚持斗争，加强团结，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排除各种阻力和困难，把反侵略的正义斗争进行下去。伟大的阿拉伯人民一定要得到解放。

谢谢主席先生，感谢你们的耐心。

第二次发言

主席先生：

我的发言被打断了。对此，我要表示不满，我要抗议。

10月21日美苏炮制了一个决议草案，不给人家讨论的机会，不给向本国政府请示的时间，企图强行通过，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照顾大局，我们没有加以否决，而是不参加投票。

本来对决议我们是可否决的，为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的好意被滥用了。今天，草案还没有下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中文本，这怎能表决？要我们马上表决，这太霸道了，难道这天下就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的吗？不是的。中国有发言权，其它国家也有发言权。因为我的讲话刚才被打断了，所以我还要从头讲起。

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

现在我要发言，请大家耐心听。

（发言内容见第一次发言）

选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73年，第231—236页

黄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曾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八路军总部秘书兼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1949年后任天津军管会、南京市委、上海市委外事处处长，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外交部欧非司司长，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197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

关于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 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1973年12月4日)

主席先生：

朗诺卖国集团的代表在联合国组织里非法窃据柬埔寨王国的席位已经3年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再也不应延长下去了。1973年10月17日联合国大会全会决定将“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一项目列入本届会议议程，这是完全正确的，联合国大会在柬埔寨问题上3年来第一次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决定，坚决主张本届大会作出决定，立即恢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把朗诺集团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自从1955年以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柬埔寨王国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它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柬埔寨王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它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颠覆，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东南亚地区及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1970年3月，美国政府策动朗诺集团趁西哈努克亲王不在国内之际，发动了反动政变，把它非法地扶植起来的朗诺叛国傀儡集团强加于柬埔寨人民，从而破坏了柬埔寨的和平、独立和中立。美国和西贡当局为了支持朗诺叛国集团，又悍然派兵入侵柬埔寨，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西哈努克亲王高举抗战救国的旗帜，组成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外国侵略者，狠狠地打击了朗诺叛国集团。3年来，柬埔寨人民团结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周围，浴血奋战，在反抗外来侵略和讨伐朗诺叛国集团的英勇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目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解放了全国90%以上的领土，550多万柬埔寨人民已经成为柬埔寨的真正主人，掌握了自己国家的命运。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扎根于人民的，和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它在广大的解放区里普遍建立了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副首相在内的11位大臣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国内领导着抗战救国战争和各方面的工作。到过柬埔寨解放区的许多外国人都证明了上述事实。这就有力地戳穿了朗诺集团所散布的柬埔寨人民是依靠外来力量作战的无耻谎言。

今年春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胜利地视察了柬埔寨解放区，行程1000多公里，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解放区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亲自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这些

事实充分表明，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广大国土上有效地、充分地行使着自己的行政权力，而朗诺叛国集团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强加给高棉人民的，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但是，朗诺集团分子及其后台却说什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一个“流亡政府”，这真是荒谬到了极点。业非拉的人民还记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为了便于进行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于1958年至1962年在突尼斯建立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援。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都确认它是代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也记得，法国戴高乐将军1943年至1944年在阿尔及尔组成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当时甚至在国内还没有建立任何解放区，更谈不上解放法国首都巴黎。但由于它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斗争，反映了法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愿望，当时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都承认它是法兰西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一致认为维希政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国傀儡集团。回忆一下这些历史事实，就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那些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污蔑为所谓“流亡政府”，或者说首都金边还没有解放，因而不能承认其为柬埔寨人民合法政府的论调，是多么强词夺理，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里应该特别指出，最近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府发表公告，决定把在国外执行任务的各部迁回柬埔寨国内，除国家元首和外交大臣外，其他所有大臣均在国内办公。这就使上述谬论遭到彻底破产。

今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代表柬埔寨王国以正式成员资格出席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和有关柬埔寨的决议，都指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是由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要求一切爱好和平与主持正义的国家正式承认它的这种地位，并重申在国际斗争中对它的声援和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中给它以坚决的支持。这一切事实有力地向世界表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和支持的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柬埔寨人民得道多助，朋友遍天下。1973年11月22日，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重申决心继续斗争，决不妥协，直至实现柬埔寨国家元首1970年3月23日的五点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拥护、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

让我们再看看盘踞在金边的朗诺集团吧。它们不过是一小撮叛卖祖国、叛卖人民的民族败类，早已为柬埔寨广大人民所唾弃。朗诺集团控制地区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它的法西斯统治激起了各阶层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它的内部分崩离析，矛盾重重。朗诺伪军中大批士兵和下级军官成批起义，投奔解放区，调转枪口反对朗诺伪军。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在今年11月开始的旱季战役中，对敌人发动了猛烈攻势，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目前，朗诺叛国集团已处在全柬埔寨人民包围之中，龟缩在金边和几座孤城，只是靠帝国主义的输血打气才得以苟延残喘。它的彻底崩溃为时已不会太远了。令人遗憾的是，一个自称“完全支持柬埔寨爱国者争取祖国自由独立的英勇斗争”的超级大国，在柬埔寨人民处在抗战救国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却一直拒绝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继续同朗诺卖国集团建立和保持着外交关系。现在，柬埔寨人民抗战救国的斗争形势是如此有利，请问他们将何以自处呢？

现在有人企图把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合法权利的问题推迟到下届大会。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阴谋，我们坚决反对。立即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全体柬埔寨人民的正当愿望，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都应当毫无保留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这种要求。既然大会已决定把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列入本届联大议程，有什么理由又要求大会推迟讨论与决定呢？其实，所谓推迟的主张，说穿了，都是为了适应一个超级大国的需要。人们很清楚，一个超级大国目前处境不妙，多么希望让自己的傀儡继续窃据柬埔寨王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便争取时间，继续提供支援，使其能够苟延残喘。我们认为，一切推迟讨论或表决的主张都只能是有利于外来势力继续侵略和干涉柬埔寨内政，危害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而不利於柬埔寨人民的正义事业，对此大家应该提高警惕。

还有人竟然说什么要求联合国讨论柬埔寨代表权的问题，就意味着要联合国去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这话说错了。大家都知道，究竟是谁干涉了柬埔寨内政，又是谁远渡重洋对印度支那和柬埔寨进行武装侵略，而这种侵略和干涉至今还没有停止。如果要真正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就不能坐视和容忍一个主权国家被肆意干涉和侵略，不能坐视和容忍一个依靠外来势力强加在柬埔寨人民头上的叛国傀儡集团继续非法窃据柬埔寨王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如果不纠正这种非正义的、不合理的现象，实际就是要承认帝国主义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颠覆和干涉是合法的，这不正是完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吗？

历史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我们深信，尽管有人在恢复柬埔寨王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设置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和圈套，但是正义的事业毕竟是不可阻挡的。任何阻挠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企图，都将最终遭到彻底破产。朗诺叛国集团必将被柬埔寨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柬埔寨人民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我们希望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能同我们一起支持立即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朗诺叛国傀儡集团的代表从它所窃据的联合国及其一切附属机构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谢谢，主席先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73年，第38—44页

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国家元首。肄业于越南西贡沙士鲁法文中学。1941年4月23日被选定为柬埔寨王国国王。同年10月加冕继位。1955年让位给其父苏马里特。接着组织人民社会同盟，任主席。同年9月该党在大选中获胜，出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960年4月，其父逝世后，拒绝继任王位，宣布废除王位继承制度。同年6月当选为国家元首。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到北京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亲任主席。不久，又成立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出任国家元首。本篇是他在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柬埔寨人民要为国家独立而战 (1984年9月25日)

今年，我们的解放斗争在战场上获得了新的胜利。自从上个旱季开始以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加强了活动，加紧攻击我国的中部，特别是洞里萨湖周围的省份，这一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意义。事实上，这是一个铁路、公路和水道相接的汇合点，敌人经此向驻在西北和西部邻近泰国边界的部队运送给养。我们的抵抗力量已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骚扰敌人，摧毁了许多军用物资库，一直打到马德望、暹粒、磅同和菩萨的省城中心。

由于我们连续攻击一直到洞里萨湖沿途的铁路和公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敌供应护航队已经被击溃和歼灭。马德望省“粮仓”的一大部分已经摆脱越南控制，使占领部队发生严重的供应问题，并使他们试图摊派的大米征收量几乎降到零，这种征收是为了越南本身的好处，众所周知，越南的经济困难相当严重。

越南曾经认为，它找到了对付失利的办法，即把大量越南的“农民士兵”安置在柬埔寨最肥沃的土地上。有些外国观察员得以访问处在河内干部愈来愈严厉控制下的韩桑林傀儡集团领导下的所谓的人民柬埔寨，他们报道说，使柬埔寨彻头彻尾殖民化的进程已经达到惊人程度。

可靠的目击者报道说，我国首都几乎有一半居民是越南人；并且在越南控制的一些地区，占领者已经建立了纯粹的越南区，其中大部分“安居者”是带武器的，并且参加镇压高棉爱国者的抵抗活动。

几百个和敌人勾结的韩桑林追随者所推行的这一政策强行规定学校要教越南语，各级傀儡政府必须使用越南语，并且提倡越柬人通婚。这些新主子疯狂歪曲柬埔寨的千年历史，企图使学龄儿童从小就学会知道自己是“大越南”。

我重申几年来我一直提出的建议：在越南军队全部撤出之后，在联合国严格监督下举行普选，各党派、政治团体，包括韩桑林集团在内都可以自由参加。

不幸的是，金边和河内都不想听到要举行这样的自由选举，他们现存也不愿听到这种选举。

我还想补充说，我在过去几年里提出的合乎逻辑和合理的建议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这些建议遭到同样的断然拒绝。

眼下很清楚，越南和其盟友拒绝任何对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最近越南提出关于开始所谓“东盟国家”与别名为“越南印支联邦”的印度支那国家之间无条件会谈的建议就表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被某些人描绘为一大突破的河内建议显然是谋求埋葬联合国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五个决议，并承

认越南在柬埔寨造成的既成事实，从而承认由一个主子和两个仆人组成的越南印支联邦。

然而，我们的武装抵抗力量正在不断扩大。它拥有 61 万多名战斗人员，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高昂的爱国精神，这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很成功的英勇的袭击中已得到证明。

另一方面，越南发起的攻势得不到被迫加入韩桑林部队的高棉青年的支持，这些攻势毫无疑问极大地危害了解放区的同胞、但是这些攻势没有能够损害我们战士的一根毫毛，更不要说夺问这些地区。

无论越南人怎样高声叫嚷柬埔寨的局势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恰恰相反。局势即将逆转。在军事上，我们的境况正在逐步好转。我们正在猛烈地、充满信心地反击并且经常主动出击。在政治上，正如最优秀的观察家所证实的那样，国内的人民尽管抱有和平共处的可理解的愿望，但怀着对所谓的“人民柬埔寨”的主子、越南占须军的深仇大恨，他们明确地站在我们联合政府的一边。在敌人的脚下土地正在燃烧，他们原想一下子吃掉小小的柬埔寨。在外交上，我们的合法政府正得到那些信奉独立和公正、事实上占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我在国内，在对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许多次访问期间亲眼看到，我到处都受到最热情的和鼓舞人心的欢迎。

我们在柬埔寨的坚决斗争以及国际社会日益增强的支持不会改变。而且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使越南恢复理智，并且使它在关心柬埔寨的国际会议上这样做。很清楚，这符合越南本身的利益。越南不愿承认，它一直遭到最高国际论坛以及当越南英勇地捍卫其自决和统一权利时曾是它朋友和盟友的国家的谴责。我有必要告诉大家，在这些友好国家中，我担任国家元首的柬埔寨站在第一线。

如果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捍卫民族团结，我们就有一切希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和维护我们民族特征的基本因素。

现在我们压倒一切的责任是，使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致力于爱国大团结，没有这种团结，我们的斗争将是徒然的。

最后，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民柬希望通过自己的代表团作如下声明：

第一，我们重申对同样遭受着越南统治的老挝人民的友好声援，声援他们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正义斗争。

第二，我们重申将始终不渝地支持朝鲜人民为统一自己祖国所作的努力。我们坚决支持金日成元帅为独立和平统一朝鲜所提出的公正建议。

第三，我们也支持和声援正在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人民。我们祝愿英勇的阿富汗战士取得新的胜利，直到苏军撤出，从而使阿富汗人民得以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府以及经济社会制度。

第四，我们继续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使他们能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恢复他们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在自己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第五，本着同样的希望，我们欢迎在黎巴嫩建立民族团结政府。重要的是，所有外国军队从那个遭受苦难的国家撤出，使它得以恢复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六，我们敦促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兄弟邻国终止它们之间战争的升级，我们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该冲突的措施。

第七，我们重申全力支持非洲解放运动，特别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纳米比亚爱国者的人民斗争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为实现目前非法政权的撤出并向纳米比亚人民移交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第八、我们支持非洲组织和非洲之角各国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我们重申，我们声援索马里人民为捍卫独立和领土完整所作的斗争。

第九、我们支持乍得人民和政府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各国为消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紧张局势、实现该地区各国的自由与独立所提出的建议。

译自《联合国英文稿》1984年9月27日

王惠初 译 叶仁 校

罗伯特·加布里尔·穆加贝，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大学时代参加学生运动。数次坐牢，获释后去国外，建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1979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罗得西亚问题制宪会议，并签署了实现津巴布韦独立的协议。

本文是他在第 39 届联大上的
发和平、安全、发展经济
(1984 年 10 月 2 日)

在我们取得独立后，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是使三支原来敌对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这一任务完成得十分费力。今天，我们自豪地宣布：我们已有了一体化的津巴布韦国民军。

在民族范围内，我们开始执行和解政策。我们不单单为民族和解而选择了民族和解政策。事实上，作为一个政府，我们相信，人民要完成民族发展的艰巨任务，就必须忘掉过去的分歧并且宽恕过去的罪行。我们相信，和平、相互尊重和信任，以及目标一致，这是解决我们在漫长的流血冲突后所面临的巨大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唯一的方法。

今天我们可以公正地说，真正的民主、社会公正、国家信任与和平——以前仅是梦想——现在已在津巴布韦成为现实。

我国人民不仅必须行使政治权利，而且在享有其政治独立和自由的同时，他们应该得到这一新秩序带来的具体的和物质的好处。换句话说，满足物质需要和我国人民的福利，对我们来说，如同他们享有政治控制权利一样重要。所以这意味着必须在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建设和发展新津巴布韦。

在评论当今国际形势以及冲击这一形势的众多严重问题的危险性时，如大会允许，我想首先提请注意南部非洲的发展情况。正如代表们所知，种族隔离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一方面对内恐吓、压迫和剥削在其残酷统治下的广大黑人群众，另一方面对其邻国和前线国家有系统地进行军事恫吓、欺负、政治和经济讹诈的两面政策，危及着这些国家的主权。这种政策还严重地破坏和威胁着整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平与安全。

纳米比亚人民在殖民统治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压迫下继续遭受苦难。虽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早就宣布它接受 6 年前制定的旨在把权力和平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从而结束解放战争的纳米比亚方案，但由于这届会议上某些受人尊敬的会员国的推波助澜，南非从 1981 年以来，在执行纳米比亚方案上，一直躲躲闪闪，支吾推诿，故安理会第 435 号（1978）决议还未贯彻执行。但对我们来说，纳米比亚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人提出了从纳米比亚撤出南非占领军的交换条件，而这与该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毫无关联。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要求在这届会议上得到了某些会员国的完全赞同。我指的是古巴军队必须从安哥拉撤出，纳米比亚才能获得独立的要求，这一要求欲使古巴军队和南非占领军分别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平行或同时撤出。

在南非内部，我们看到推行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继续残酷剥削和镇压广大人民。成千上万的南非爱国者由于抵抗和拒绝种族隔离制度，正在监牢里受折磨。更多的人在为自己生来就有的权利和自由进行的斗争中牺牲生命。种族主义分子通过进行所谓的立宪改革，竭力欺骗国际社会，为自己开脱。

然而，我必须提出警告，即使是这个所谓的政治施舍和随后在有色人和亚裔人阶层中进行的假选举，也欺瞒不了南非广大被压迫人民关于什么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真正政治判断。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所有的外国朋友和盟友都完全知道，这些所谓的宪法改革只不过是种族隔离的黑暗与肮脏的历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

面对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残暴和顽固态度，国际社会别无他择，只有更多地援助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和所有在南非为自由与尊严而战的人们。

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试图在我们地区酿成政治和经济动乱并增加前线国家对南非的依赖的侵略行径。我们呼吁南非结束推行这种侵略政策。

只有通过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南部非洲除南非以外的国家才能摆脱产生于它们自身的经济与种族主义南非的经济的千丝万缕联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现在谈谈世界形势。在西撒哈拉，撒哈拉人民被剥夺自决权；在中东，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源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政策和措施，而阿拉伯人民被剥夺建立家园和自决的权利；在塞浦路斯，外部侵略的干涉已经推动和鼓励了威胁国家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和主权的单方面分裂行为；在中美洲和加勒比，特别是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从外部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预和干涉，正在播下紧张和冲突的种子，阻碍和影响了改革与国家间和解的民主进程；在东帝汶，外国的占领阻挡人民获得政治独立和主权；在阿富汗和柬埔寨，外国军队的存在和未能严格遵守不干预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正在威胁着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主权和不结盟地位；我们感到，联合国应极其关注、拒绝和谴责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军事侵略、干涉和破坏活动，不管它们在哪里发生，由谁进行。

我国政府对那些国家的局势的关注，已经在许多国际讲坛上，包括在大会这届会议上阐明，因而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道义和外交上支持并声援正在进行的斗争，以及在自己国家里发展实现改革的解放运动和改进力量也是众所周知的。

我现在谈一个与本届大会特别有关而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这届大会恰巧在联合国成立 40 周年前夕召开，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却恰恰是当初成立联合国以防止其出现的那种紧张形势。

军备竞赛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和对世界文明的未来捉摸不定而产生的担心。我不是在这里说，只有小国和弱国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感到关注。但是人所共知的是，军备竞赛与发展的目标相互竞争。不仅发展进程被剥夺了十分需要的资源，而且全人类都失去了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正如一句古老的非洲格言所说：“大象相斗，草地遭殃”；同样，这和军备扩散一样，最不发达的国家最为遭殃。

因此，制止军备竞赛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任务。

为了缓和国际局势，我们曾努力开始全球谈判。去年 3 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建议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这项建议强调了一个紧急措施计划，其中包括了商品、贸易、发展、货币和金融等重要领域，另外还有一个从长期着眼重建世界经济结构的措施。不幸的是，我们所有进行这些谈判的努力都没有取得结果。全球谈判必须继续作为我们一致努力重建国际经济关系以适应我们新的需要的基本结构。我们应一致认识到，所有经济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各国的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复苏是不可能

的。

节译自《联合国英文稿 1984 年 10 月 4 日》
王惠初 译 叶仁 校

伊扎克·沙米尔，两度出任以色列总理。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肄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49年参加议会选举未获成功，后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商业活动。1955年重新开始从政。1983年任总理，后被西蒙·佩雷斯接替，1986年再度出任总理。著有《以色列在变化中的中东的地位》、《以色列40年》等。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关于犹太人问题和从黎巴嫩撤军问题 (1984年10月2日)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随着新的伙伴参加到我们的共同努力中来，我们这一国际社会一年一年地变得强大。联合国执行了普遍性的原则就会强大，否则就会垮台。我们应该抵制寻求狭隘私利的态度，因为它与国际共同努力背道而驰。

尽管过去令人失望，但是每一届联大都应该在希望的气氛中召开，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也应该重新努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40年前，联合国的缔造者们回顾了悲剧性的过去，立志要创造一些工具，确保人类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要根据古老的犹太传统，年复一年地回顾过去的失望，坚信未来将更加美好。

联合国大会已经注意到1985年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这将是历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我国人民编年史上的里程碑。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身上仍然留着那一场恐怖战争的伤疤，我们将恰当地纪念这一日子。毫无疑问，各国将根据38届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开展纪念活动。

联合国的概念包含着全人类。它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福利服务，特别要关心穷人、残废人和被压迫的人。

关于犹太人问题

以色列标志着在以色列土地上重新建立犹太国这一古老的梦想和祈祷的实现。它是所有以以色列为家的犹太人的家园，它维护和保护了所有由于是犹太人而受压迫和迫害的犹太人。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法律和人民的觉悟中都包含了这些原则。

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纳粹主义被消除40年以后的今天，许多国家内仍然存在着疯狂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视。苏联犹太人的情况最近进一步恶化。我在此呼吁苏联政府消除对寻求遣返、与以色列兄弟们团圆的犹太人的种种限制。苏联犹太人继续受到迫害是当今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之一，是违反赫尔辛基条约所包括的最基本人权的行。几十万犹太人被系统地剥夺了权利，被强行排挤出社会，被剥夺了生计，受到迫害，甚至被极不人道地关进监狱和劳改营。

苏联犹太人被剥夺了享受犹太文化的权利。苏联展开了系统的运动，迫害教授和学习希伯来语的苏联犹太人。苏联新闻媒介也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披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外衣而正式鼓动的反犹太主义。

我们要求苏联政府改变其不合理的政策。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参加任何反苏活动，也没有违反苏联的法律或破坏苏联的利益。他们的唯一的希望是研究自己的古老文化和民族语言，并且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家

园。人们应回顾苏联的正式代表在大会面前的宣布。犹太人民享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权利。苏联犹太人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行使这样一种权利。

在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中东——叙利亚犹太人继续在一个严厉的政权统治下遭受苦难，这一政权将他们扣为人质，并拒绝给予他们各种基本的人权，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移居并与同胞团圆的权利。定期杀害犹太人得到执政当局的批准或容忍，这使叙利亚犹太人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

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努力保持其传统、文化和特性。我们感谢埃塞俄比亚政府作出的姿态，它最近允许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访问这一社区。我们真诚地希望，埃塞俄比亚政府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保护和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权利，并且使那些渴望与居住在古老家园的家属团圆的人实现他们的愿望。

1984年9月13日，一个包括以色列绝大多数政党的全国团结政府成立了。它的建立反映了那种广泛的协商一致的意见，这种协商一致的意见使以色列人民在政府议程中关于经济、防卫和政治方面的主要问题上团结一致。

关于中东问题

在其外交关系中，以色列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同其所有邻国建立和平与谅解的目标。在北方，我们作好一切准备同黎巴嫩达成一项将保证我们共同边界安全的谅解，这使所有部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成为可能。叙利亚仍然顽固地持反对同以色列讲和的意见。然而，我们坚信，除了和平没有其它任何的解决方法。在东面，我们当然已与埃及讲和，但是我们坚信，在抵抗阵线反对和平的巨大压力面前，和平关系应该得到加深和加强。

然而，必须根据这一地区的现实来评价在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实现进一步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进展的机会。

中东继续受到暴力、艰苦的冲突和战争的困扰。在持续几个星期的伊朗与伊拉克边界流血事件中，男人和儿童死去的人数超过了所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死去的人数。每年，在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毫无关系的内乱和战争中成千上万人丧失了生命。然而，正如这个大厅中坐着的每一个人所清楚知道的那样，大会使用过多的时间年复一年地来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和毫无结果的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审议，审议的主要目的似乎仅仅是诋毁以色列。

在过去的20年中，已成为中东地区许多政权特征的暴力和压迫在恐怖主义、劫机和暗杀的浪潮中突现在国际舞台上。

当秘书长在1972年建议联合国采取措施抵制国际恐怖主义时，我们是第一个欢迎这一创议的国家之一。遗憾的是，这一创议受到了那些发起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阻挠。得到这些政府批准的中东恐怖主义，由于人们对它采取忽视和满不在乎的态度，而得以扩大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今天，恐怖主义的恶瘤已扩散到所有大陆。恐怖主义和国际海盗行为的最新动态是设置威胁在红海的船只自由航行的水雷。最近，凶恶地爆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的事件，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恐怖主义行动，再一次使我们感到震惊。

恐怖主义是一种恶性疾病，如不加以抑制就会到处扩散。但至少有一个例子可以表明，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收到了效最近，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想法又一次复活。这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的、建议恐怖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国家提出的。之所以对有关争端不需要再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是因为这种会议和建议已经够多了，并且证明都是没有用的。它们只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共同与以色列对抗的政治问题上进行宣传和争论的场所。现在建议召开的会议将再一次打击直接谈判的原则，这一原则从 1949 年的全面停火协议起到 1978 年的戴维营协议以来，早就被证明是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

因此，我们呼吁有争取和平之意的会员国给我们东部和北部的阿拉伯邻国一些影响，以使它们选择唯一成功的和得到证明的和平之路，与以色列直接谈判。

关于从黎巴嫩撤军问题

这种谈判已经产生了我们与黎巴嫩在 1983 年 5 月 17 日签订的协议。协议规定了反对恐怖主义的安全安排，达成了两国间在公认的国境线上保持正常关系的基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立法机构批准了这一协议，然而叙利亚和其它不能容忍与以色列缔结和平的国家使用武力把它摧毁了。协议本来旨在使所有外国部队撤出黎巴嫩、恢复黎巴嫩的独立和建立黎以边境上的安全措施。

今天大约 4 万叙利亚部队占领着黎巴嫩 65% 的领土，并且毫无离开之意。黎巴嫩政府受到叙利亚的控制，不能自由进行将解决它和以色列之间问题的谈判。很明显，以色列将继续保证其合法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作必要的安排，以保护北部以色列人民免受最近几年以来遭受的恐怖主义的进攻。我重申，我们将按照上述的安排准备从黎巴嫩撤出军队。

现在，任何国家、包括我们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都应该清楚，以色列没有在黎巴嫩保持其军事存在的意图。但是我们不得不肯定一点，即在以色列最后一名士兵离开黎巴嫩后，恐怖主义分子不可再回来进攻我们。

让我们再讲一遍：任何希望以色列的部队撤出黎巴嫩的个人、人民和国家必须保证，被以色列赶出黎巴嫩的恐怖组织不得回到我们边境上恢复它们的进攻。这是争取和平的一个基本条件。以色列愿同任何严肃的努力一道合作争取公正的解决。

这里，我向我们的邻国再一次发出同样的呼吁。让我们一道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让我们开始互相间的谈判。让我们共同努力以解决我们的冲突、而不是永远保持一种常在这里得到表达的消极态度。

除非这一呼吁得到重视，否则以色列将继续努力消除阿拉伯拒绝主义的态度，争取相互接受、容忍、了解和对话，这些才符合联合国最基本目标。

我们古代的寓言家对世界和平的预见只是遥远的乌托邦式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在我们的道路上消除了饥饿和恐怖主义这两个可怕的障碍，人类向实现这一预见的进军将会大大得到推进，我们的步伐将会加快，我们也会为未未更好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

节译自《联合国英文稿》1984 年 10 月 9 日
王惠初 译、校

雅克·勒内·希拉克，法国前总理（1974～1976、1983～1988）。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索缪尔军校。曾任国务秘书、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长、内政部长等职。1995年当选法国总统。本文是他在第4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会上的演讲。

反对恐怖主义，振兴发展中国家经济 (1986年9月30日)

联合国成立41周年纪念日，一方面是我们庆祝取得成就的时刻，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现实使得贯彻宪章存在局限性。

恰如其分地考虑使幻想破灭和令人失望的事情，其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表现。今天，我们这个组织面临的不仅是它财政方面的困难，也面临着它的成员不能就任务的轻重缓急达成一致意见的困难。然而我感到大家普遍认识到过去的混乱和不足之处，这一点已经第一次导致人们致力于真正的改革，这已经由18国集团的结论证明了。

《旧金山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联合国的重要目标。如果不妥协地和不带思想意识偏见地看问题，人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辜负了联合国创始者们的期望。

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我们的星球缩小了，在思维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变革更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变革使得世界性的问题越来越多地重叠在一起。任何重大事件，不管是多么具有地方色彩，都不能使我们无动于衷。今天的冲突，就像联盟一样是没有边界和距离的。它们可以超出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却不能消灭这些差异。相反，在许多情况下，问题的国际化已经产生了一个反应——各种各样的集团由它们自身特殊的利益重新恢复活动，有时甚至是十分狂热的。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单一的实体，另一方面它却不能对付它所面临的威胁和集体挑战。冲突和侵犯人权的事情在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的癌症在扩散。军备竞赛受到技术进步的推动，也在继续加剧，技术进步的好处应该在全世界得以推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形势仍然十分危急。

在中东问题上，长期以来法国一直认为，和平必须建立在一些对于我们是不言而喻的原则上。必须承认并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权，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要实现和平，有关各方应该相互承认，它们还负有解决问题的重要责任，任何它国不管作出多大的贡献、也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这种情况，今天人们又谈到，通过适当准备举行一个所有有关各方部参加的会议。我们在原则上支持这种做法，并愿意在帮助解决冲突中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冲突对国际社会是极为严重的威胁。

人们所注意到的明显的迹象里包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必要进行对话，虽然这种认识的过程是缓慢的。法国一向欢迎这种表示。

不幸的是，这些希望不允许我们忘记使黎巴嫩四分五裂的无休止的危机。它将给该国人民带来悲剧的后果，该国人民与法国在各方面有着几世纪的联系，法国热爱并尊重这个民族。

无论如何，黎巴嫩曾经是共处、容忍、自由和文化的榜样。如果这个其光辉照耀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智慧中心被卷入并埋在狂热和仇恨的浪潮里，这将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我衷心希望，这一惨遭蹂躏的国家有一天

将通过恢复其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找到实现国家团结的道路。

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南部，国际社会努力防止战争和无谓的暴乱的新的升级。法国士兵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中其它国家的部队一起，经常为安全和平使命而付出他们的生命。

然而近来形势变得更加不能容忍。联合国部队不仅被夹在原来要隔开的敌对力量之间发生的零星冲突之中，并且还成了蓄意攻击的目标，这样下去，它将只好加固堑壕，以确保其自身的安全。我们至今所作出的牺牲使我们有权利要求大家都应承担起责任，同时，该部队所能得到的手段应该与其所承担的任务相符合。本组织、它的权威以及它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能力遭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们必须应战。

6年多以来，伊拉克和伊朗卷入一场互相残杀的战争，由于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及其带来的资源等方面的重大损失，不能仅视之为一场区域性的冲突。对世界经济有着重大意义的航道上的自由航行受到了威胁。顽固地持续这场荒唐的战争，将威胁到一个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的地区的平衡。我们只能表示希望通过谈判合理解决这一长期的冲突、同时我们要求，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将最终得到实施。法国支持所有旨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努力，特别是秘书长关于调解的主动表示。

我已就本组织至今无法解决的中东危机作了许多阐述，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本组织和平努力所无法解决的其它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塞浦路斯问题、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在朝鲜半岛，分裂和紧张状态持续了40年，我们衷心希望南北双方将进行对话，因为这是缓和紧张局势、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道路。我们希望，联合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所有的朝鲜人民都能够派代表参加联合国。

多年来，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决心捍卫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勇敢地抵抗外国的占领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统治。

阿富汗三分之一的居民被迫走出国界，在其它国家寻求避难，阿富汗人口的精华也大量外流；阿富汗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每天遭受那些践踏一切人道主义原则、攻击他们村庄的战争行为的蹂躏。

在柬埔寨，高棉人民成为日益残酷的外国压迫统治的牺牲者。我们甚至看到那一国家出现一种新形势下的殖民主义者。

如果让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恢复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他们决不会威胁那一地区的任何国家，更不会威胁他们强大的邻国。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成为对任何人的威胁。对这两个国家的入侵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征服性战争。法国将同绝大多数国家一起要求，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世界和平，苏联必须结束它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冒险行为。

南非当局顽固坚持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是不能接受的。比勒陀利亚至今所宣布的措施并没有涉及实际问题，这些措施没能制止暴力的升级是毫不奇怪的。我们同南非国内一切鼓励温和和和解的人们一起——希望现在还为时不晚——期待为建立一个至少使南非各阶层人民的尊严得到承认的社会奠定基础。

无可否认，冲突的继续存在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公正情况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们是，我们又必须谴责许多其它的根源，例如日益上升的不容异己和极端主义的思潮，某些国家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视而不见，或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些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甚至鼓励这种活动。

在今天的世界上，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暴力威胁着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对它们作出反应。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大会反映全世界的认识，去年谴责了这些卑鄙的罪行，安全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也在拘留人质的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立场。法国希望强调，虽然这些文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它们还必须得到适应具体情况的具体措施的补充和加强。

如果各国都能有效地履行它们所签署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所带来的义务，采取必要的坚定行动就比较容易了。

今天，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指出的是，无数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他们中间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局势似乎已经变得每况愈下。这种局势在非洲表现得特别严重，大会在今年本届特别会议上再次讨论了这些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方面。

非洲各国从自己的经验中已经知道，它们勇敢地决定进行的工作将会得到法国坚定的和兄弟般的支持。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因为法国同我们在撒哈拉北部和南部的伙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一承诺也还因为法国了解到这一危机的严重程度，有关国家已经对产生这一危机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进行了洞察秋毫的分析。这场危机几乎已经影响到了整个非洲大陆，其人口包括了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的的人口。法国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的援助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法国对整个非洲大陆发展的捐助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没有停止。毫无疑问，法同将在未来继续进行这种援助。

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经济发展极其糟糕，它们也受害于对其安全的威胁。

在乍得，正如在其它许多问题上一样，发展不足和不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军备水平畸形上升不断地表现出来。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债务已成为首要的紧迫问题。他们每天都在作出努力以调动其一切资源来按期偿还债务。但这无法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获得必要的自由来解决他们的长期发展问题。

国际社会已经警觉地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债务问题本身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后果。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任何人再也不能说这一问题可以仅仅通过机械的办法加以解决，即给予短期援助或仅仅采取救急的补救办法。如果我们要永久地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着手解决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仅仅解决其影响。

世界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进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以便它更富有想象力、更活跃和更切合实际。

法国认为，我们必须加强在以下三个领域内的国际合作：第一，必须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以帮助它们减轻债务危机。我还要指出，任何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曾毫无例外地寻求过大量的投资。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这一领域里，我注意到某些进展，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是如此。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加强多边发展机构的作用及其干预能力。我们都承认，还需要其它一些性质的财政援助，尤其需要国际商业银行和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和商业贷款。

第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负债最多的国家为取得经济复兴而开始的卓越努力必须继续下去，在排除内部和外部赤字方面，在控制通货膨胀以

及执行大胆经济政策来突出国家的长远利益并避免空洞脆弱的短期解决方面，已经取得卓越成果。

第三，纠正国际经济和财政体系内的无秩序状况极其重要。解决债务问题必须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恢复为基础。这应该是工业国家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克服通货膨胀斗争所取得的进展应该使我们继续降低实际利率，否则任何债务问题的持久解决都只会是空泛的，并且我们还应该为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进一步稳定而努力。

还应该采取积极步骤来努力纠正资金的不平衡状况。现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仍在消耗掉大量的世界储蓄，这种情况并不健康。而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大国在它们可以更多地鼓励扩充发展的时候却竟然在积蓄剩余资金，这种现象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扩充发展是我们所有国家必须努力实现的目标。

在我所提到的所有挑战当中，我认为有两项需要作出比其它挑战更加紧迫的反应。一个是恐怖主义问题，如果我们允许恐怖主义任意破坏民主社会并且摧毁国际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我们会倒退到我们认为早就过去的时代。另一个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它们当中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危机。难以想象我们会让这些国家被自己的经济和财政困难所压倒、这是难以想象的、无人性的和不负责的。

在联合国，甚至可以说在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中所碰到的那些相信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上，大会经常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明智反过来促使我对所有会员国发出有信心的呼吁。

译自《联合国会议文件集》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本篇是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人民的心愿

(1987年9月21日)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
贵宾们，尊敬的代表们：

首先让我们欢迎秘书长为中东和平远行归来。在伊朗同伊拉克的流血冲突中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去了。所有善良的男女都祈祷着，但愿这场大屠杀马上停下来。我们但愿这位秘书长不仅是一位朝圣者，而且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持久和平的缔造者。

像这位秘书长一样，今天我们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处在朝圣的行列里。我们从各个大陆、各个种族和大多数的宗教地区来到了这个希望之厅，我们以和平的名义在这个大厅里开展外交活动。当然现代外交工作是一种微妙和精巧的艺术，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当19世纪的最狡猾的外交官之一去世的时候，其他外交官们听到他的死讯便问：“你认为这个老狐狸这样干是什么意思？”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不仅需要技能，而且需要更加伟大的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为远见——把握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可能性。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向你们阐明我对世界未来的看法，我认为，所有美国人都同意这种看法的基本点。我希望，如果我说我们美国人认为寻找未来格局的地方首先不是陆地和海路——虽然地理位置显然十分重要，对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请不要介意；它也不是国家的军事力量，或者金钱和工业能力，虽然军事和经济力量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在于一种简单得多、但也深刻得多的东西——人心。

谈世界的变化

今天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愿望正在改变国际事务的航程，从而揭穿了唯物主义和历史宿命论的神话。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就可看到，在我们时代的记录上普通人的朴素愿望表现得多么明显。

去年在菲律宾，普通百姓重新发扬了民主精神，并恢复了选举进程。有些人说，他们创造了奇迹。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一个类似的奇迹——向民主化过渡——正在大韩民国出现。当这些新的年轻的民主政体面临冲突或挑战时，有些人感到失望，但是在民主政体成长过程中出现痛苦是正常的。像地球上所有别的民主政体一样，美国也经受过这种痛苦。

在拉丁美洲，人们也能听到自由的声音在山顶和平原回响。这是普通百姓的进行曲，他们不穿军服、不是行军，而是穿着朴素的日常工作服一个个地走向投票站。10年前，只有三分之一拉美人 and 加勒比人生活在民主政体的国家或者生活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里。今天这个比例已增加到90%以上。

谈市场经济带来“繁荣”

在世界各地，新兴的商业、新的经济增长和新的技术正在从那些抱有非

凡梦想的普通人的车间里出现。

在美国，企业的活力因我们削减税收和精简规章制度而得以恢复，这种活力促进了目前经济的发展。

在印度和中国，由于农民有了比较自由的市场，生产突飞猛进。在非洲，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它们的政策，凡是允许农民有较自由的经济的地方，作物生产情况都有改善。同时，在太平洋沿岸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不仅农业而且劳务和制造业都有自由市场，这导致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东盟国家、日本、朝鲜和台湾在过去 20 年创造了真正的经济奇迹，在这些国家里，很大一部分奇迹是由那些已成功地成为企业家的普通人创造的。

在拉丁美洲，各国正在对自由市场、扩大机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经验进行研究，并按照这种经验行动起来。巴西总统萨尔内说：“人的积极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巴西，我们懂得，每当国家对经济的渗透增加时，我们的自由就减少。”他的这番话也是说出了其他许多人的看法。是的，激励普通人的梦想的政策正在世界各地推行。从哥伦比亚到土耳其，到印尼，各国政府正在减税、检查规章制度，并为首创精神提供机会。

谈中东形势和两伊战争

在今天的地球上，和平最需要朋友的地方莫过于中东。中东人民渴望实现和平的强烈愿望正在日益增长。美国将继续积极参与使有关各方一起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以及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努力。

本月伊朗——伊拉克战争进入了第 8 个年头。两个月前，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强制性决议，要求交战双方停火、撤军和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完全支持执行第 598 号决议，如同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进行的两伊和平使命一样。伊拉克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决议，我们表示欢迎，而对伊朗不愿接受这一决议的态度，我们感到失望。

40 年来，美国一直明确表示，波斯湾及其沿岸国家的安全同美国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那里的石油储蓄对自由世界各国的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坚决维护那里的石油的自由运输，防止任何一个敌对国家控制该地区。

我们不愿同伊朗或任何其它国家发生对抗或麻烦。我们的目标不仅现在是在、而且在以往的每一个阶段一直是在寻找某种办法，以没有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结局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对海湾增派我们的海军力量，并不是要支持这一方或那一方，而只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这也是同我们在该地区的朋友磋商的结果。一俟紧张局面缓和，我们的海军部队就将减少。

美国希望苏联人同其它安理会成员国一道携起手来，积极寻找办法，结束这场已成为战后大悲剧之一的不该发生和早该结束的冲突。

谈阿富汗问题

在这一地区的其它地方，我们看到苏联继续占领着阿富汗。在苏联人占领阿富汗将近 8 年以后，有 100 万人伤亡，近 400 万人被迫流亡，而战斗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现在是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了。

阿富汗人民必须有权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命

运。没有任何借口去延长这场残酷的战争，或去支撑一个显然维持不了多久的政权。这个政权提出了一些政治建议，佯装妥协，但实际上是要确保使这个政权的权力永远延续下去。这些建议没有经得起唯一重大的考验：它们遭到了阿富汗人民的拒绝。抵抗力量每天都在壮大，它已成了谋求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不可少的一方。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坚持以下几点立场，使阿富汗人民拥有真正的自决权，使苏联迅速、全面地撤军和使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也许有人会试图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今年改变投票立场。但是，我知道，这个国际机构将会像往年一样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支持阿富汗独立和自由。

谈中美洲局势

我们大家知道，在中美洲——在尼加拉瓜正在进行着另一场地区性冲突。

对出席今天会议的桑地诺代表团，我要说几句话：你们的人民了解你们政权的真正性质。他们看到自由受到压制。他们看到 1979 年的许诺没有兑现。他们看到他们的实际工资和个人收入自 1979 年以来下降了一半——对，下降了一半，而你们党的上层人士却享有特权和过着奢侈的生活。

因此，尽管苏联集团仅在去年一年就向你们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援助，尽管你们拥有中美洲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军队，你们在国内还是遇到了一场人民革命。这也就是民主抵抗力量为什么能够深入到你们的心脏地区自由活动的原因。不过，你们对于这场革命的到来不应感到意外。这只是你们答应过人民进行的一场革命，而你们后来又背弃了它。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的目标是简单的。这个目标就是尼加拉瓜人民、也是自由战士所追求的目标：实现民主——实现真正、自由、多元化和制度化的民主。你们必须懂得：我们决不会，而且国际社会也决不会接受旨在为掩盖使专制永存而搞的假“民产”。

如果没有实现民族和解与民主，“实现民主化”就是骗局。而在上述目标没有实现以前，我们争取真民主的办法就是支持那些为此而斗争的人们。

谈美国对联合国的看法

讨论和平问题的最合适场所莫过于这个大厅。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赖伊在谈到联合国时说：“鉴于火灾危险性的存在，而又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消防部门，邻居们一起动手建立自己的消防队，这完全是一种普通常识。”

大家一起来扑灭战争的火焰，再加上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创建时的理想。确保联合国不辜负这些期望，乃是我们的任务。

正如秘书长在若干时候以前所说的，由于有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则，世界陷于无政府状态的风险增加了。在阿富汗被占的问题上，联合国大会一再承认这种风险。今天联合国宪章有其具体的实际意义，因为它涉及我前面提到的人们的意愿——对民主和自由、对全球和平、对经济繁荣的渴望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今天我想要说的是，普通人的梦想已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如果我们这些

外交朝圣者们要达到同样的高度的话，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完全建立在人民的意志和拥护的基础上。建立在整个人心的基础上。

节译自美国《纽约时报》，1989年9月26日
王惠初 译 叶仁 校

亚西亚·阿拉法特，出生于巴勒斯坦那路撒冷。本名穆罕默德·阿贝德·阿鲁夫·阿拉法特，化名阿布·阿拉法特。1945年参加巴勒斯坦阿拉伯党。1955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后入埃及军事学院。1959年组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武装力量“暴风突击队”，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1989年4月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本篇是他在第43届联大上的演说。

让我们缔结勇敢者的和平 (1988年12月13日)

我深切感谢所有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民族权利的国家、力量和国际组织——特别是我们在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伊斯兰国家、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其它友好国家中的朋友们。我还要感谢西欧国家和日本对我们人民采取的最新立场；我请他们采取进一步的步骤，积极推进它们的决定，为实现和平和在我们地区——中东——实行公正解决开辟道路。

我很高兴且非常自豪地告诉你们，我们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完全自由地实现民主，已再次显示它有能力肩负它的民族职责，通过了严肃的、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决议。这一切为我们铺平了道路，为加强和突出我们要找到一项和平解决办法的愿望作出了贡献，以确保我们人民的民族和政治权利，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一个果断的决议是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以圣城耶路撒冷作为它的首都。

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

靠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对他们的家园巴勒斯坦拥有的自然的、历史的和法律的权利，以及他们一连几个世代为保卫他们家园的自由和独立而作出的牺牲：

根据的是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决议；

有着体现在自1947年以来的联合国多次决议中的国际合法性权威；

执行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在其领土上实行自决、政治独立和行使主权的权利，并符合你们连续通过的多次决议。

在向国际社会重申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宣告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重申这个决定是不可逆转的，重申我们将不会放松下来，除非成功地消除了占领，使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在他们的国家巴勒斯坦国行使主权。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将发展他们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享受充分的权利平等。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他们的人类尊严将在一个民主的议会制政府下得到保障，这个民主议会制政府将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言论自由；成立政党自由；多数保护少数的权利，少数尊重多数的决定；社会正义、权利平等，不搞民族、宗教、种族或性别歧视；制订一部保证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宪法；完全忠于多少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关于宗教容忍和共处的精神和文明遗产。

巴勒斯坦国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它的人民是阿拉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那个民族的遗产、文明及其实现社会进步、统一和解放目标的愿望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国保证遵守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不结盟原则。

它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热爱和平国家，它将同所有国家和人民一道实现一个以正义和尊重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永久和平。

它是一个相信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决议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的国家。它在不破坏它天赋的保卫其领土和独立的权利的情况下，拒绝武力、暴力或恐怖活动的威胁，拒绝对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或对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土完整使用这种威胁。

它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相信未来只会给那些正义的或是已恢复正义的人带来安全。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们宣告成立的巴勒斯坦国，我们将努力使之具体化，以便能够在世界各国中间取得它的地位，并创造性地参加建立一个由正义与和平占上风的自由世界。

真主保佑，我们的国家将抓住尽可能早的机会，建立它的临时政府。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已授权巴解执委会在此期间负起上述政府的职能。

我们重申有必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中东问题及其核心——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参与这个地区冲突的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会议。会议所遵循的谅解是：这个国际会议的举行将以安理会的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为基础，并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和政治权利，其中首要的是它的自决权利。

我们重申以色列必须像非斯和阿尔及尔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决议所要求做到的那样：从它在 1967 年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撤出；取消所有剥削和吞并措施；拆除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

我们还重申有必要在一个有限时期内把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置于联合国监督下，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创造一种气氛，以有利于国际会议的进程成功地走向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实现广泛的政治解决，给中东所有国家和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并使巴勒斯坦国能够尽早在已为阿拉伯多次最高级会议决议所确认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权力。

我们要求根据有关的联合国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它保障自由和所有宗教在巴勒斯坦圣地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它还重申兄弟的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关系，并重申巴勒斯坦国和约旦哈希姆王朝之间将来的关系将建立在邦联基础上，依据这两个兄弟人民的自由和自愿的选择，巩固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历史纽带以及他们共同拥有的生命攸关的利益。

主席先生，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指出，这些决议的内容和措施反映了我们坚决希望实现和平与自由，反映了我们完全意识到国际存在的缓和气氛和国际社会切望实现一项考虑到冲突各方的要求和基本利益平衡的解决办法的心情。这些决议证实了巴勒斯坦人民对和平问题的庄严立场：他们致力于和平，并认为它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得到安理会的保证和保障。

这就是我们对一些国家为了使人怀疑巴解的立场和政策而使用的所有论据、偏见、立场和借口的坚定而毫不含糊的回答。

我们重申我们对维护各国人民抵抗外来占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权利和为独立而斗争的权利的各种决议所作出的承诺。我还重申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强调我们对过去在这方面作出的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主席先生，这个立场是明确而毫不含糊的。但是我作为巴解主席，再次宣布，我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时向在座的人们表示致敬，因为他们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进行战斗时，曾被他们的压迫者指责为搞恐怖主义，而他们今天却成了他们人民的忠实领导人，维护正义和自由的价值的坚定斗士。

我还要向在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手中倒下的烈士表示虔诚的致敬。

我们巴勒斯坦家园的局势不容再等待了。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儿童，走在我们向自由进军的前列，高举自由的火炬，为了结束占领和在他们的自由独立的家园以及整个地区奠定和平基础，每天都在殉难。

为此，我们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之间出现容忍精神的必要性，把有关的决议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

联合国对我们的人民及其权利负有历史性的特殊责任。40多年前，联合国在其181号决议中决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巴勒斯坦国，一个是犹太国。尽管这是对我们人民的历史性的不公正做法，我们今天认为，上述的决议仍然合乎国际合法性的要求，并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有取得主权和国家独立的权利。

加速这个地区的和平进程，需要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对我们地区的和平事业负有伟大职责的美国和苏联作出特殊的努力。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所有国际集团和机构在目前这个阶段可以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以巴解执委会（目前负有巴勒斯坦国临时政府职能）主席的身份，提出巴勒斯坦和平主动行动如下：

第一，作出认真的努力，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监督下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为召开国际会议铺平道路。召开国际会议已经得到除以色列政府以外的普遍一致的支持。

第二，鉴于我们对国际合法性和联合国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信念，应该采取行动把我们的被占巴勒斯坦置于联合国暂时监督之下，并在那里部署国际部队，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并同时监督以色列军队撤出我们的国家。

第三，巴解将在国际中东和平会议的体制内，根据242号和338号决议，为保障平等和利益平衡，特别是我们人民取得自由、取得民族独立的权利，以及尊重所有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利，谋求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和其它邻国之间实行全面解决。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巴勒斯坦人决心努力以和平方式，在联合国发起下，并在根据其宪章和决议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体制范围内实现这些目标。同所有地球上的其它各国人民一样，我们是渴望和平的人民，而且考虑到我们长期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我们大概还比其它各国人民有着更大的热情。我们的人民和儿童被剥夺了过一种没有战争、没有悲剧、没有流亡的折磨、没有无家可归之苦和每日的悲痛的常规生活的权利。

所以，应该让支持橄榄枝、和平共处和国际缓和的声音得到倾听。让所有人携手参加保卫一个历史性的、大概是无法替代的机会，来使一场拖延得太长、付出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和摧毁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城市的悲剧得以终止下来。

我们把手伸向橄榄枝，因为它已在我们心中从家园之树、自由之树上萌发出来了。

我要求以色列的领导人在联合国的发起下到这里来，以便我们能够在一

起缔造这个和平。我愿意具体地向以色列人民以及他们所有的政党和势力说：来吧，让我们和好。抛弃恐惧和恐吓。把过去 40 年在这场冲突的磨炼中持续不断地出现的战争怪影抛在后面。撇开一切将来的战争威胁，因为这些战争只能用我们的儿童和你们的儿童的尸体来当炮灰。来吧，让我们和好。让我们缔结勇敢者的和平，永远不要强力的傲慢，永远不要占领、压迫、羞辱、谋杀和折磨。

最后，我要对我们的人民说：黎明已经临近。胜利已经在望。我从你们虔诚的礼拜中看到了家园。我看到我们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旗飘扬在我们可爱家园的山头上。

译自《联大会议文件集》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卢泰愚，生于庆尚北道达城郡。195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68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首都警备司令、陆军保安司令等职。1981年退役。1987年起任民主正义党总裁。1988年2月就任总统。1990年任民主自由党总裁。本篇是他在1991年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化剑为犁，走向和平与统一

(1991年9月24日)

大韩民国从第一次申请加入联合国到正式加入联合国，经过了42年零8个月的时间。阻止我们加入联合国的是冷战体制。现在冷战体制已经成为过去。

不管怎么说，苏联的改革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

在本届联大，我们的兄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大韩民国一起成了会员国。

我相信我们将同北方的兄弟一起走向和平与统一的道路，并衷心祝贺他们加入联合国。

互不承认对方的实体，可耻地持续对峙，只能延长分裂的悲剧。

我相信，南北韩一起加入联合国，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最现实的选择，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是分裂后南北韩关系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现在，南北韩都是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的成员，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为朝鲜半岛与世界的和平尽到自己的责任。

虽然韩民族分裂为南北，但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年北韩分别加入联合国是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是不安全的。但这是走向统一必经的一个中间阶段。我相信，南北韩两个席位变成一个席位的日子将不会是遥远的。

现在，南北韩将会在这个和平的殿堂里开始对话和合作，共同走向实现一个国家的道路。我期待联合国及其成员国都声援和支持我们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同全人类一起为创造世界和平而作的努力。

冷战已经失去其意义，国家和民族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了。我所以说这一变革是伟大的，是因为它不是通过流血革命，而是通过人类的理智和自由精神使历史前进的。但是，这一伟大的变革现在只是伟大的起点。

我希望所有繁荣的国家进一步积极地支持正在从过去实行被控制体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大韩民国既不是富裕的国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支持苏联、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并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

我曾经在第43届联大时说过：“当朝鲜半岛化剑为犁的日子来到时，世界将会真正和平。”

最近3年来，朝鲜半岛周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变革动摇世界之前就越过冷战的壁障，同苏联，中欧、东欧的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邻近的中国也开辟了交流合作的道路。同断绝来往半个世纪而处于对峙中的这些国家结成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国民看到历史的新潮流也涌到了朝鲜半岛，并体验到了和解之伟大。韩国国民相信和平与统一也会来到仍有着战争危险的、分裂的这块国土上。

南北韩应该协商并具体实行如下原则：

第一，南北韩应该把不安定的停战体制变为和平体制。我们不得不在既不是战争又不是和平的停战状态下度过了 40 年的紧张生活。南北韩应该缔结和平协定，放弃向对方使用武力，使各个领域的关系正常化。

第二，为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威胁，南北韩必须在建立军事信任的基础上真正裁减军备。要想消除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必须首先实行南北韩互相交换军事情报，事先通报机动演习和部队调动，并且为了预防突然袭击而互派常驻监督团。

在朝鲜半岛研制核武器不仅会威胁东北亚的和平，也会威胁世界和平。参加了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北韩必须无条件同意国际机构该查一切核物质和设施。我想明确表明，如果北韩放弃研制核武器，南北韩为建立信任而作的努力有了进展，我们不仅愿意协商裁减常规战斗力量，也愿意协商朝鲜半岛的核武器问题。

第三，南北韩应该自由交流人员、物资和情报，结束分裂时代。朝鲜半岛的南方和北方居住着因为分裂和战争而离散的 1000 万离散家属。他们连父母兄弟的生死和住处都不知道，不能通信和通话，这是谈不上建立信任和改善关系的。

南北韩双方都应该保证向世界各国开放的自由通行、通信和通商。

只要在南北朝鲜各个领域促进交流和合作，就能够以民族凝聚力为基础，迅速创造政治合并的条件。

不能再使朝鲜半岛成为地球上唯一分裂的国土了。在一个隔绝双方的所有障碍都在崩溃的世界上，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历史的潮流。

必须预防争端，消除争端因素，并为防止使用武力采取集体安全保障措施。

通过联合国第一次采取的集体安全措施而维护了自由和生存的大韩民国，将积极支持联合国为实现国际社会的正义和为和平解决争端所作的努力。

我们赞赏美苏两国今年 7 月缔结裁减战略核武器协定，并希望它促进全世界加快裁军。

韩国支持全面废除化学武器，如果就此签订国际公约，韩国将会早日加入。

我认为，现在东北亚地区国家应该以新的思维考虑缓和紧张局势和控制军备的问题了。

南北委员会的报告中说：“饥饿的地区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30 年前，韩国曾经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 100 美元的贫穷农业国家。但是，现在韩国变成了贸易额为世界第 13 位。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第 15 位的国家。韩国的迅速发展是通过市场经济和开放实现的。

韩国作为居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将为积极解决南北问题起作用、以此来报答世界给我们的好处。

韩国不仅要为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还要为交流资本市场情报和增进合作起桥梁作用。

发达国家应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家之间的横向分工，停止垄断技术和情报。

为了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应该开放世界市场，持续扩大贸易，停止保护主义和排他的地区经济集团化。

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进一步积极地以联合国为中心，从根本上解决一切问题，并对全世界面临的环境、恐怖、毒品等挑战采取相应的对策。

人类面临 21 世纪，开始了以理智与和平为基础的新的历史。

人类的尊严、价值、自由和民主已经成了任何人都不可抗拒的历史和世界潮流。

科学技术的革新、尤其是交通、信息、通信的革命，把世界变成了使人类作为近邻能够共同繁荣的地球村。

人类从有史以来就有一个恳切的宿愿，那就是把混乱的世界变成“一个和平的共同体”。

这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成为共同繁荣的伙伴，互相扩大开放和交流合作，建立一个共同体。

韩国国民对作为世界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参加实现人类共同愿望的队伍感到自豪。

我们不会只要求世界理解和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

大韩民国将为创造更加安乐而幸福的世界、真正自由的世界、和平的世界、我们的后代感到幸福的未来世界起先导作用。

节译自韩国《东亚时报》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本篇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上的演讲。

集体安全只能建立在集体信心和诚意的基础上

(1992年1月31日)

我十分荣幸地欢迎你们出席安全理事会这一历史性会议。这一聚会的意义超过了其象征性的价值。它是象征促进实质的一个场合。你们光临这里，有力地表明了你们对联合国的倚赖。这种支持使你们刚刚选出来的秘书长深感欣慰。

这一会议再及时不过了。新的纪元开始，它需要以思想和行动将国际生活置于更坚实的基础之上。正在出现的秩序将是何种形状，将建立何种防御方法以对付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如何能消除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世界领导人的明智、远见和怜悯心。正是参与联合讨论的各国领导人才能解决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而且解决在这些问题后面的沮丧和恐惧。正如其它首脑会议定期举行一样，安全理事会也应该定期举行首脑级会议来评估国际情况，这样才能配合历史已加快的步调。如果我的这一建议受到欢迎，那将加强联合国在此关键时刻所需的权威。它也将有助于保证这个机构按照全世界的希望，在1995年其50周年纪念以前完成改变面貌的任务。

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阶段。正在横扫世界广大地区的革命的势头及其真实性不是源于任何过时的或再生的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各国人民对自由、正义、团结和承认其特性的根本需求。革命所将导致的全球秩序的轮廓还看不清楚。但是已有几个经验教训可吸取。国家一级的民主化要求在全球一级有相应的进程。在这两级，民主化都旨在实现法治。对国内的社会来说，民主意味着加强下列机制：人民参与和同意，政治多元化和保卫人权——包括少数民族的人权在内。对全球社会而言，它意味着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所有国家参与制订国际生活新准则。小国可以起建设性的大作用。联合国的记录证明政治意愿和设想比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对和平能作出更有成效的贡献。在尚未充分实现此种参与的地方，必须对其加以鼓励。而这一点反过来又要求乐于容忍各种不同的观点，以及愿意对民主化进程给以特殊协助。

不论是在国家一级还是在全球一级，如果以为仅仅靠民主化，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那当然是太天真了。在这两级，民主都是一棵嫩苗，需要得到和平、安全与经济成长的土壤的滋润。因此，需要制订新的办法来防止国内争端和国与国之间的对峙。

在这一方面，国家主权具有新的意义。它除了有权利方面，另外还有国内和国外的责任方面。侵犯国家主权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种危害全球秩序的罪行。但是滥用主权，也可能侵害人权并危及全球的和平生活。内战不再是国内问题，内战所造成的残杀也不会让世界袖手旁观。反对或蔑视稳定国际秩序准则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抵制健康的经济或政治一体化的微观民族主义，会破坏全球的和平生存。各国之间大相互依赖，各国边界太多漏洞，跨国的现实状况太危险——一方面是技术和投资领域、另一方面是贫困和苦难——都不容许自我中心的孤立主义。

集体安全只能建立在集体信心和诚意的基础上，即对集体安全的指导原

则有信心，对谋求确保集体安全的途径有诚意。全球社会一片混乱，只剩下一种力量可以在刚出现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这就是超越权宜概念的原则力量。

现在冷战既已结束，我们就必须努力避免爆发或重新出现新的冲突。民族问题的爆发使多种族国家分裂，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新挑战。如果联合国的会员国增加一倍，而不是由 166 个国家组成，它还能履行其职责吗？民族主义狂热将使声称拥有主权的社区的数量无限增加，因为在获得独立的少数民族中总有不满意现状的少数民族。和平首先受到种族冲突和部族战争的威胁，继而往往可能发生边界的纠纷。

联合国将须采取一种新的战略来对付各种族和文化社区提出的收复失地或要求自治的主张。联合国必须考虑到武器的充斥、各个社区之间经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及难民潮。

我们已正确地强调预防性外交，也就是说，发现可能出现冲突的地区，趁冲突还在萌芽阶段便进行斡旋，并在危机未恶化成为武装冲突之前予以解决。这就需要观察的手段、尖端的通讯网络，因而需要新的财政资源。还必须取得发生危机的国家与叛乱的社区的协议，并重新设计今后新的联邦方式。

这整个战略必须在十分紧迫的压力下执行，而战斗、毁灭以及死亡、伤员和难民的阴影则笼罩着政治舞台。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新战略奠定了基础。我们在非洲、中美洲，亚洲和欧洲成功地维持了停火或恢复了和平。我们的进展甚至更大，我们甚至触及民族和解的制度管理领域。

在冲突的喧闹、愿望的激荡以及仇恨情绪后面存在着希望——希望联合国采取行动。人民期望各会员国，特别是能够伸出援手的国家，摒弃争霸，满足人民对尊严、公平与正义的需要，表现出和解与对话的精神，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和平解决争端。在这个时刻，战争、暴政、狂热和经济不公正现象的亿万受害者正热切地注视着你们的讨论，期望能找到一剂灵药来解除他们的病痛和苦难。如果具有善意、勇气、同情心和远见的人们采取主动态度解决残害许多人命的问题，受害者的希望就不会落空。

你们就是那些心怀善意的人们。我谨代表本组织的男女工作人员，代表在全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努力结束战争、开始对话的成千上万的公务员，外交家、军人和专家，感谢你们来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感谢你们的来临在那些天天都在为争取和平与主权正义而奋斗的人们心中唤起了希望。

三、联合国与裁军

导言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乃至浩劫，使联合国大会自成立之初就把裁军作为其优先解决的主要事务。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首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普遍裁军，使人类免受核大战的浩劫。

自 1945 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武装冲突约 150 次，估计死亡人数超过 2000 万。世界各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4.5% 到 7% 用于军事开支。1990 年，世界的军费已超过 1 万亿美元。据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裁军主任马滕森公布的资料，当今世界上已储存了 5 万件核武器，总破坏力相当于 100 万个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如按世界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分担相当于 3 吨 TNT 当量的核毁灭当量。当今，核战争造成的损失将不是以城市计，而是以大陆计，最后使人类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联合国近 50 年来的实践表明，作为国际协调者和组织者，在裁军问题上，它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通过联合国决策机构或秘书长颁布有关和平与安全准则；二是提供裁军和军控讲台；三是行使监督裁军和军控的职能。联合国成立后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关于裁军问题的。自那时以来，已经成功地缔结了许多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协定。

自 50 年代初始，美国和苏联就在裁军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分岐。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联合国更加致力于局部裁军。

1969 年联合国宣布，20 世纪 70 年代为第一个裁军 10 年。但到 1978 年，为停止军备竞赛的努力并未取得进展。于是联合国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于 1978 年 5 月至 6 月在纽约举行，国际社会第一次就裁军的综合战略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两个超级大国仍顽固地拒绝真正执行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协议。

1979 年联合国宣布，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 10 年，后又把 90 年代定为第三个裁军 10 年，并于 1982 年和 1988 年在纽约召开了第二、三次裁军特别会议。然而，在裁军问题上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历来重视裁军，并为世界范围内的裁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一向以正义的立场和实际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与好评。1986 年底，中国已完成了 100 万兵员的裁军措施。与此同时，中国不止一次地作出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91 年中国政府决定加入《核不扩散公约》，为世界真正的裁军作出了贡献。

尽管裁军和军控进程遇到过种种挡拆，但人类还是应该乐观。由于世界人民的团结奋斗，加之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作用的日益发挥，最终的胜利总是伴随着正义和人造而到来的。我们相信，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及削减常规军备等重大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选收了不同时期关于裁军问题的演说。从 1950 年的联合国大会以来，特别是在两次裁军特别会议上，演说者们把裁军这个议题分析得透彻淋漓。不管是美国的总统还是苏联的主席，不管是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其它国家的首脑，都对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作了形象的描述，并提出了限制、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目标和手段。

早在 1953 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联合国大会上称：“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不能在原子弹造成的废墟中找到胜利。”1959 年，赫鲁晓夫也在联合国讲坛上说：“只要一点火花，就可以酿成一场大灾”的国际紧张局势令人担忧。演说家们的描述形

象生动，且触目惊心，无非让人们唤起良知，不至于在遭受一场世界浩劫后，人类再从
头进行远古以来从野蛮走向礼仪和正义的奋斗。

这一部分的演说，在漂亮的言词后面，显见到的是针锋相对的斗争。虽无战场上的
真枪实弹，刀光火影，然而美苏之间的相互攻评、唇枪舌剑，让人领略到了演说作为
一种斗争武器的分量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裁军不只是一个愿望，而更应是一种行动。无论是部分裁军还是彻底裁军，都是
当今世界所强烈关注的热点。人们所希望的是这一篇篇关于裁军的演说，真正爆发出它
们的力量，化作现实的行动。这样，不断的冲突，连绵的战火，不公正的强权，野蛮的
侵略，残酷的杀戮，一切的战争罪恶都会获得化解、消除。人类的明天一定是美好、宁
静的。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1915年毕业于西
点军校。二战中曾任驻欧美军司令、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战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等职。
1948年退役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至1952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
统帅，1953年1月起任美国总统。著有《远征欧陆》、《白宫岁月》等。本篇是他在
1953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使人类的天有发明——原子能为和平服务

(1953年12月8日)

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从那一天起，
美国已进行了42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今天原子弹的威力比原子时代开始时原
子武器的威力要大25倍以上，而氢武器的威力等于几百万吨的炸药。原子力
量的可怕秘密和技术已不是我们所独有。首先，这个秘密已被我们的朋友和
盟国——英国和加拿大——所拥有，它们的科学天才对我们原子弹的最初
发现和设计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这个秘密也为苏联所了解。最近几年来，苏联曾爆炸试验了一连
串的原子武器，其中至少有一种是含有热核子反应的。

如果美国曾一度拥有对原子弹的垄断权的话，那么，这种垄断在几年前
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虽然我们拥有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但今天在原子能
方面的现实却包含着两个有着更大意义的事实。

老一，现在为若干国家所拥有的知识，终将也会为其它国家所拥有，可
能为所有国家所拥有。

第二，纵然在武器数量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并有进行毁灭性报复的能
力，但这一点本身也不足以防止突然侵略所可能造成的可怕的物质损害和生
命的牺牲。至少自由世界对这样的事实了解是模糊的，虽然开始实行了一
种强大的警报和防御系统的计划，但这种计划还应加速推行并加以扩大。

但是，不要以为花很多钱制造武器和建立防御系统就能保证任何国家的
城市和公民的绝对安全。原子弹的可怕威力并非如此轻易就可以防止的。即
使有了最坚强的防务，一个拥有进行一次突袭所需的最低限度数量的有效原
子弹的侵略者，就可能对它所选定的目标投下足够的原子弹，以造成可怕的
破坏。

如果对美国进行一次这样的原子袭击，我们的反应将是迅速而坚决的。
但是，若要我说美国的防御能力十分强大，足以使侵略者受到重大损失，并
使侵略者的土地沦为一片废墟，这一切虽然是事实，但却不是美国的真正目

的和希望。

如果就此而越趋不前的话，就等于是证实了一种无可挽救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两个原子巨人注定了要满怀敌意地在一个发抖的世界上无限期地彼此嫉视着。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等于说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文明被摧毁的可能性，世代留传下来的人类遗产将遭到毁灭，从而迫使人类再从头进行远古以来从野蛮走向礼仪和正义的奋斗。

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都不可能在这样的废墟中找到胜利。有谁希望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上与这种人类退化和毁灭的事连在一起呢？历史上偶然也记载着“大毁灭者”的面貌，但是整个历史显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寻觅和平的努力和建设的天赋能力。

美国一直希望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相一致，而不希望和破坏人类文明的某些历史时期相一致。我的国家是希望进行建设，而不是进行毁灭的；它希望国际和解，不希望国际战争；它希望能在自由中生活，同时也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所以，我国的目的是要帮助人们摆脱恐怖的黑暗，走向光明，去寻找一条使世界各地的人民的思想、希望与心灵能够走向和平、快乐和幸福的道路。在寻找这条道路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我知道：例如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分裂的世界上，就不可能因一个戏剧性的行动而获得拯救。

我知道：我们必须长年累月采取许多步骤，然后才有一天世界会真正发现它自己充满了和平与互相信任的新气氛。

同样，我也知道，从现在起，我们应该首先开始采取这种步骤。美同和它的盟国——英国和法国——在过去数月中已经在设法采取这种步骤了。

在记录上，长期以来就记载着美国、英国与法国曾要求与苏联谈判解决德国分裂的种种问题；要求谈判对奥和约和朝鲜问题。最近，我们收到了苏联表示愿意举行四国会议的照会。诸位谅必已经从我们的百慕大联合公报中知道，美、英、法三国已同意马上与苏联举行会议。

美国政府是抱着希望和诚意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我们将竭尽一切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那就是：要从此次会议中获得走向和平的具体结果，这是唯一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要求苏联放弃它理应拥有的东西。我们决不会说俄国各族人民是敌人，而我们永远也不与他们在友好与有益的关系中打交道或互相往来。

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与苏联打开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最后能使东西方人民自由交往——这是增进了解的一种可靠而合乎人情的办法，而这种了解是彼此间信任与和平的关系所必需的。

我们不是要寻求在东德、在被占领的奥地利与在东欧国家发生的那种不满情况，我们只是想寻求一个自由欧洲国家的和谐家庭，不存在一个国家威胁另一个国家，更没有人威胁俄国各族人民。

我们要超越亚洲的纷乱、争吵与灾难，替那里的人民寻找和平的机会来开发他们的资源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些并不是空话和幻想，而是以一些国家自愿通过和平谈判而获得独立这一事实为根据的。西方国家欣然援助了那些急待援助的各国人民及由于饥荒与天灾而一时受难的人民，这些都是有记录可查的。

这些就是致力于和平的实际行动。这些行动比空口许诺或表白和平愿望更为有力。

但是，我并不想重申以往的建议，也不想重叙过去的事实。目前的核心是：必须探求每一条导向和平的新道路，不论这种道路是多么的艰难曲折。

至少还有一条我们到现在为止尚没有详加探求的新的和平道路，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现在提出来的道路。

联合国大会在 1953 年 11 月 28 日的决议中建议：“裁军委员会研究是否应由各主要有关国家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由该小组委员会秘密谋求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就这种解决方案在 1954 年 9 月 1 日以前向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美国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的这项建议，准备立即与那些可能是“主要有关”的其它国家举行秘密会谈，以便谋求一个关于原子军备竞赛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原子军备竞赛的阴影不仅笼罩着世界和平，而且笼罩着世界的生存。我们将把一种新的概念带到这种秘密的或是外交的会谈中来。

美国将设法谋求削减或是废除一切可供军事使用的原子物质。当然，仅仅把这种武器从军人手里拿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交给那些能把它应用到和平事业中的人们的手中去。

美国知道：如果能够把这种建立原子军事力量的可怕趋势倒转过来的话，那么，这种世界上最大的破坏力量可以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一种伟大福利。

美国知道：原子能的和平力量并不是将来的梦想。今天，已经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存在。如果世界上的所有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能充分试验可分裂物质和发展他们的思想，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将会迅速地变成普遍的、有效的，并可以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为了使东西方人民及政府迅速消除对原子能的恐惧心理，我们现在可以采取某些步骤。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各主要有关政府，在起码的慎重态度所能容许的范围内，从现在开始，并在将来继续共同捐出一些它们储存的常规铀与可分裂物质给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希望这一机构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设立。美国准备诚意地从事这种尝试。与美国合作的任何人，只要是怀着同样的诚意，就会发现美国并不是一个不讲理、不大方的伙伴。

原子能机构除了可以负责保管、贮藏、保护所捐献的可分裂物质及其它物资外，更重要的责任是要研究处理这些可分裂物质的解决办法，使它为人类和平事业服务。专家们将动员起来，运用原子能来满足农业、医药及其它和平活动的需要。这样，捐献国就是为人类的需要作出了一些自己的贡献，而不是为人类的恐惧服务了。

美国不仅愿意与“主要有关”各国一道拟订计划，以加速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且还将以此为荣为能实现以上的愿望，我特在此提出以下各点计划：

一、鼓励全世界研究将可分裂物质最有效地用于和平，并为进行一切适当的实验提供所需要的各种物资：

二、削减世界现存原子弹的潜在的破坏力：

三、让世界各国人民都看到，东西方各大国在这个文明的时代中都在关心人类的希望，而不是关心建立军备；

四、开辟和平讨论的新途径，假如世界想要摆脱由恐惧而产生的惰性并

在促进和平方面获得进展的话，就必须在召开会议和秘密商谈中解决这些问题。

在原子弹造成的阴影中，美国并不仅仅希望表示自己有能力，而且也希望表示自己要和和平。希望本次大会按照世界各国人民的心愿，作出使这个世界摆脱恐惧、获得和平的决定。

美国向在座的诸位、也向世界保证：它决心努力解决这个可怕的原子能难题，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不使人类的天才发明被用来致人于死地，而是用它来造福于人类。

节译自美国《国务院公报》
汪建明 译 晓平 校

孟戴斯—弗朗斯，法国前总理（1954～1955）。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1923年加入激进社会党。曾任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1954年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本文是他在第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为了世界和平 (1954年11月22日)

我的目的并不是在大会上讨论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诸多问题，因为大会对于这些问题都是很熟悉的。我想将我的演说限于我认为对联合国组织现在和将来都是特别重要的、为数不多的一些问题上。首先，我愿意谈一谈裁军、和平利用原子能、改善落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然后，我想说说为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为了缓和局势以及为和平打开道路所做的工作；最后，我想说说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增加国际谅解的希望，使这样谅解获得具体的内容和实行的范围。今天在全世界各国，在不论各大首都还是极小的村镇都怀抱着这种希望。而在本会场中，这种希望比别处来得更热烈。因为在我看来，本届会议幸运地表现了若于有助于缓和国际局势的迹象。

关于裁减和控制各国军备一事对于人类的必要性，已经阐发得淋漓尽致了。8年以来，联合国大会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8年以来，各专门委员会曾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加以比较，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失败：第一天实现了一些进展，但不幸的是，第二天却又重新成了问题，而军备却越积越多，破坏力也越来越大。

但是，要求活下去的人们拒绝把这种现象当作宿命。在危险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发挥了想象力，并且彼此有了一些接近。

无疑，春天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是令人失望的。但是5国在会议上谨慎地和客观地彼此交换了意见，也使某些问题获得了澄清。一些新的方案已经拟订出来。其中一个方案是法国和联合王国共同提出的，这个方案包括关于各种裁减和禁止措施在时间上互相衔接这一基本问题的具体建议。苏联政府宣称，苏联同意以英法方案作为讨论的基础。苏联所采取的新立场和西方国家代表团所表现的和解精神，都有助于主要有关的5个国家同意一项共同提案，这一提案大会已一致通过。

要解决的困难仍然是非常多的。裁减的范围和性质应当怎样？控制的方式应当怎样？必要的保证和保卫的措施有些什么内容？这一切还有待于解决。工作任务是沉重的。它的复杂性只会增加，特别是因为有最现代化的武器的囤积。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法国希望我们能够成功。法国的代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决不会忽视任何有利的因素。

诸位注意的第二个问题与裁军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并不是说，诸位已经着手研究的国际原子能合作方案就是裁军方案。已经存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误会，已经由于诸位的讨论而消除。如果这项合作能够很快地建立起来，那就可以为东方国家与两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有利的基础。这种合作促进并鼓励东西方国家之间彼此往来，打破深沟高垒，澄清神秘，消除疑虑。这一系列的理由均使法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创造性想象力所产生的事业的成功，这个事业是肯定会因美国的慷慨而受惠的，几天以前，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在讨论中已经获得某种程

度的一致。因此道路扫清了。这条道路的里程碑，是明年夏季举行的科学会议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立。这条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是这一原子能机构与联合国的联系，至于联系的方式则还有待于决定。因此，国际机构着手长期工作的必要条件即将具备，而且这一项工作已经到处激起了想象和希望。今后各国将一起努力把原子能科学的发明用于为全人类的幸福服务。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各国的共同努力将可以增加地球上动力的资源。

我们希望看到人类天才的惊人智慧，科学的发明、技术上的奇迹——我们至今还没有开始估计——不再为破坏工作服务，而终于为保证全人类在各大洲舒适的生活服务。现在大多数人还缺乏生存的物质资料和社会进步，没有这些东西，唉，自由和民主这些字眼都不过是些抽象的东西。

对一些现代国家来说，如果要无愧于人民的托付，就应当超越它们现在的困难和分歧而起来应付挑战。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努力，应当还加上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以便更快地在世界各地减少饥饿、疾病和愚昧。

集体事业应当仍然是具体的和切合实际的。排列些空洞的计划，堆积些虔诚的决议，宣布些不能实现的空想，都是无济于事的。

但是联合国能够而且应当不犯教条主义，不犯浮夸风，而是抱着耐心和坚毅的精神来分析地球上一些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和阻碍它开发的障碍，共同寻求通过怎样一些方式，各国才能帮助其它国家越过这些阶段。

我希望诸位打算通过的条文是鼓励联合国组织通过各国的协调团结有效地排除真正的困难，而不是去向风车进攻。

各国人民对联合国所表示的信任和各国政府对联合国意见的重视，大部分要取决于联合的工作方法，取决于联合国避免忙乱的意志，取决于联合国不要一次作出太多的决定。我一向认为有效的格言是：把问题逐一处理。首先专心处理最紧急的问题，并在未确定解决办法之前锲而不舍；在一大堆慷慨而又有用的方案中，善于舍弃那些不符合联合国组织的规定的方案，挑选那些我们确有力量使其实现的优先目标的方案。

因为我们以牺牲美梦为代价，已经学会懂得了什么是国际合作切实有效的限度。那些希望逐步扩大国际权力的限度和范围的人，必须抱着高度的警惕和现实主义来从事这一工作。否则，这个机构就会出轨。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使用技术和利用资源的愿望，就会被各国重新闭关自守的政策所代替。

法国的行动是不断地遵循着这些原则的。我们愿意把人类走向和平的巨大渴望作为我们的指导。我们确信谅解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应当有助于国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和平关系。远东重新获得的和平，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的独立和主权，再一次庄严地证明了：对有善意的人来说，用协商来代替战争是可能的，而且人们可以抱着互相了解的愿望举行会晤，来代替交锋对垒自取毁灭。我就是这样来理解真实地忠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主席先生，这些就是法国政府在它的行动中所遵循的一些理想。这些工作的积极开展，获得了所有法国人尤其是年轻的法国人的支持。自然，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我非常了解：只要今天正使那么多人感到忧心忡忡的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全世界就还将继续残酷地遭受没有安全的痛苦。我们必须准备使世界各国男男女女今天所感到的不安和忧虑安定下来。我们的责任是寻求和建议明确的解决办法。法国政府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我们期待的这个谈判的日期已经为时不远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就

是走冒险的路，就是走肯定要失败的路。如果我们冒这个危险，那么我们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在到处是渴望和平与安全的人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希望，但是这些希望一下子就将成为泡影。这是我们没有权利轻易踏上的一条道路。

自从一些胸襟豁达的人从事寻求防止战争的方法以来，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设想出一种保证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有助于各国人民热望建立的安全的。他们提出限制和控制军备是这个安全的两项主要保障。人们常常指出，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那么和平的组织是靠不住的。为此目的，人们曾起草过方案，举行过会议，有时甚至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还获得了一些局部的结果。但是直到现在所作的一些努力都是以失败告终的，特别是 1932 年日内瓦会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辛酸失望的回忆。

但是，在伦敦和巴黎，我们在这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常被批评的巴黎协定包括有严格的措施，禁止各缔约国单独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及单方面决定增加它们的军力或军备。我要着重地指出，这些规定是严格的防御性组织的特征。在我看来，巴黎协定规定的限制和控制军备的制度，构成一个有益的范例，一个更为普遍的制度的前奏。法国政府提出这个制度并使它获得通过时，是想到根据同样的原则和在同样的规模上使它适用于欧洲的。而且，也许有一天会适用于全世界。

自然，这些只是简单的轮廓和建议，还需要慎重地加以探究，以便逐步确定适用于全欧洲的集体安全制度。今天主要的工作是：这样的计划可成为事实，只要这些计划是怀着诚意起草的，同时怀着唯一的决心，即对安全感的增加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证，而这种安全感是欧洲人民很久以来所痛感缺少的。

无疑，联合国没有直接解决我刚才提出的那些区域问题的任务。但是这些问题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它关系到的不仅是一个大陆的和平与安全，而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节译自《波兰西文献：论文与文件》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尼·谢·赫鲁晓夫，前苏联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1953年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至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14日，由苏共中央全会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让我们彻底裁军 (1959年9月18日)

主席先生！

尊敬的代表们！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会的代表们和秘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会给我机会在联合国的崇高讲坛上讲话。

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像联合国这样使人们对它寄予如此的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的枪声还未停息、被破坏了的城市和乡村的废墟还在冒烟的严酷的时期，联合国诞生了，它代表了千千万万的饱经忧患的人们的思想和愿望，把摆脱后代的战争灾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目前，联合国的会员国已有80多个。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属于敌视这一组织奠基者的阵营中的许多国家，现在也加入了它的队伍。

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建立了14年多。然而，建立这个组织时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未达到。各国人民仍然经常生活在对和平事业和自己的未来的忧虑之中。的确，如果时而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时而在世界的那一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人血横流，怎么能不让人产生这种忧虑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还记忆犹新，而新的战争危险的乌云又笼罩了世界，有时简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能长此下去。要么这种紧张状态达到这样的白热化，即只有爆发战争这种结局；要么各国共同努力以及时消除这种紧张状态。各国人民正期待联合国加倍努力以建立各国间的信任和相互谅解，加强普遍的和平。

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差别，任何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不应当妨碍联合国各会员国就主要的问题——各国神圣地、严格地遵守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原则——达成协议。如果把分歧和差别提到首位，那么我们在保卫和平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在20世纪，不能像中世纪的宗教狂热病患者那样实施用火和剑消灭异教徒的进军，而不冒使人类面临历史上最大惨祸的危险。

联合国本身就是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国和平合作思想的体现。事实也正如此，请看一看，这个大厅里坐着多少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代表，有多少个种族和民族，他们有着多么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

为了在各国关系中把和平共处的原则完全确立起来，我们认为必须结束“冷战”。各国人民不能允许“冷战”这一违反常态的状况长此下去，就像他们不能允许鼠疫和霍乱猖獗蔓延一样。

消除“冷战”是什么意思？对此必须做些什么？

首先必须停止战争叫嚣。必须承认，有那么一些毫无远见的国家领导人继续发表好战的演说。难道还不是该停止对其它国家采取武力威胁和恫吓手段的时候吗？

“冷战”是倍加危险的，因为它是在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进行的，

军备竞赛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加深国与国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

谁也不能否认，尽一切可能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对于消除“冷战”和改善国际气氛具有莫大的意义。但愿联合国能在本身找到力量，消除“冷战”的所有积垢，成为真正无所不为的国际合作机构，从而卓有成效地为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服务。

苏联深信，现在已经具备必要的条件使国际关系能够迅速好转，能够彻底消除“冷战”以造福于全人类。

我们认为，世界的确正在进入国际关系的新阶段。“冷战”的艰难岁月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能不留下痕迹。各个国家的普通平民和政界人士都反复考虑过很多问题，并学会了很多东西积极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力量在各个地方都无比地壮大起来了。当然，如果说国与国关系中不信任和怀疑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世界和平已经得到保障，各国已经不需要继续作顽强的努力，那便是毫无根据的乐观。可惜，情况远非如此。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并散布新的冲突的种子的人，还在很多国家进行活动且颇具影响。这些人坚持陈腐的、过时的东西，死死地抓住“冷战”的遗产不放。但是，许多事件，特别是最近的事件的进程表明，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把棍子插到车轮里去，这只会使那些不愿意放弃这类企图的人陷入窘境，因为各国人民不会支持他们。

在我们大家面前摆着许多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然而有一个问题正是一切大小国家的人们——不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如何——都希望解决的，这就是裁军问题。人类的前途如何，是走向后果惨重的战争还是取得和平事业的胜利，这将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这个问题能否得到正确的解决。

各国人民世代代憧憬着消除毁灭性的战争手段。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最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最接近劳动人民的政党都提出并坚决要求裁军。但是，不仅没有裁军，数十年来，世界一直在扩军的狂热中颤抖。

谁能昧着良心说，军备竞赛能够有助于解决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国际问题？相反，军备竞赛只能使一切争执问题的解决更加错综复杂。

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军备竞赛从来都没有像今天在原子、电子学和征服宇宙的时代里这样迅速地进行，并孕育着如此巨大的危险。

现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一种危险局面。存在着各种军事联盟，军备竞赛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燃料，只要一点火花，就可以酿成大灾。世界现在处于这样的边缘，只要偶有差错，譬如一架携带氢弹的飞机的操纵器发生故障，或者正在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精神失常，战争就会立刻成为事实。

除此以外，大家都很清楚，军备竞赛现在已经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它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实际工资降低，并且极有害地影响着许多国家的经济，阻碍着国际贸易。历史上还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卷入军备竞赛活动。如果除了军人以外，再加上那些直接或间接同军事生产有联系的以及从事各种军事研究工作的人，那么脱离和平劳动的人就在一亿以上，况且他们都是些精力最充沛、工作能力最强的劳动者、科技工作者。人类的大量精力、知识、发明才干和技能落在无底洞里，被日益扩大的军备所吞没。

联合国和其它国际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已经 14 年多了，但直到现在还没

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裁军谈判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监督问题成了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在裁军协议达成后，对协议的执行情况要有严格的国际监督。但是我们从来就反对监督系统脱离裁军措施，反对在裁军实际上没有进行的情况下使监督机构事实上成为搜集侦查情报的机构。

我相信，各位代表会同意，必须引导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的集体智慧去寻找解决裁军问题的新途径。任务在于找到一个能够借以防止人类陷于战争深渊的杠杆。目前需要的只有一点：消除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所有国家在 4 年之内实行彻底裁军，并且不再有战争的手段。这意味着，陆军、海军和空军将不再存在，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将被取消，军事学校也将关闭。千百万人将回到和平建设性的劳动岗位上去。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将要撤除。许多国家拥有的一切原子弹和氢弹都将被销毁，这些武器将不再继续生产。裂变物质的能量将只用于和平的经济目的和科学目的。各种射程的军用火箭将被销毁，而火箭技术将只用作运输工具和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征服宇宙空间的工具。

各国只应该保留有严格限制的、经商妥符合每个国家需要的警察（民警）人员，他们配备轻型射击武器，其职责只是维持国内秩序和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

实现彻底裁军以后，人类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一个精疲力尽和面临饥渴死亡的危险的沙漠旅行者，经过长久的苦斗后终于到达了绿洲一样。

我们诚恳地告诉一切国家：与目前在某些地区仍旧流行的“让我们武装起来！”的口号相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让我们彻底裁军！”

节译自〔苏〕《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

叶玉珍 译 毛喜 校

本篇是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现代化武器的存在是
恐怖、失和与猜疑的根源**
(1961年9月25日)

今天，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到地球可能不再适应人居住的那一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宛似在一把核子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过活，这把剑用极细的线悬着，只要一发生什么意外——计算错误或是疯狂行动，它便随时会被割断。在战争武器消灭我们以前，我们应先把武器消灭。

人们不再辩论军备是否是局势紧张的象征或原因。现代化武器的存在就是恐怖、失和与猜疑的根源，它们比世界历来的武器要强大千百万倍，而且距离全球上任何目标都不过几分钟远。人们不再坚持待所有纠纷解决了才裁军，因为裁军必须是任何永久解决的一部分。人们也可能不再认为谋求裁军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为在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里，一个国家武器数量增加时，其安全系数极可能反而缩小。

这个机构 15 年来一直在谋求削减并销毁武器。现在那个目标已经不再是梦想，而是实际的生死存亡问题。裁军所含的危险与武器无限制竞赛所含的危险比起来要小得多了。

最近的巴尔格兰德会议便是根据这种态度而清楚地认识到，它不只是个苏联问题，也不只是个美国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因而赞同一个“绝对由国际管制的全面彻底裁军”计划。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是根据这种精神而再度积极努力，设置国会现已完全赞同的一个新政府机关，负责寻求解决裁军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必须既具深远作用又合乎实情，既使各国平等互利，因此都能予以接受。我们便是根据这种态度，征得苏联同意并且说明两国如今都接受“全面彻底裁军”，从而提出关于新近议定的谈判原则的新声明。

但是我们深知原则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光原则是并不够的。因此我们打算向苏联挑战，不是要和它进行军备竞赛，而是进行和平竞赛，逐步逐段共同前进，直至达成全面彻底裁军。我们现在请他们从原则上同意再向前迈进一步从而议定具体问题。

行将向这大会提出的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旨在沟通坚持逐步进行者与只谈最后全盘成就者的意见。它将创设维持和平机构以消灭战争机构。它进行时的各个阶段都是平衡的而且有保障的，务使一国在军事上不会比别国占优势。核查与管制的最后责任即不完全归于大国，也不归于一国的敌手或者它自己，而是归于联合国体系内的一个国际机构，也就是这项工作应该归属的地方。它将保证能履行裁军所必备的条件——实地核查。这种核查也将按照裁军的各阶段而分段进行。这个裁军计划不但涉及武器，也将涉及武器的运载系统。最后一切武器的生产、试验、转让及待有均将禁止，在一国际裁军组织监督下，各国的核武力及常规武力都将要逐步削减，直到全部军队、全部武器——除了维持国内治安及参加新组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所需者以外——统统废除为止。这个计划使裁军在今天、现在，甚

达摩克利斯剑：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的佞臣，他常羡慕帝王的权势。狄奥尼修斯乃以一发悬剑，命达摩克利斯坐其下，使明帝王忧患。

至在谈判伊始时便开始了。

简言之，全面彻底裁军切不可再只是用来抵制初步裁军的空喊的口号。它已不再是无从实践、无从核查进展、无从维持和平的一个目标。它现在是个现实的计划，也是个考验——对只愿意说而不愿意做者和愿意做者的考验。

这样的—个计划并不会使世界就此杜绝冲突与贪婪——但将使全世界摆脱大规模毁灭的恐怖。它不会带来一个超级大国时代，而是任何—国不能消灭另—国或被另—国消灭的时代。

1945年，我国远在他国还没有原子弹而且甚至于未解散部队之前便提出把原子能国际化的巴鲁克计划。我们在韩战期间也曾向盟国提出1951年裁军计划。我们今日又在加强柏林方面防务之际提出裁军建议，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前后矛盾，不诚恳或是受到恫吓，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由人的权利将获胜，因为我们在违心地重新武装时，我们满怀信心地把眼光掠过柏林而盼望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那种解除武装的世界。

我因此提议在这个计划基础上，迅速恢复裁军谈判，并且继续不停地谈下去，直到整个全面彻底裁军计划不但签订而且完全实现为止。

合乎逻辑的起点应该是保证在所有情况下和有效管制下终止各种核试验的条约。美国和联合王国已提出这种合情合理、有效而准备签署的条约，我们如今仍然准备签署这个条约。

我们也曾提议互相禁止在大气层举行核试验，不过，并不附带核查与管制，以使人类不致中具有放射作用的原子尘的毒。令我们遗憾的是，这个提议并未为人们所接受。

15年来，我们一直想使原子能成为和平发展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可是15年来，我们虽一再让步但是却备受阻挠，我们虽坚持忍耐，但是他人却顽强固执。人类的和平呼吁遭受漠视。

最后，当别国的爆炸把天空弄得乌烟瘴气时，我国别无他途，只好为本身及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行事。当别人改善他们的武器时，我们不能不顾安全需要而不去进行试验。我们也不能不顾安全而同意再来—次时间长久、无人视察的禁试。我们三年来不断企求关于视察的协议而同时听任我们的开放的社会甘冒这些危险。但是今年，当我们正在日内瓦真心诚意地谈判时，别人竟暗自部署毁灭性新试验。

我们的试验并不污染大气层。我们的威慑武器都有人防守，以防范意外爆炸或使用。我们的医生及科学家都随时准备协助国家采取的任何措施并应付在大气层试验时不免要产生的危害健康的危险。

但是为求阻止这些可怕武器的扩散、空气的污染及不断螺旋式上升的核武器竞赛，我们仍然随时准备寻求能够达成协议的新途径。我们的新裁军计划包括下列各项建议：

（一）各国签署禁试条约，这是现在所能做得到的，禁试谈判不必而且不应等待全面裁军实行后再举行。

（二）停止制造武器国的可裂变物质生产，并且防止它们转移到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去。

（三）禁止向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转让核武器。

(四) 务使核武器不致于在外层空间制造新战场。

(五) 逐步销毁现有的核武器并把这些物质转作和平用途。

(六) 终止毫无限制的试验以及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生产，并且把它们逐步销毁。

然而，销毁武器还不够。我们甚至必须在废除全球性战争及武器时便创造全球性法律及执行法律的办法。在我们所寻求的世界里，靠匆匆拼凑而成，给养供应和经费不足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是远远不够用的。

所以，美国建议所有会员国都在他们的武装部队里划定特别和平保卫单位，以便随时可应联合国之召。它们将受特别训练，经费及后勤支援都预先安排好，能够迅速出动。

此外，美国代表团另将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联合国和平解决纠纷的机构，其中有进行实地调查、斡旋及仲裁的机构，也有扩大国际法治的机构。因为和平不仅是个军事或技术问题，它主要是个政治及人民的问题。要是人在社会及政治方面的进展不能与武器技术方面的进展并驾齐驱，我们的军事力量将强似恐龙，无法驾驭，最终也将像巨兽那样在世界上消失。

我们在世界上扩大法治时，同时也拓展人类的新领域——外层空间。

我们都向英勇的苏联太空人致敬。不应该以令人心痛的帝国主义及主权要求等旧观念去拓展外层空间的新疆界。宇宙高不胜寒处不应变成更加森寒的冷战战场。

为求达到目的，我们将敦促通过议案，将联合国宪章扩展至人类勘探宇宙的极限并保留外层空间以供和平之用，禁止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在宇宙空间或天体上运用，同时向所有国家公开宇宙空间的奥秘及好处。我们还要提议各国在天气预测以及最终在控制大气方面共同合作。我们最后提议建立一个遍及全球的卫星通讯系统，使世界各地可以借电报、电话、无线电及电视而联络成一片。这样一个系统将把这机构的会议情况传播到全球各地以促进和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但是切不可让我们的眼睛及精力从人类所面对的冷酷现实转移到外层空间的奥秘上去。要是没有扫除贫穷、文盲及疾病的方法，则政治主权只不过是个引人嘲弄的笑柄。要是前途没有丝毫希望，自决也只是个空洞的口号。

我并不忽视这机构所面临的那些残存的传统殖民主义问题，只要有忍耐力、善意及决心，那些问题是会解决的。我国打算在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责任范围之内不袖手旁观而积极参与，支持从殖民地转为平等伙伴的和平的运动。我们同情并且支持澎湃不已的自决浪潮。

可是最残酷的殖民主义并不仅是老的民族剥削新的民族，肤色浅的剥削肤色深的，或是富的征服穷的。我国一度是个殖民地，我们知道殖民主义意味着什么：是强者剥削征服弱者，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而被统治者根本没有答应受人统治，不论在哪一洲，不分阶级或是肤色，都是如此。

译自《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1961年9月25日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阿布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阿尔及利亚前外交部长。曾在阿尔及利亚大学攻读文学。早年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1954年参加民族解放军。从1962年起，历任国会议员，青年体育、游览部长，外交部长，民阵政治局委员，总统顾问。曾率团参加1971年不结盟国家会议和1975年的联合国第七届特别会议，担任过1974年联大主席。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东西方缓和是裁军政策中最主要的要素

(1978年6月10日)

和平不能降格为仅仅在西方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建立信任措施。军事缓和与政治缓和是不可分的。如果东西方缓和是裁军政策中最主要的要素，那么向世界其它地区的延伸和北南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则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

那些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发表了不少宣言，但无明显的实际行动。几个主要大国保持它们的武库，并不断改善和发展它。这就给人这么一个印象，他们谈论裁军是为了转移世界人民对他们的核军备竞赛的注意力。作为所有裁军协议的结果，尚未销毁过一件核武器。

核不扩散条约的歧视性质只要求放弃获取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而让核大国放手发展他们的核武库。核大国没有为别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使不结盟国家或不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军备竞赛的加剧造成了紧张的温床和引起地区冲突，第三世界成了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试验场。昨天是越南人民、今天是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成为杀伤炸弹的牺牲品。通过想象的意识形态冲突，在非洲再度出现殖民式的征服，因为政策目标是直接干预。

如果不停止扩大势力范围、进行军事干涉和经济侵略的政策的话，任何裁军措施都将是那不完善的。裁军要求解散军事集团，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和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核大国应如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行动纲领中所呼吁的那样解除对别国的核威胁，这一呼吁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意志。第三世界国家强调要逐步减少核武库，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禁止试验核武器及不在第三世界部署核武器。他们呼吁建立和平区，特别是印度洋和平区和地中海和平区。

阿尔及利亚特别重视在非洲和中东建立这样的和平区，这有助于消除由特拉维夫（以色列）和比勒陀利亚（南非）所造成的核威胁。对以色列和南非，西方国家要负纵容的责任。是西方纵容他们执行侵略、支配别人和种族歧视的政策。至于地中海，阿尔及利亚将不遗余力地使之成为和平合作之海。遗憾的是，自1975年以来，某些力量对这个地区正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民不是提供帮助，而是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侵略。

联合国制定的政策将通过适当的谈判安排加以贯彻。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民主化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一个办法是吸收代表联合国地理和政治因素的国家，组成一个有效的谈判机构。双主席制度应由民主的轮流制来替代。为衡量在裁军问题上取得多少成果，对于这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全面、彻底裁军而言，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并设立有关机构将是恰当的。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8年第7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德斯坦
一九二六——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国总统（1974～1981），法国民主联盟领袖。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和国立行政学院。1944年入伍，在戴高乐领导的装甲师立过军功。1952年后历任财政监察官员、富尔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民议会议员、财政国务秘书、经济和财政部长。1966年组建独立共和党，任该党主席。1974年5月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三任总统。著有《法兰西民主》等。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实现普遍的、有控制的裁军
（1978年5月25日）

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果，裁军努力是失败的。经过30年的建议、主动行动和谈判，其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人们提到军事的巨额经费——每天耗费10余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各种各样的发展援助的总和的14倍。在国家关系中，有两种关系——导致军备的不信任和导致援助的团结与合作。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比互相信任和团结要大3倍。

当前西方缓和、非洲国家的安全、中东问题全面公正的解决和对中国形势的考虑均有利于裁军的进展。如果要想实现普遍的、有控制的裁军，就应分析世界的现实情况，而不是存有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裁军问题上法国提出一些原则意见。

每个国家都有保卫自己安全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是普遍的，得到联合国宪章的承认。它应当是裁军考虑的中心问题，因为它是实体法的组成部分，并使具体裁军的方式方法成为可能。

第二个意见是裁军不应当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应当成为每个人的事。联大会议尤其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不过仅是暂时的展现。

第三个意见是裁军必须考虑地区的形势。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企图将同一原则应用于一切国家身上是不尊重现实，是注定要失败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原则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为对象而加以设计的话。这是因为，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一决高低，别的大国则难与之匹敌。如果从地区出发，通过分析这一地区国家所感受到的对它的安全的威胁，就有希望找到最有效的措施和共识。

这些意见将导致裁军目标和方法的修正。从全世界角度看，裁军必须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大家共同监督的结果，而且对大家都有利。

就审议而言，普遍性原则要求联合国大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应承担裁军问题的责任，它应当是永久性机构，由世界各国参加。

就谈判而论，它意味着承担这一任务的机构应在精神、组成和程序上反映普遍性原则。但目前的裁军委员会会议却不是这样的。现在是让与联合国有更具体联系的机构来替代它的时候了。成员分开，保证与会者一律平等。一旦这些原则付诸实施，法国准备讨论建立这一机构的方式方法，并愿意参加它的工作。

从咨询而言，它意味着需要一个世界级的裁军研究机构。好几个国家建立了这样的机构，特别是瑞典。这么一个机构如附属于联合国那该多有用！

它在保持其知识上的独立性的同时可以为联合国裁军机构提供材料。这样的研究机构除了搞研究外，还可以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作财政情况调查那样对各国武器水平进行研究。法国建议建立一个世界裁军研究所，并将依此目的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

没有有效控制就没有真正的裁军。技术的进步，既造成了大多数可怕的武器，也为通过卫星监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两个最大强国是拥有这种装备的唯一国家。其它国家如法国（——在今后5年内）也将获得这种技术，但在很长时期内它将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中。像卫星之类的侦察手段应向国际社会提供。法国建议成立一个卫星监视机构。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未能成为现实。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办法来衡量军备水平。随着侦察手段和威慑理论的发展，最强大的武器，不论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相对他说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法国已提出了一项关于建立一项支持发展的特别裁军基金，并将根据秘书长意见及其它国家的建议使之进一步完善。

除非根据地区形势在世界范围内采取行动，否则裁军的努力就是不完全的。在世界军事地图上显示了两个地区：一个是无核武器的区域，另一个是以核武器为构成力量均势的重要手段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可能是一样的。

在没有核武器的地区，有关国家的责任是保持它们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在这一方面拉美和其它地区如非洲已采取了具体的步骤，这样做的目的已公布于世。从它们的安全来说，一个地区的国家关于保持无核武器状态的决定应得到核武器国家的尊重，不对这些国家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威胁，这一条还有待作出明确规定。

就它们的发展而言，这些国家作出保持无核武器的决定后，应当按照核不扩散条约的有关保证为它们和平利用核能创造方便的原则，由其它国家向它们供应核材料。根据这一精神，法国在1974年批准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补充议定书。它希望能与有关国家进行接触，研究对签署第一补充议定书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制止常规武器军备竞赛的威胁也有必要，一个地区的各国家之间应通过磋商确定武器限额和不断裁减军备的规模。这种地区协议一旦达成，法国将通过调整其军事装备销售政策来帮助这类协议的执行，目标是对军火的销售和采购实行步调一致的限制。

从美国到欧洲、到苏联及亚洲这个覆盖北半球大部分地方的庞大区域内，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大国互相对峙。如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则将对人类具有最大的破坏性影响。在四分之一多一点的世纪内这个地区受到防止核威胁措施的保护。由于核武器是整个军事均势的组成部分，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并未导致毁灭性的冲突，虽然对几次警报人们尚记忆犹新。在这个地区，在保证国家安全上仅靠取消核武器是不够的，那只会使常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产生更大的危险。

核武器的实际存在并不是主要威胁，威胁来自它的积累和不断改进。发展节奏是美苏两国所定的，他们的竞争可能导致致命的不平衡的出现。这种竞争将使“第一打击力量”理论和有限核战争理论成为可能。这种有限核战争将在别国的土地上而不是本国领土上打。中止军备竞赛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努力。

美苏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并正在谈判限制其战略武器。法国欢迎这种努力。但由于这两个大国的安全要求及其盟国的安全要求，它们的任务将是艰巨的。成效只能慢慢地分阶段地显现出来，我们希望这些阶段能很快来到并有很大进展。

对欧洲的威胁也来自数量庞大的常规武器的存在及双方的不平衡。这种常规武器的明显不平衡是核力量裁减的障碍。法国建议所有关心欧洲安全并参加了欧安会的国家召开一次欧洲裁军会议。这一会议的第一阶段的目标将通过提供适当的信息和通告等措施，在所有欧洲国家之间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在第二阶段再在欧洲地缘战略范围内——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实现真正的军备裁减。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8年第7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施密特
一九一八——

赫尔穆特·施密特，西德总理（1974～1982），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34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7年中学毕业后，参加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接着正式服兵役。1945年被英军俘虏，关押4个月。1945年至1949年在汉堡大学学习。194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49年后历任汉堡市交通科长和局长，联邦议院议员、联邦议院国内事务部长、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国防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长、财政部长等职。离开政坛后，仍从事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的研究工作。著有《防温还是报复》、《西方战略》、《伟人与大国》等。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禁止使用武力必须适用于一切武器
(1978年5月26日)

我谨代表那些不能也不会按一个大国意志行事的国家讲一点看法，我们这些国家也意识到自己对和平的责任。德国不能使用武力是受条约约束的。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必须适用于一切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使用常规武器的地区战争可以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在限制核军备的同时，必须寻求达成裁减常规力量与武器的地区协议。

超级大国在重新确定其安全要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已不再把单方面的核力量的增长看作是对他们自己安全的加强。

在欧洲，大家知道在军事安全与缓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从西方盟国在10年前制定出防务和缓和的战略以来，已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自从1969年以来联邦德国与其东部邻国的关系在正常化与和解上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围绕柏林以及柏林本身的形势已平静下来。如果对力最平衡及缓和有共同意志，那么，未预见到的冲突会引发对有效地控制危机的需要。最近一个时期的历史已提供给我们好几个对危机加以成功控制的例子。比如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危机。对这些严重局势的控制已产生了长期影响，它使核大国重新思考，并为缓和与裁军创造了一个心理基础。这些危机曾导致核大国之间的对抗，若不是从中获得了经验教训，要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和核不扩散条约会是很困难的。1967年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是更进一步的成绩，联邦德国欢迎苏联在该条约第二补充议定书上签字。

如果在军事能力和军火制造的问题上能更透明一些，人们对突然袭击危险的忧虑就可以大大减轻。联邦德国为联合国秘书长所发起的使军事预算透明化和加以比较的预备性工作作出了自己贡献。对条约的遵守必须有目共睹。在这方面联邦德国一向接受国际监督。

第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因卫星的出现解决了核查问题而成为可能。联邦德国希望第二轮会谈能很快取得成功。

在限制扩充军备上，核不扩散条约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两个超级大国曾明确承担了减少核武库的诺言，它们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但核不扩散条约不应当成为和平利用核能的障碍。有必要加强国际核查手段以防止它的误用。核不扩散条约要想得到有效的加强，就必须扩大共识的基础，不然它就会遭到破坏。

过去10年中缓和在欧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胁因四大国柏林协议和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条约的签字而得到了具体的表述。现在欧洲存在着过去几十年中从未有过的促进互相信任的措施，但同时欧洲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集结和军事力量的对抗。维也纳共同和均衡裁军谈判开始于5年前，其目标是对双方军事力量设置一个集体的限额。

在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最近一次访问联邦德国时，双方在东西方联合宣言中声明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双方谁也不要追求军事优势，大致的均势足以满足防务的需要。正如苏联外长所说，该宣言是对维护和平的重大的思想贡献。在宣言中，苏联表示愿意讨论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所未涉及的武器系统，如中程导弹。这些武器对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威胁程度和洲际导弹对超级大国的威胁是一样的，它们都是致命的。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对法国总统的建议深感兴趣。

联邦德国对北约的防务贡献是通过均势来实现保证安全的目标。考虑到欧洲的整体形势，对联邦德国而言，集体防务联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集体防务以外，北约也同样对缓和与军备限制予以关心。感谢美国总统，是他让大家注意大量武器转让这个严重问题。在军备限制的努力中必须对国际军火转让作出规定。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美国副总统的观点。联邦德国支持在研究有关问题的行动草案中所提出的建议。所有的军火出口国应当完全公布他们的军火出售情况。联邦德国希望特别联大应当利用这个机会表现出国际社会在裁军和军备控制上所作努力的信用，在避免争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联邦德国愿意和其它国家分享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的经验，它也愿意提供其地震测定设施以核查核武器全面禁试执行情况。它支持联合国关于让世界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接触以促进国家间相互的信任的考虑。

要想达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新的戏剧性的全球裁军协议，看来没多少成功的希望。我们需要很多单个领域的进展，以一步一步地缓和各国的利益冲突。任何在原则上排斥折衷思想的人是与和平格格不入的。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8年第7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葛罗米柯
一九 九——

安德烈·安德烈维奇·葛罗米柯，前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家。毕业于明斯克农学院和莫斯科经济学院。193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6至1939年在苏科学院搞研究工作。1939年后历任国家外交委员会美国处处长、美洲司司长和驻美大使馆参赞、驻美大使兼驻古巴公使、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驻英国大使、外交部部长。1973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至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起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曾主编《苏联外交史》、《外交辞典》。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军备竞赛
(1978年5月26日)

与本次联大特别会议恰巧重合的将是另外一种会议，那就是北约理事会。将出席北约理事会议的有在本次裁军特别大会上发了言的一部分代表。在北约会议上他们将讨论计划在1980年代进一步扩充军备问题。某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口是心非、自相矛盾：它们向那些将其命运绑在军火生产上并从中获得巨大利润的人的压力低头。他们常常要求泡制出新的神话，以不断重弹“苏联军事威胁”的老调。

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知道苏联从未发动过战争，它也决不会这样做。每当苏联人民被迫进行战斗的时候，都是为了反击将战争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侵略者。西方说苏联的SS—20导弹可以瞄准世界任何地方，再次重弹“苏联威胁”的调子。然而难道不是美国核导弹可以打到四面八方，并且可以先发制人并预测方向吗？美国为何要将它们部署在欧洲呢？

有些国家的代表连发“裁军”这个词的音都感到困难，而宁愿用“控制”一词。如果用所谓的“控制”办法，世界的军备规模将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4倍。这难道是通向和平之路吗？

通向裁军的道路障碍重重，情况复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大家庭从不沮丧。人民、国家和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如果他们能走正确的道路，而不是执行旨在欺骗人民的政策的话。

在一些地区对抑制军备增长已取得了一些经验。通过20多个双边和多边协议，使得切断某些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渠道和使另一些扩散渠道变窄成为可能。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表明，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取得进展是可能的。在目前缓和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政治气氛下，是有利于认真的限制军备的努力的。这在两种社会体制的关系中是前所未有的。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已被建立起来，虽然还很不够。最近勃列日涅夫和联邦德国领导人的会谈给了这一进程以强大的推动力。

政治缓和应当和军事缓和相结合。否则的话，通过多年努力所取得的国际关系改善将付之东流。在军事领域双方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然而目前的均势是建立在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的高度之上的，不久可能达到更高的高度。在不破坏已有力量相互关系的条件下，决不要失去制止军备增长的机会。

苏联呼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以制止军备竞赛。问题在于武器质量和数量

的进一步提高。苏联建议停止制造各种型号的核武器，停止制造并禁止使用所有其它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停止发展新的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与它们有军事协议的国家不再扩军和增加常规军备。这样的措施不会破坏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谁也不损失什么，而对和平事业的收获则十分巨大。苏联准备讨论所有这些措施，并在限定的时间里加以履行。

由于主要危险来自加快中的核武器竞赛，应该将停止核武器的生产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然后是逐步减少核武库。谈判应该由所有核国家和某些非核国家参加，后者按大家同意的原则在筹备机构的框架内参与。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极其复杂，但在政治方面却非常重要。

停止核武器生产和储存的措施的具体化及其履行，与加强各国安全的国际法律保障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一点上，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应当达成一项在国际关系事务中不使用武力的协议。联大特别会议应当就开始核裁军谈判和不使用武力谈判作出原则性决定，应当就筹备和开始谈判确定程序。

核不扩散条约是有用的，但各方均应作出进一步的努力。苏联宣布它决不对宣布不研制、不生产核武器、也不允许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它准备签订这样的协议，并呼吁其它核国家也这样做。

如果同邻国有冲突的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就可能触发一场全面的核对抗。这正是为什么南非和以色列打算发展核武器会引起人们如此巨大关切的主要原因。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这种事态的发展。

在墨西哥总统最近访问莫斯科时，苏联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第二个议定书。由于该条约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缺陷，苏联曾对该条约有过一些疑虑。尽管如此，它决定承担其义务，尊重拉丁美洲的非核化，但其前提是其它核大国也要尊重该区域的这种地位，其参加国要保证做到它们是真正的无核武器国家。

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苏联以其设备帮助很多国家提取浓缩铀，它还进行着其它方式的核合作。和有关说法相反，这种合作并未导致核威胁的增加。

由于苏联反对使用核武器，它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向欧安会参加国（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提出了一项建议，希望达成一项相互之间不向对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该建议仍有效，并等待着实施。

必须防止发展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幸的是这方面谈判的进展异常缓慢，苏联赞成为达成有关协议而加倍努力。

苏联支持禁止中子武器，这并不是因为苏联不能应付这种挑战。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苏联不同意在军备竞赛中别开生面。苏联建议双方达成不生产中子武器的协议，不要等到为时太晚的时候再想到这一点。在今年3月苏联向裁军委员会会议就这个问题提交了一项建议草案，现正等待明确的答复。苏联不想生产这种武器，除非美国或其它国家生产这种武器。

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已克服了很多困难，剩下的困难也可能克服。该条约一签字，苏联就准备参加大大缩小战略武器规模并进一步限制其质量改进的会谈。

达成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前景是看好的。在谈判中苏联已在最困难的问题上做了它该做的事，余下的要看美国和联合国了。苏联在一份备忘录中同意在自愿基础上对和平核爆炸进行核查。如果开始阶段不是5个核大国，而是3个参加谈判的核大国的话，条约也可以生效。3个国家建立的榜样可以说服

其它国家跟上。

在谈判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产生了如何控制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各个国家的核查手段再加上国际的考虑周详的方法来解决。

禁止放射性武器协议已可看得见了，条约草案已部分地获得同意。苏联期待着迅速达成协议。

在维也纳举行的中欧裁军谈判非常重要，因为常规武器占世界军事开支的80%。在中欧，两个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以大体上的军事均势互相对峙。通过一致同意的措施，可以减少这种均势的规模而不影响任何一方的利益。与北约不同，苏联很长时间没有在中欧增加其力量了，将来也不准备增加。苏联希望另一方放弃想取得单方面优势、改变力量关系的做法。欧洲的军事缓和必须迎头赶上。

苏美关于限制和大量减少印度洋军事活动的谈判到现在为止讨论的是冻结目前的军事活动规模。苏联准备寻求大量减少这些活动的方法，包括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只有那样，印度洋沿岸国家希望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愿望才可望实现。

正如大家所见，关于裁军的好几个方面问题正在讨论中。苏美还在讨论限制国际常规军事装备的销售和转让问题。我们对这个紧迫问题的明确政治态度是：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应同等对待。各国人民从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压迫下争取解放的合法斗争权利不应受到侵害。

加入现有的裁军条约和协议也是朝结束军备竞赛跨出的重要步伐。本次联大特别会议应该强烈敦促有关国家为加强现有国际协议作出它们的贡献，因为很多会员国还没有成为如核不扩散条约、部分核禁试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在海床、洋床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的签字国。

削减军事开支是减缓军备竞赛的另一个现实的步骤。苏联建议拥有庞大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国家，如常任理事国，应当同意在绝对数上减少军事预算，而不是百分比。从中节省的费用应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苏联和其它国家赞成召开一次世界裁军大会。在这样的论坛上可以立即作出真正对所有国家起约束作用的决定。本次特别大会的成功有助于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认真考虑尽早召开这样的会议。

至于国际裁军机构问题，苏联并不认为有必要抛弃现有的谈判渠道，或进行重大的改组。更换机构的名称或标牌不会有多大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机构能否很好工作决定于参加国所奉行的政策。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8年第7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伦纳德·詹姆斯·卡拉汉，英国前首相（1976～1979）。毕业于朴次茅斯高中。1929年以后曾先后担任税务委员会秘书、执委会委员和税务员、全国联合会秘书。1936年加入工党。1939至1945年在皇家海军服役。1945年以后历任下院议员、运输政务大臣、海军部政务大臣、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外务和联邦事务大臣。1976至1980年任工党领袖。1976至1979年担任首相职务。1979至1980年为反对党领袖。1987年被封为男爵。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不干涉与和平解决争端是最好的原则

（1978年6月2日）

本次特别联大的根本任务是为世界军备走上裁减和稳定的道路提供动力和框架，以改变目前的状况。

最近北约的讨论表明它的成员一致认为，如果东西方军事力量维持平衡，和平是可以保持下去的。它也表明面对东方国家改进装备，特别是面对会破坏力量平衡的东方的庞大常规力量的存在，西方国家对恢复力量平衡更趋关切。西方深切地希望双方能共同保持克制，或通过更理想的裁减军备来实现力量平衡，而不是用愈益扩大代价高昂的武装力量。

如果看到别的国家在直接地或间接地以现有军事力量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尽一切可能在为自己谋利益的话，一些国家就不愿在裁减军备上跨出第一步。

非洲面临着一些顽症。有些人可能认为使用武力是迅速解决问题的方便快捷。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与它能够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联合王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从非洲撤走后，非洲国家的边界线犬牙交错，根本无视地理和种族的因素。它们往往将一个部落、甚至一个家庭一分为几。

1950年代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的明智和远见表现在他们认为虽然非洲现在边界有人为造成的不合理的因素，但非洲的最大希望还在于承认边界现状。他们还进而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及拒绝外来势力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预。

现在看来这些原则有可能被新的情况所取代。那不一定对非洲有利，也不能纠正以往的错误。那些多年来曾经帮助非洲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不愿意看到它被新的帝国主义（或正在成为新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所误导，从而成为造成东西方不和的新的争夺领域。

对斗争中的非洲人民来说，不干涉与和平解决争端这两项老的原则是最好的原则。联合王国呼吁非洲国家明确地讲出来，不然的话，可能会为时过晚。他们很可能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沼，从而增加这些国家的不稳定和战争的危险。

联合王国愿意在寻求裁军方面起中心作用，并正在参加为达成全面核武器禁试条约的谈判。英国的立场是一步一步来，把全面彻底裁军作为当前的目标会导致失望。联合王国同样也不认为各个领域内的努力互相脱节是好办法。

联合王国同意禁止一切条件下的核试验，条件是所有会员国均能核查条约的执行情况。那会使大家有信心，即没有一个国家在搞秘密试验。条约要没有歧视。对核国家和无核国家要一视同仁。

为了早日达成协议，联合王国准备在日内瓦举行的三边会谈中提出新建

议。它认为这些建议是现实的，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将要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得到英国的充分支持，也会得到会谈双方政治上的批准。该条约将正式地建立一种战略均势，保持稳定。这些步骤不仅其本身是可取的，而且如果要使世界免除战争危险，使美苏两国从开销巨大、失去控制而最终也将没有什么用处的战略核武器竞赛中解脱出来的话，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就应开始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合王国认为不仅仅那些可以从苏联打到美国、或从美国打到苏联的核武器是恐怖武器，而且所有的核武器都是恐怖武器。西欧对苏联瞄准这一地区的武器系统感到关切。而苏联及其盟国也有类似的关切。

英国的长期既定政策是，除了在最极端情况下用于自卫，英国决不使用核武器。那些已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权要求制订一些更具体的措施来保证核国家不对他们使用核武器。联合王国承认这些愿望，希望采取行动，满足他们的要求。

联合王国准备和其它核国家一起向无核国家提供坚定、深远的永久性保证。它支持签订进一步建立各国关心的无核区协议。

欧洲和北美国家通过维也纳的均衡共同裁军谈判，正在为缓和紧张局势和使军事对抗降级方面作出重大的努力。联合王国及其盟国曾建议通过确立共同的人员集体限额的办法来消除现有的力量对比差距，以及减少目前双方在作战坦克数量上的不平衡。对北约所关切的问题我们将提出新的解决方法。

裁军的道路要靠细致、复杂的谈判去铺平。也需要靠政治意志使其获得成功，并产生推动的动力。联合王国已在北约首脑会议上建议召开双方的外长会议，以给裁军谈判以政治推动力。

法国建议扩大裁军谈判的地理范围，使其覆盖欧洲更大的地区，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联合王国也建议联合国应当研究如何将西奈半岛安装的现代侦察手段应用于其它地区，以增强信心和检查军备控制协议执行情况。

联合王国已自愿接受对其民用核设施的国际检查，并愿充分参加国际地震监视体系。联合王国政府愿按化学武器公约接受对英国的有关化工厂的检查。联合王国愿意为实现、贯彻未来军备控制协议而接受在其国土上进行包括国际核查在内的任何核查措施。

联合王国没有进攻性化学武器，它呼吁所有国家共同拒绝这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它在 1976 年 8 月在日内瓦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这有助于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联合王国应当考虑限制常规武器销售的方法。世界需要有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基础，以放慢螺旋形上升的相邻国家之间的军火采购竞赛，并不出售可增加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复杂武器系统。一种办法是以地区的和多边的方式进行谈判，供应方和接受方以平等地位参加。这在关系紧张的地区特别合适，可以配合为减少战争风险而采取的政治步骤。本次会议作为第一步应当作出一项决定，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限制常规武器的方法。英国将充分参与该项工作。

关于裁军和发展的关系，联合王国已决定在今后 4 年内每年增加 6% 的对外援助。将援助与裁军进展联系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不会有多大帮助。相反这种联系对它们不利。

裁军与发展的关系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英国支持北欧国家关于联合国研究的建议。联合王国对军工生产设施转为民用特别感兴趣。

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做得很不错，但其结构有待改善。现在是改变双主席制度的时候了，英国愿意看到法国和中国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也许成员还应再扩大一点，以使裁军委员会更加具有代表性。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联合国的合作应加强，应安排不是裁军委员会会议参加国的国家参与该会的工作。

英国还希望联合国秘书处发挥更大的作用。秘书处在农业和教育方面所收集的统计资料令人起敬，为什么秘书处的裁军中心不能作为裁军问题的数据库呢？

英国支持3年后再开一次特别裁军会议，以评价所取得的进展，并为未来确定新的行动纲领。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8年第7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莫拉尔吉·兰奇霍季·德赛，印度政治家，印度前总理（1977～1979），曾就学于孟买大学威尔逊学院。1918至1930年在孟买市政府工作。1930年参加圣雄甘地领导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同年加入国大党。1931年起历任全印国会委员会成员，税务、合作、农林部长。在印度独立斗争中，曾4次被捕入狱，被监禁长达7年之久。1952年后历任孟买市政府首席部长、印度政府工商部长、财政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议会反对党领袖。1975至1977年被捕。1977至1979年为印度人民党领袖。1979年人民党分裂，辞去总理职务。著有《我的一生》、《自然疗法》等。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坚定地走和平的道路

（1978年6月9日）

尽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裁军，它也在促使人类坚定地走和平的道路，走理智的道路。

时机是很好的，排除战争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很遗憾的是自古以来人类历史是一部战争不断的历史。而更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不是去批判好战立场和征服者的形象，而是将他们作为英雄大加歌颂。每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儿童读物，即使在今天，仍然充满了关于人类在战场上和战争中互相屠杀的故事。战争曾被认为是推进民族利益的可以接受的合法手段，但今天应该已不具有以往的那种合法性。

看来目前对和平的渴望似乎来自对彻底毁灭的恐惧。印度坚信恐惧是最坏的东西，它对人类产生了持久的、令人泄气的影响。应当以正确观念规范人类的行为。

和平不仅仅是战争的中止，而是一种积极的认同感，一种对他人的关心。留在人们心中的应该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假如人们不能深信只有和平才能给人类带来满足和幸福，那么为和平而努力也不会带给人们多少好处。即使目标看来很遥远，仍然值得争取。

哪怕是最崇高的目标，若用罪恶的手段来加以实现，它也会黯然失色。对甘地来说，真理不仅是一种信念，更是行动的指南。甘地的一生证明了如下真理：真正的自由是摆脱了害怕的自由。世界要通过下决心使战争成为非法的事物来实现裁军，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只要认为战争是合法的，裁军就只能是空想。

过去30年中超级大国在达成部分或全部核禁试条约、限制核军备、削减北约和华约国家的军事力量方面所经历的困难和拖延表明，要想通过建立在互相猜疑和害怕之上的力量均势来实现哪怕是部分裁军，都将是徒劳的。

承诺裁军必须是彻底的、没有保留的。印度是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之一，人们对印度这样做的动机有很多误解。为清除这些误解，印度宣布：在承诺全面裁军方面，印度不会向任何人屈服。印度是世界上唯一保证不制造、不获取核武器的国家，哪怕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有核武器，印度也坚持这一保证。印度重申这一保证。

事实上，印度走得比这更远，它甚至放弃了为和平目的而进行核爆炸。印度要求别人所做的不过是对自己实行的自我克制原则。

印度反对核不扩散条约是因为它的歧视性。它对拥有核武器国家和那些致力于为和平目的而研究核技术的国家厚此薄彼。它自相矛盾，给前者以垄

断权，让它们享受对核技术商业开发的自由，对后者则施加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阻碍和平核科学的发展。

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使具有军事核能力的大国继续为军事目的使用核能，而同时告诉其他人“一切到此为止”。尽管和平有保证，尽管知道存在着核战争的危险，在过去8年中超级大国仍进行了254次核试验。因此不扩散条约并未如预期的那样阻止核军备的增长，实际上核武器的质量还在提高，数量还在增长。虽然美苏之间、美苏与别的国家之间活动频繁，但他们还没能提出在几个方面达成裁军的总的协议的基础。寻找解决核裁军方案之重任在他们身上。要想履行其责任，猜疑和畏惧解决不了问题。

裁军问题，特别是核裁军问题不能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核查和平衡的办法。它必须着眼于全球，不能因政治或战略考虑而让一些国家将世界分隔开来。

如果世界上有些地区仍然继续受到核武器的威胁，那末谈论无核区有什么用呢？在一些远的地方宣布自己为无核区，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并未失去任何东西。那些没有核能力的国家想象自己参加这种区域可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是得了妄想症。不存在什么核威胁和核危险的有限解除，而应该使整个世界成为无核区。应该采取决定性步骤使各国放弃将暴力作为保证安全的手段，转向以非暴力和把握真理运动作为抵制错误的手段。

第一步必须包括：

宣布以军事为目的的核技术使用——包括武器技术研究为非法。

对核军备作出质和量的限制，在国际监督下立即冻结现有储存。

以全面销毁核武器为目标，逐步减少核武器储存，并制定一个确定的时间表，整个时间不超过10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并附有保护条款以防止违反条约。印度认为这只有通过独立核查才能做到。

禁试范围应包括大气层、地下和 underwater 核试验和外层空间的试验。保护体制要以普遍性和作歧视性为原则。必须客观地强化监视和保护体制，并不受政治干扰。

除非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否则的话任何全球和平计划和裁军都不可能持久。核大国及其盟国也是支配世界经济、并使之朝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方向倾斜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互相配合，穷国不仅要面对受支配的威胁，还被剥夺了从它们的生产和劳动中获得公平回报的权利。裁军能够、也应当为改变今天占人类三分之二的国家在经济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被剥夺的状况这个大目标服务。

大会应当建议设立一笔研究裁军和非暴力的基金，寻找以食品和书籍来代替炸弹和子弹的方式方法。废除战争的努力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需，也不仅是道德的要求，而且也是人类的责任。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8年第7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沃尔特·弗雷德里克·蒙代尔，美国前副总统（1977~1981），民主党人。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麦卡利斯特学院和法学院。1951至1953年在美国侵朝陆军中服役。1956年成为明尼苏达律师和明尼苏达州司法部长特别助理。1960至1964年任明尼苏达司法部长。1964至1977年任参议员。1977至1981年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从1977年起一直是芝加哥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著有《掌权者的责任》等书。本篇是他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美国对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直场 (1978年7月)

美国政府很重视这次特别联大。自从卡特总统去年10月在联合国强调了美国对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承诺以来，美国进行了在它历史上最广泛的军备控制谈判。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保卫其人民这点上仍然是强大的，但它们面临着欧洲一部分地区军事力量史无前例的迅猛增长的形势。华约对北约在坦克上有了3对1的优势。瞄准西欧的SS—20导弹是毁灭性力量的新发展，代表了苏联核威胁的巨大增长。

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将使西方民主国家再度使自己有能力遏制和抵抗进攻。北约将继续在整个大陆抗击常规力量、战术核力量和战略力量的攻击。面对华约力量增长的情况，北约国家亦将适度增加防御预算、这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北约最高首脑会议还将重新确认西方对其它安全政策领域进行军备控制的承诺。会议将讨论西方最近已提出、并将继续提出的军备控制倡议。

在拟订行动计划方面来说，首先应当大大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并对它们的质量的改进进行严格的限制。美国承认它和苏联及其它核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

第二阶段战略核武器协议正在迅速形成中，它将减少现有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并对余下的运载工具数量设置限额；对那些最具威胁性、最起破坏平衡作用的武器系统设置第二限额。对现有武器的改进和发展新的更加复杂的武器系统作出限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必须是能够核查的，不允许任何一方通过欺骗手段突然取得优势。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世界各国均有好处，值得大家支持。这仅仅是漫长而又困难的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希望尽早开始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强调它对进一步大量削减核武器及更严格地限制运载工具的现代化和发展新的运载工具的承诺。但要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它谈判获得成功，其它国家的承诺也是需要的。苏联的战略核力量有很大增强，其中最显著的是对SS—20——一种新的机动的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

每枚这类导弹可携带3枚核弹头，每枚弹头的当量为50万吨TNT，这意味着距爆炸点12公里以内的无辜人民将惨遭杀害。如果部署完成，苏SS—20将达好几百枚。这些导弹虽然没有对准美国，但它有能力达到欧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很多目标。它的部署和本次特别联大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有什么理由可以为这种核竞赛的升级进行辩解呢？

第二，应当结束核装置的爆炸。卡特总统上任伊始，就宣布他将为达成一个完全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努力。目前，美、苏、英三国已为此进行了三边

谈判。谈判是在日内瓦进行的，在朝着达成一个可充分核查的协议努力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全面禁试条约将对限制超极大国之间的核竞赛、减少非核国家想拥有核武器的欲望和在加强核不扩散条约的作用上作出重大贡献。必须说服所有国家放弃核试验。

第三，在现有核国家的武器系统正在减少的同时，必须作出共同一致的努力，以确保在今后 10 年和更长的时间里不再出现新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理解一些非核国家的关切——它们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美国重申卡特总统在联大所发表的宣言——除非美国领土和武装力量及其盟国遭到核武器或常规力量的攻击，否则美国不会使用核武器。其它国家也应作出相应的保证。美国总统将对支持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的和平核计划提供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帮助。

拉丁美洲在禁止核武器方面值得其它地区效法。几乎所有拥有潜在核能力的国家都签署了 1967 年的拉美禁止核武器条约。美国对苏联签署该条约的第二议定书表示赞赏。在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示要签字。这个问题应当解决，那样的话，就可以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重要的无核武器地区。

第四，在为控制核威胁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必须作出努力达成禁止其它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协议。最近几年在禁止生物武器上取得了进展。美苏已接近达成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协议，该协议将提交裁军委员会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的讨论要困难一些，美国将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而努力，并尽可能对另一方公正。

第五，有必要马上放慢、然后再逆转常规武器迅速增长着的速度。为数巨大的 4000 亿美元的军费的大部分被用在常规武器上。在承认正当防御需要的同时，必须看到共同利益要求大大减少常规武器的销售。向常规军备竞赛火上浇油的是世界军火贸易的迅速扩大。以往 10 年中，进口武器的数量增加了 75%。

美国已采取了主动行动，开始削减军火销售量，将 1978 会计年度的军火和有关物品销售限额定为 8%，但北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除外。美国不会向一个地区引进新发展的先进武器，在美军装备自己之前也不会向别人出售这种武器系统。美国不允许开发只用于出口的武器系统，并对军火合作生产和技术转让作了严格的控制。美国已和其它军火供应国和采购国进行讨论，因为一直让美国单方面执行这样的政策是困难的。

第六，地区性军备控制安排及进行控制的能力应当加强和扩大。在欧洲，美国及其盟国最近已采取主动，使已进行了 5 年的共同均衡裁军会议重新出现活力。它们在考虑采取新的其它措施来加强中欧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已提出、并已开始与苏联讨论如何限制在印度洋的军备。苏联增加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妨碍了这一谈判。

第七，需要大力发展军备控制所需的机构和专门知识。联合国军备控制机构应加强，但不要损害已建立的其它机构。虽然美国准备考虑改变裁军委员会会议的组成，但美国关心的是改组后的机构应该是基于意见一致、保证认真谈判的机构，也是能继续产生成果的机构。

联合国和地区组织维持和平与促成和平的能力应该是军备控制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像非统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那样的地区机构的作用在减少外来干涉上非常重要。

联合国在黎巴嫩、塞浦路斯、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的部队使得谈判朝持久和平方向取得进展成为可能。为使这些努力更加有效，美国建议建立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后备力量。它应当包括由有关国家政府选派出来担任联合国的任务、并按联合国维持和平方式加以训练的部队。这样每当安理会决定建立一支联合国部队来维持某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时，联合国秘书长就可以动用这支后备力量。

第八，军备控制上取得进展应该让更多资源转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从集体角度说，世界完全有能力在本世纪末消灭极端贫困现象。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在以往 10 年中已从 15% 增加到 23%。这些国家的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高于发达国家。

仅用世界年军费开支的 1% 就足以为 2 亿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足够的食品和保健需要。特别联大应该开始实现如下转折，即将世界用于储存毁灭性武器的资金化作为人类生命提供机会的资源。美国赞成将用于军援的经费转用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

美国多年来努力限制向非洲输出武器。它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援助远远超过其军事援助的数量。它在食品方面所提供的经费记录和其它有些国家的援助几乎全部为军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国全力支持联合国研究裁军和发展问题。研究应当考虑裁军可能对经济带来的问题。美国支持减少军事开支的努力。它自愿对联合国的一个研究试验项目提供国家军事预算信息。限制军备必须有使军费开支更加公开化的措施相配合。

军备控制不应当仅仅是特别联大的议程，它也必须置于当今时代人类道德的议事日程之上。它的工作情况应当让国际社会有充分的了解。为了使这项工作有紧迫感，世界舆论对其施加一定的压力乃是必要的。美国呼吁特别联大在 1981 年再次召集这样的会议。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8 年第 7 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谈裁军问题

1982年6月7日

4年前，当联合国第一次裁军问题特别大会召开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长期探索的制止军备竞赛问题有了新的起色。这项联合国自从成立之日起所一心一意从事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绩。但大家都很清楚，核武器和其它武器的威胁有增无减。要想制止或逆转这一势头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在为探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迄今为止召开过的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最后文件，该文件为在和平时期实现能普遍被人接受的裁军目标而行动的计划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

现在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这一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纸上。的确，在行动计划里所确定的

目标，与4年前相比，距离我们比以往更为遥远。1978年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已被僵局所取代。在4年前已经达到危险和无理程度的军备竞赛继续扩展和加剧，令人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加快了堆积的速度，而且新的武器还在不断涌现。地球上一些新的地区也被卷入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已深入海洋、扩展至外层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只有军火工业一枝独秀。比例大得惊人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被浪费在这种无穷无尽的、最终必将化为泡影的通过军备来寻求安全上，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于更好的目的。

军备竞赛的一个更基本的前提值得重申，目前军备竞赛的根本现实是，无论从质量上看还是从数量上看，它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当然一直是，也将继续是一切地方的政府所最关心的事。通过实力求安全的观念和希望过和平生活的愿望一样久远，一样地深植于各国的生活之中。使当前的军备竞赛完全不同和更加危险的是其两个基本特征：1、竞赛的势头并不是出于深思熟虑的安全目标，而是来自无情的军事技术的发展；2、这种努力所产生的后果并不和它设想的目的相吻合。这无论对于核军备竞赛还是常规军备竞赛或多或少都是适用的。

在核武器发明之前，人们关心的是个人、单个人或一批批人的生死。可是，在核时代，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整个人类被毁灭的威胁。今天，“世界末日预言”不仅是圣经描述，而是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面对生存和毁灭的选择。

今天人类所拥有的毁灭能力相当于一百多万颗摧毁广岛的原子弹。一艘装备核弹头的潜艇所携带的武器弹药的爆炸力据估计将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用的武器弹药总和。事实上，这个大厅内的每一个人，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人都将摊到3吨炸药。正如温斯顿·邱吉尔曾说过的，核时代彻底改变了人类事务。对国务活动家的最大挑战是抓住这一新的极其不祥的领域，确定行动途径，以最后消灭它。

所有的决策人都明白，由于核战争的性质，一场核战争决不可能是一场有限战争。一旦核战争打起来，没有办法可以将其局限在预设的框架之内。这不是一场分为两方的战争——战后幸存的一方能从掩体里走出来在过去的废墟上费力地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也不是一场在世界遥远的角落里的人可以

坐山观虎斗、不伤毫发、最后可以修补世界的战争。

一场全面核大战将影响整个世界、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着地球免受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的极大部分将被毁坏，从而使人类、动物、植物遭到灭顶之灾。支持生命的一切服务均将遭受破坏，人类文明的基础设施会被打得粉碎。

在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无政府主义中，国内外为了生存而毫无节制的斗争必将出现。还有影响深远的遗传问题，不管我们将避难所选在哪里都无用处。没有可能打赢一场核战争，文明被毁灭后很难说谁是胜利者。对于一场核对抗的后果的一种适当的描述是“活着的人会羡慕死去的人”，生不如死。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说：

“人类面对着如下选择：要么制止军备竞赛进行裁军，要么面临毁灭。”

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一警告无动于衷，让军备竞赛迅速在国际社会中蔓延。当人类的多数在寻求一种免除饥饿、恐惧和绝望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却把最天才的人才、最宝贵的人类财富用于积聚毁灭的工具。我们每分钟将 1 百多万美元花在军备竞赛上，而在发展中国家中每天（注意不是每年，也不是每个月）有 4 万儿童死去。于是我们造就一种荒唐至极的状况：我们有能力毁灭我们自己很多次，但却没有一点拯救广大同胞免于饥饿的政治意志和道德心。

在核军备竞赛对人类造成大规模自我毁灭的威胁时，常规军备的积累也将不少方面给社会生活带来浩劫。它竭尽了经济、社会发展非常急需的资源。由于每一代新武器总比老一代更昂贵，军备竞赛的包袱就越来越沉重，特别是对那些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军备竞赛不会缓和地区冲突而只会加剧这些冲突。而且使一个社会军事化后，将使政治稳定和发展受损并威胁国内国际的安全。

自从 1945 年以来，在军事行动中从未使用过核炸弹，但全世界用常规武器打了 100 多场战争。这些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苦难、毁灭，使无数生灵涂炭。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裁军只是工业化国家的事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中军费开支也和花在卫生、食品生产、教育及其它和生活有关的目标方面的费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事实上，除了它所预示的灾难外，军备竞赛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难以承受其昂贵的经济代价。很明显，在军备竞赛花钱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从长期来看能有希望解决通货膨胀、萧条、失业、能源耗尽和国际经济不平衡问题。有些数字虽然简单化了一点，但还是相当中肯地揭示了目前世界所容忍的对轻重缓急次序的扭曲的情况。

每年军费支出 6000 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每人摊 112 美元以上。这比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得多。两架最新式的战略轰炸机的价格约为 2 亿美元，足以开展一场全球范围的扫盲运动。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的费用不到 1 亿美元，而比这一数目大得多的钱被用于发展更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全世界军费开支的 1.5% 就足以提供所需要的农具以使低收入国家和缺粮国在这个 10 年结束时解决粮食自给。关于裁军和发展的关系，秘书长的报告是这样说的：

“世界要么使劲地去搞军备竞赛，要么自觉地以审慎的速度在一个能更持久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实现更加稳定、更加平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两者必居其一。”

总之，不论是核军备竞赛还是常规军备竞赛，它代表了我们对人类福利

责任的放弃，是一种走火入魔，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全世界 50 万科学家在用他们的知识研究更复杂、更致命的武器。除非以政治决定加上道德上的意志来阻止它，否则军事技术发展过程的本质决定它决不会自动停下来。现在，军事技术中新的可能性、新的突破正在导致新的运用，不论是战略上还是军事理论上都有变化，正在走向一条难以逆转的道路。

本次大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蠢事是否会没完没

人们当然可以随口说，这种局面既不是因想毁灭人类的罪恶动机所造成的，也不是想要自杀而故意制造的。我前面说过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始终是军备竞赛的一个理由。但通过扩张军备来寻求安全正越来越被证明仅是一种幻想。在一场毁灭性战争结束的时候成立联合国，旨在提供一种国际安全体制，以保障所有国家的安全。

这一体制建立在所有会员国接受某种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这包括尊重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在国际关系中进行威吓或使用武力。造成目前这种令人绝望的局面的原因是这一体制的信心的丧失，而这个问题几乎在这一体制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正是这种信心的丧失才导致了两个大国集团的形成和对于对方的深深的不信任感，也导致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的动摇。

讲这些话的目的，是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需要结束目前这种浪费的、无休止的、危险的军备竞赛，这在各个方面几乎都和各国在这个极不安全的世界上对安全的需要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我们今天聚集在联合国如果解不开这个难解的结，就应快刀斩乱麻，采取决断措施。我们不能等待理想条件出现后再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不表明我个人的信念：即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制止军备竞赛的办法，不然会为时过晚，那我就是玩忽职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让人类摆脱核毁灭的威胁，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全人类心上的一个阴影。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2 年第 8 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本篇是黄华在联合国第12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对裁军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2年6月11日

主席先生：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是在举世瞩目下举行的。为了这个会议的召开，不结盟国家和许多中小国家做了值得称道的工作。由于它们的倡议和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得裁军问题越出了超级大国的控制，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关心和参与的事情。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裁军问题无疑显得更为紧迫了。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注视着各国政府对待裁军问题的立场，看看它们能不能在这次会上，在制止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的若干紧迫问题上制订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这一点来说，这次会议不只是一个讨论裁军问题的论坛，而是将成为检验世界各国政府裁军的诚意的场所。

中国代表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指示，抱着真诚的意愿前来参加会议。我们愿意同与会各国代表一道，对当前有关世界裁军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并希望会议能对促进裁军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4年来，各国人民争取裁军的斗争尽管从未停止，但是裁军问题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规定的裁军目标，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其根本原因是两个超级大国毫无裁军诚意，仍在加紧扩军。双方展开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力求在战略武器和战术核武器方面提高质量，更新换代，确立优势，压倒对方。同时，发展常规军备，控制战略要地，加强战争准备。它们各自都以对方扩军作为自己扩军的理由，并为此而互相指责，互相揭露。它们日益加剧的扩军备战威胁到国际的和平和安全，理所当然地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近年来，欧洲、日本，美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掀起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和要求防止核战争的群众运动。我们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愿望。

随着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战争威胁的增长，第三世界和广大中小国家更加强烈地要求推动裁军的工作，希望本届大会取得成果，这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首当其冲的是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它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宝贵的资源和有限的资金用来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从而加重了经济困难，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一直在为争取裁军而大声疾呼，它们还提出了不少积极建议和合理主张，其中有些已经包含在提交本届大会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之内。我们认为，大会应当对这些建议和主张进行认真的考虑和研究。

在世界公众反对核威胁的压力下，两个超级大国在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同时，不断作出愿意裁军的姿态，抛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方案。对于这种现象，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呢？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军备竞赛中占了上风、取得优势的一方，总是力求冻结现状，保持优势；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则总想打破现状，迎头赶上，使力量对比改变得对自己有利。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强调先冻结，一个强调先削减，表面上都说要保持军备均势，实际上是都想争夺优势，在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加强自己争霸全球的实地

位。

在这方面，一个超级大国所作的姿态特别值得注意。它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方案，花样年年翻新。可是，它究竟采取了什么实际行动呢？没有。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向主张实行真正的裁军，并为谋求裁军问题的进展作出积极的努力。从 6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多次提出过有关裁军和加强国际安全的主张与建议。我们历来反对军备竞赛，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任何国家利用军事优势进行侵略扩张。我们赞成苏美两国进行核会谈，希望它们以严肃负责的态度，使谈判能够达成真正有助于限制核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威胁的协议，而不要重蹈过去的覆辙，不但未能削减它们的核军备，反而为进一步改进和发展它们的核武器预留下很大的余地。

近年来，我国代表曾在各种裁军会议上多次阐明我国政府对各项裁军问题的基本原则。现在，我愿借此机会把中国政府关于裁军的基本原则重申如下：

一、争取裁军和维护国际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争取实现裁军应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努力相结合。为了给裁军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使裁军取得真正的进展，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特别要反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两个超级大国应率先进行裁军。由于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常规军备大大超过任何其它国家，它们之间的争夺和军备竞赛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因此，超级大国对裁军负有主要责任，必须率先裁军。在它们大量裁减军备之后，其它核国家和军事上重要的国家也应按照合理的比例和程序同它们一道裁军。

三、核裁军和常规裁军应结合进行。由于核战争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采取切实措施以实现核裁军的目标是很重要的，但是利用常规武器对别国进行侵略和威胁也不可忽视。只有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措施结合进行，才有助于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在进行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同时，应禁止其它种类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

四、一切中、小国家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持为防御侵略、捍卫独立所必需的国防力量。裁军进程各个阶段的措施和步骤，不得损害和威胁任何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五、裁军协定应规定严格有效的国际核查措施。为了建立必要的信任，并确保所有缔约国切实遵守，有关协定均应包含切实的核查措施。对违反协定的行为，应采取必要的制裁。

六、各国应平等参加裁军问题的解决。裁军问题涉及各国的安全和利益，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国小国，不论有核无核，不论军备强弱，都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裁军问题的审议、谈判和监督有关协议的执行。

考虑到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的强烈愿望，根据我国政府对裁军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上述基本原则，我现在向大会提出以下几点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的主要措施：

——所有核国家应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此之前，核国家各自保证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并且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彼此也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苏美两国停止试验、停止改进、停止生产核武器，并将其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削减 50%。

——在此之后，所有核国家都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并按商定的比例和程序削减各自的核武库。

——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应结合进行常规军备的裁减。作为第一步，各国承担义务，不以常规军备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侵略和军事占领。

我们认为，为了使裁军问题取得真正的进展，必须从当前世界军备的现实情况出发，明确裁军的主要方向、主要对象和主要目标，同时应采取公平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裁军措施。

现在核军备竞赛的趋势有增无减，核武器的堆积达到了超杀伤、超饱和的危险程度，要想在朝夕之间实现全面彻底的核裁军是不现实的。所以，作为核裁军的第一步，应当先从禁止使用着手，接着逐步进行裁减直至销毁。一切核武器的研制、试验和部署，最后都是为了使用，如果所有核国家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核战争的危险也就可以减少了。只要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不进行核威胁，并承担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无核国家也就没有必要拥有核武器或者寻求外国的核保护伞。作为一个核国家，如果它首先不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威胁无核国家，倒反而责怪无核国，并要求无核国保证不威胁有核国，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为情理所不容吗？

当然，仅仅禁止使用核武器是不够的。如果只讲禁止使用而不进一步实行裁减直到完全销毁，那就难以杜绝核武器被使用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主张核武器的禁止使用必须与裁减和销毁相联系的理由。

另外，我们主张核裁军和常规裁军应结合进行。鉴于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对人类安全的严重威胁，人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反对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威胁方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不认识到，核战争有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核大国之间一开始就打核战争，另一种是它们先打常规战争，再升级为核战争。如果我们只注意防止核战争，而忽略对常规战争的警惕，就可能给核战争的爆发留下了缺口。现在超级大国拥有的常规军备经常被用来作为侵略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放松常规裁军，就会在客观上不利于制止霸权主义者利用常规武器去进行侵略扩张。这个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还有，我们主张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都应当分清主次和先后，两个超级大国应该首先进行大幅度的裁减。因为现在世界上它们两家的武器最多，只有它们两家才有能力打核战争。既然国家有大有小，军备有强有弱，那么究竟应当削减强者的军备以确保弱者的安全呢，还是不分强弱，不分先后，但求一律，等量齐观呢？我们认为，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军，大幅度地削减它们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才能减少战争的威胁。在核裁军方面更应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的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准备承担的裁军义务。事实上，我国政府早已向全世界多次作出保证：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裁军的诚意。我愿在此声明，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率先停止试验、改进、生产核武器，并把它们的核武器裁减 50%，中国政府愿意与所有核国家一起承担义务，停止发展和生产核武器并进一步裁减直至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国政府关于裁军的基本原则和上述关于裁军主要措施，是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产生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团结第三世界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正致力于发展经济，建设国家，以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参加任何军备竞赛，因为这种竞赛是违背我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只能在和平中进行；我们的人民的需要，只有在和平中得到满足。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根本利益，决定了我们必然奉行和平政策。我们不需要战争，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中国的军备，包括核力量在内，完全是为了自卫和防止外来侵略。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从不谋求任何外国基地。也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事实证明，只有在别人把侵略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才被迫起而自卫。我们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略和威胁，也从不威胁任何人。我们一贯奉行和平政策，不怕别人污蔑造谣。有人捏造所谓中国“威胁”的谎言，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

裁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问题，它必须要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和关切。只要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战争而坚持不懈地斗争，是推动裁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动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顺应世界人民的愿望，为实现真正的裁军而共同努力，我们衷心地希望和祝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这方面取得成果，作出贡献。中国代表团愿意同各国代表一道，为争取实现这个目标而积极工作。

转引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2年第13 23页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联合国工作报告”摘要。

免后世再遭战祸

(1983年9月)

作为秘书长，我认为如果我不利用这个场合谈谈我对目前世界裁军状态感到不安，那就是我的一种失职。我们必须自省一下，是否已真正致力于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提出的箴言：“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宪章赋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审议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的责任。今天，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核浩劫的威胁不能同其它许多问题相提并论。防止核浩劫是我们进行一切努力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不能防止核浩劫，摆在本世界组织面前的其它各项重大使命，即对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争取人权方面的进步、建设一个公正和人类尊严的世界，都将是一片徒劳。

虽然联合国有其不足之处，但它是整个国际社会可以表达意见的唯一现存机构。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就得在这里说清楚；而最为根本的愿望莫过于人类的生存。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那些令人可怕的数字。因为再三地重提那些数字，似乎已经使我们麻木不仁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核战争决不会是有限的，也决不能打赢。核战争的影响将不会局限于核对手，而会威胁这个地球上所有人民的生存。核战争将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世界末日的情景是不需要加以证明的，这一危险的存在就足以证明，因为最坏的事情只需要发生一次就够了。

当我环视这一会议厅时，我看到了159个会员国的代表团。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民都派代表到这里来了。而他们全都——我们全都——生活在核威胁之下。作为本组织的秘书长，我只忠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我认为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主要核武器国家提出这一问题：它们凭什么权利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拉丁美洲，从欧洲、非洲到远东，每一个男男女女的命运都受到了它们的行动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够期望逃脱一场核战争对我们星球的脆弱结构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大国现在所承担的责任再也不仅仅是对它们自己人民的责任了，它们必须对每个国家和每个人负责，对我们整个人类负责。

我们决不能允许意识形态的对抗危及人类的未来。而现在处于危险之中的正是人类的未来。今年作出的决定不仅会影响今天，还会使我们的后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就好比最高的主宰，很可能由于今天的争端而割断未来，夺去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出生的无辜者的生命。再没有比这更狂妄的了。与此同时，我们先辈所过的生活也将失去任何意义，因为我们能够在几小时甚或在几分钟的冲突之中摧毁历代文明的全部成就，人类的一切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便会毁于一旦。

近4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核阴影之中。许多人宣称，正是这种核阴影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如果说核武器确实是维护和平的工具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获取这种武器呢？恰恰相反，显然，依赖核威慑也就是接受一种永远处于恐惧之中的社会。这完全不是联合国宪章所预期的那种人类价值和谅解的社会。

通过核威慑寻求真正的稳定，从长远来说，是既不可取也行不通的。其所以不可取，是因为从长远来说人类价值与那种玉石俱焚带给人类千百万男

女的死亡威胁是格格不入的。承认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人道社会绝不能盘算采取这样一种行动。相反，正是对每一个被认定能够发起这种进攻的对手的恐惧和憎恨将破坏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

即使我们撇开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从长远来说，我们能不能真正期望从恐惧均衡和这种均衡带来的怀疑中得到稳定呢？随着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付每一个新威胁的需要将变得更加紧迫。军备中的每一项新发明都会破坏脆弱的均衡。每一个想象中的优势都将导致对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恐惧，从而并在重大危机时刻产生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的诱惑。我们的科学虚荣心会不会使我们忘记我们难免犯下双重的差错：人的差错和技术的差错？进攻能力当然必须减小。然而，最终将没有威胁，因为采取任何核敌对行动对谁都没有好处。可以再清楚不过他说明这一点的是，一次核打击即使在没有发生报复的情况下也会随即造成一个“核冬天”。因此，发动任何核进攻将是一种自杀。这种暴力的恶果将对半分食，发起者和受害者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6年前，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对所有人面临的根本目标作出了决定：

“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人类正面临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并朝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代表都希望，美国和苏联外长之间的会谈将是朝着我们所有人谋求的方向跨出的一步。当然，并不是由我来对拟定的谈判方针发表详细的看法。但根本的安全需要必须予以承认和考虑，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双方在对方的安全中都维系着自身的利益，因为不安全只能导致双方的损失和先发制人的考虑。由于当今的武器极端复杂和武器库的不同构成，不同领域中的优势不得不互相抵消。最后，认真的会谈只有在谈判桌旁而不是通过宣传工具的电波进行。国际社会将不会再从仅仅是表面的进展中获得慰藉。

联合国会员国在裁军方面拥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边谈判机构，即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我曾多次说过，不应该使会议的努力依赖于双边取得的进展。而且，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对双边进程作出贡献。我呼吁在缔结—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重新作出努力。任何—项多边协议都不能比该项条约对限制核武器的进一步完善产生更大的影响。—项全面禁试条约是检验是否有进行核裁军的真正意愿的试金石。发展威力上更加致命、技术上更加复杂的新类别的武器（对于这种武器的控制更难以核查）难道是明智的吗？我们将由计算机自动的——而且是易犯错误的——反应去作出关于人类未来的决定。

要求就外空武器进行会谈的时间同样紧迫。看来，就武器而言，停止—切竞赛的唯一办法就是防止竞赛开始。竞赛—旦开始，就很难达成协议。赢者所享有的只不过是短暂的、不牢靠的片刻胜利，另一方很快就赶了上来，留待双方回顾的则是浪费了更多的人力和智慧。在军备竞赛中是没有最终的优势的。所以，至关重要的是，要尽快在这个新的外空领域缔结—项禁止武器的条约，要不然就又会为时太晚了。

明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这也是在广岛和长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使用核武器40周年。尽管我们迄今为止避免了全球对抗，但是我们在过去的40年中，在裁军和限制军备方面进展甚微。讨论放任自流。看起来往往像是在—场全球象棋比赛中棋手们仅仅移动了他们那有杀伤力的小卒

而已。我们无法计算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已经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有限资源。

在一个对年轻人来说是捉摸不定、对贫穷和饥饿的人来说是绝望的时代，我们确实是将自己的未来抵押在军备竞赛——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上了。一些杰出的研究报告向我们表明，军备开支是如何破坏我们的经济的。我们知道，发展将成为军备竞赛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军备贸易使接受者穷困，使供应者卑劣。这与毒品贸易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当今饥荒悄悄逼近了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甚至在他们面临着无声无息的饥荒大屠杀的时刻，我们却继续一意孤行。国际社会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裁军和发展的联系上，并对此采取行动。我们应该采取具体的和目光远大的步骤，将军备工业从军事生产改变为民用生产。我们应该开始纠正军备研究与研究限制军备和裁军之间某种极大的不平衡。

宪章规定秘书长的任务是：要求他处理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我相信，对国际社会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

人们对裁军的事业谈了很多。我们都知道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概述的目标，只有各国政府的政治决定才能够使我们实现这些目标，而又只有世界人民才能够敦促他们的政府朝这一方向采取行动。联合国宪章谈到了“我联合国人民”，因为联合国正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才建立起来的。裁军对于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利害攸关。在核时代，不能听任军事战略家或者甚至政府去作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

作这类决定确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因此，我们在会议厅就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打破不信任和不安全的循环，并对人类渴望和平作出反应。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5年第1期

田国培 译 沈丁 校

竹下登，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日本内阁前首相。194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系。1958年以来，10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历任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通产省政务次官、内阁官房长官、自民党副干事长、建设大臣和大藏大臣等职。1986年7月至1987年7月任自民党干事长。1987年7月正式成立竹下派。1987年11月6日，经国会选举出任日本内阁首相。1989年6月2日，因受里库路特案牵连辞去首相职务。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地球是人类唯一故乡 (1988年6月1日)

我国由于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的轰炸而蒙受了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悲惨灾难。最终消灭核武器是日本国民的夙愿。每年8月，我们都在广岛和长崎举行纪念会，重新下定决心，争取实现和平。

我们强烈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核裁军。

美苏之间签订的在全球范围内完全销毁中程导弹的条约开始生效，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也正在进行。我衷心欢迎两个超级大国对拥有的核武器设定最高限量并予以削减的时代能真正到来，并希望继续努力推动谈判。

防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是极为重要的。我要求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早日加入这一条约。

关于禁止核试验，我国在1986年就制定了交换地震波资料的计划，并进行了试验。我国为了在全世界建立核查核试验的制度、介绍试验的成就并呼吁参加这一制度，正考虑与联合国一起在我国召开国际会议。

在两伊战争等争端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实在令人遗憾。为了完全防止使用核武器，迫切的任务是禁止拥有和生产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完全销毁核武器。我认为，应该竭尽全力，争取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尽快地拟定完全废除化学武器条约。

关于常规武器的军备管理和裁军的问题，希望欧洲早日开始削减常规武器的谈判，朝着纠正常规武器不均衡的目标前进。

我认为，在军备管理和裁军方面有以下4点必须考虑。

第一，遏制和均衡。在维持遏制力量的同时，必须综合考虑整个兵器体系的均衡，均衡地降低军备的水平，提高有关国家的安全程度，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第二，特定地区的军备管理与裁军，必须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学的条件和对它地区的影响。

第三，军事情报的透明度。我认为，如果对方国家的军备等情报增大透明度的话，在促进谈判方面就能产生信赖，就能更客观更妥当地处理问题。

第四，实行有效的核查。为了保证执行军备管理和裁军的措施，一定要商定建立行之有效的核查制度。

自从43年前创建联合国以来，东西方之间一直保持着对立和紧张局势，争端从未间断。时至今日，世界各地仍有许多人在牺牲生命。

在亚洲，日苏之间的重要问题是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为了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解决柬埔寨问题，我认为包括当事者在内的有关方面今后需要继续作出努力。

另外，为了使汉城奥运会平安无事地取得成功，日本将不惜力量予以合作。

我国在战后制定了以和平与自由为崇高理想的宪法，并坚决表示不再成为军事大国。今后也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可以说，这是打算迎接历史性的新挑战。我们向国内外声明：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我们要坚持这种原则。

我深刻地意识到，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应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大。

我把“建设对世界有贡献的日本”作为竹下内阁的最大目标。至于如何实施这一基本方针，我现在讲一下我的想法——“关于国际合作的设想”。其中要特别谈谈“对和平的合作”。

第一，努力推进外交，以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在过去5年，我同曾就两伊战争问题单独同两个当事国进行过政治对话，不断为建设和实现和平环境作出努力。关于中东和平问题，最近拟派外相去该地区探讨我国可以作出贡献的办法。关于柬埔寨问题，为了使西哈努克亲王寻求和平的努力取得成果，我们准备尽量援助亲王。

第二，要对国际活动进行合作，以便防止发生争端。特别是在防止争端发生方面，联合国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工作。这已写在预定于今年秋天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预防争端宣言”中。我国也要加强援助。

第三，积极参加努力争取解决争端的工作。迄今为止，曾经在资金方面实行过积极的合作。最近特别捐助的2000万美元，预定用于这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要把500万美元用于阿富汗。还考虑派遣人员参加有关方面的适当工作。可以设想的有关工作是指监督选举、运输、通信和医疗。为了和平解决和预防争端发生，建立联合国秘书长与有关国家不失时机地进行联络的通讯网，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加强对难民的援助。我特别要补充一点，为了帮助阿富汗难民自发地返回自己的家园，我们准备实行合作，其中包括在财政方面提供实际的援助。

第五，在援助复兴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国不仅要在资金方面，而且要在人员方面作出贡献。为此，要利用日本国民的经验，要发挥日本国民的干劲。

从宇宙看地球，地球是全体人类唯一的故乡。必须把这个行星从大规模破坏性兵器可能造成的毁灭中挽救出来，必须把它从不间断的争端和政治对立中解放出来，以便使人们切实地感到这颗行星是自己的真正故乡。

现在，正是我们应该坚持把销毁核武器进而实行全面彻底裁军作为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的时候。为了使地球上不再存在受战争、饥饿和疾病折磨的人，为了把世界建设成一个富裕而和平的世界，让我们互相携手前进吧。

译自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6月1日

晓宇 译 江兰 校

本篇是布特罗斯-加利在日年瓦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演讲词。

**1995 年裁军方面出现真正的真体进展
将是联合国献给世界各国人民最佳的周年纪念礼物
1994 年 1 月 12 日**

我认为有必要在 1994 年初召开一届咨询委员会会议，这有两项理由。第一，我们需要回顾过去的一年，需要评价各会员国在大会第 48 届会议期间对裁军发表的意见。第二，我们必须展望未来，规划前程。我们必须努力给裁军带来新的生命、新的活力和新的紧迫感。

今天，我征求各位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我将提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需要用到各位的专长和细节知识。重要问题有以下三个：

——哪些是关键问题？

——1994 年及以后国际社会裁军议程上应列入哪些项目？

——哪些新概念和新方法可用来使裁军辩论一体化、全球化并且重新获得活力？

18 个月以前，我发表了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和平纲领》。其中我就联合国应付冷战后时代对和平与安全的挑战的一些方法提出了建议。随后，我在题为《冷战后时代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中具体讨论裁军问题。《和平纲领》和《新层面》都受到广泛的讨论和辩论，这一进程仍在继续。

现在人们已就需要预防危机一事达成了新的共识。人们新近认识到，在国际冲突中预防胜过治疗，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方法必须与裁军努力相结合，成为裁军努力的一部分。这需要各种各样的危机管理方法，其中包括预警、收集和分析资料、事实调查和其它形式的建立信任措施。建立信任措施是军备控制和维持和平的关键一环。

综合办法的优点是否已得到充分了解和赞赏？我们是否应更努力地宣传我们的目标，提出新的想法？执行和平这一概念仍未得到会员国的一致接受。裁军工作是否能从联合国在伊拉克、索马里甚至萨尔瓦多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毫无疑问，世界仍然危机四伏。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常规武器仍然存在。各国面临一系列新的威胁，包括族裔和宗教冲突、环境恶化和城市退化，以及穷国特别是非洲的贫困和动乱。这些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流血，并给冲突火上加油。

其后果之一便是常规武器的扩散。在许多国家，军事开支继续耗尽本可用于人民真正需求的资源。设立“常规武器登记册”是一大进步。这将有助于使军事行为更能预测，并将加大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我高兴地看到，所有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和接受国在登记册生效的第一年都提供了资料。当登记册的规模扩大，列入国家武器储存和生产情况时，将会更加有效。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感到满意。武器出口管制和转让透明化的一项作用只不过是遏制扩散而已。

下一步应是设立区域常规武器登记册。其长处是把各类武器登记在册，以反映该区域对安全的关注所在。其目的必须是减少武器储存，使存量降至与各国真正安全需求相称的水平。联合国对于常规武器一直有许多主张。难道在此领域采取一些可以核查的切实措施的时机还不成熟吗？我们需要有更

多的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在区域一级。

例如，我完全支持中非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这是一个由 11 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它们的互不侵犯条约应成为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典范。我期待着各位拿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关于常规武器扩散问题，我们不应忽略南北差异这一更广阔的范畴。例如，在军备生产和技术领域，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这就是不安全感的症结所在。必须以某种方式弥合这一差距。有些捐助国十分关注常规武器的扩散，因此以发展援助方案为手段，影响受援国的军备开支。当发展中国家的军备开支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比例时，它们便压缩外来援助。但是，其中一些捐助国目前正出口对其军事需要或军工生产来说过剩的武器。换言之，它们一方面鼓励限制军备开支，另一方面又鼓动军备采购。

怎样才能结束这一不合理现象呢？就核裁军来说，在座各位都同意，冷战结束并没有消除核武器的危险。相反，在有些情况下危险事实上有所增加：指挥和控制问题，武器系统的衰耗，这是我们面临的两个新的挑战。核事故仍可能发生，令人胆寒。们是在此方面，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裁军谈判会议授权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这是在国际安全的一个最关键的领域里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我热切希望，谈判将尽快成功。核扩散是另一个亟需取得进展的领域。在筹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会议之际，非常需要创造相互信任的气氛。现在必须采取措施来创造这种气氛。

继续暂停核试验能起很大作用。落实“停止”生产核裂变物质的主张也会有帮助。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各国普遍加入《不扩散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保障措施必须进一步加强。阿根廷和巴西与原子能机构签署的协议是向前迈出的正确的一步。我坚决赞成非洲无核武器区计划。我敦促有关各方摒除成见，以更大的勇气和想象力来解决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问题。

必须消除使无核武器国家发展核武器的诱因。必须使违规者明白，只有恢复遵守条约规定才最符合它们的利益。需要有明确的远见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在 1992 年 1 月 31 日举行的历史性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宣布：“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关于《不扩散条约》，安全理事会成员承诺采取适当措施，努力“防止与研究和生产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技术的扩散，并为此采取适当行动。”

我在“新层面”中继续讨论这个主题。我指出，“问题是如何把不扩散的道理变为协调一致的行动。”上个月，我访问了东北亚地区，那里对核扩散的危险极为关切。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签署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我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我的看法，国际社会将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退出《不扩散条约》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再次呼吁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遗下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核设施都必须接受国际核查。

在这方面，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条约》和就拆除其境内一切核设施问题进行谈判的决定是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议一旦签署，将能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得到加强。

我希望听取你们对获得新技术问题的意见。在冷战期间，发达国家限制

获取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两用技术。安全理事会赞同这个做法。但并不是所有会员国都相信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这个领域中，也需要取得进展，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多边谈判能尽快开始。一个目标是，最终用令进口者更为满意的安排来取代现有的出口管制制度。

这个领域中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有限核查制度，这个制度或许可以与原子能机构的制度相似？如要切实有效，这一制度将须取决于接受国同意限制使用以及核查。供应者是否愿意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与此同时，供应者现行制度是否有改进的余地？能否把每种机制中好的方面结合在一起？最后，联合国应起什么作用？

当然，这个题目将要在下月举行的技术和武器转让国际会议上讨论。会议将由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设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合主办。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给与会者提供一些思考的材料。

我在《和平纲领》及许多讲话和声明中都明确指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由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共同承担的任务。在裁军方面，裁军问题“全球化”意味着——也许有些自相矛盾——更多的工作应由区域组织来承担。联合国将继续起主要作用。但区域组织的作用怎样才能加强呢？

最后，我希望听取本委员会对裁军机构的意见。在“新层面”中，我要求重新评价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目前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我知道，总的说来，会员国对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议程和工作方法上进行的改革感到满意。本委员会对裁军机构——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和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工作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会受到我本人和联合国秘书处的重视。

最后，我要向裁军研究所、特别是研究所主任洛德格尔德先生致意。当然，你们是裁军研究所的董事会。我高兴地认为你们全体都与裁军研究所做的出色工作有关。我知道，明天将向你们通报最近活动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会对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范围留下深刻印象。

我早先在讨论《不扩散条约》时曾谈到 1995 年。1995 年将是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希望到那时我们在裁军方面将取得真正具体的进展，这难道期望太高吗？我想，这是对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最恰当的赞礼。我认为这是联合国送给世界人民的最好的周年礼物。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希望。

四、联合国与国际人权

导言

国际人权是联合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势力肆意践踏人权和凌辱弱小民族的罪恶行径震惊了国际社会。一切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从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践踏人权的行为是对整个人类的浸害，国际社会有责任确立人类的普遍原则，建立人权的国际保障机制，从而永远杜绝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

针对法西斯国家给全世界人民造成的空前灾难，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称，为在它们本国以及其它国家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维护人权与正义，必须对其敌国取得完全的胜利。据此精神，《联合国宪章》庄严地重申了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把“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宗旨。1946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人权委员会，作为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主要机构，同时，联合国的其它机构的活动也同维护人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50年前创建的联合国揭开了世界人权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联合国先后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12月）、《联合国人权公约》（1966年12月）、《发展权利宣言》（1986年12月）和其它有关人权的宣言、公约、议定书等共约70项，其中涉及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有30多项。

大体说来，个人人权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人身安全权，工作权、受教育权、享有社会保障权等；集体人权包括大小国家平等权、民族自决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保护妇女、儿童和其它易受损害的群体，受益权，和平权和发展权等。

多年来，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成绩应该得到肯定，但与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相比，尚有很大的距离。由于联合国在本质上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集合体，该集合体的成员国都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各成员国关于人权的理论和观念分歧很大。东西方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时就已开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把民族权利列为基本人权、把发展权纳入人权的立场持有异议，对别国本属内政的问题恣意夸大、横加指责。所有这些，使国际人权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必须指出的是，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各国国年管辖的事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中国一贯重视人权，并为积极支持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了应尽的努力。中国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同时也认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人权的基础、前提和核心乃是平等。在一国之内讲人权，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国际大家庭里讲人权，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

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人权观的多样性和有关法律的多样性。联合国目前的185个独立主权国家，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实行人权普遍性原则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有所不同。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尽管自己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却处处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把自己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标准强加于人。乏有甚者，它们时时将人权用于政治目的，这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是为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所不容的。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再抛出反华提案，均因多数国家的反对而未能得逞。这充分证明，以人权作幌子推行强权政治的时代已成过去，各主权国家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正在取得成就，中国所坚持的人权立场必将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选收了在联合国讲坛上关于人权问题的一些发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发言。中国代表们在联合国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说，义正辞严、立场鲜明，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关于人权问题的价值观标准，亦表达了当代人类对人权问题所赋予的先进而文明的观念。围绕人权的活动创造出一个团结互助、负责任的国际社会！

本篇是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人权日的讲话。

让《世界人权宣言》的言词真正变为现实

1974年12月10日

今天的人权日标志着联大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已26周年了。该宣言为联合国宪章的决心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因为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之信念以及男女平等权利之信念”。

这些不仅仅是言词。它们对于创造一个能实现和平与人的尊严的世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我们知道离实现我们的目标还有很长折路要走。尽管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不能容忍2/3的人类生活在贫困之中的情况再继续下去，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被剥夺了过一种有成果、有益的人生的最基本的人权。

1974年，联合国努力制订食品和人口战略，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1975年的国际妇女年，将处理世界人口的一半——妇女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和困难。联合国也将继续努力消灭种族歧视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对个人的非人道待遇。

让我们再次努力，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美好言词真正变为现实吧！

译自《联合国记事》1974年第11期

王寅通 译 王德华 校

阿布杜拉齐兹·布尔弗里卡，阿尔及利亚前外交部长。曾在阿尔及利亚大学文学系学习。1954年参加民族解放军。1959年任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62年后历任青年、体育和游览部长、国民议会议员、外交部长、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解放委员会主席、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主席。1974年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本篇是他在联合国人权日的讲话。

人权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宝贵

1974年12月10日

26年以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但毫无疑问，国际社会仍未医治好最近降临全人类的空前灾难的创伤。人的价值和精神价值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在需要扫除危害这种价值的放纵与野蛮的今天，人权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宝贵、神在联合国历史上，《世界人权宣言》将继续是光辉的一页，是联合国最崇高、最宏伟的成就之一。该宣言反映了基本的人的志趣，同时表达了切望世界兄弟般的和睦相处，并坚信人类的智慧。《宣言》所深刻体现的原则是，每个男子或每个妇女为了确保过上幸福生活，必须能够发挥其最大潜能以参与社会进步事业，并有权申述其要求。

当今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不仅政治体制在发生剧变，而且我们地球上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是科学技术把人从长期束缚它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不幸的是，它们也提高了——我也要讲——更完善了损害人的个性和正直的工具，同时又限制其基本自由和个人权利。

可是，属于同一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又残留着严重和最不可容忍地侵犯《宣言》的原则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应该提到的与此息息相关的是，异口同声地一致谴责种族隔离，还没有能成功地打倒那种既贬低执行《人权宣言》者而同时又向整个国际社会遮盖其耻辱的体制。

今天在庆祝联合国人权宣言26周年之际，我们有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认，则今发展中的国际体制无法保证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人的压迫，总是预示着国际秩序遭到破坏，所以让我们这样行事：年复一年地回复到传统上这个最崇高的原则，下定决心每天始终不渝地努力确保宣言的贯彻执行。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11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王洁尘、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会议的发言。

对有关人权的决议草案中关于国际
上人权遭受大规模侵犯的根源问题的解释性发言

1979年11月9日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认为，L—15 修字 2 号决议草案基本上反映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建立新的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维护民族的、人民的以及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正当要求，因此，我们表示赞成。但是这个决定没有指出霸权主义是当前造成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重要根源，我们对此有所保留，并再次阐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或地区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它们对外侵略扩张、压迫甚至灭绝其它民族，对内则实行专制统治、压迫本国人民，构成了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已经是众目共睹的。联合国有关机构审议人权问题的时候应当面对这种现实。中国代表团要求将我的这段发言列入本委员会会议的正式记录。

谢谢主席先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79年，第134页

黄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本篇是她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友言

1977年10月19日

主席夫人：

关于制定《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问题，已经讨论许多年了。中国代表团在不同场合已多次阐述过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扼要地重申自己对有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我们一贯认为：妇女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妇女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广大妇女直接和间接地参加，都是不可能完成的。长期以来，各国被压迫妇女为了争取解放，同其他被压迫人民一道，前仆后继，英勇斗争，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前进，也推动了反帝、反殖、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妇女群众日益觉醒，广大妇女已经形成为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的妇女仍然处于无权地位，受到种种压迫、剥削和歧视。在一些国家中，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妇女和男人有同样平等的权利，但在实际上这些权利都形同虚设，根本得不到保障。

妇女在每一个国家中，是整个民族和人民的一部分，妇女的命运总是和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和国际妇女运动的经验证明：妇女确实存在着某些本身的特殊问题，但从根本上讲，妇女解放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整个民族的解放，劳动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在未独立地区，还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在所谓发达国家，广大妇女的实际处境，都说明了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例如，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部非洲、整个人民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如果不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求得民族的解放，妇女怎么谈得上解放呢？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妇女，如果不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超级大国在中东进行的争夺，不收复失地和恢复基本的民族权利，即使妇女和男人有了平等的权利，也仍然同样是处于被侵略被威胁和被奴役之中。在已经取得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如果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侵略、颠覆、控制和掠夺，那么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就会受到损害，民族经济就会遭到摧残；而如果自己的国家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妇女要求“同男子平等地参加发展”也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主观愿望，妇女就业、教育、保健等问题当然也无法解决。在第二世界国家中，劳动妇女不仅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遭受垄断资本的剥削，而且也面临着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和军事威胁。不反对霸权主义，就谈不到“和平与安全”，妇女权利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这就说明：妇女要争取解放，就必须和全体人民站在一起，首先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斗争。解放了民族，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妇女自己。如果离开了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共同斗争，孤立地搞女权运动，妇女的权利也会落空的。因此，在制定《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时，有必要把动员广大妇女投入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作为妇女运动的首要目标和首要任务。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争取到某些法律条文上有利于妇女的规定，这些规定也不能完全或完全不能兑现。

目前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草案，经过多次研究和修改，在序言中包括了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等正确主张，也包括了许多改善妇女地位和工作生活状况的条款。这些我们都是赞成的。但是，不能不指出，中国代表团的一贯主张和上述基本原则立场在目前的草案中仍未能得到充分反映。另外，在修改后的草案中还仍旧保留了一个超级大国所塞进去的货色，把所谓“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裁军”作为妇女取得各种基本权利的前提条件之一。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中国代表团在 62 届经社理事会上曾经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正在疯狂扩军备战，与此同时却又竭力鼓吹“假裁军”，以美好的“和平”词句制造虚幻的安全感，企图麻痹广大妇女和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的革命意志，其目的就是要把妇女运动引入歧途。对此，中国代表团一向是坚决反对的。

鉴于上述原因，在《公约》草案提交表决时，中国代表团将不参加投票。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77 年，第 113—116 页

米国钧，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1940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毕业于东北工业大学。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处长、天津市委副书记、国家科委副局长、驻奥地利商务代表、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驻斐济大使、驻联合国副代表。本篇是他在联合国难民署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

解决难民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1982年11月16日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保罗·哈特林先生对本项议题所作的介绍。他的介绍和秘书长的报告对本项议题的审议是很有益处的。

许多代有对补编第12号和12号A文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和难民署一年来的工作作了评论。中国代表团认为，从现实情况考虑，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是一项有意义的重要工作，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事处人员对此作出了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主席先生：

当前大量难民遍布世界各地。难民问题举世关注。解决难民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当前世界难民问题有两大特征：其一是，短期内难民大批涌出。这里说的大批，不是成千成万，而是成十万，成百万。特别是1979年以来发生的南亚、印度支那的大批难民的涌出是历史上罕见的。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武装侵略和占领，几百万阿富汗难民外流到邻国，仅流落在巴基斯坦的就有270万之多。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侵略扩张行径使得印支三国在短短几年内产生了100多万难民。在非洲集中了世界难民总数的一半。拉丁美洲这几年也发生了大批难民外流的现象。其二是，难民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难民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本来经济就比较贫困，大批难民的涌入给他们增加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500多万非洲难民分布于20多个非洲国家，多数属最不发达国家。南亚、印度支那和拉丁美洲难民也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上述两大特征是我们当前研究和制定解决难民问题的政策的重要依据。

主席先生：

无论从物质救济还是国际保护方面来说，都必须继续强调国际分担的原则和发扬国际合作的精神。难民问题是人类的不幸，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是国际社会的义务。那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给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了临时避难所，并从物质救济和道义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事态表明，国际社会向难民提供救济的慷慨性和果断性还需要加强。1982年方案经费截至9月底还短缺6000万美元，现在仍未筹齐。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个别经济大国至今对难民署援助难民计划以及援助难民的国际认捐分文不出。

在加强难民的国际保护方面，近年来做了一些工作。难民署执委会每届会议之前都举行国际保护全体小组委员会会议。此外，还召开过一些国际保护问题的国际讨论会。在防止难民遭受海盗袭击方面也作出了某些具体安排。两年来又有安哥拉、玻利维亚、乍得、埃及、日本、肯尼亚、莱索托、菲律宾、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和中国等11个国家加入了《1951年难民地位

公约》和 1967 年的《议定书》，使缔约国的总数达到 93 个。这些都是加强国际保护的积极步骤和成果。但是，在具体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实际困难，有待克服。

在大批难民潮水般涌来时，第一收容国或临时避难国是根本无法按照通常的秩序来确定其地位的，有的连登记姓名都难以办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第一收容国和临时避难国往往不具备长期安置难民的条件，而其它国家，特别是难民自愿选择去安置的一些国家，这几年给难民提供重新安置机会的热情显然有所下降。因此，许多要求去第三国安置的难民长期停留在难民营里，无法实现愿望。甚至连要求去第三国实现家庭团聚的难度也在增大。

近两年来，国际保护方面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的难民营遭到了野蛮的军事袭击、轰炸甚至大屠杀。在泰国、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多次遭受难民制造者的武装骚扰和袭击，在安哥拉的纳米比亚难民营多次受到南非军队的轰炸。不久以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竟然发生了惨不忍睹的血腥大屠杀。对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不能不进行最严厉的谴责。

关于难民署保护对象的范围问题，我们赞成采取既现实又灵活的做法。在有些情况下，如在非洲发生的某些情况，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难民署只能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主席先生：

难民署章程规定其工作是非政治性的。我们无意要求难民署去介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但是，正如高专先生所说，“难民问题从定义上说就是政治问题”。对国际社会来说，不从根源上着手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难民问题的。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请看看现实吧：一边是国际社会尽各种努力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解除难民的苦难，另一边是难民制造者源源不断向外输送难民；一边向难民提供救济和保护，另一边却冲着难民营开枪打炮，进行轰炸和屠杀。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社会只管对罪犯的受害者进行救济而不对罪犯加以惩治，那么这个社会是真正人道的和主持正义的吗？很明显，强调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不但不会降低救济难民工作的人道价值，反而会增添它的光辉，是更崇高的人道主义。

谢谢主席先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2 年，第 128 131

本篇是米国钧在联合国召开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上的发言。

谈谈反对种族主义的问题

1983年10月12日

主席先生：

首先，我祝贺你和你的同事当选本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我相信，在你和你的同事的指导下，本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

现在，我就议题 82、83 和 87 发言。

我感谢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主席和秘书长以及人权中心主任的介绍。他们的介绍对我们的审议工作是有帮助的。

主席先生，这三个议题都与反对种族主义事项有关，核心是如何在国际范围内推动向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进行战斗，最终在地球上消除种族主义，实现《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提出的宗旨和目标。

让我们回顾一下多年来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发展，特别是联合国大会 1973 年确定“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 10 年”以来的有关情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非洲大陆的人民向旧殖民主义势力和种族主义势力不断发动进攻，取得胜利，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势力节节败退。英雄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人民经过长期奋战，终于砸碎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枷锁，获得了民族的解放，赢得了国家的独立。这三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大大改变了南部非洲的面貌，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传统势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与此同时，联合国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各种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联合国开展了“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 10 年”活动，制订了《行动 10 年方案》，规定了根除种族偏见、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结束种族主义政权等项目标，并拟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和措施。1978 年又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所有这些对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有力的支持。

我想在这里谈谈今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会议。在联合国“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 10 年”的最后一年举行第二次世界会议，回顾“10 年”的活动情况，总结“10 年”中的经验，制订国际社会今后进一步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具体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与会各国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对在会上出现的问题持各不相同的立场，从总的看，会议已经取得的成果是积极的，具有重大的意义。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并建议本届联大宣布第二个“10 年”。这些都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各地尤其是南部非洲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以及其它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是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在今后反对种族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这种共同努力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推动我们的斗争前进，直至实现《行动 10 年方案》规定的最终目标。

上述回顾显示，不论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来看，还是从联合国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 10 年”来看，国际范围内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有成效的，这一斗争代表了人类进步的要求，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种族主义势力

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腐朽力量，日益走向没落。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贯彻执行情况，如果我们按照《行动 10 年方案》规定的最终目标和两次世界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来对照现实，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还远远不能止步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国际社会在反对种族主义这个领域内还面临着严重的任务，要走的道路还是坎坷不平的。因为种族、肤色或人种的歧视，在臭名昭著的南非严重存在，在其它某些国家也还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种族主义势力同任何没落的反动势力一样，越是临近没落，就越加残暴和狡诈。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南非当局实行的最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大肆逮捕甚至杀害反对种族主义的爱国志士和黑人领袖，目前，南非监狱里囚禁着几十万黑人群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于参加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正义斗争而被逮捕的，其中许多人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和其它非人道的虐待。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玩弄“改革宪法”、制订“种族关系法”等欺骗手段，搞假改革，力图使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合法化、永久化。此外，南非当局还把它种族隔离政策扩大到纳米比亚，千方百计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妄图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纳米比亚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到了剥夺。南非当局还对非洲邻国发动军事袭击和入侵，妄图威胁前线国家放弃支持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南非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严重地威胁了南部非洲地区和整个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和广大主持正义的国家对此进行强烈的谴责并要求时其实施制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为了维护它们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一个超级大国对南非当局百般纵容，多方支援，成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靠山；一些西方国家也对制裁南非采取消极态度。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至今还如此嚣张，就是因为它不断得到国际上某些势力的支持和援助。

还应当强调指出，以色列当局在中东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判夺了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在其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残酷镇压和百般歧视阿拉伯居民。不仅如此，它还长期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相勾结，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进行包括所谓“核合作”的冒险，这是国际社会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为了更好地实现《行动 10 年方案》的目标，中国代表团认为，当前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一方面要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研究和分析这个问题，找出它的根源，从而根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另一方面，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如南部非洲存在的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必要的优先措施，及时解救那些受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迫害最深的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们。本此，中国代表团支持第二次世界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并强调以下各点：

（一）南非当局推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二）南非当局应该立即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实现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

（三）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义务，普遍严格执行联合国有关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一切决议和决定：

(四) 呼吁各国，对正在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前线国家，加强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和援助；

(五) 敦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立即停止对南非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和援助；

(六) 呼吁联合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

(七) 呼吁各国普遍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加强国家立法，扩大宣传教育活动，彻底消除对有色人种、移民工人、土著居民等的任何歧视。敦促尚未批准或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国家尽快批准或加入。

主席先生，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非洲和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积极支持联合国开展的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活动，严格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坚决执行不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发生任何关系的方针。中国已经成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已经并将继续认真贯彻公约规定的各项条款。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在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选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3年，137 142页

陈士球，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三（人权）委员会代表团代表。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增进人权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问题

1983年11月10日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就第100项议题发表一些意见。

本项议题列入议程以来，联合国范围内就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讨论，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1977年第32届联大通过的32/130号决议和近年来关于发展权问题的研究。

32/130号决议概括了联合国系统内处理有关人权问题的应当考虑的一些概念，正确地指出，危害最严重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问题是由种族隔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侵略，对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威胁，以及拒绝承认民族自决和各国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行使充分主权的基本权利等状况所造成的。因而联合国系统内处理人权问题时，应把这些大规模侵害人权的事情作为优先事项，或继续作为优先事项，来寻求解决，这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的现实。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处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之下的人民至今还在过着非人的生活；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和自决的权利迟迟不得实现；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生存权利和一切基本人权至今不得恢复；军事占领和侵略别国的事件时有发生；柬埔寨、阿富汗至今仍被外国军队占领着，其独立和主权受蹂躏，自决权利被剥夺，无数平民生灵涂炭，千百万百姓家破人亡，沦为难民；许多饱受苦难的难民逃到异国的难民营里仍然免不了杀身之祸，轰炸袭击难民营和屠杀难民的事件屡次发生。所有这一切不仅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构成了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自决和一切基本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最粗暴、最惨无人道的违反和破坏。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应当把处理此类人权问题放到最优先的地位。

主席先生，32/130号决议还指出，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继续存在，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构成主要障碍，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有效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必要因素。

大家记得，在通过32/130号决议的同一年春天，第33届人权会议通过了第4(XXX)号决议，规定人权委员会参照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把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来研究。从那以后，人权委员会及其下属的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对发展权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理论、国际法 and 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权委员会负责研究发展权问题的政府专家工作组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已经进入了起草发展权宣言的阶段，按照第39届人权会议1983/15号决议的要求，政府专家小组应向下届人权会议提出关于发展权宣言草案的具体建议。目前虽然宣言草案尚未完成，但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个概念已经确立无疑。发展权概念的确立是继联大32/130号决议以来，对当代人权概念的又一重大贡献。

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延伸，一个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还不够，如果没有经济独立或没有经济发展，它的政治独立就不能巩固。

一个实现了民族自决权的国家及其人民迫切需要在不受外来干涉和束缚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其经济，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鉴此，发展权的实施不言而喻地要以实现和维护民族自决为前提。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国家人民的自决权利不能实现，他们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统治下处于无权的地位，或者，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占领，民族自决权被践踏和剥夺，在上述任一情况下，有关国家、民族和人民就根本不可能享受什么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只有摆脱外国统治和外国侵略、占领，只有取得民族独立，获得或恢复国家主权后，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发展权才能得到保障。

发展权是一项人权，有它的普遍意义，它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人民都有效。然而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那些仍然处于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权。这是因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包括受现有不公正国际经济关系束缚的原因，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或者根本不可能，或者受到极大的阻碍，它们的发展权遭到了不应有的剥夺和限制。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发展权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发展权宣言能早日诞生。我想，这也是本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愿望。

中国代表团认为，在本项议题下对上述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是完全必要的。在本项议题的辩论过程中，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建议，本代表团愿听取更多代表的意见，予以研究。

选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3年，第133 136页

本篇是米国钧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上的发言。

人权就是发展权和民众参与权

1984 年 5 月 16 日

主席夫人：

首先，我国代表团感谢人权中心副主任尼亚米基先生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所作的介绍性发言，并愿就这届会议所涉及到的几个重大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作为优先项目审议了“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境内人权遭受侵犯问题”、“南部非洲人权遭受侵犯情况”以及民族自决权议题下的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主持正义的决议和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许多代表团的发言和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再次强调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是当代造成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民族自决权的主要原因，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联合国重点关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上，以色列当局在中东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南非当局所顽固坚持的种族主义政策和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外国侵略势力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非法入侵和军事占领再次受到了强烈谴责；某些长期不顾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而一味支持纵容以色列和南非当局的国家的错误立场再次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批评；巴勒斯坦和广大阿拉伯国家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要求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南部非洲黑人群众反对种族压迫的正义斗争，以及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反对外国军事占领和争取民族自决的正义斗争，再次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成员国的同情和支持。我国代表团认为，人权委员会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伸张了正义，主持了公道，维护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本理事会对此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必要的支持。

这里我想提请理事会注意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通过的第 1984/12 号决议，该决议执行条款第八段建议：“经社理事会 1984 年第一届常会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柬埔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尤其是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我们认为：这一建议应该引起理事会的充分重视。大家知道，一年来越南当局仍不执行联大有关决议，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最近以来反而加紧在柬、泰边境地区发动军事进攻，袭击居民区和难民营，炮击泰国领地，致使许多群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涌入泰境。针对这种情况，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要求本理事会继续对柬埔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表示关切，是完全必要的。我国代表团将支持马来西亚大使阁下介绍的提交本理事会审议的 E/1984/C2/L2 号决议草案。

人权委员会第 40 届会议报告书第一章提交本理事会审议的第 XIV 号决议草案，要求设立一名特别报告员，负责调查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建议应该得到本理事会的重视，并相信它将得到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支持。

二、关于发展权和民众参与权问题。大家知道，发展权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战后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

序，独立地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强烈愿望。我们相信，发展权概念的正式确立和不断完善，不仅将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国际人权概念的内容，同时对促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也具有现实意义。主席夫人，我国政府对发展权问题的看法和某本主张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在人权委员会已作了多次阐述，在此我不准备就这个问题再重复我们的意见。我国代表团仅想对发展权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提出一点希望。我们注意到负责起草宣言草案的政府专家工作组第六、七两次会议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迄今没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十分关切。我们强烈希望本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能够采取进一步措施，大力支持专家工作组的工作。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呼吁有关国家在工作组内采取合作立场，以促成发展权宣言草案的早日诞生。

关于民众参与权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它是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支持南斯拉夫以及其它国家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同时，我们希望理事会能够支持人权委员会就此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

三、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就人权委员会审议议题 12“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和其它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侵害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目前在人权委员会议题 12 下受到公开或秘密审议的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趋势应该引起人权委员会的注意。我们认为，联合国在受理秘密人权来文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审查来文的可靠性。在这方面，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应当切实负起责任。只有那些证据确凿的、连续性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才能提交人权委员会审议。人权委员会在正式作出审理一国人权问题的决定之前，应当认真听取包括当事国在内的广大成员国的意见，不应草率从事。对待这个问题，我国的基本立场是：我们赞成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同时，我们也反对借口“保护人权”来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只有这样，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才能得到维护。

选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4 年，第 21 24 页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人权日的讲话。

人权是一个全球关切的问题

1985年12月10日

今年，紧接着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就是人权日。在评价联合国的成就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是人类进步和实现宪章目标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今年我同世界各国许多领导人的接触也肯定了这一点。明白事理的人，对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以使人类大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上自由和尊严的生活这一目标，是不会有有什么异议的。

指出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即只是在本世纪，并主要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促进人权才受到了重视，成为一个全球关切的问题。但是，把对原则的尊重变成普遍的实践，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每当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时，这一挑战就显得愈加紧迫。

差不多全世界都对当代人类社会仍然存在着早该结束的种族歧视表示愤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种族歧视的极端例子，已造成了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在那个经受冲突折磨的国家里，只有通过所有有关各方之间的开诚坦率的对话，才能避免这个可憎的制度进一步造成痛苦。

遵守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人权宣言的原则以及继人权宣言之后制定的各项文书的责任，主要在于各国政府。但我们应当承认，在促进尊重基本权利方面，个人作出的努力也起着重要作用。世界人权宣言在这方面赋予“每个人和每个社会机构”以其本的作用。宣言要求他们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宣言所列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能够造成促使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国家的和在国际的渐进措施的气氛。因此，为维护人的尊严而进行的斗争，意味着要让人民普遍知道他们享有不容剥夺的权利。

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个人在促进人权领域无私无畏地作出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我们听说过他们的成就，但我们也知道他们面临的困难，他们在为促进人权而斗争的过程中往往牺牲了生命或自由。从道义上讲，他们是不应当孤立无援的。因此，人权委员会明年初讨论那些为促进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努力的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的权利和责任问题，是十分恰当的。

在我要求大家支持联合国去完成面前摆着的这一巨大任务的时候，我特别要呼吁那些尚未批准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特别是那两项公约的国家政府批准这些公约。我要促请那些已经批准了这些公约的国家政府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作出实际表示，那就是重新审查它们的法律和制度是否充分，以便确保公约的规定在它们各自的国家管辖范围内得到贯彻。

确保普遍尊重人权，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真心实意去做，也需要在方法的选择方面十分讲求实效。让我们今天重新下定决心，不论有多少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都将以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献身精神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今天，我保证作出最大努力，协助在全世界实现人权。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6年第2期

王德华 译 桃校

科拉松·许寰哥·阿基诺，菲律宾共和国第七任总统。1954年同贝·阿基诺结婚，当家庭主妇。1983年其丈夫从美国返回菲律宾时在机场遭暗杀。此后，她积极投身反对马科斯政权的政治活动。1986年2月出任总统。本文是她在第4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会上的讲话。

要赢得自由，必须依靠自己

1986年9月22日

联合国有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许多同家的新的领导人同我今天一样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这一讲台。我们取得政权以实现联合国所代表的种种理想。我们从一个早已丧失了人民支持的政府的压迫和腐败统治下解放了我们的人民，恢复了人权。然而，同以前的许多领导人一样，我不得不说，我们是依靠了自己取得胜利的。正是菲律宾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在选举中不怕威胁，反对欺骗；在别人窃取胜利果实的时候，数百万人成群结队走上街头夺回胜利果实。

事实上，当我国在一个肆意践踏我国人民权利的政府的统治下流血的时候，这一政府领导人的夫人还在这一讲台上虔诚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人道的秩序——当时正有数千名菲律宾人沦为政治犯。在那一专制政权行将垮台的最后几个月中，是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表达了国际的声援，他们坐在自己的电视机前，关注和欢呼我们的革命。

今年世界许多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自己的人权而斗争。在这样的时刻，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提出切实中肯的意见。我想借此机会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介绍如何实现革命的亲身经历。

我的基本结论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自由，可以有效地呼吁实现联合国组织等机构建立的国际人权准则，但要最终实现这些权利，要赢得自由，就必须依靠自己。

联合国不干涉各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显然，就防止践踏国家独立主权问题而言，这一规定是明智的；但是，这也导致产生了虚伪，联合国大会的价值在于我们各会员国言行一致。我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其它国家的事务时表现出现实主义和关切，现实主义就是不要作出我们无法兑现的承诺。

我们应当承认菲律宾人民所学习到的东西，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被压迫人民自己的行动。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决不能允许那些口头上宣称某种行为标准、但在国内却另行一套的人利用这个讲坛。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联合国决不当成为只允许一种思想模式存在而排斥其它思想的俱乐部。因为那样将会损害它最初的宗旨，即维护一个不甚完美的世界的和平。

治理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方法：但是对待人民却只有一种方法，即要体面地尊重个人的个性。只有我们这些担负领导责任的人都能够尊重我们的同胞和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实现抱负的基本权利，我们才能够在联合国这里挺胸做人。

如果联合国打算以一种政治体制为标准来判断另外一种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它将会丧失所有的目标。但是，如果联合国不注意各国政府怎样对待它们本国人民的话，联合国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我仅需要在这里回顾一下联合国宪章中的令人振奋的话。联合国是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如果它

没有对人民尽责,那么联合国和它最腐化、最专横的会员国又有什么两样呢?即使是从对于各国十分突出的外交的角度来说,它也不能对国家应该怎样对待人民的问题掉以轻心,否则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受风险和窘困的被动局面。

因此,作为一个今年已经达到自由和美好的国家的领导人,让我再次在这里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竭尽全力维护的事业,即和平、自由、尊严和人类和睦。但是,也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告诫那些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人们,不要依赖别人去争取自由和尊严。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和我们一起战斗,这使我们菲律宾人民的决心更加坚定。在他们的电视和报纸上可以看到,他们在继续进行我们菲律宾人民所经历过的斗争。此外我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争取我们曾为之而奋斗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明文记载于——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些权利并没有被葬送——联合国的各种公约之中。我们绝对不能抹煞这种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孤立的。

人民必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菲律宾人民已经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对别人恩赐给自己的解放也感激涕零:在 1898 年,一次解放的成果被人很快地出卖了;在 1946 年,另外一次解放运动也很快毁于一旦。但在今天,当菲律宾人民感受到了自己打碎枷锁的喜悦以后,我认为每一个菲律宾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只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解放。

只有内心向往主权并在实际行动中为此而奋斗的民族,才能赢得并维护他们的独立与自由。这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结论。因为,此外我还相信,一个团结战斗的民族是任何政府所无法抵抗的。这样的政府可能拥有枪、打手和黄金。但是,正像我们在菲律宾所看到的那样,任何政府决不可能阻挡一个决心争取解放的民族。

因此,尽管联合国可能无法进入使被剥夺了主权和自由的民族获得其它国家所能够享受的这种基本权利的斗争之中,但是,它应当非常小心地避免成为那些压迫者的不自觉的伙伴。

我现在要具体地谈一谈本届大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南非的局势。我为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妻子温尼以及所有的南非人民祈祷。我支持你们。曼德拉先生长期被囚禁在监狱中,与他的妻子和家人分离,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丈夫尼诺依·阿基诺被囚禁的情况。

我国和诸如阿根廷——它的总统阿方辛最近访问了马尼拉——等许多其它国家所得到的教训是,任何压迫的行为终将得到报应。人类的价值最终是不会受到蔑视的。它们不会在阿根廷受到蔑视,它们也不会菲律宾受到蔑视。人类的价值在南非也决不会受到诋毁。

为创造在南作进行改革的环境而发挥作用是我们的权利,菲律宾人民将支持国际社会为促进实现南非的和平与自由并对其人民表示声援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如果这个讲坛能够同样注意并采取行动反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压迫以及任何地方人民所遭受的攻击和蔑视的话,无论是公然进行这种行径或是假借人民的名义,那么都将会对解决南非问题有更大的帮助。我不相信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广泛地采取道义行动会对这种行动的力量有所削弱。采取道义行动会加强这种行动的力量,反之,如果对此掉以轻心,则会削弱这种行动的力量。

让我直截了当地向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上百万受害者们、向那些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的家属们讲几句话吧。不要动摇你们的团结,要寄希望于你

们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如果在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存在一种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有利于我们的战术的话，那就是要支持一项能使我们紧密团结的行动纲领。

我一贯坚决倡导和平。也许正是因为冲突的悲剧使我们懂得了和平的真正价值。让我们这些和平的忠实朋友继续抵制利用自己邻国冲突的诱惑。我们东盟各国懂得这些目标的重大意义。我们东盟的各个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软弱、分裂的危机时期。然而我们中的其它国家，尽管各自的政治制度和信仰有所不同，都没有利用别国这种危机。相反，它们站出来，令人鼓舞地表现出同情，主动提供帮助和调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尊重它们不幸的邻国的完整。

因此，今天我在这里讲话是要使联合国的这一使命更加集中于以下目的，即人们不再为那些子虚乌有的期望而感到失望，那些必须节省力量以用于争取和平与自由的长期艰苦斗争的人们不再感到希望破灭。另一方面联合国将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丝毫未减的价值，并更加注意它们的统一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实现联合国和平、自由、尊严和人类伙伴精神的目标的前景将更有保证。

节译自《联合国》英文稿 1986 年 9 月 28 日)

王惠初 译 叶仁 校

本篇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第 14 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1987 年 9 月 17 日

我们召开特别会议，是为了再次表示联合国广泛承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和独立的要求，我们日益感到迫切需要为纳米比亚问题找出一个公正的和平解决办法。

如果要恢复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就必须立即在人人享有公正和人的尊严方面取得确实的进展。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持续僵局不仅威胁着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还向人们提出了国际行为准则利法律规则的根本问题。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权利是纳米比亚的中心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已被剥夺得太久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这一计划的实施却受到过分的拖延，这是因为有人提出了一些和纳米比亚问题不相干的外部的问题。

通过磋商，有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在 1985 年 11 月已经得到解决，当时在选择制度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因此，在那时候就已要求南非确定停火和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的最早日期。南非作出了反应，提出 1986 年 8 月 1 日作为开始执行这一计划的日期。条件是在此日之前在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的问题上达成一项确定和令人满意的协定。尽管我们一再清楚地表示，安全理事会反对这样的联系，认为这种联系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但是南非坚持这一条件。

在 1986 年 6 月，经过同赞比亚和安哥拉政府及其它能够帮忙的同家政府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磋商之后，我通知南非政府：联合国准备在 1986 年 8 月 1 日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在这一点上，我谈到，安哥拉政府坚决反对上述联系，而这一立场得到前线国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我也明确地表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准备同南非达成停火，以便在 1986 年 8 月 1 日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南非在 1986 年 7 月 28 日的一封信中再次坚持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作为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

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不断地受到阻碍，这不仅延长了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而且也加剧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和不稳定。南非政府必须意识到，种族隔离和破坏稳定的政策以及南非至今一直对纳米比亚推行的行动方针，不仅会对纳米比亚人民，而且也会对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所有人民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我将不遗余力地寻求一项公正和最后的解决办法，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作为一个享有自由和主权的国家在大会里取得合法的地位。

《联合国纪事》1988 年第 1 期

王德华译荣桃校

胡马云·拉希德·乔杜里，1986年9月16日当选为第41届联大主席。先后毕业于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和伦敦大学附属伦敦国际事务学院。1951年进入外交界，曾在意大利、伊拉克、法国、葡萄牙、印尼和印度任外交官。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后，又先后任孟加拉国驻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美国大使。1984年任总统外交事务顾问。1985年7月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部长。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14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

1987年9月17日

南非在纳米比亚解放问题上对联合国的态度常常带有轻蔑鄙视、口是心非，狡黠欺诈的特点。

最近宣布在纳米比亚建立了所谓“临时政府”，表明了南非决心完全破坏和绕过联合国计划，而在该地进行它自己的改革进程，其目的在于确保它对该领土的继续统治。

不幸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仍在继续。……形势已经达到国际社会不能再容忍的地步。我向有关各方呼吁，进行建设性合作来结束这一无法忍受的局势。

在最近几个月里，纳米比亚境内和周围形势进一步恶化，纳米比亚在占领政权的压迫力量之下日益军事化，并受到剥削。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南非恐怖统治的残暴镇压。成千上万的人继续逃离该领地以逃脱殖民枷锁。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在受到南非和其它外国经济集团的掠夺，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在过去一年中，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肆无忌惮地把纳米比亚作为时邻近非洲国家发动侵略和颠覆的跳板。

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是南非拒绝履行它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我希望理智将占上风，南非会在字面和精神上接受第435号决议。否则，南部非洲可能出现进一步的流血和动乱，从而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8年第1期

本篇是布特罗斯-加利在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致的开幕词。

人权是“不可缺少的人类要素”，也是基本价值观念

1993年6月14日

今天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标志着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举世瞩目的珍贵的关键时刻！

1989年联合国大会请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对是否需要召开一次世界人权会议表示看法时，展示了非凡的历史直觉。世界人权会议的筹备工作是配合着历史进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加速发展而进行的。

因此，很自然的，国际社会今天认为有必要审视自己的价值，并在对历史作一番思索以后，反躬自问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本质，也就是说，要探索关于人类的问题以及如何为了保护人类而保护国际社会的问题。

世界人权会议的目标忠实地反映了下列关键问题：1948年制订《世界人权宣言》以来；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

遇到哪些障碍？如何加以克服？

如何增进人权文书的执行？

联合国制订的方法和机制效能如何？

应该为联合国促进人权工作编列哪些财政资源？

在更深的层次上，联合国所追求的目标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包括发展与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都是普遍性的问题，但是无法为其中任何问题找到单一的答案。固然，人权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的，而且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人权中认识到自己。但每一个文化的新纪元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方式以实现人权。在这方面，应该向在区域层面上提醒他人注意到这一事实的会员国表示感谢。

但是，这种提醒应该是积极思考的来源，而不应导致无谓的误解。

从全球的层面上来看，人权使得我们面对“相同”和“差异”、“自己”和“别人”之间最具挑战性的辩证冲突。人权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教育我们：我们是相同的，同时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为了实现我们所宣告并且设法加以捍卫的人权，我们就得超越我们自己，就得自觉地作出努力，超越明显的差异、暂时的分歧、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壁垒，从而找出共同的本质。

总之，我所要慎重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要在维也纳此地讨论的人权，不是所有国家之间的最低共同点，而是我所要说的“不可缺少的人类要素”，也就是说，我们惜以共同肯定我们同属一个单一的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

我无意低估我们这一任务的性质。但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没有时间去寻求审慎的妥协、精当的解决，或满足于抚慰性的宣言，或等而下之地陷入口舌之争。相反，我们必须坚持能够使这些权利真正普遍化的人权概念！

面对上述考验，眼前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将来人们如何评判这一会议的结果，就看我们现在怎么做。

认识辩论的复杂性是迈向制订辩论方法的第一步。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幻觉。关于人权的辩论包含复杂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把人权视为绝对的准绳，

还应该把它视为由长期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综合体：

作为一个绝对的准绳，人权是人类的语言。采用了这一语言，所有各国人民便能了解别人，并且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权，顾名思义，是所有政治学的最终规范。

作为历史的综合体，就其实质而言，人权是不断运行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人权具有双重性质。人权应该表明绝对的、永恒的训谕，而同时又反映历史发展中的某一个时刻。人权既具有绝对定义，也具有历史含义。

我之所以用可能被认为是很抽象的话先作一个原则说明，是因为我认为，除非我们铭记存在于普遍和特殊、认同和不同之间的根本性的辩证冲突，否则我们便不可能就今后几天内所要审议的任何问题——即便是最为技术性的问题——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任务之所以显得特别迫切，是因为随着通讯的发展，全世界每天都能够目睹自由享受人权或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

没有一天不发生战争或饥馑、任意拘捕、酷刑、强奸、杀害、驱逐人口迁徙和种族清洗，没有一天不出现最基本的自由受到攻击的报道，没有一天人们不注视着种族主义及它所滋生的罪行、不宽容及它所酿成的暴力以及不发达及它所造成的破坏！

那些正在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男女和儿童所面对的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忍受。我们都很相近，但是历史却强调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以各种理由——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把我们分隔开来。

不错，我们确已学会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差异，视之为彼此相互补充的源泉。然而，当差异成为不平等的同义词时，就不能不被看作是不公正了！今天，所有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都有这种感觉。这个事实本身便是人类觉悟的一个进步。

这一点尤其重要，即从找出不平等过渡到反抗不公正，只有在普遍确认人权思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归根结蒂，是人权思想使我们从道德上的考虑发展到法律上的考虑，对人类的活动作价值上的判断和法律上的规范。

然而，我们不应自我欺骗！因为判断是建立在这个限制和价值观尺度上的，因此，它也是权力筹码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正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往往以各种手段力图使人权服务于它们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它们变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不容否认，有些国家经常试图绑架人权或是没收人权。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具体指责国际社会的某个成员。我只想强调，人权本身便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

让我们澄清这一点！人权与各国对它们的认识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与各国管理其人民的方式有密切关系。再换言之，与各国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有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不忘记所有这些问题，我肯定，我们将可避免这次会议一开始便在我们面前徘徊的两个危险：一种是怀疑态度的危险，根据这种看法，人权的国际层面只不过是各国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借口而已；另一种是过于天真的看法的危险，根据这种看法，人权是普遍共有价值观的表现，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对这种价值观都自然是向往的。

在我们的整个讨论过程中，都必须牢记这些考虑，以便我们能够大胆地提出建议，坚持我们的原则。

在这方面，我愿庄严呼吁：这次会议应与它的主题一致；它应以三项要

求作为指导，我将它们称为“维也纳会议三要旨”：普遍性、保障、民主化。

我们首先来谈普遍性的要旨。诚然，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人权应与历史相一致，应与历史同步发展，应使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按照自己所确认的形象对自己加以反省。然而，人权与历史进程同步发展的事实不应改变人权的本质，即人权的普遍性！

第二，是保障的要旨。我们每大都能看到，如果我们为保护人权而起草的宣言、盟约、宪章、公约和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或不断受到破坏，那么在全世界人眼中，人权乃至联合国本身是如何名誉扫地。因此，应该有有效的机制和程序，保障和保护人权，并规定制裁措施。

最后，是民主化的要旨。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临近本世纪结束时面对的关键问题。只有在各国国内和国际社会范围内实现民主，才能真正保障人权。通过民主，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各国人民权利和个人权利得到调和；通过民主，各国权利和国际社会权利得以调和。

我愿请诸位认真思考这三项要旨——普遍性、保障和民主化。

普遍性的要旨在我们整个辩论过程中无疑将是显而易见的。也只会是这样的。因力普遍性是人权所固有的。宪章在这一点上是斩钉截铁的：其第 55 条规定，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1948 年宣言的标题——“世界”而不是“国际”，更加强了这一着眼点。

然而，这一普遍性概念还必须为每一个人所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共同的人权概念赖以建立的这个普遍性要旨成了我们之中误解的根源，就会在使用的术语上产生矛盾。

因此，必须以最明确的语言阐明，普遍性不是什么强行地规定的，也不是一个国家集团对世界其它国家意识形态统治的表现。

联合国大会的性质和组成使它最有资格表达这种普遍性的思想，我们应对它已进行了将近 50 年的制定人权标准的工作表示敬意。

由于大会的活动，保护的领域已变得越来越准确：惩治种族灭绝罪，制止种族灭绝，废除奴隶制，禁止酷刑，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种族、性别、宗教或信仰的歧视。

此外，对这些权利的主体也作出了更加明确的定义：人民的权利，对难民、无国籍者、妇女、儿童、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囚犯、被挟迫失踪的受害者的保护，对移徙工人和他们家属权利的保护，和对土著人民的保护。在这方面，经大会一致赞许，作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有关活动的一部分，大会起草了一份普遍性宣言，将在今年秋天进行审议。

联合国大会制定标准的这些工作所产生的一系列文书，现在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它有足够的内容使所有国家、所有各国人民和所有文化得到满足，因为它所申明的普遍性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性。

如果我们对这些文书加以认真研究——世界人权会议让我们有这样做的一个理想机会——我们就可能会发现，大会为制订普遍性的思想做了不懈的努力，对此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

由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案文我们可以看出，从自由派价值观脱胎出来的一般性、抽象的人权观念，在最初被接受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投入又帮助扩大了最初的视野。1966 年的两项盟约证明了我们视野的扩大。它们使我们确认——我愿在此强调这一点——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同样重要，同样值得重视。

当然，我们都知道，大会并未就此止步：它又进一步扩大了普遍性概念，在这些我愿称之为团结互助的集体权利之外，又提出了使我们回到所设想的普遍性的权利，要求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国家和国际方面采取联合行动。自宪章第一条提出人民的自决权以来，大会又宣布了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享有和平的权利，得到粮食保障的权利，拥有人类共同遗产的权利，还有——尤其是发展权。

我认为，特别是最后这项权利表明了普遍性的思想是如何具有现代性，大会在承认这一点上作了很多工作。早在 1979 年大会便申明：“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发展机会平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两者均有的特权”。

这个思想在 1986 年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时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宣言》声明：“人是发展的主体，因此，人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在同一份文书中，大会强调了这项权利对各国提出的相应责任，即彼此相互合作以确保发展的责任，制定国际发展的政策的责任，以及在国家一级确保“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的责任。

我认为，这种对待普遍性概念的态度是正确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应遵循的路线。

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意识形态分歧和经济差距可能继续会是我们国际社会的一个特点，但它们不能影响人权的普遍性。

我认为，现在更为紧迫的不是阐明新的权利，而是说服各国通过现有的有关法律文书并且加以有效执行。

我认为，区域组织在促使各国加强认识这一问题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人权的区域行动同联合国的世界一级行动并不矛盾，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认为，最近举行的一些区域人权会议反映了人们希望坚持普遍性这一概念——无论这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问题或法律方面的疑难。

保障的要旨应当是我们的会议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没有适当的国家和国际机制及结构确保其有效实行，人权算什么呢？这里必须再次指出，维也纳会议决不能流于毫无结果的辩论或无意义的争论。要避免这样，会议就必须讨论国际社会中人权的精髓，并且讨论其独特的性质。

我不得不说，人权，从其性质本身来讲，应排除传统上划分的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那种差别。人权涉及一种新的法律渗透性。因此，不应当从绝对主权或从政治干预的角度来考虑人权。相反，必须认识到，人权需要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协调。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国家应当是人权的最好保证。国际社会应当主要委托国家来保护个人。

但是，当国家不能胜任这一任务时，当它们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当它们非但不是个人的保护者，反而是折磨者时，就必须提出采取国际行动的问题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一种无时不在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流动和世界舆论的作用使有关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的时候。

在这些情况下，国际社会从未能履行其义务的国家把任务接过来，这是一个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法律和制度解释，我认为，它无损于我们当代的主权

概念。我要问问大家，当一个国家公开以世界的良知和法律所拒斥的方式利用主权概念，从而沾污了这一神圣概念的时候。它还有权期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绝对尊重吗？我要说，这是一个毫不夸张的真理，主权成为专制政权用以支持它们侵犯男女和儿童权利与自由的最大理由的说法，早已受到历史的谴责。

另外，我认为，这样界定和指导的国际行动关系到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让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个别国家单独承担保护人权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为有害于国家本身了。

是的，必须使各国相信，国际社会施行的管制最终会给它们带来对其主权和管辖范围的最大尊重。

因此，维也纳会议决定评估保证人权的方法和机制以求改进，这是正确的。确实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要认识到有关这种管制形式在行政、司法以及实践领域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在行政方面，近些年来保障人权的程序一直在增加，这不仅是在联合国，而且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专门机构以及在欧洲委员会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组织中也是如此。

在联合国范围内，甚至可以看到产生了许多分别负责监测某一特定公约执行情况的机构。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而言，必须对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给予特殊地位。

尤其是人权事务中心，近年来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该中心最初的任务是就所有人权事项开展研究和提供信息，现在它已逐渐被要求协助执行各项公约，以及参加为调查诸如即审即决、失踪和任意拘留事件等各类广泛问题而设立的特别报告员特设委员会。

不过，保障人权还意味着建立司法控制，惩治已发生的任何侵权行为。

在这方面，一些区域组织特别是欧洲委员会范围的欧洲人权法院以及美洲范围的美洲法院已向我们指出了途径。

在这方面我提请各位注意，联合国目前正在努力推动设立一个永久的国际刑事法院，以及一个负责起诉前南斯拉夫境内罪行的特别国际法庭。

今年 2 月，安全理事会决定要设立这样一个法庭，“起诉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肇事者”。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考虑这个项目，因而为自己规定了一项全新的任务。根据宪章第七章，安全理事会于 5 月 27 日全体一致作出一项决定，设立了这一法庭。这样行事的好处在于可以立即设立法庭，并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步骤，执行以此方式通过的决定。安理会并因此设立了宪章第 29 条所设想的在强制性措施范围内的一种辅助机关，只是该机关属司法性质。

在讨论联合国为保障人权而采取的措施的发展情况时，我必须提及大会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采取的决定性行动。

自从 1988 年 12 月大会通过关于向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第 43/131 号决议以来，关于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权可获切实保障的领域之一。

我们看到联合国在苏丹、在索马里、在伊拉克的特殊情况中，以及今天在前南斯拉夫的行动中都已反映了这一点。

同样，这些决议不是要表示某种表面上的干预权是应该的，而只是要反

映当前保障人权的努力所依据的关键思想之一，即此类保障与国际社会当前理应拥护的民主化要旨之间的关系。

民主化的要旨是我们工作应当遵循的最后的行规则，而且肯定也是最重要的行规则。国际社会对这一要旨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我认为，民主化进程不能与人权的保护相互割裂。更准确地说，民主是最能捍卫人权的政治框架。

这不仅仅是一种原则声明，更不是随波逐流赶时髦，而是表明了一种认识，即民主是让个人权利自由行使的最佳政治制度。联合国促进人权的工作不可能与在国际社会之内建立民主体制的工作相互割裂。

我希望这番话不会引起误解或无意中造成难堪。

继许多其他人之后，我强调民主化的要旨，并不是要某些国家盲目模仿另一国家，也不是要它们照搬对它们不适合的政治制度，更不是要它们设法使某些西方国家感到满意——事实上恰恰相反。让我们强调，民主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利，所有文化都能够也都应当对它加以消化吸收。为了更切实地适应各地的现实，民主可采取许多形式。民主不是某些国家树立的供其它国家照搬的样板，而是所有人民要争取实现的目标！民主应是人人都享有的。因此，与人权一样，民主具有普遍性。

为了避免误解和误会，我们必须达到共识：民主化绝不应造成某些国家的担忧，而是应启迪所有的国家！本着这种精神，联合国在履行其保障人权的任务时，有义务帮助各国——往往是处于最为不利境况的国家——在通向民主化的艰难道路上不断前进。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摆脱无谓的争执，必须积极地在民主、发展和人权之间建立联系，而我们已确认这种联系是必然要建立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促进民主，从而不尊重人权，就不可能实现持续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一些国家为争取发展而采取的最初步骤表现为非民主做法和独裁政策。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些国家一俟经济取得进步，如果不开展民主改革，最终取得的增长就必然是没有牢靠基础的，会引起更大的不公平，最终导致社会动乱。只有民主才能使发展具有真正的意义。

根据这一分析，发达国家必须以更为负责的态度对待正在从事民主化进程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必须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共同努力中的责任。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了解，援助发展有助于促进民主和人权。这决不意味着减小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所承担的在国内促进民主和人权的主要责任。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所在，因为只有通过每个国家的发展，才能确保一切国家的和平！

情况越来越表明独裁政权是战争的潜在根源，而民主则恰恰相反，它是和平的保障。我们只须看一下为联合国部队规定的任务职权，就可以看出，联合国正在其业务活动中以尽可能实在的方式在维持和平、建立民主和保障人权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一演变的早期的有力表现可见于 1989 年 4 月至 1990 年 3 月赋予联合国纳米比亚行动的任务职权。1991 年起，一些重大行动在它们的任务中都列入了这一政治层面的任务——捍卫人权和恢复民主。我们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萨尔瓦多、索马里以及当然还有柬埔寨的行动中都看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许多国家完全清楚，接受选举援助是多么必要，它们越来越经常地请联合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

1989年，一个监督尼加拉瓜选举进程的特派团设立了。次年，在海地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特派团。要求提供选举援助的请求逐渐增多，大会于1991年秋季核准了在政治事务部内设立一个选举援助股，该股已于1992年4月开始工作。

自那时以来，联合国在这一新工具的帮助下，已能够更好地满足许多国家要求选举援助的请求：阿根廷、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刚果、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肯尼亚、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卢旺达、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舌尔、多哥、乌干达……等等，名单之长令人印象深刻。

这方面的要求分为多种类别：组织和举行选举、监测和核查选举、观察员现场协调以及顺利进行民主选举所必需的多种技术合作等等。

对联合国来说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强调这项任务的规模。监督和监测选举本身并不能长期保障民主化和尊重人权。安哥拉和海地的经验令人遗憾地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不能保证各国会有尊重选举结果的足够的民主意识。

所以，我们必须做甚至更多的工作。我们必须帮助各国改变态度，促使它们进行结构改革。联合国必须能够向它们提供技术援助，使它们调整自己的体制，教育自己的公民，培训领导人，并建立起尊重民主和体现人权关注的调节机制。我特别想到的是，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建立尊重法治的军队，建立保护公众自由的警察队伍，建立对民众进行人权教育的制度，这一切的确是太重要了。

我深信，我们的任务起码相当于建立起一个全球规模的公民学讲习班。

只有以这种方式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意识，使每一个人参与这一努力，我们才能防止我们的良知和法律将予以谴责的未来侵犯事件。在这个问题上与在其它问题上一样，迫切需要预防性外交。

我期待本次会议提出建议、革新和提案，使这一人权外交具有不断增多的实质内容。

我希望，通过这些思考和解释，我已表明，联合国已发生了其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转折。我们尊重人权的决心现在正通过具体和务实的努力，潜移默化地见诸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之中。

我们在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牢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捍卫人权既是具体目标，又是一般性目标。一方面，它要求我们认明越来越具体的权利，并且构想越来越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向我们表明，人权渗透于我们组织的所有活动之中，同时人权又是我们组织的根本基础和最高目标。

因此，请允许我在本次会议开始之际以一项最后呼吁结束我的发言：

让人权为我们在此创造一个团结互助、负起责任的气候！

让人权帮助把所有的国家和人类社会凝聚在一起！

最后，让人权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

五、联合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

导言

联合国宪章确认，各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需要以社会经济发展为条件。因此，促成国际间的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也是联合国的重要活动之一。事实上，联合国正将 80% 的财力和人力投入于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

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和平，这是一个事实。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南北不平等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富国和穷国必须携手合作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据材料统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但其国民生产总值还下到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1990 年占世界人口 20% 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为相等比例的世界最贫困人口收入的 90 倍。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和劳务出口方面的损失每年达 5000 亿美元。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高达 1.3 万亿美元。从 1981 年到 1989 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已从 31 个增 42 个，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总收入 85% 的份额，消耗着世界能源的 70%。

联合国大会承认，为世界人民谋求更美好的生活乃是国际社会的责任。1961 年，联合国将 60、70、80 和 90 年代定为四个发展 10 年，要求各会员国团结一致，努力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社会发展。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自 70 年代以来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对此非常关切并予以全力支持。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1974 年 4 月，联合国专门就原料和发展问题举行了第 6 届特别联大；中国政府派出了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演说。考虑到全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中国政府由李鹏总理率团与会，并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关于加强环境领域国际合作的五项原则。1995 年 3 月，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由 100 多个国家的首脑参加的社会发展大会，兵商全球社会发展大计。正如李鹏总理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的那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在社会发展方面，联合国还通过多种途径，着力于解决全世界的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移民工人的需要和权利问题。1995 年 9 月，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总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特点，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也正是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中心。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选收了多篇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演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代表们的演说。在这里，读者们可以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企求，可以听到他们热烈真诚的愿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福音，发展是人类美好明天的条件。在建立世界新经济秩序的过程中，联合国将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还特别收录了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里约热内卢、开罗和哥本哈根发表的三篇精彩演说，他要我们认识地球的脆弱性，重视对地球上今世和后代生活均十分重要的人口问题对发展的影响，敦促全世界遵守 50 年前在旧金山作出的“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和社会进展的诺言”，决心“共同反省——然后一致行动——保护大家的地球”。愿和平与发展真正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本篇是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新老挑战并存

1974年4月10日

我能在不结盟国家主席、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最及时的倡议下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致词，颇感荣幸。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常是处理影响世界和平的问题。在这第6次特别会议之前的问题或多或少是与世界未来和平直接相关的，但也涉及到现在特别要讨论的问题。这包括影响到地球上每个男女老少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的后代具有巨大的意义。这里提出了我们愿意建立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一类的根本问题。它向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我们从一系列决定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未来生活质量和条件的方案中作出合理一致的选择。

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世界各国是相互依存的，而这种相互依存性将不可避免地快速增长。导致这次会议召开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已集聚多年，促成了种种发展。造成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能力的不稳定因素，也有其最根本的政治含义。有些情况是突然而来的。目前形势剧变和历史进程的加速，使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紧急情况。问题在于因这种十分紧急的情况引发的这次特别会议，是否能够确保相互依存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是否可能在更公正、更切实可行的世界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即在不仅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和需要，而且在诸多方面问题——贫穷，人口、食品、储备一定的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和贸易、金融体制等的绝对必要的相互关连的基础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人往往有个自然的倾向，那就是在危机的时刻回忆过去。但是，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急剧变化中的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崭新的连锁问题——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我们无法回复过去的条件。我们只有集中面对现实、面对将来，别无其它选择。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如此艰巨和如此复杂，以至我们不得不结成一个共同体合作解决之。如果有一种清醒的思想，那么，也就是一种鼓舞人心的思想。因为紧急的形势会造成在国际关系中至今无法实现所有呼吁理智与亲善的主张。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对短期的民族利益的追求都不能暂时减轻目前不可避免的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从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以集体努力确保联合国体制有效地工作。

不同国家或集团的观点大相径庭。对某个国家集团来说，物价上扬，包括工业品价格上扬和缺乏食品和肥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对另一个国家集团来说，众所周知的“能源危机”引起的复杂问题是最重要的；对第三个国家集团来说，原料的折旧率及其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是主要关注的东西。但对某集团来说，目前的紧急情况则威胁着他们许多人的生命。而具有普遍性的是，大家都共同关注着保护和改善我们的环境。

在这个大厅里，可以自由发表不同的看法，真可谓群策群力。这里发表不同的意见与其说是一种对抗的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合作精神。联合国大会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将国际社会各方面所关心的不同东西和其不同的观点展现在世界舆论面前。这种过程对于达成一种相互谅解从而能为一个新的更好的国际关系体制作出安排是必不可少的。宪章第一条规定的联合国宗

旨，是各国协调一致达到共同目标。这次特别会议给我提出了罕见的、复杂的协调一致的任务。

不同的观点，很自然也会导致大会提出大量的问题和建议。每个意见或问题当然都会受到必要的考虑，我相信，大会对于那些越来越威胁到所有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又很容易引发政治灾难、并进一步造成国际社会不公正的情况给予优先考虑，是最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

我不想向本次大会建议该怎么办。但是，如果我不把对于世界和平与幸福构成潜在威胁的根本问题提请大家注意，那么，作为秘书长来说将是失职。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在保证全世界社会公平条件的改善的基本目标下，保证对世界自然资源的适当利用。为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向上有所前进，请允许我提6个立即要采取措施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大众贫困问题。当前对世界文明最具破坏的造孽是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大众仍继续处于赤贫或者反常的贫困之中。这贯穿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生活的各个时期：儿童营养不良、滋生疾病；失业蔓延，文盲众多，城市拥挤不堪。我们怎么才能重申决心，消灭大众贫困？

第二，世界人口问题。预计本次特别会议将开三个星期，在此期间，这个地球上的人口将增加400万。新增加的人口将对我们的有限资源不断提出日益增长的要求。我们怎样对付这种压力？

第三，粮食问题。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的储备从来没有如此低过。必须生产足以吃饱且质量尽可能好一些的粮食。全世界的人口——不谈运输与分配——几乎构成了对自然资源唯一的、最大的压力。我们怎么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作必要的储备，以应世界紧急之需？

第四，能源问题。全世界突然认识到日常生活中能源的重要性。给世界提供能源的自然资源是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之一。我们应怎样保护好这最珍贵的资源？怎样消灭浪费？

第五，军事预算问题。在本次会议召开的三周内，花在军备上的费用将达140亿美元。这样庞大的开支是对于自然资源的另一个强大的压力。大规模的裁减军备随着时间流逝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第六，国际金融体制问题。自然资源如要得到最好的利用，一个有效的世界金融体制是必不可少的。现行体制不能有效运作。这里有最危险的癌症般的疾病，即通货膨胀。除非通胀得到控制，否则国际金融体制不可能有效地运作。除非通胀得到控制，光谈论物价是无用的。目前，没有人能够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再说一遍，除非通胀得到控制，否则不可能保证自然资源的适当利用。

这6个问题，都直接同自然资源有关，跟未来世界和平与稳定直接联系。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可幸免其影响。而如果这些问题单个挑出来讲也许不算太坏，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是互相关联、相互起作用的，因而会引起增殖反应。

并非向大会提出的问题的所有内容都是新的，事实上，其中大部分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在考虑。但迫切感——甚至紧急感——则相对比较新。因近几个月来的事件所造成的动荡不定、令人无奈的危险局势的加剧使所有国家、甚至最富裕的强国惊叹不已！我们正朝着更有益的对话前进，正是由于现在所有国家的幸福和繁荣受到了威胁。我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次会议将是一个历史的转换点。

我们面临解决问题的许多框架和我们务必遵循的指示，已经体现在联合国体制的过去的系列决定之中。而现在所缺乏的是贯彻这些决定的政治意志。看起来本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必须找到，加强和提高这种政治意志。

我们议事日程上的问题的许多方面，是跟 1970 年联合国 25 周年时大会通过的国际发展战略一致的。联合国的一次大会在回顾和评价该发展战略时扼要谈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国际发展战略与其说是一个政策，倒不如说是一个愿望。”（决议 3176 [] 第 33 段。）但愿最近事态发展形成的紧迫感可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和新的契机，以把原先的愿望变成积极的政策。

过几个月，现在大会的焦点问题将在于明年召开的发展与经济合作特别会议上讨论。今年我们将召开世界人口会议和世界粮食会议。另一个重要的高层会议是海洋法会议。接下去有 1975 年国际发展战略 10 年中期修改会议，紧接着 1976 年有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四次会议。建设一个有效的世界性环境保护系统的过程进展顺利，对跨国公司的作用在继续作积极的研究。另一方面，问题涉及的其它重要方面是跟诸如世界金融体制以及继续进行的关贸总协定谈判等重要工作同时处置的。这样，我们不久将有一个议程包括长期政策纲要。这个纲要最终与新的国际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框架成为一体是势在必行的。这一体制应在实践中和原则上完全承认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权利和愿望；政策纲要还要考虑国际社会其它方面的利益和首先要做的事。这次特别会议有机会在过去所有工作的基础上开始制订全面的全球长期未来规划。这一任务的进展必然会使我提到的比较特别的活动目的方向更明确。

我以为，重要的是政府和公众能时刻牢记联合国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是大会能够勾画出全球观点大纲。大会主席说得对，大会可以制订原则和指导方针。大会可以采取短期应急措施以帮助国际社会中受目前局势影响最大者。然而，务必记住在本会议厅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必须实施的决议多数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国际专门机构要解决的问题。我想把这一点讲明。只有通过他们的行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问题新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还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联合国大会赞助下作出保证国际社会合理性的富有凝聚力的集体努力提供了机遇。

本次特别会议承认需要缩小我们世界的贫穷与富裕之间、失败与机遇之间、奢侈与贫困之间的差距；会议承认需要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原料的作用以及使用的方法的不同观点进行调和。会议公认保护自然资源和对自然资源更平等地分配是必需的。会议公认急需更大的国际、经济社会公正。大会公认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是未来的生命线。最后，大会公认没有人能从无益的对抗得到好处。我们应维持现在的紧迫感。本次大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思想，即为建立在平等、公正基础上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奠定基础。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 年第 5 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阿尔维托·胡安·维尼斯，阿根廷外交家。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先后在阿根廷驻奥地利、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典、挪威、丹麦大使馆任一秘或临时代办。1948年任阿根廷出席联大代表团副团长。1973年出席阿尔及利亚不结盟国家会议，为代表团团长。1973年任外交部长。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合作制度

1974年4月10日

阿根廷政府参加这次特别会议，是因为认识到会议的重要及其意义。它确信迫切需要将民族意志运用于创造一个广泛合作的制度和共处的准则，使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公正、更合理。

因缺乏世界规模的有效的共同基础，各地区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拉美一体化概念使各国政府考虑其它国家的问题；当其它国家问题影响到整个地区时，考虑那些影响到自己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用无视或破坏地区体制的办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发达国家的政治行动造成了这样的先例：控制一切它们能控制的，控制一切对它们有利的。若发展中国家实行同样的控制以表示决不屈服于压力，对它们来说也是不应感到意外的。

在举世公认的思想完全多元化的世界里，基于经济社会制度之上的歧视性待遇是毫无意义的。由于地区性组织实行地区性制裁，姐妹共和国古巴仍备受歧视性待遇。对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来说这种制裁仅是个遗留问题。应清除在同古巴恢复关系的道路上的障碍。这样想的地区体系各国可以跟古巴恢复关系这次特别会议必须给国际行动模式下新定义，要打破指导世界贸易的陈腐的框架。最近的能源危机显示当发展中国家行动协调一致、决心捍卫其正当权益之时，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工业中心在生产和原材料方面的政策和决策依赖会回潮。于是出现一个新因素：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捍卫其资源的来源。阿尔及尔不结盟国家宣言形成了采取国际行动的基本纲领。

石油危机使世界关注于相互依存，关注通过国家集团化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关注冲突形势扩散，关注在国与国之间正在产生的平等思想及其脆弱性。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伊朗前首相，曾任教育、司法大臣。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需要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1974年4月10日

我们全球的资源正被逐个开采，在相当程度上来说，它们被几个富裕的高消费国家为维持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而浪费掉了。随此现象而来的是工业国家和跨国公司蓄意制定物价政策，它们只为自己或其国家的短期利益开采资源，很少考虑人类的长期利益。

而同富人如此挥霍浪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仍忍饥挨饿、百病缠身，愚昧无知。1967年至1972年，工业化国家年平均增长率虽达约5%，但官方发展援助却从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42%减至1972年的0.34%。既然自然资源不能仅满足少数高消费国家之需，还应满足多数人达到少数人现有的高生活水准的殷切愿望，那么就务必找到发展新标准和新规定的方法。要运用先进的技术，通过制定指导技术转让的国际行为法来阻止对资源的掠夺和浪费。

国际贸易结构需要大检修。要适当考虑建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恰当比例；创立缓冲存量并为融资作出规定；废除歧视性做法；为市场准入作出规定，并建立对于跨国公司更有效的监督机制。

现在急需建立一个世界金融新秩序。国与国之间的环球清算继续分布不均。应采取措施让发展中国家精心完善其金融体制，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源要作适当的安排。

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要大量增加。大会所有成员应承诺满足第二个联合国发展10年援助目标。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四川广安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广西百色和龙州起义，并参加长征。建国前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职。主要著述编入《邓小平文选》1至3卷。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

1974年4月10日

主席先生：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它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像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

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

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了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的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

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作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

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差猜·春哈旺，泰国副总理，泰国前副总理、泰国皇家陆军前总司令屏·春哈旺元帅之子。曾任泰国驻联合国总部联络官，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工业部长，泰国民族复兴党副主席、泰中友协主席等职。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必须保证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

1974年4月10日

工业化国家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已经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抵消了本已缩小的出口创汇和增加进口开支之间的差距。运输会议单方控制运价率和提高保险与分保的费用使问题复杂化了，许多缺少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各经济部门都可感觉得到。进口石油高成本增加了国际支付的费用。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滑坡。

石油奇缺引起泰国各行各业严重的混乱，特别是交通业、渔业和制造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向泰国出售高速柴油的协议是件意义深远的事，它证明，尽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在困难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泰国欢迎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其它国家提出的援助欠发达国家的建议。

应鼓励将盈余资本不断地投向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国和工业化国家合作来解决肥料问题，将打破饥荒苦难的恶性循环，并为世界食品提供保障。

要尽力保持粮食出口和粮食进口国之间的利益平衡，切记受严重自然灾害之煎熬的人民的需要，牢记依靠生产和出口农业品的发展中国家岌岌可危的处境。要制订一个国际行动规划，解决减轻沙漠化问题，特别是在苏丹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问题。

新的国际金融体制必须保证发展中国家参与决策。世界商品市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关于价格政策和市场准人的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泰国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料、初级产品与进口的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以及资本设备之间建立联系。发展中国家应享受优惠待遇，普惠制待遇应扩大范围，并有所改进。

跟运输会议行为法规相匹配的适当的仲裁机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强大的运输卡特尔侵犯。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将成为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相互平等、相互依赖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关系新体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米歇尔·约贝特，法国政治家。先后担任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私人秘书副官、私人秘书主官，总统秘书长和外交部长。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应促进经济发展不同层次国家的广泛合作

1974年4月10日

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即时发生的能源危机早就酝酿着国际经济关系进一步的总危机。

国际货币制度未能确保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固的基础。在布列顿森林制定的这种制度是基于固定不变的等价制和黄金与美元两根支柱之上的。外国的承诺和国内通货膨胀逐渐破坏了对第二根支柱（即美元）的可靠性的信心。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两次贬值，波及其它货币的全面浮动，引起连锁反应和货币贬值。

1972年世界几大地区出现旱涝灾害，引起农产品市场的混乱。几个国家由于开采放慢，矿产品产量下降。经过两年停滞之后（1970和1971年工业增长率为1.3%），发展中国家周期性恢复工业活动，增长率为6.3%，这引起求过于供，造成了几乎每样产品的价格直线上升。

1972年中至1973年底，在不到18个月中，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平均翻了一番还多，有的甚至提高了三四倍。由于事态来得如此突然，波及面如此之大，使世界金融体系最后的储备受到无法忍受的压力，引起通货膨胀率高达10%。这种事态的发展引起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基本不平衡。

石油大幅度涨价在通胀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结果，石油进口国家多支出600亿美元。石油储藏作为自然资源，属生产国主权管辖。而作为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条件来说，对于所有那些从石油得到好处的人——包括国际石油公司，石油负有特别的责任。

本次大会要集中解决四个问题：原料市场组织机构，不可更新的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改革援助和发展合作。

就原材料而言，为减少某些造成贸易不稳定的边际交易的影响，尽快使市场增加透明度是十分重要的。要达到这种透明度，特别是做到对物价形成和物价水平的更好了解，可由联合国主办一个经济监控中心。为保持完全的独立，中心应考察世界的交易，记录原料交易主要经营者申请价，定期发布每样商品加权均价。

法国建议建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料进口协定或协议网络……

国际共同体首先应致力于组建两类很不相同的市场……

世界能源市场应有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

为保证世界共同体工业交流的发展，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应促进经济发展不同层次国家之间进行广泛的工业合作的进程。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米切尔·夏普，加拿大前外交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曾任贸易商业部副部长和财政部长，自由党下院领袖。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国际经济关系的 重组和调整需要进行务边磋商

1974年4月10日

考虑到加拿大人均出口比例高和对外贸的依赖发生性强，它的发展经验是外向型的。加拿大确信，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材料或技术在国际上的自由合理的流动，是实现工业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加拿大承认资源拥有国的处置其自然资源的权利是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利益的，资源拥有国只有在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经济框架内才能实现其抱负。全世界也许必须抑制某些原料的消费率，这应该协调一致地来做，不应引起经济混乱，造成失业和收入下降。影响供应的突然的任意的举措会严重破坏国际经济合作。对世界资源储备合理规划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由于粮食问题之紧要，加拿大十分重视即将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而作为粮食主要出口国和世界粮援贡献大户，加拿大愿通过双边形式和多边国际机制继续为粮援作出贡献。粮食问题需要所有能作贡献的国家、而不仅仅是粮食出口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至于能源问题，加拿大赞成世界原油贸易井然有序的框架，即能提供稳定的合理价格水平，反映引进新的常规和非常规能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成本。加拿大强调在能源问题和与能源有关的问题上，特别是主要消费者和主要出口者之间需要进行对话。对话对于能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紧要。加拿大作为铀的主要输出国，愿意发展进口者和出口者之间磋商的机制。

通货膨胀是个严重的国际问题。近来贸易条件变得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因为矿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扬。所有国家都是原料和制成品的消费者。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各国政府应奉行负责的政策。最近的能源价格迫使国际市场进行调整，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各国政府必须面对挑战，调整经济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加拿大赞成建立一种机制，保证跨国公司的政策和其运行国的民族利益相一致。

为了帮助人们面对形势，加拿大回顾了自己的承诺，并重新排列了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加政府已同意另拨1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之急需，特别是其对粮食和肥料的需要。……立刻要采取的措施将包括国际收支方面的支持，比如对必需品软贷款等。长期措施将包括对发展能源的援助。1974年7月1日，加拿大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将开始施行。

国际经济关系的重组和调整需要进行广泛的多边磋商，比如进行货币流动和多边贸易谈判，继续讨论有关商品和商品协定问题、创立资源管理特别机制和新的技术。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马克斯·范·德斯图尔，荷兰前外交大臣。肄业于莱顿大学。1958年从政后任工党国际部书记。1960年后，历任议会一院议员、二院议员、外交国务秘书、欧洲委员会会议议员、外交大臣。1983至1986年任荷兰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世界经济是相互依存的

1974年4月12日

最近的经济事件使人深切地感到相互依存的现实。对于工业化世界而言，这意味着突如其来的、迄今未闻的依赖感。可是，对于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说原料短缺却是正常情况。在这些国家中，粮食、原油供应不足，所有满足人们基本生活和保证适当的经济条件的商品都短缺。

发达国家通货膨胀，进口工业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对其发展发生了消极的影响。能源危机则在长期起作用。世界面临日益供不应求的局面。只有在互相依赖并因此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精神，才能圆满地谈论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可选择自力更生，但是无论自力更生还是通过双边协定确保某些原料的供应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包罗几乎所有生产者和尽量多的消费者的世界范围的安排，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为平等、互利、公平和合作的新的经济关系奠定基础。

一个世界范围的政策必须基于承认公正的国际劳动分工和由此带来的结构变革，承认对海底和洋底公正的国际管理体制以及保护完善人类生存环境的必要性。

在相互依存和需求结构变革的基础上，应对自然资源和商品采取行动，把资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形势影响最大的国家。其中很多是属于最不发达的国家。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則应加以重申，并使之与基于互相依存和团结一致的世界性资源政策相匹配。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应包括缔结世界性的政府间商品协定，来调整出口、进口、价格。为使这种安排行之有效，把市场干扰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是最必不可少的。

为了从初级产品中充分获利，生产国要求实行更平等国际分工的原则，它们越来越多地自己加工自己的资源，这就需要投资和资本。

世界性的资源政策将需要在科研、开发和技术转移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为确保世界有限的资源得到理想的利用，有关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废料加工的新技术必须发展，天然制品和人工合成品之间的关系要加以考察。国际合作还要求寻找能源的替代品，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替代品。

许多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短缺，首先必须用提高这些国家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为了备荒，要尽可能建立最重要的食品的储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是至关重要的。必须重申和加快实现国际发展战略中制定的援助目标。

荷兰积极主张欧洲经济共同体要作出必要的决定，使欧共体积极参与对受影响最大的国家的国际援助计划，并为这种计划作出慷慨的贡献。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本篇是基辛格在联合国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美国将致力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1974年4月15日

发展的大问题不能再从富裕和贫穷之间的对抗或者从对固有财富的分配斗争的观点考虑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思想信仰和社会结构，我们都是作为所有国家经济目标基础

的单一的国际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单方面决定未来的形态。大会必须把握住我们相互依存的事实。

我们一开始就迫切需要和平。要是资源继续被一直在螺旋上升的扩充军备消耗掉，那发展的希望就会落空。

美国愿就刺激世界经济和促进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努力。

首先，全球经济要求以公平的价格拓展能源供应。所有各国对就维持较长时期经济增长和合理物价水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都颇感兴趣。后代的需求要求发展新资源和再生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须进行新一轮对话。在新一轮对话中美国将认真考虑生产国关心的问题：人民的前途并非仅依赖石油，美国将帮助拓宽其经济基础。美国已为促进技术转让作好了准备。它将接受产油国在美国大规模的资产投资，并将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支持产油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健康的全球经济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摆脱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原料剩余与短缺的周期性循环。适用于能源的原则对整个原料问题同样适用。当我们谋求修改贸易的规则和条件并使之现代化时，供应接轨问题和市场准入问题是关贸总协定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从长远观点看，美国敦促国际专家小组跟联合国经社事务部资源司紧密合作，立即担负起对非再生资源 and 再生资源的综合调查，包括发展预警系统以预报即将发生的剩余或者短缺。

第三，全球经济必须在食品生产和人口增长之间取得平衡，恢复应付粮荒的能力。美国从其非凡的农业生产率认识到自己担负的领导责任。由于全力支持提高粮食生产的全球性努力，它提议召开即将开幕的世界粮食会议。所有对粮食生产的国内限制业已取消，美国将同世界各国同心协力重建粮食储备。粮食援助计划的资助额将从2.58亿美元提高到1974年的6.75亿美元。

美国已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肥料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为产油国所独有的原料和资本作好了准备。为了协调国际改进化肥肥效的行动以及改用非石油原料生产肥料的新方法，需要办一所国际肥料研究所。美国愿为这样的研究所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

第四，强调全球经济不允许弄垮最贫穷的国家。三分之一的人类由于受世界经济通货膨胀冲击，对发展已感到完全无望，并面临饥饿的威胁。美国将继续兑现对援助计划的承诺，并保证支持尽早充实国际发展协会。它已作好准备同其它国家一起，采取额外措施以减轻商品价格对不堪重负的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第五，在物资匮乏的世界经济范围内，科学技术成了最宝贵的资源。现代技术使得人类更加健康，它提供了省力的机构，引发了“绿色革命”。但

现代技术已不断提高资源消耗率，人口爆炸使地球有限的生活空间更拥挤，农业越来越依赖工业产品。

为应付失业与饥饿两个根本问题，美国已作好准备为发展和运用生产性耕作技术和劳力密集型技术的国际规划作出贡献。节育技术应该加以改进。美国建议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和国际气象组织立即调查季风带和全世界气候变化之可能性，提出立即要采取的国际行动的指导方针。

第六，全球经济需要有一个能支撑工业文明和刺激增长的贸易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所有国家应保证努力调整较高的商品价格，避免贸易限制和支持限制。美国已准备使资本市场继续保持开放，这样资本就能在受危机影响最深的发展中国家循环流动。为了帮助控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美国愿意同大家一起作出奉行负责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际承诺。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准备进一步向这些产品开放市场。它还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尽力在更广阔的领域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现正提请国会讨论通过给发展中国家普惠制待遇。

我们的目标是政治远见和物质需要相一致。这要求务必做到既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又要尊重发达国家的愿望。美国支持墨西哥提出的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概念。

译自《联合国纪事》1974年第5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姚依林，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业局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1949年后，任国家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职。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6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的发言。

推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83年6月10日

主席先生：

第5届贸发会议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世界生产下降，国际贸易萎缩，货币金融动荡，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了战后最深刻的一次经济危机，给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发达国家加紧争夺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贸易战和货币战愈演愈烈。它们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实行高利率政策和削减官方发展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它们当中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处境尤为困难。

不久前，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和77国集团第5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许多重要建议。中国政府完全支持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77国集团提出的正确主张和合理要求。

在当前极为困难的世界经济形势下，第6届贸发大会的召开为推动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认为，第6届贸发大会的基本目标应该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振兴世界经济，以推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

为了达到这些基本目标，我们认为，需要妥善处理下列三个关系：

第一，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远目标的关系。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当前，它们急需弥补国际收支逆差；重新安排债务和要求减轻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和出口收入，排除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障碍，改善贸易条件，大量增加发展资金的流入，等等。解决这些紧迫问题已不容再迟延了，本届会议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因此，解决这些紧迫问题必须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远目标正确结合起来。紧迫问题的解决应该逐步引向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使之成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实际步骤。我们认为，全球谈判是谋求改善南北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良好途径。我们支持第7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关于全球谈判的新建议，希望主要发达国家作出积极响应。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振兴世界经济的关系。

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去发达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的。今天，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那种要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政策早已落后于时代。发达国家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采取明智和

有远见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合理要求作出积极响应，从各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为改善南北关系、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关系。

在世界经济恶化、南北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加强南南合作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南南合作可以增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南北对话。但南南合作并不排斥和取代南北对话，也不因此而减轻北方对南方应承担的义务。我们认为，所有发达国家对南南合作都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提供必要的协助。

国际经济领域各项具体问题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商品、贸易、货币、金融和发展问题不能分别地、孤立地解决，应该寻求全面、整体的解决办法。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不符合它们国情的调整政策，或者加重它们的经济负担，不仅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和世界经济的振兴也是有害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支持就商品、贸易、货币、金融、发展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制订和实施一套包括应急计划的中、长期计划在内的综合性国际政策。

在商品问题上，我们认为，本届大会应当有所作为，采取有效的措施，全面实施商品综合方案；应促使商品共同基金协定尽快生效；加快单项商品的国际协定谈判；改进和扩大补偿性资助拨款；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初级产品的加工、销售、运输和分配的机会。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我们主张发达国家逐步减少和取消妨碍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保护主义措施，并对它们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工业部门进行调整和重新布局。切实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对于现行国际贸易制度中的原则和规章，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重新加以审议和进行相应的改革。

在货币和金融方面，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所有发达国家增加双边、多边官方发展援助和优惠贷款，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应大幅度增加资金来源、切实改善贷款条件等一系列正当要求。目前，发展中国家异常严重的债务问题必须给予妥善解决，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充分执行贸发会议通过的有关债务问题的决议，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我们支持对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确保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世界货币金融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们赞成召开一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积极创造条件，这次会议应当成为实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总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一向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困难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采取切实措施，贯彻执行《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 8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我们支持一切有利于解决这些国家经济困难和加快它们发展的措施和努力。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一向坚定不移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我们愿意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进一步发展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我们愿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扩大经济和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积极稳妥地利用外国资金，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增强自己的自力更生能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愿意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联合一切愿意改善南北关系的发达国家，为实现联

联合国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第三个《国际发展战略》而共同努力。

主席先生：

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促进世界贸易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在推动改革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维护各国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当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本届贸发大会能够为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有益的贡献。我们预祝本届贸发大会取得成功。

谢谢主席先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3年，第96—101页

本篇是黄华在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大会首届大会上的发言。

人口与发展问题是亚洲国家 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

1984年2月16日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议员、各位来宾：

人口与发展问题是亚洲国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亚洲议员在这一领域的相互合作和交流经验，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经过卓有成效的准备之后，现在召开了它的首届大会，为此，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东道国印度的议会、政府和印度人民致以诚挚的敬意。

本届大会使我们自然想起了两年多前与朋友们在北京人口会议上聚会的愉快时刻。那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对协调亚洲的人口与发展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宗旨和目标。今天我们愿同各位代表就人口和发展问题进一步交流经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安定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对世界的人口与发展问题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近几年，我国在70年代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口问题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首先，国家提出力争到本世纪末在实现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同时，要求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6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不仅提出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妥善安排城镇劳动力就业和改善城乡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任务，而且规定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第二，为解决各方面人口问题，我国全国人大和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立法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了有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保护妇女儿童和创造劳动就业条件等条文。政府部门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提出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生育政策及必要的奖励和限制措施，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的基础上；决定增加教育经费，创办多种形式的高等和中等教育设施；继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开展婚前检查、产前诊断和遗传咨询，加强优生、优育。

第三，从中央到县健全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组织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政府机构。在农村的乡（公社）和城镇的街道设有专、兼职计划生育干部。此外，在城乡广大基层单位还有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目前我国业已形成拥有几十万人的计划生育专职队伍。

第四，免费供应避孕药具，加强节育技术指导，提高节育手术水平。在全国城乡建立了一支熟悉节育技术的医务人员队伍。为此，国家每年都在预算中拨出大量计划生育专门款项。

第五，把宣传教育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位。发动社会各阶层和各行业的力量，利用多种渠道，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使广大群众真正理解控制人

口增长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重要意义，破除“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树立只生一孩光荣、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的生育观，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并同时普及避孕和优生的科学知识，保证生育计划和节育措施的切实执行。

第六，1982年7月，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普查以及我国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为我国制订控制人口计划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提供了依据，同时它们也是制订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资料。

由于上述工作的进展、近年来我国在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工作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尽管有处于生育高峰时期的不利影响。1983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可控制在13%以内，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从50、60年代的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着今后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这些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调整方针的贯彻实行，我国国民经济逐步走上了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农业连年获得丰收，工业在持续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例如，1982年，占我国人口总数80%的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较1978年增长了一倍，5年内，城乡新建住宅近26亿平方米，城镇共有3800多万人得到就业。由于人口增长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我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开始出现了可喜的趋势。当然，我们深知，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居于较后的位次。因此，我们决心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同时决不放松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对各方面的人口问题采取正确的对策，使我国的人口与发展进一步得到协调，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

亚洲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对人类的发展曾作出过光辉的贡献。但今天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的是人口问题，而人口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则是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因此，为了解决亚洲人口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一方面必须坚决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力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把过高的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人们已经注意到，由于占亚洲人口大部分的国家现已实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为公众提供了节制生育服务，因而1975年至1980年的亚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降至1.9%。我们相信，亚洲各国议员将同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一道，通过深入和持久的工作，进一步协调各自的人口与发展问题，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与亚洲其它各国一样，为实现《北京宣言》所提出的到本世纪末使亚洲地区的年人口增长率降到1%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亚洲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国情，各国当然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制订本国的人口与发展战略。但与此同时，亚洲各国也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和与世界其它国家及组织的合作。近年来，我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和其它许多组织的合作日益发展。我们对这些合作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愿借此机会向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和专家们致谢。为了进一步加强今后亚洲国家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合作，中国代表团建议：

——亚洲国家的议会、政府和有关人口组织及人口学者，就人口与发展的一般问题和专门问题，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及学术交流。

——本届大会再度向国际社会呼吁，促请各捐款国提高其发展援助资金中人口援助的比重。值得指出，发达国家增加其国家人口援助资金，对亚洲和世界人口与发展问题作出贡献，最终对发达国家自己也是有好处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发达国家中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关组织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为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最后，我祝愿论坛的首次大会在各国议员先生和各有关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4年，第171—176页。

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 60 代和 70 年代两个 10 年持续增长后,在 80 年代即联合国第三个发展 10 年受到了挫折。德奎利亚尔的这个报告是 1984 年 5 月 7 日至 25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三个发展 10 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情况和评价委员会收到的重要文件之一。

关于第三个发展 10 年

1984 年 10 月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停滞和衰退取代了经济增长,它们按人口平均的收入在过去 3 年中下降,只有 1984 年可望有不大的增长。国际经济合作每况愈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将不足以给穷国恢复势头,除非采取具体步骤缓解穷国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变限制穷国出口的保护主义气候,增加发展资金。

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很想知道的是,在先进国家不买它们的出口品的情况下,它们如何能够偿还欠下先进国家的债务?利率越来越高,旧债偿付额愈来愈大,它们如何能够应付债务、偿付开支?它们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投资资源来维持它们的发展努力和为日益增多的劳动力提供工作?

我同来自发展中世界许多地方的领袖见过面,我注意到一种沮丧的情绪,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还在不太久以前他们对于改善他们人民的生活条件的那种信心看来已经丧失。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集体政策,并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已确立的行为准则。

衰退的影响

1980 年以来的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同战略所规划的增长道路恰成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正是全球性衰退的冲击,使得联合国第 3 个发展 10 年的开头几年在期望和实绩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1980 年 12 月大会通过该战略时,经济形势一致公认每况愈下。战略的通过看来是有益地重申了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以创立一种显然更加支持多国的发展努力的国际环境。.....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衰退会如此旷日持久,会迫使这么多的国家紧缩得如此厉害,以及会使国际经济关系制度陷入如此严重的困境。

部分地由于衰退所致,自从通过战略以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经济情况在一些重要方面产生了变化。例如,偿付外债问题对许多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来说变得相当严重,这一点在制订战略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而且,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在因衰退而产生的浓厚得多的防御气氛中成倍增加了。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很可能无法恢复许多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

虽然情况的变化使某些问题突出了,并改变了相对的优先次序,但战略中所建议的具体政策措施却是与 1980 年一样有效的。.....但是执行情况总的来说却是行动拖拉、无所作为,或甚至与早些时刻的积极行动背道而驰。

在通过战略的时候,国际经济日程上的主要项目是建议发动全球谈判,以期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促进发展。未能开展 1979 年大会所要求的全球谈判,也是执行战略的一个失败。

增长

整个发展中世界人均收入在 3 年猛烈下跌以后，目前出现的复苏是不平衡的、逐渐的。

1984 至 1985 年的预测显示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最低，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严重的干旱对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使它们不得不将有限的外汇转用于进口粮食。

虽然工业国家正在复苏过来，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预计仍将处于萧条状态。

偿债比率很高，预计不会大幅度降低，特别是从非减让性官方贷款和私人信贷的利率的未来趋势看更是如此。

在拉丁美洲国家，偿债和债务总额同出口收入的比率最高。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政策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债务

对许多国家来说，利息支付总额已增长到不能继续支付的地步。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国家，支付外债利息占去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1983 年，大约 12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利息付款超过了国民收入的 5%。1983 年，许多国家的利息支付额都超过了资本的净流入额，以致这些国家出现了实际资源净外流的现象。

从长远看，只有大量增加出口收益，才能解决债务问题，而增加收益将取决于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恢复实力和商业政策的决定。对一些国家来说，即使最终能够充分增加出口收益，在今后的一些年中，偿债仍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努力鼓励或劝使贷款人集体降减利息和有关收费，并延长现有债务的偿还期限。

国际贸易

发展中国家最近出口下降多半是经济衰退引起的。各工业中心经济较快地增长，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改善，预料可以部分地改变这种情况。对于面临严重的债务偿付困难的国家，市场保持开放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国家唯有通过持续的出口增长才能希望减少债务负担。

尽管有进一步放宽贸易的各种保证，保护主义还是明显地有增无减。对于保护所持的态度也在改变；贸易管制被日益认为是正常的，举证责任正在转移给那些鼓吹开放市场的人。虽然工业国继续在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所作承诺的范围内进一步减少关税，但增加采用关税壁垒的趋势在 80 年代最近几年加速了。这些壁垒影响到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出口利益的产品，如纺织品和衣服、钢铁及许多农产品。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纺织品和衣服老早就受到数量上的限制。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法——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各缔约国于 1973 年通过的所谓多纤维办法——的连续谈判，使这项办法在准许增加进口方面显得更加具有限制性。结果，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向工业国的出口量大大地减少了。

发达国家很早就限制农产品进入市场。例如，糖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

要出口品，在糖的生产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较发达国家有利得多。欧洲经济共同体不仅保护其本国的市场，而且还提供出口补贴，使之成为世界主要的糖出口者。1982年5月，美国重新采用糖进口配额，将它们规定在1980年数量的75%左右。

保护主义的压力不可能自行减少，贸易可能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为了制止和扭转国内和国际上助长保护主义蔓延的强大力量，必须有“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的明确的承诺”。

如果要成功地抑制这些力量，则个别国家必须加强它们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的决心，并把采取使总协定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文书的国际行动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主要贸易国作出不仅仅是发表一些宣言的明确承诺，是对抗保护主义的进一步侵犯和争取设立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的重要因素。决策者和公众必须认识到保护主义的居心是不肯随着比较利益的转移作出调整。

普遍优惠制没有满足人们对它的期望，即成为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工业中心的出口的工具。虽然11个工业国维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所包括的产品有限，因为“敏感”产品（例如纺织品、鞋类、皮货、一些矿产品和农产品）一律不包括在内。

此外，享有优惠待遇的贸易受到数量上的限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包括在现有普惠制范围内的，占18%。

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出口品享受关税特惠的好处减少了，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不断下降并日益采用非关税壁垒。此外，普惠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趋势的受害者。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已采取一些做法，将比较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排除”于其优惠制之外，也就是排斥那些能够在工业国市场中竞争的发展中国家。

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第3个发展10年头5年中的工业发展情况是令人失望的。1981年至1982年期间，制造业产量每年增长不到2%，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制造业增值价值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停滞在11%左右。

实绩最差的是拉丁美洲，其制造业产出1981年下降了5%以上，1982年略有增长，1983年则可能再次下降。拉丁美洲的情况表明巴西和墨西哥迅速的工业增长突然陷入停顿，这两个国家自1970年至1980年期间占发展中国家工业总产出增长额的40%。

亚洲的制造业产出在1981年和1982年继续增长，但其速度比70年代末所达到的要慢得多。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严重地被打断了，这些国家人均收入下降了。虽然总的看来1984年工业增长可望有一些恢复，但许多国家在筹措新的投资从而恢复工业增长势头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粮食和农业

1981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增长超过了4%，其中拉丁美洲和中东取得了超过平均值很多的成就。但是这两个地区在1982年的增长速度骤然放慢，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平均数降低到人口增长率的大约三

分之一。

每个主要发展中地区都有一些大国的作物受到了旷日持久的旱灾的不利影响，而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还遭到严重水灾。

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的下降在非洲最为突出，非洲在按人口平均的农业和粮食产量方面的长期下降对粮食保障造成了最直接的威胁。20年前，非洲大陆在粮食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但非洲的人口自196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在发展战略中通常把农业放在很不优先的地位。因而未能加快提高产量和生产率。

粮食和农业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确保充分供应。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确保产量的持续增长。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人们日益认识到农业部门在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和奉行一项旨在提高国内的生产和营养水平的政策的必要性。

从“绿色革命”和最近发展抗病害谷物品种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专门知识和财政援助能够协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必须为增加灌溉作出努力，还必须对干旱土地的耕作制度进行更多的研究，重点要特别放在非洲的气候条件上。

主要捐助国曾经常表示支持向农业提供更大的援助，但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援助已经进行。“狭义的”官方对外农业援助承诺，亦即直接支持农业部门的活动，从1980年的79亿美元降低到1981年的73亿美元，并且看来最近也未有增加。减让性的承诺，特别是双边承诺，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对非洲粮食生产活动的援助则增加了。

最不发达国家值得特别注意。这批国家的农业商品出口往往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出口扩展得慢得多。这些国家基本设施不足，拖了其加工工业的后腿，它们日益增加的国内需求又往往限制了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

资金

在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普遍增加，1960年的储蓄率低于17%，但1980年的储蓄率几乎达到25%。尽管尚没有80年代前半期的最终数据，初步估计表明储蓄率自1980年开始逐渐下降，至1983年为止可能降至20%左右。

80年代的发展无助于发展中国家调集国内资源。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人均收入大幅度下降。能源进口国的贸易条件恶化，随后能源出口国也遇到同样情况。随着个人收入的减少，增加个人储蓄益发困难。80年代初期的发展危机还对政府储蓄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利润和投资机会减少，公司社团储蓄也下降了。

对10年后半期来说，更加努力地调集国内资源仍是实现该战略的发展目标的关键。在这方面仍有必要通过增加收入的政策和削减目前支出来加强政府的储蓄努力。价格政策、对国营企业的有效管理、建立和改进将私人储蓄导向投资的机构，也有助于提高储蓄率。企业储蓄的增长将取决于利润的增加和新的投资机会的开辟，但只有在重新推动发展进程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按目前美元价值计算，1981年和1982年期间各种来源提供的官方发展

援助额都有所下降。就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1981年到1982年官方发展援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有明显增长，但这主要是向多边资金供应机构支付挤迫的结果。1982年的比率为0.38%，同1980年的记录相差无几。

70年代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增长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成为主要的捐助国。这些国家目前提供的援助占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大约16%，其综合官方发展援助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大约为1.2%。由于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该10年的最初几年中有明显的下降。

尽管一些国家超过了战略的指标，另一些国家也明确表示打算履行其承诺，但一些最大的捐助国明显表现出缺乏兴趣。在70年代显示了发展前途的新的官方发展援助来源也在国际经济情况发生变化后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减让性基金总额停止增长，经济援助方面的多边主义也受到挫折。

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有时以经济困难作为不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源的理由。从国内方面来看，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要求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方面感到或面临困难，因为它们的预算赤字不断增长，而限制目前支出的努力正在扩大到限制各种类型的社会支出。但是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该10年的最初几年大幅度提高了它们的官方发展援助水平，尽管它们在国内经济方面也遇到了同样严重的困难。经济困难并没有阻碍世界军费开支的大量增加（1983年达到大约7.500亿美元的水平）。

总之，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是政治优先次序的问题，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结果。

战略要求国际社会致力于维持稳定的国际货币条件，以支持平衡的、公平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它特别呼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的支付困难，要有一个有效的、对称的和公平的调整过程。

国际流动资金的产生和分配受到复杂力量的影响，并且不是国际社会能够加以有效管制的。当前制度上不足之处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是发展中国家过去两年来国际储备严重减缩。当此最需要提供国际收支贷款之时，私人资金流量却急剧收缩。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其它可行的办法，只好大量提用其国际储备和减少进口。

因国际收支贷款的私人来源枯竭，官方贷款又没有相应扩展，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比例上不相称的大部分调整的负担。

主要工业国家的紧缩通货政策很快就影响到发展中国家，这说明国际货币制度在保护发展进程不受这些政策的不利后果影响方面无所作为。

对国际货币制度的忧虑，已使许多国家的政府提出要召开一次关于货币和金融的国际会议。因为预期全球谈判会为达到战略的目标而在国际货币问题方面提出了一个更为详细的方案，今后的筹备工作应考虑这个会议在为发动全球谈判所作的努力中将起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

战略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将谋求集体自力更生，以加速其经济发展和提高它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和扩大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

在执行这项政策时，在各个不同级别都采取了行动。

1981年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高级别会议所通过的加拉加斯行动纲领设想了一系列各个领域的合作措施：贸易、技术、粮食与农业、能源、原料、财政和工业化。它拟订出这些领域的详尽行动方案。

70年代的趋势显示，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出口额的增长速度要比它们向世界其它地区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更快。这种趋势在该10年的头几年仍在继续发展。1981年，尽管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各地的出口额减少了约2%，集团内的出口额却增加约4%。1982年，该集团向世界各地的出口额下降约12%，集团内的出口额却仅减少约4%。因此，集团内一些国家的出口额仍持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弥补了世界贸易额下降的影响。

1983年，在根据77国集团1982年10月通过的部长宣言所进行的关于全球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优惠制谈判方面，已采取了一些步骤。在此之前，在区域间一级为建立发展中国家间贸易优惠关系而作的努力，是通过总协定关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谈判的议定书进行的。这项议定书原有16个签署国，并在1973年生效。然而，在参加国的贸易总额中，根据这项协定书进行的贸易仍然只占很小的部分。

以财政合作促进在贸易领域和有关领域加紧作出努力，诸如在能源、运输和通讯等方面建立合营企业，可以有效地补充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所作的努力。

社会发展

减少并消除贫穷，以及公平分配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该10年内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战略要求2000年时达到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普及小学教育；全世界人口达到一定的健康水平，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精神上和经济上充实的生活；婴儿死亡率降到最多占新生儿的50%以下；所有国家都达到至少60岁的平均寿命。

在发展中世界的一些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有大批国家改善了生活水平。在其它地区，尤其是在非洲，却日益贫困化：不仅是物质匮乏，而且更加不安全。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贫穷的和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条件恶化了。

由于劳动大军继续急剧扩大，经济衰退或经济增长普遍减慢，充分和有报酬的就业这一目标看来愈来愈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妇女参与社会变革过程的程度有所提高。

一些指示性数字——其中显著的是婴儿死亡率和按人口平均可以得到的食品量表明，60年代和70年代已取得了某些进步，这一进步并未由于80年代初世界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而完全停止。

发展中世界遭受极度贫困、饥饿的总人数在这一时期也许没有增加。世界主要粮食商品的供应总额和粮食生产的增长仍然赶得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一些大的、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扩大了它们的粮食及其它必要的货物和劳务的生产和消费。亚洲的农业和粮食生产保持了前10年所取得的进步。

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基本货物的生产下降了。占发展中地区五分之一的国家，其经济活动在该10年头3年中绝对下降。另有10%的人口居住

在人均产出水平停滞或是下降的国家。

贫困不仅在非洲和全体最不发达国家蔓延，而且在前十年有过经济迅速增长和作过社会改革的发展中地区蔓延。经济衰退对于那些日益依靠工业扩充和出口兴旺来维持其经济的国家具有最直接和猝然的影响。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从有力的增长到萧条的逆转来得特别迅速，给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都更为一体化的经济迅速造成普遍灾难。

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表现于人们受苦和作出了牺牲。对许多社会集团、尤其是新的城市阶层来说，生活水平的下降不仅意味着收入和消费减少，而且意味着一笔勾销了保障他们经济安全的微薄余裕，使他们迅速陷入贫困、丧失社会地位，并使他们业已确立的生活方式日益解体。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也缺乏精心制作的“安全网”，那种以大规模社会保险和福利支持制度为形式的安全网可以缓解经济猝然衰退对生活水平的影响。

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社会形势使人想起 30 年代大萧条的社会影响。不仅是穷国更穷，而且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亦沦落到贫困的境地之中。

节译自《联合国纪事》1984 年第 3 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埃及总统，民族民主党主席。曾先后毕业于埃及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三次赴苏联全国高等参谋学院进修。回国后，先后任轰炸机中队长、轰炸机旅旅长、空军基地司令、空军学院院长、空军参谋长、空军司令。1975 年任副总统。1978 年起任民族民主党副主任，后任该党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总书记。1981 年 10 月萨达特遇刺后，任总统，并于 1981 年 10 月王 1982 年 1 月兼任总理。本篇是他在庆祝联合国成立 40 周年特别会议上的讲话。

联合国要集中解决发展与和平问题

1985 年 10 月 14 日

建议把精力集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试图改革联合国体制，使它适应不断演变的需要是关键性的。一个是发展中国的经济形势，一个是联合国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无能为力。

在 1984 年底，发展中国家债务的总额已经高达 9000 亿美元，债务国不得不开始用收入来还债，使得债台高筑的问题更为复杂。而与此同时，富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却停滞不前。尽管国际发展战略规定，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应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但这一援助在近年来却一直停留在国际发展战略中规定的目标的一半以下。除此以外，国际贸易条件也一再恶化，发达国家还加强了保护主义的做法。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其后果将不仅仅影响到某一个国际集团，而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整个国际制度。必须通过现实和全面的办法来打破僵局。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干旱、沙漠化和粮荒造成的问题正在恶化，并由于非洲的贸易条件恶化和商品价格下降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局势严重威胁了非洲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埃及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第 21 届首脑会议呼吁召开一次部长级特别大会，来讨论非洲的经济问题。埃及同样完全支持它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支持非洲国家努力进行经济改革、执行发展规划以及消除饥饿的威胁。埃及呼吁各个债权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国际银行与债务国家进行合作，以达成一项持续的债务解决办法。

联合国在处理危及和平与安全的危机方面缺乏效率，并不是由于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不能在关键时刻通过决议。尽管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出于人所周知的理由，使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就具体问题通过某些决议，但一系列的决议还是得到了通过。然而，这些决议只不过是“毫无生气的一纸空文，既无效，也无用”。这种现象损害和削弱了联合国。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已经通过了无数的决议。然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仍然生活在占领和军事统治的枷锁下。

在南部非洲，大多数人民继续遭受种族主义政权的暴虐。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可能被用作进行大规模外国干涉的借口——这样一种发展事态可能导致冲突范围的扩大和战争与破坏的升级。

译自《联合国纪事》1986年第1期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前苏联首任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1946至1950年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农机站当联合收割机司机。1952年加入共产党。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62年起历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7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0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1979至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法案委员会主席。1984至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1985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同年8月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1990年3月当选为苏联首任总统。本篇是他在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全人类的利益将是进步的基础

1988年12月7日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全人类的利益将是进步的基础。

意识到这一点，就要求在面对世界政治时优先考虑全人类的价值。

在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间产生战争、仇视、隔阂的同时，还日益加强着另一个由客观决定的过程——形成互相联系的整体世界的过程。

现在，只有通过走向世界新秩序的运动中探索全人类的协调，世界今后才能进步。

很显然，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不能够、也不应该再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这首先说的是核武器，但还不止是核武器。这要求大家、首先是那些力量较强者进行自我限制，并完全不对外界使用武力。

世界上已经形成一种势力，它无论怎样都要促使世界进入和平时期。各国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都真正热切地希望事态向好的方面变化，都希望学会合作。

总之，应该认识到和平时期的必要性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正在变成一种占优势的趋势。

近来，联合国的沟通理解作用日益活跃，再次说明联合国能够帮助自己的成员国应付时代的严峻挑战，沿着国际关系人道化的道路前进。

拿发展问题来说，这确实是个全人类的问题。对人类来说，“第三世界”许多地区亿万人民的生存条件变得十分危险。

这些问题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债务问题。

不要忘记，发展中世界在殖民时代为世界大家庭的繁荣付出了无数损失和牺牲，这些损失都是发展中国家因对世界物质进步作出这一历史性和悲剧性的贡献而蒙受的。现在该是补偿这一损失的时候了。我们相信，出路还在于解决办法的国际化。

如果对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观察，就必须承认：已积累起来的外债不能按原来的条件偿还和索取。苏联愿意确定这样一种方针：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可长期延缓、直至延期100年偿还，在某些情况下并可完全取消他们的外债。

苏联主张在多边会议上具体讨论解决债务危机的途径，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债务国与债权国政府首脑之间的协商。

现在谈谈最主要的问题——裁军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下世纪的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

今天，我可以向你们说，苏联通过了关于裁减自己武装力量的决定。

在今后两年内，苏军人员将减少50万，并将大大减少常规武器数量。

这种裁减将以单方面的方式进行。这与根据维也纳会晤的权限而进行的谈判无关。

根据与我们华约盟国的协议，我们决定在 1991 年之前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 6 个坦克师并解散它们。

还将从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部队集群中撤回登陆突击兵闭及许多其它兵团和部队，包括登陆渡河部队及其武器与军事装备。

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队将削减 5 万人，而在装备方面将减少 5000 辆坦克。

并且，还将对暂时留在我们盟国领土上的全部苏联军队进行改编。军队结构将与今天完全不同，在从军队中撤除大量坦克后，军队结构将逐渐变成单纯防御性的。

与此同时，我们将削减苏联驻欧洲部队的兵员和武器的数量。

在我国欧洲部分和在我们欧洲盟友的领土上，苏联武装力量将减少 1 万辆坦克、8500 门火炮、800 架战斗机。

在这两年内，我们还将大大减少我国亚洲部分的军队集团，根据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临时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相当大一部分将返回祖国。

我们将把我国的防御能力保持在合理的和可靠的足够水平上，使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侵犯苏联及其盟国的安全的野心。

译自《联合国文件集》
庄建明 译 晓平 校

何康，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四川、广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林业部、农业部司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贵在行动

1983年11月8日

主席先生：

自从上次大会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动乱不已，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尽管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些回升迹象，但持续三年多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深受其害。这些都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许多国家农业增长的势头减弱，有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倒退的现象；一些国家缺粮严重，而又无力进口必需的粮食，几亿人民被迫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国际农产品的贸易状况，在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威胁下正在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值出现了连续增长36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外汇收入减少，削弱了他们扩大农业再生产的能力，加重了农业发展的困难；农村经济的持续衰退，又迫使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不仅造成城市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而且还带来了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切都说明，世界性经济衰退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还在继续，远远没有消除。

世界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也再一次证明了77国集团部长会议的这一论断，即：国际经济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它是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紧密相关联的。如果不加以改革，那么在今后世界农业的发展中，还将会重复过去和今天所出现的危机现象。

大家都知道，农业是绝大多数国家民族经济的基础，又是世界上近半数人民从事的主业。所以，在粮农领域内改革结构，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合乎当代历史潮流的。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把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就世界粮农领域而言，我们认为，需要从当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指引下，努力加快发展中国家粮食增产的步伐，配合采取各种必要的综合措施，切实保障世界的粮食安全；本着“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充分的国际磋商和协调，推动国际农业调整，逐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状况；按照“世界农村改革和乡村发展会议”《原则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精神，积极进行适合各国国情的农村改革，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在粮农领域内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不仅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而且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都是有益的。

我们始终认为，世界各国经济是紧密相关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解决、甚至加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会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到头来对发达国家也只会有害而无益。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粮农生产，振兴经济，就可以为它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保证原

料供应，开拓新的市场，并提供广泛的投资场所。所以，我们赞赏有的发达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有远见的观点：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也就是帮助发达国家自身摆脱经济衰退，走向稳定的经济复苏和增长。

主席先生：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贵在行动。我期望这次大会通过平等、友好的协商，为在粮农领域内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而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行动。为此，请允许我根据许多国家发展农业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就农业政策、科学技术和国际合作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要促进农业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照顾全面而又能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农业政策。我的前任林乎加先生在上届大会曾经指出：“农业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农民的问题。”农民既是政策的受益者，又是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因此，一个好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必要从农民的迫切需要和切身利益出发，同时也要兼顾全体人民和国家社会的利益，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不同，农业发展水平也有区别，需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宜的农业政策。一般说来，在经济上，需要采取有利于鼓励和扶持农民生产的价格、税收、贷款以及必要的补贴政策，还要努力改善流通环节，发展商品生产和销售事业，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生产和销售中，稳定地增加收入；在政治是，需要尊重农民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采取措施，发动和教育他们自觉地按政策办事；在法律上，要切实保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在体制上，还需要根据各自的国情，积极采取改革措施，在改革的基础上求发展。所有这些都利于持续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农业的不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业的发展，还应该归功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广，这对于今后世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在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今后要加速发展农业，也必须在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上下功夫。所以，发展农业科学技术，是我们在农业发展事业中的又一个共同的需要。

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应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也要适应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所以有必要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从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普及现有的农业科学技术，并就地总结和推广有效的增产技术和管理措施，把科学技术和传统经验结合起来，看来也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把普及农业科学技术当作一项基础工作来抓，建立和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加强技术培训，逐步做到让每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都能掌握和运用诸如使用良种、化肥、农药等农业科学技术。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和改革农业科学技术，从而创造和发展新的农业生产力，是农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也绝不能忽视。总的来说，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应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而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又应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依靠政策和科学技术，这是发展农业的两个重要课题。我们期望各国农业工作者能在这些方面加强合作，交流情况和经验。我们也希望粮农组织和其它有关的国际机构在这些方面充分发挥它们的支持和协调作用。

主席先生：

我们同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看法，即：当前在粮农领域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首要问题，仍然是保障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今年世界谷物将要减产，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又在上涨，一些地区已出现严重的缺粮现象，非洲的粮食状况尤其令人感到关切和同情。我们希望发达国家从振兴世界经济的大局出发，增加援助，帮助低收入缺粮国家度过困难。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动员起来，推动南北谈判，在粮农领域内认真协商，以便采取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优先生产粮食；并在粮食贸易上达成协议，以稳定的价格，保证市场供应。

认真执行国际农业调整的指导方针，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状况，是我们当前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另一个方面。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阻碍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这种政策，既损害别人，又危害自身的长远利益。明智的做法是：减轻直到最终消除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市场，并以公平合理的贸易条件交换农产品和农业必需品。

我们高兴地看到，粮农组织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了不少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来，采取“面向行动”的方针，通过执行实地计划和技术合作计划，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做了有益的工作。这些都应当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对粮农组织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加强合作的诚挚的愿望。

在过去两年里，中国政府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业发展中，推行和完善农业联产责任制，进一步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多数地区气候条件较好，1982年获得了农业的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3亿5千3百43万吨，比上年增长8.7%，创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油料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开始做到了基本自给；畜牧业、渔业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造林面积扩大，成活率也有提高；农村收入显著增加，农民生活也有改善。今年的农业生产，在全国较大地区发生水涝灾害的不利条件下，粮、棉、糖预计仍可超过去年大丰收的水平。从1979年以来，我国农业持续发展，方兴未艾。今后，我国将根据粮食生产情况，逐步调整或减少我国的粮食进口。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很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要达到公元2000年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设想，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我国政府和人民今后将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按照我们预期的目标，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满怀信心地前进。

在发展我国农业的同时，我们还将在农业的国际交往中，坚持实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不仅要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发达国家加强友好合作，我们还将十分重视加强“南南合作”。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粮农领域内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我们今后将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增产粮食、多种经营和农村综合发展等方面，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互相帮助，我国农村经济正在向前发展，我们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欢迎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时，我们将继续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开展友好合作，从而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主席先生：

粮农组织第 22 届大会的召开，为国际社会在粮农领域进行友好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场合，最后，感谢大家把我选为大会的副主席，我将尽力和大家一起为开好这次会议作出贡献。我和中国代表团衷心祝愿大会取得成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3 年，第 305 312 页

本篇是布特罗斯—加利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的开幕词。

需要充分认识地球的脆弱性

1992年6月3日

现在，我非常荣幸地宣布环发会议开幕。就我们将要在这次会议讨论的各项主题而言，危莫大于服膺于官词之力，自囿于唇舌之势；险莫过于相信或认为只要把话说了，挑战就对付过去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并没有服膺于言词之力。不错，我相信这个时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可以提出三点理由——随着这次全世界都将注意的环发会议的召开，每一点理由都可以发人深省。

首先，让我们设法弄明白这次世界首脑会议的意义。各个国家在这里团结一致，举行聚会，出席聚会的都是各国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受到异乎寻常地团结在一起的各国人民的支持，各国人民决心共同反省，然后一致行动，保护大家的地球。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已经明白我们这个地球以及它所庇护的生命有多脆弱。这就是第一点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它反映出人类反躬自问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过去，个人处身的大自然是如此丰饶，它广袤无垠，令人惶恐。本世纪初的情况依然如此。所有种种胜利都是战胜大自然的胜利，从战胜威胁着穴居人的野兽到战胜隔绝群体的自然距离，无一例外。野兽已被征服，自然距离也已被征服，想到这种种征服，我们可以说，一切科学均渊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人的进步就是逐步开拓、利用无穷无尽的大自然。

但是，“有穷世界时代”业已来临，在此世界，我们被“软禁于家”。这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已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自然已掌握在人类手中。这也意味着人类已战胜环境，然而这一胜利隐藏着危险。最后，这意味着再也没有什么绿洲可以发现，再也没有什么“新边疆”可以开拓，每一次战胜自然的新胜利事实上都将是战胜我们自己的胜利。因而，进步不一定与生命相容；我们再也不能把无穷尽逻辑视作理所当然的道理。对历史学家说来，这次“地球首脑会议”最终所象征的可能正是认识上的这一巨大突破。

这次会议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的另一理由同样激动人心：我们所审视的是一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个人生命期的时间框架。我们进行这种反思，尤其是采取我们要在此为之奠定政治基础的行动，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也不是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按我们目前的速度，我们还可以多浪费地球资源几十年。在酸雨只是逐渐摧毁我们的森林、湖泊、建筑甚至我们自身的情况下，我们尚可以再活几年或者几十年、即使气温上升几度，即使地球生物多样性消减，即使水源污染继续下去，即使地球荒漠化加速，我们都可以承受——我们总会有足够的森林、足够的水、足够的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总有一天，在我们作为个人已不再存在的时候，这种状况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再也不能任其自然，风暴最终会降临在后世的头上。对他们来说，一切已为时太晚。

因此，我们在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身临此地，证明我们打算承认政治意义上的时间——亦即历史——优先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历史。我们来此是为了作长期打算，几十年、几百年的打算。这就是我们在里约所作的集体努力的最崇高的地方。

这一时刻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还有第三点理由，它源于前二者，而且与我有幸领导的联合国有关。本组织和所有寄希望于大同普济的人们一道在此处理的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我们究竟能否表明人类有能力超越以前那个不同时代的冲突而共同努力迎接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呢？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曾经讥讽道：“最糟糕的事情总是一定会发生的。”如果我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未能作出困难而又紧要的决策就在一周之后离去，那么这话可算是说对了。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常规，将我们整个系统提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不管通过什么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此被迫要走向伊斯兰哲人法拉比所预期的道德行星“al-ma'muraal-fadila”，哪怕是仅仅走近一步。

我的倾向是乐观的：首先，我想到过去几年来在国际合作方面所发生的积极的事态发展；其次我想到我们的组织在筹备这次会议时所勉力引发的一切努力、机智和热忱；最后，我考虑到这次会议所具有的影响范围。联合国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至少已讨论了某些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自那时以来，联合国已取得了经验，并培养了非凡的人才，提出了独特的研究报告和评估，它们几乎对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影响。不要忘记，1972年我们是先驱。让我们在以前的工作成就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继续做开拓者。我特别想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进行的工作，也想到联合国系统内许许多多组织的紧密合作，经常荟萃知名人士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以及空前数量的筹备工作。区域或语言集团会议、研讨会、报告、文章和书籍，它们在全世界为我们的工作铺平了道路。所有这些力量都已汇集在里约。说到这里，请允许我向我们的东道国巴西、向巴西政府和热情招待我们的巴西人民表示感谢。自筹备工作开始以来，就可以看出他们真诚和热切地希望环发会议取得成功。

遗憾的是，我不能向每个人道谢。但是，让我至少提一下布伦特兰德夫人的报告，她在理论上的进展已受到广泛注意。我还想提一下筹备委员会主席许通美大使，他具有的宝贵的外交才能再次得到了证明。还有莫里斯·斯特朗和他的小组，他们承担了一种“海格力斯（大力神）的第十三项艰巨工作”。这种热忱和献身精神使我乐观，我的一篇评论的标题为“里约——一项特大型的工作”。特大型的，不错，正像它所应答的挑战一样。因为我们被迫要表现出英雄气概，如果我们成功了，联合国就经受了火的考验，本组织将永远名留青史。但是，在我谈到议程中列明的行动之前，我想首先扼要重述一下在我看来业已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进展。

我不知道推动世界运转的是不是思想。无论如何，离开思想，一切都不可能。因此，我们必须以集体反思作为开始，这也是联合国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因为反思会有风险，即我们将被迫放弃神话，放弃安稳的思维方法和神圣的经济原则。我们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特性，它是我们环发会议的中心概念，那就是发展。发展！这个词享有了空前的荣耀。但是，只是通过本次环发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词才有了它的全部含义。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证明没有能力进一步扩充发展的概念，我们将会面临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如果其中不是掩盖着如此多的苦难和危险，我们真的会哑然失笑，那就是：不发达和过于发达同时使地球遭殃。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科学发展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来扩充我们所说的“发展”一词的含义。我认为，未来这种扩充将朝着两个方向：第一是朝向我们现在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第二是朝向我建议称之为“全球

发展”的方向。我想再次指出，在我看来，这些概念关系到整个世界，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

让我们先来说可持续发展。它可以定义为在资源可再生的情况下满足当前需要的一种发展，换言之，即不危及子孙后代发展的的发展。这是看待发展的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考虑到发展的持续性。它迫使我们认识到，正如南方国家面临保护环境的问题一样，北方国家也同样必须解决过度发展的问题。北方国家，同南方国家一样，未能尊重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举例而言，我们知道全球升温是由一些构成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气体引起的。这意味着富国的生活方式是有害生态的，它们的发展在目前阶段不可能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知道，正是在穷国资源损耗最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不得不过度使用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它们被迫牺牲未来，以勉强维持目前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

因此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人们不能为了保护某种自然资源而不让赖此生存的人们使用该自然资源。环保与贫困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关系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也关系到日常生活，尤其是妇女的日常生活，她们不得不供应家庭需要、水或木柴。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扶贫行动有助于保护环境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们不要再截然划分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经济与生态。任何生态灾害都是经济灾害。而且，这两个词都有一个相同的希腊语词根“oiki”，意思是“家”。戈尔巴乔夫先生曾经建议，欧洲应当成为一个“共同的家”。但是，整个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家”。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logos”，意即“家的科学”；经济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nomia”，意为“家的良好管理”。它们是同一件事。生态，就其本性而言，正是经济的一部分。

这一原则同时具有微观与宏观经济影响。它对价格尤有影响：既然环境退化带来社会资本和社会成本的损失，对这一损失就必须按分期摊销投资的同样办法予以处理。由于自然现在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因而不再将自然视为先天所赐，而将其视为后天得来，将它视为一笔必须不断滚转的投资，就像其它成本、工薪、财政支出和原料一样分期摊销，是相当正常的。通过计人“自然成本”，从长远来说，我们就不仅仅是在保护资源，我们是在提高货物的质量和耐用性，我们是在回收利用废物，最终我们是在节约。生产、消费，还要回收利用：这是未来的三个关键概念。

我想要强调一下第二点理论进展，它由第一点而来，不管我们称之为“新集体安全”还是“全球发展”。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不得不面对安全方面的威胁。不管怎样，安全在演进。简单说来，安全现在越来越不是一个军事问题——因为在一个走向统一的世界里，任何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内战，而且正在获取一种经济和生态的性质。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这意味着按旧词义的所谓“安全”费用，即军费，有一部分必须改用于全球发展项目。其次，全球发展意味着以环保顶债。最后，全球发展包含着一种第三层的努力：技术和资金的转让，特别是要以“谁污染谁出钱”为原则。关于这方面，项目多得很，其中有些项目还包括设立或加强各机构，或者至少设立或加强分配机制。对于这些项目，不该由我来指出孰优孰劣，但应当对其优缺点进行讨论，时刻牢记有必要得出清楚而具体的结论。

因为，我们绝对应当得出具体结论。当然，我意识到其中至少有一些结论偶尔可能与强大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但是我要说，这些利益同其它利益一样，也必须关心长远的未来，也必须考虑到驱动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平等感的固有力量的力量。很简单，还必须考虑到必要性的力量。毫无疑问，谁越富裕，谁承担的责任就越多。北方国家，尤其是它们的公众舆论——我现在正要对这些国家的公众舆论说句话——它们必须认识到，就资金和技术而言，它们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发展的含义，是对可持续发展的补充。而“新发展”就是一种精神和某些行之有效的原则。对于人类如何看待事物、植物、动物，从如何对待随便啜一口即倒掉的一杯水直到种类数目正在急剧减少的动物，都必须有这种新精神。所有这些世界的财富，均非我们拥有之物，而是如圣·埃科于贝利所写的那样，都是从我们的孩子那儿借来的。

现在我要简要谈一下你们议程上的一些具体议题。我的朋友和同事，环发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将会更详细地谈这些项目。

迄今在就《21世纪议程》达成协议方面听取得的进展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表明了普遍存在的善良意愿以及对这份伟大的文件的重视。对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众而言，《21世纪议程》在本年代其余几年中将仍然是一项关键的参照依据。

我还很高兴筹备委员会能够协商一致，同意将《里约热内卢宣言》提交你们。这为《21世纪议程》所体现的主要行动纲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框架。我希望你们能在此通过这一宣言，并且希望，如果一些国家政府表示保留意见，要求你们进一步谈判，你们的努力结果将充实宣言的内容。

更广泛一点讲，我很高兴筹备委员会成功地就如此多的重要议题达成了协议。你们的任务是解决那些未能由筹备委员会谈妥的问题，并对那些仅仅达成原则谅解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精细推敲。

其中一个问题是资源转让问题。我知道已经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所需增加资源总量的数字。但首先需要的是政治意愿。如果有了政治意愿，那么必需的资源就会随之而来，哪怕一时尚无全套财务计划。我希望到本次环发会议结束时，将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将清楚表明捐助国有良好的集体意愿和坚定的决心，要着手贯彻全球发展概念。

我认为必须从同样立场来看待技术转让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当得到必要的技术，以便开创全球发展的新时代。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将诀窍从一个国家转让给另一个国家，或者从一个企业转让给另一个企业的问题，它是一个培养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机构能力的问题，它是一个确保合作进行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问题。我促请各位特别注意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我还希望，在非常重要的森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具体他讲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原则草案——将在这里形成一项协议。在我看来，这些原则是一般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完美缩影。就这一问题业已取得的进展再次表明，各国政府都愿意在这个各自立场难以调和的领域谋求可行的妥协方案。

最后，我想就有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已达成的协议向各国政府表示祝贺，这两项公约不久将在此签署。我想借此机会特别赞扬让·里佩尔和比森特·桑切斯大使。他们为了促成此事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我知道产生这些条款的谈判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有时还有争议。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两项文件对世界来说堪称创举。《生物多样性

公约》清楚地重申了我们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护天地万物，不得毁损。在保护滋养地球的生命形态方面，这项公约是一个转折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起了一个目的在于将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合作进程。最初的承诺水平并不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高。但是这一开端可促成最大范围的参与——这是取得成效的一个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审查过程应可促进承诺。各国现在期望联合国立即组织后续工作。这表明本组织在处理影响实际国家利益的经济和生态基本问题方面能够很好地适应各会员国的需要。

我说过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但是，只有当我们为地球利益作出不懈的努力，这才称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里约环发会议是经过长时间讨论的最终产物，也只有当环发会议标志了一个新的开始，这才称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这是指就联合国系统、各国的行动和动员全世界人民而言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秘书处为本次环发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涉及了整个联合国系统，堪称机构间共襄盛举。同样的工作方法应当指导并激励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

协调行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主持举行的首次会议——彻底审查了联合国系统在实施本次环发会议决议方面的作用。该委员会在秘书长的领导下聚集了联合国系统所有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在这方面，该委员会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巨大责任。

个别机构将本次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视为主要挑战和一次在其各自主管领域内取得进步的新的机会——不管是促进卫生、粮食及农业，推进科学和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为发展提供资金。

同样重要的是，本系统的所有组织都将本次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看成是进行有效集体行动的一次新的机会。从这个观点看，本次环发会议的结果，具体他讲即《21世纪议程》，为确保不同部门机构的行动以及整个系统所具有的进行研究和政策分析、资助发展、提供技术援助的能力，在促进持续和可持续发展事业方面能够真正地互相补充和互相支援，提供了一个共同基准点。

促进这些目标——利用联合国系统的全部潜力来迎接未来的严峻挑战——将是我在本人整个任期内所主要关心的事项之一。

同时，各个国家将是实施本次会议通过的决定和指导原则的主要工具，这一点，无论我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而且，保护地球应该是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参加的一项工作。

在这方面，本次环发会议筹备工作的显著特点就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以及各国政府、科学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之间进行了如此密切的合作，特别令人鼓舞。必须维持并加强这些合作网络。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领域中，比起在其它领域中来，我们更是处于一种即使情况不确定也要采取行动的境地。这是因为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生态系统如何作用，因为有时我们的工作要照顾很长的时间过程；还因为间距一大，因果关系便断绝分离。因此，确保在决策过程中充分注意科学家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将非常重要，在本次环发会议的后续工作中，我们必须找到促进科学与政治对话的创新途径。

我想就此对非政府团体表示特别的赞扬，有一千多个非政府组织派代表参加了本次环发会议。它们为筹备过程出了很大的力——它们努力工作，对

你们的审议工作寄予了很多期望。它们在后续工作中也应起到关键作用。

这些组织代表着在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可以清楚听到他们呼声的世界各国人民。他们有男有女。我注意到宣言草案的第 20 条正确地重点突出了妇女——经理和工人、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妇女。

我将这次环发会议视为一项全球范围的广泛努力。在筹备过程中，各种力量——国家和地方当局、生产者和消费者、社会团体，以及许多其它各方——参与形成共识，本次环发会议现在应当巩固加强这种共识。只有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我们才能成功地达到目的。

我们的里约会议已经在全世界唤起了空前的关注。它使世界各地人民为之神往。

作为秘书长，虽上任伊始，但也意识到各国政府、尤其是各国际组织力量有种种局限，我希望我称之为“里约精神”的东西——即地球精神——将遍及全世界。“里约精神”应当体现对地球脆弱性的充分认识。“里约精神”应当引起我们不断思考未来，思考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宣布本次环发会议开幕时，当我祝你们工作成功时，我深为感动的原因。让我用下面这几句简单的话作结束：世界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仰仗大家；对于自己，对于别人，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地球——对于所有相互依赖的生命形式，大家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或不作不为，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本篇是布特罗斯—加利在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的开幕词。

会议讨论的是对地球上
今世和后代的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

1994年9月5日

我们今天在作为东道的、全世界注视的永恒之城开罗开会是一件历史性事件，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首次在一个这样的级别讨论一些对地球上今世和后代的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

本会议对于至关重要的人口问题是一个转折点，因此，会议取得的成果将对为解决该问题而决定采取努力的方向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会议具备必要的政治意志，一定能够为积极的方向创造巨大的动力，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援。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意志，会议就很不幸地只会产生更大的分裂和疏远，甚至会产生危急情况。如果我说不但人类社会的未来取决于本会议，而且我们所生活的地球的经济秩序的效率也取决于本会议，这并非言过其实。

今天这个重大会议要审议的是具备广泛提案和建议的一项全面和综合的行动纲领，目的是要解决目前最严重的问题：贫穷、发展、环境、妇女地位、今天的儿童和未来的主人翁成长的条件、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其它与各国人民目前和未来福利有关的问题。

如果会议能够通过这项纲领，它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创造了必要的动力，不但可以确定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的方针，还能保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满足其要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正挑战。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大家有责任予以最充分的利用。

事实上，今天召开的国际会议是联合国成立以来不断进行的一项长期和广泛分析的结果。宪章在其序言部分中坚决重申国际社会“促成大自由中社会进步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意志。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在1946年设立人口委员会，激发世界组织首次审议这项题目。联合国大会本身很早就负起了人口问题的责任，并在这个领域制定了历次的“发展10年”等一些具有深刻影响的行动原则。

联合国也建立行动机构协助各国的人口政策。在这方面，大家都认识到人口基金发挥的作用。人口基金25年来在世界不同区域和在不同专题领域执行方案的广泛性，说明了其活动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感谢长期辛勤工作、使这次会议顺利召开的所有人们：基金的工作人员、秘书处的各部门、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各机构及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主任纳菲丝·萨迪克博士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大家确实已深切了解到，国际社会用什么方法处理人口问题必须是在最高一级调动所有会员国进行广泛辩论的题目。这是过去大约20年来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到墨西哥会议就这个题目举行的各次国际会议所起作用的结果。

今天在开罗开幕的会议标志着国际社会审议人口问题的一个新的和重要的阶段，也证明了决定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这次审议的意志。

但是我也要指出，必须从联合国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的所有国际会议这个背景来看本次会议，才能充分体现其意义。

我曾多次强调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性。大众舆论和新闻媒体往

往只通过联合国为和平和国际安全服务所发挥的作用来认识联合国。当然这些活动很重要，而且值得继续鼓励。然而事实依然不变，这些活动只占本组织工作的大约 30%，本组织的其它任务大部分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我也要强调，国际社会对其集体未来进行的审议基本上是对人类命运的审议。在整个会议中我们必须时时牢记这点。事实上，我们在里约热内卢一起讨论的正是人类与其环境的问题。我们在维也纳思考的正是作为权利拥有者的人类。

人类与其社会发展将是我们在哥本哈根辩论的中心。

通过妇女地位和妇女状况考察人类问题将使我们明年聚集在北京。

这个世人关切的问题，通过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很明显地体现在今天的开罗会议上。为我们定下的各项目标反映了下列重大问题：

- 人口、持续的经济成长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有什么联系？
- 我们应当对人口增长和结构采取什么态度？
- 如何能够保证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
- 家庭应发挥什么作用？
- 如何可以减少儿童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
- 我们如何能够保护老年人的尊严和幸福？
- 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最佳办法是什么？
- 如何能够控制国内和国际的移徙行动？
- 非政府组织在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上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显然，这是些极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坦白他说，即使在我们必须讨论的最技术性的问题的背后，也可以隐约地看到社会的选择。因此，对本次会议产生的忧虑、迟疑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回避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一个理由。如果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论坛都不能处理这些基本问题，那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联合国为了忠于其使命和宗旨，必须考虑到各种意见和信念，向各国提供一个讨论的自由和开放的框架。因此，随着本会议的开幕，向大家提供一般模式或现成答案的人绝对不是我。然而，我确实相信，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我有责任请大家以卓有成效和积极的精神对待这个国际会议。

在这方面，我想向大家提出的不是一项工作方法，而是一些我要称为的“行动原则”。我觉得我可以用我提请大家注意的精确、容忍和良心这三个基本词语概括为开罗会议敲定基调的这些原则。在这里，我要向大家略为一谈这一行动原则。

我们必须遵守的精确性指的是尊重事实的精神和知识上的精确。

今天世界有 56.3 亿人口。每年世界人口几乎要增加 9 千万。联合国预测，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是 79.18 亿至 115 亿。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人口增长大部分集中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目前有 50 亿人、即世界总人口的几乎叨叨是住在世界上最不发达区域。如果不采取行动，这种情况在今后可能恶化。因此，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果每天有 337000 名新生儿大部分在发展中区域出生，而且很多是在不能忍受的艰苦和贫穷的情况下出生，我们如何能够坚持宪章所构想的社会进步的要求？

考虑到这些不可逃避的现实，无动于衷和不采取行动对于宪章精神是真正的犯罪。我们必须实施、鼓励和支持国家、区域和国际人口政策。因为简单地说，只有通过我们的干预和决心，我们才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维护我们从今要对其负责的后代的未来。

不允许依赖某些自然法则，换言之即容许战争、灾害、饥荒或疾病来调整世界的人口增长。

必须支持各国为控制人口增长所作的努力。我们这样一个会议的目的不但要估量过去 10 年取得的进展，而且还要制订更好的将人口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的方法，正如我们会议本身的题目向大家作出的敦促。

然而，我们又必须从最广泛和最全面的角度来审议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其根本原因。事实上，人口政策与卫生、营养和教育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在这方面，我要强调这些政策必须分配给妇女的作用。教育和动员妇女是全世界的所有人口与发展政策取得成功所必需的目标。

我深切了解到在某些情况下拟订和执行这些政策可能与某些观点或传统相抵触。正因为这样我才愿意强调应当指导我们的第二项原则——容忍原则。容忍就是需要这样的会议高度尊重各种文化和信仰，因为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关于人口与发展的会议既会提出社会问题，也会引出道德问题。

从社会观点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谓的“人口”并不是一批不加区别的人群。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个传统。人口由多种关系组合而成；在人口中，每一个社区都值得我们尊重，而家庭就是它的核心。而最重要的是，人口包含各种不同的信仰，我们的讨论应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人口也是一群人民和一群个人。因此，我们切勿忘记将我们的会议与人民权利的基本概念联系起来，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政策必须与人权始终一致。

去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我有机会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以及人权的绝对方面和偶然方面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也应适应同样的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特别是当我们处理会议最敏感的问题时。因此，我要求你们各位都能容忍和尊重在这次讨论期间可能对某些问题所表示的敏感性。

这种容忍必须以尽可能强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它不应导致审慎的妥协，不彻底的折衷政策，空泛的解决办法，或更有甚者——哄骗我们沾沾自喜的各种声明。同样，我们应避免陷入荒谬而过时的文字争执之中。这种容忍还必须是相互的，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将某种哲学、道德或精神信仰施加于整个国际社会，或以之阻碍人类的进步。

换言之，我们会议的成功取决于我们为克服我们表面的分裂，我们临时的分歧、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障碍而作出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指定良心为我们会议的第三项行为原则。

良心的传统定义是指个人真正认识和判断自己的能力。而这的确就是我们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们对自己必须首先具备的认识，就是对我们的判断自由的认识，以及对所有男女都有权根据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在尊重别人的自由和社会规则的情况下度过和管理自己生活的认识。世界各地的男女不仅必须有权而且必须拥有手段选择他们个人及其家庭的前途。

这种作出决定的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必须加以保护和鼓励。不然，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这里我具体地想到的是妇女的地位——将会遭受最悲惨的后果。但是，只有在鼓励男女承担责任的环境中体验这种自由并将它付诸实践，这种自由才可能是名符其实的。

因此，只有通过自由和责任的结合，在一个关注人身尊严和社会前途的家庭环境中，个人才有可能充分地发展。但是，我们对自己必须具备的认识也包括对我们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我们往往只是通过危机、武力或威胁——在最消极的情况下，由于移民潮或难民潮——才意识到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们目前关于人口与发展的辩论应使我们更好地体会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个人的共同命运，而且是人类的共同命运。还应使我们各自的本国舆论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会议还应当帮助我们——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希望——充分担负起我们对后代的责任。我们所谓的“人口”实际上不过是人类旅程的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时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它使我们回到我们即将举行的辩论之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也就是如何执行尊重所有人的自由的人口政策，而同时又确保后代享有和谐的发展和共同的社会进步。

因此，开罗会议是国际社会在探讨当前现实的同时又指出其共同前途的路向的罕有而重大的时刻之一。

开罗会议也是我们对后代承担集体责任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最后，开罗会议是表示我们决心共同掌握世界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前途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本篇是布特罗斯—加利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1995年3月6日

主席先生，

阁下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在哥本哈根开幕的世界首脑会议标志着整个国际社会对社会不公平、排斥和贫穷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时刻！

一个社会、以越来越大的步伐向前迈进，却把10亿男女老幼置于路旁，陷于完全绝望之中，这的确是不能容忍的事。

在我们庆祝联合国5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反躬自问：我们已经充分信守宪章的诺言了吗？我们已经遵守50年前在旧金山所作出的“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的庄严承诺了吗？

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今后所处的全球经济结构具有许多危险，其中包括破坏个人之间的传统团结关系，将某些国家、甚至地球上某些区域整个排挤到边缘，因而进一步扩大富国和与穷国之间的差距。

因此，我们今天有迫切的义务设想出一个集体生活的新方案，一项全球性的社会契约，以便给全世界的国家、民族，男女人士带来希望的具体理由。

我们今天宣布开幕的这个世界会议就必须本着这个观点来举行和理解。

联合国大会在1992年主动决定召开这个世界首脑会议时，乃是希望借此庄严申明：必须把社会发展列入国际社会绝对优先的事项之中。

我们这个首脑会议所订的目标确实证明了这种决心。

如何消灭贫穷？如何对抗排斥和社会分裂？如何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如何激发新的国际团结？

所有这些被关心的问题都清楚表明，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起源于国际社会若干年来对其集体前途和人类的未来所进行的深入思考。

实际上，我们在里约共同讨论的就是人类在其环境中的问题。我们在维也纳讨论的就是人类享有的各种权利。开罗的人口会议的中心问题就是作为集体生命的人类。我们今年9月在北京开会时，仍然要透过妇女的地位和处境来讨论人类问题。

我们要在此地辩论的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本身就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一点假设。

因为对社会发展的讨论乃是庄严申明，人类只有在公平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充分实现其愿望。

对社会发展的讨论也是申明，没有社会进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进展。

对社会发展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国际社会决心对今天的世界作出意义最强烈的“政治”反应。

基于这个理由，我深信联合国应该在这个时刻开始作出这个反应。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了解，并不存在任何独特的模式或现成的答案。但我们可以制定我所说的“优先目标”，而且我认为，这些目标可以体现为三种

紧急事项：

——保护社会上的个人；

——促进社会融合；

——确保社会安宁。

我想花费一点点时间同各位讨论这三个优先目标。

保护社会上的个人是我们这个会议的深远目的。我觉得，我们开始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不忽略促进社会发展与保护人权两行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白宣示了人权的领域。1966年的两项《盟约》，特别是我在此地重新指出其重要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中更加坚定地重申了这个领域。几年之后，就是从这个前提中产生出关于发展权利的基本概念。

在联合国大会所引起的这一规范性演变中，社会发展的概念占有一个根本的地位，而且我还要设法在这方面指出联合国为了增进人类的利益而塑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的团结概念。

基于这个概念及其根据的价值观，我们今天有迫切的义务对抗世界上的贫穷。

实际上，我们必须记得，在此时此刻，有13亿人民生活在赤贫之中。我们还必须记得，有15亿人民得不到最基本的保健。而且我们知道，最容易受贫穷之害的人是妇女。因为妇女占全球穷人的70%以上。

我们还必须强调，虽然必须在全球对抗社会不公平现象，但世界各个区域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样严重，一样普遍。

《最后宣言》草案很正确地坚持了这一点，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都很危急，需要注意并采取特别的措施”。

我们只有继续不断考虑到世界上这些现实情况，才能在哥本哈根确实充当所有要求促进社会正义的人士的代言人，充当全球社会政策的行动者。

我要向各位提出的第二个优先目标是促进社会融合。

全世界各地正出现排斥和处于社会边缘等令人担忧的情况，听以尤其需要这个优先目标。

因此，为了争取社会融合，首先必须摒弃自我主义和冷漠态度。同时必须消除全球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不论其原因如何。此外，还必须呼吁大家容忍、团结、动员。最后必须对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必要的教育，以便在社会上立足。

因此，世界首脑会议很正确地强调消灭贫穷、谋求社会融合与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就业在今天是融合的一个必要因素。反过来说，失业则是一种排斥的方式，造成社会各种不良现象同时出现。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按照处于这种情况之中的男女人士的迫切期望，采取最紧急的行动。

这是我们的主要责任。但这也是一种集体责任，因为这种行动必须动员全世界每一个社会行动者。

首先，国家有责任制订有力的社会政策。社会发展需要政治行动，尤其

是在立法和规章方面。

但是，除了国家之外，社会发展也是这个世界组织全体的事务。因为有一个团结原则只能在国际一级考虑。长久以来，联合国系统一直致力促进社会进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许多机关和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许多专门机构都在这方面进行过先驱工作。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方案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非政府组织卓越的动员能力以及私营企业和投资者促进融合的功能。

因为只有一切机构和一切诚心诚意的人士都参加工作，才能实现持久的融合，而持久的融合是社会安宁的要素和凝聚力所在。

确保社会安宁是我要请各位一起讨论的第三个优先目标。

实际上，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很明显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和谐的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的目的之一就是具体实施社会的愿望。

但在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蓬勃的社会环境是政治稳定本身的一个条件。因为一个充斥不平等现象和特权的国家可能容易发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动乱。一个国家，如果阻止适当的社会融合并造成许多人被排斥，就不能不担心会爆发完全预料不到的社会灾难。我们必须非常明白地说：政治的宁静局面与社会的安乐是相辅并进的。

此外，今天我们知道，联合国必须面对的武装冲突大多数是从国家内部产生的冲突。我们也知道，其中大多数冲突都是由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造成的。今后，我们必须再次肯定促进发展与保障和平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关系。

但是，我想借此机会同各位谈一谈，重新指出我从这个观点出发而产生的对不可缺少的民主制度的重视。

民主可以说是和平与发展之间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民主是和平的一种保障；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期望有持久的社会发展。

主席先生，

阁下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刚才之所以一直从联合国所追求的伟大目标的观点来讨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是因为我深信我们造福人类的行动所根据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也是因为我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深知我们对后代所负的集体责任。因此，我希望这个世界组织能具备必要手段，来保证这个会议的成果以及在此地通过的重要决议都能在各各国和各国人民之中实现。我殷切希望布雷顿森林机构充分参与我们在此地即将重新制订并重新发表的社会行动计划。

因为我们即将在此地、在哥本哈根讨论的社会发展方案等于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宣告：

反对危机不可避免的理论！

反对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

反对世界分裂！

我们将社会发展问题提高到全球优先事项的地位，希望这样做就能够掌握国际社会的集体命运，并缔结一项全球性的团结盟约。

本篇是布特罗斯—加利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的演讲词。

**现在比过去更有可能合作
解决世界上各种社会弊病**
1995年3月11日

各位来到这里，就表明你们对社会发展的承诺。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各国领导人聚首一堂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消灭贫穷、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加强社会结构。

这个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并非偶然，因为我们的东道国不仅由于它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传统，而且也由于它的慷慨的国际援助政策，而见称于世。

我谨代表参加首脑会议的全体人士，向丹麦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

世界上生活在贫穷之中的人、每天工作只能餬口的人、在混乱局势中过活的人——这些人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到此地。

但是，有生产性事业、待遇优厚、态度乐观的人也必须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到哥本哈根。

今天各种严重的社会弊病——犯罪、毒品、疾病、不满、城市的腐化和教育水平的降低——都有其社会渊源，对最广义的人类安全都有社会后果。

这些社会问题，从前可以限制在国家疆界以内，现在却蔓延到全世界。解决这些问题，曾经被视为国家政府的专属责任，现在却达到全球的规模，需要全球加以注意。

现在是开会并采取行动的时刻了。全世界已经接纳市场经济及其无限的潜力。我们亲眼看到若干国家崛起而全面发展的辉煌例子。但同时，最穷的国家却不能依循那个模式，必须先具备基础，而这种基础必须得到别人的帮助才能奠定。在许多社会里，仅靠政策决定无法带来清洁用水、卫生、基本教育和保健、法治与人权。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比过去更有可能进行合作。东西方的分歧已经消失，南北方的对抗逐渐化为一种更全面的考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新挑战不是对抗，而是差异——能够自食其力的国家与不能自食其力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需要国际社会合作。

我在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强调需要全球一级的一项新的社会契约。在法律上，一项契约常常被形容为兼具精神和文字，首脑会议议程的精神尤其必须反映国内和国际的团结心。这样一种团结心不容许享受特权的人忽视贫穷、脆弱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

社会契约的文字包括缔约各方必须遵守的条文。我们将通过的首脑会议宣言中所反映的承诺将要求我们参与一个行动纲领。你们来到这里，给首脑会议的成果带来巨大的政治力量。你们出席会议，不仅象征所涉问题的严重性，也最能保证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必将产生具体结果。

我们必须不辜负大家对这个首脑会议所寄托的希望。只要有决心捐弃我们的歧见，合力谋求共同的利益，就会得到成功，但只有有关各方日复一日耐心而坚毅地努力，才能得到真正、持久的成功。这种成功需要所有的行动者联合起来，协力争取同样的目标。各国政府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它们需要同等家、议员，基层和宗教组织、工会、社区团体，商业机构，科学家和非

政府组织携手合作，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和人士对这一事业已经有很大的贡献。

在首脑会议以后的时期，我们必须一起继续作出集体努力，帮助所有国家、社区和人民塑造一个更美好的共同前途。

我本人保证竭尽绵力帮助实现首脑会议的理想，并使联合国成为执行首脑会议的决议的有效工具。

我们忠于宪章的目标，努力增进人类的幸福。我们恪遵各国的托付，促进和平与发展。我们为后代的利益着想，协力缔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可以骄傲他说：这是我们的世界。

六、中国与联合国

导言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毛泽东在 1945 年曾指出过：“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33 页。）

在联合国筹建初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民主力量，在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应有地位的斗争中，同反动势力作了积极有效的斗争。1945 年 4 月，经党中央决定，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唯一代表，参加出席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的努力，当时的中国代表团为制宪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然而，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的百般阻挠，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被无理剥夺，从而造成了联合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期年的失误和悲剧。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坚持正义的主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49 年 10 月 15 日，正当联合国第 4 届大会在成功湖举行时，周恩来曾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严正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大会根据宪章的原则开除国民党非法代表，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的合法代表。

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操纵，联合国从 1950 年第 5 届联大到 1954 年第 9 届联大相继作出决议，对新中国竭尽诽谤之能事。此后，于第 14、16 和 20 届联大上，又相继作出了反对中国的非法决议。

人们在记忆中留有深刻印象的是，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总部联合掀起了一场“玻璃大厅里的风暴”，即第 26 届联大将一项由 23 个会员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机构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是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第 26 届联大终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同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各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与联合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坚持原则立场，采取灵活的策略，在联合国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世界所瞩目。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选收了多篇演说，再现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复杂的进程。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演说，充分反应了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所进行的斗争。我国政府代表的多次演说，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和良好愿望。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伍修权 1950 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演讲。1950 年 10 月 23 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出席安理会讨论并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会议。伍修权在大会讲坛上以确凿的史实、严密的逻辑，病斥了美国一向侵略中国、武装侵占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强盗行径。这篇演说的成功之处在于通篇充满正义、公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威风。与此同时，伍修权的演说充分表达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极大地增进了

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赢得了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同情。伍修权的演说为中国人民争得了荣誉，一时间曾传为佳话。

斯特芬·威尔勃洛夫斯基，波兰代表团团长。1944年波兰新闻部司长。1945年至1947年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任大使。1948年任波兰外交部秘书长。1954年为波兰教授。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5届大会上的讲话。

立即从朕人逐出国民党集团

1950年9月19日

波兰代表团来到大会后，又看到不代表任何人的国民党集团代表用中国人民代表的名义来此申述错误的主张，深感惊讶。这幕死人舞蹈的滑稽剧——“中国代表权”问题，已经延续一年以上了。被他们本国人民驱逐出境的一小撮政客，竟企图以人口约达5亿之众的大国人民的名义来发言。我们当中谁也不怀疑这一集团过去及现在的真正性质。甚至如此固执地支持这个冒险家集团的美国政府，在它最近发表的国务卿艾奇逊自己所提出的白皮书里也不得不说：国民党这批贩大走卒不但为中国所唾弃，而巨是腐败透顶的。

让我们考虑联合国宪章对一个参加联合国的代表团所要求的资格吧。国民党集团是一个政府吗？肯定他说，不是的。这个集团，或者说这个团体，仅仅是一群冒险家的聚合；这些冒险家虽然有外国干涉来支持，却已被他们本国人民驱逐出境了。它仅仅是由于外国的干涉才能盘踞着残余的小块中国领土的一个集团而已。事实上，这个集团甚至在这一小块领土上都不能行使政权。从美国开始占领台湾（福摩萨）之时起，国民党便甚至不能讨求丝毫权力了。

这样的团伙能够承担任何义务吗？当然不能，因为它并不行使任何政权。

最后，国民党团伙是否能够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呢？它能保卫和平吗？显然不能。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从蒋介石匪帮的性质便产生了否定的答案。这个集团对于在亚洲继续进行战争感到兴趣。这一点已在许多场合下得到证明，而且蒋介石本人也一再证实了它。蒋介石的目的便是战争，因此，他的目标是与联合国的目标相冲突的。这种不代表任何人的人，这种戏弄联合国的权利并且剥夺这些权利的人，还应继续坐在我们中间吗？

大会已听过国民党代表的发言，他企图诽谤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而且要求承认他自己为中国的代表。显然该国民党代表还没有读过他的保护人——美国所著的白皮书。

大会已听过一个并不代表任何人且肆意诽谤他自己国家的人的发言。他们这样浪费我们的时间，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难道这不是戏弄我们的组织吗？

造成这样可厌、这样可悲的景象，其实际原因是怎样的呢？现在的情况完全归咎于美国政府的政策。由于美国政府之赐，国民党集团才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意愿。中国人民在挫败了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后，已经赶走了美国保护者在台湾给予援助与庇护的冒险家。中国人民已经通过了判决书。这是对国民党集团的判决书。如果美国正企图用它的大炮支持国民党集团，它这样做就是为了推行它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干涉的政策。显然的，美国的计划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是不能以和平方法来实行的。让国民党集团苟延残喘是与战争挑衅者的计划密切相关的。

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常年报告中论及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时曾说：“这是一个法律和宪章上的问题，它已在联合国中引起了严重的危机。”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更进一步的后果。值得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国民党代表团伪装中国代表的事继续下去，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得到一个结论说：一个拥有近5亿人口并有其自己政府的国家却没有权利参加联合国。联合国内没有中国代表出席，就将使它的全部工作成了问题，它的活动将瘫痪，并导致联合国构成上一个严重缺陷。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条，有国民党集团代表参加的大会，就不能认为是正当地组成的。我们正在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和作决定。为了扫除使我们的组织不能正当地执行职务的障碍，我们必须首先从大会会场内逐出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把这些虫蛀腐朽的傀儡们自联合国组织中清除出去已经到了不容再延缓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代表出席我们的会议，也已到了不容再延缓的时候了。只有在那个时候联大才能正当地工作。波兰代表团最郑重地抗议国民党集团出席大会。波兰代表团同时并支持苏联要求立即自联合国大会上逐出国民党集团代表的建议。

摘译自波通社《电讯稿》1950年9月21日

小宇 译 王思君 校

阿·雅·维辛斯基，前苏联法学家、外交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0至1953年间在苏联外交部担任领导工作。在联合国建立初期，他多次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大会议。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5届大会上的发言。

美国的侵华政策必以失败而告终

1950年11月27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众所周知，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正式对美国第七舰队发布命令，在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为借口的掩饰下，对中国的台湾岛采取暴力行动。美国军队就这样横暴地蹂躏了国际公法的一切准则和原则，而非法地占领了台湾岛及其海域，且像对待被征服的地区一样地驻扎在台湾地区，驻扎在这个中国的岛屿上。

并且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台湾一向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的事实最明显不过：许多世纪以来，台湾就属于中国；就台湾岛上居民的民族成分而言，按最近的统计，98%为中国人；最后，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签订过的若干国际协定。苏联代表团曾经提请政治委员会注意开罗和波茨坦关于台湾的同际协定、关于台湾归属中国的协定；这些协定都是美国在上面签了字的。

美国当局及其盟国实际上经常使用日本人对台湾的称呼，把台湾叫作“福摩萨”。虽然这不是日本的岛屿，而是过去曾被日本人占领、现在却被美国人占领的中国岛屿。因此，我在任何地方都将称“台湾”，而不说“福摩萨”，因为“台湾”是它的民族称呼，谁也没有这个权利来破坏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至少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的说明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一，毫无疑问，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决不容许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美国庄严地承担的义务；三，承认企图在占领军当局或联合国组织监督之下而不是在中国政府监督之下在台湾建立行政当局，就意味着使台湾脱离中国，而违背上述义务。

然而，美国政府却不顾自己的声明，横暴地违背了它在开罗和波茨坦面对台湾所担负的义务，夺去了台湾，并派军队加以占领，从而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蛮横无理地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目前，像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大会全体会议讨论关于把“福摩萨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时所表明的那样，美国统治集团是企图假借联合国的招牌、联合国的旗帜，联合国的名义，来掩饰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台湾岛的侵略行动，正像他们在朝鲜所做的那样，这就是利用若干安理会理事国的非法决议，把它们强行说成是安理会的决议，而我们早就证明过这是粗暴地违背联合国宪章所根据的原则而通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评判那样一个国家的行为呢？它以武装部队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海，对该国的海岸或海岸的一部分实施封锁，以武力威胁合法政府，同时并干涉这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对这种行为的评判是无可置疑的。对这种行为的评判只能有一个，而且是完全确定的一个，这就是显然的侵略。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是支持如今已经破产了、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国民党集团所进行的反对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美国统治集团干涉中国内政，是有其悠久历史的。这个干涉行动是长久以来一再实施过的，而目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台湾岛实施的那种非法行动，只不过是美国统治集团以军事装备武装国民党反动派、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干涉行动的一长串锁链中新的一环而已。

美国政府所称美国武装部队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台湾的声明，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要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还在这种干涉中公开使用自己的军队，这种事情本身就充分证明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证明了苏联对美国统治集团类似的非法侵略行为的控诉是正义的。

美国政府为了达到自己对中国的目的，便采用一切措施来加强与反人民的国民党集团实行的合作。

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敌人，美国统治集团就以中国民主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的身份出现，以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不可调和的敌人的身份出现，毫无顾忌地残暴地破坏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的主权。姑且不论美国承认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追求着深远的目的。其一便是要避免国民党集团被逐出其最后的巢穴——台湾岛，并从而使美国保持一种可能性，使它能利用这个岛屿作为美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并进而侵略远东的军事基地。

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杜勒斯先生，又将在这里重复那些关于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国家主权的同样虚伪的言论。我不知道，他在如此横暴地破坏和违背这种原则和这种立场的情况下，将怎样辩解美国获取台湾、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的、事实上的政策——美国统治集团目前实际上正在实行的政策。他大概又将引证社鲁门先生6月27日发表的所谓这一切措施都纯粹属于预防性措施之类的声明了。

其实，在所有这一切纯属捏造的、虚妄的解释之上多费口舌是没有必要的，事实是绝对明白的。要不是歪曲关于法律与主权的一切概念，要不是嘲弄国家主权与人民的自主权，怎么能够说一国政府会对其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进攻”呢？

显然，这种理由是虚妄的、捏造的，因为根本谈不到一个合法政府的武装部队对其自己领土的进攻；而国民党集团则是不顾4亿7千5百万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所明确表现的意志。而非法盗名擅行政府职权的一群乱党。同上面所说的一样，说什么未来“台湾地位”问题尚未解决，说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留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留待对日和约的缔结，或留待联合国审议这一问题等等，这些理由也都是虚妄的、捏造的。并且就在同时他们又竭力使这些问题迁延下去，破坏一切使有关各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解决的企图。

不是别人，正是麦克阿瑟将军，竟在不久之前还无耻地、露骨地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图——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台湾变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大家知道，麦克阿瑟的话并不是随便说说的，麦克阿瑟的话现在已化为美国武器的炙热的金属了，他并不是在用言语作战，而是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作战；他也不是为了有关别国的领土完整的那种目的作战，而是为了作为美国全盘外交政策基础的侵略目的和侵略计划作战的。而且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些话和命令并非简单地是什么孤注一掷的军事狂人、军事冒险家的发言或文学练习而已。这是支配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的一位总司令的话，他的一言一语足以使成千上万的人丧生，足以使无数的城镇乡村毁灭。

美国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好像它对台湾的侵略行动是由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导致的军事必要所引起的。如果说事实确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也并不能使美国侵略中国的行动成为合法，因为谁也没有赋予无论是美国政府或任何其它政府以权利，为了不论何种目的，尤其是为了保证自己武装干涉朝鲜的利益来破坏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在我们所谈的情况下，就是中国的领土完整。

我们认为，以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为藉口来解释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是牵强附会的。实际上，现在第一委员会所审议的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乃是早已存在的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的政策继续，这个政策，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许久就已被他们采用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便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不用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并不止于在台湾侵略中国。从本质上说，这只不过是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侵略计划的一连串侵略行动中的一环而已。美国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及其民族解放斗争的仇视，是人们所共知的，而且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这种仇视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参加外国干涉者武装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即本世纪初有名的所谓“义和团运动”。在最近的中国内战时期，美国统治集团的代表毫不隐讳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敌视，花费了数以 10 亿计的美元，以美国武器武装过去反对、而且现在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美国统治集团不甘心中国人民的胜利，不甘心自己对华政策的失败。可是我以为：似乎已经是甘心干这个事实的时候了，似乎已经是甚至表现一点远见并从而得出一个相应结论的时候了，这个结论就是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赞成停止一切进攻——这种进攻无疑地必将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

节译自塔斯社纽约 1950 年 11 月 30 日《电讯稿》

沈永林 译 刘枫 校

伍修权，中国湖北武汉人。曾用名吴寿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后在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1年回国，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著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

中美人民的深厚友谊

1950年12月16日

我听了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先生在11月27日政治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发言。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支持和拥护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先生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全部发言。

我也听了美国代表杜勒斯先生对维辛斯基先生发言的答辩。杜勒斯先生对于维辛斯基先生的答辩，以及奥斯汀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发言和他对于我在安理会发言的答辩，还有英国代表乐伯先生为美国代表的辩护，所有这些发

言、答辩和辩护都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经不住驳斥的。他们说了一大堆话，但是不管他们说的是历史也好，是哲学也好，是政治或经济学也好，他们总不能自圆其说，其根源就是他们坚持侵略，坚持为侵略辩护；他们要把侵略说成是防御，把反侵略说成是侵略，把战争说成是和平，把是说成非，把黑说成白，不管他们有多大本领，究竟是办不到的。就拿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来说吧，他们能把一个摆在台湾海峡的庞然大物——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第七舰队说成是并不存在吗？他们能把美国成千架飞机几百次的侵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侦察的事实说成是并未发生过的事吗？不能。

不能这样做，也得这样做——这就是杜勒斯先生、奥斯汀先生和其他美英集团的代表们在这里的使命。

杜勒斯先生装成悲天悯人的若子，一开头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说起。好，我们就来谈谈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吧。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不是存在深厚的友谊呢？是的。我在纽约的时候已经说过：“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从未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现在我还要强调说，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仅过去有过深厚的友谊，现在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这个友谊将来还是要存在下去的。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杜勒斯、奥斯汀、艾奇逊、杜鲁门先生们所说的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之间的所谓“友谊”是毫无相同之处的。杜勒斯先生和奥斯汀先生在他们的发言中花了不小气力来证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于中国人民友谊的存在。据杜勒斯先生说，这种友谊主要的不是从美国对华的商业利益出发，而是从文化和人道的利益出发。据说150年来，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对华关系都是如此。在历史上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所谓友谊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所作的文化和人道的努力有些什么实际内容，他们在中国的朋友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

这150年的历史证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一贯侵略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所谓友谊，不过是侵略的别称；他们在中国所作的文化和人道的努力，实际上只是实现这种侵略的手段；他们在中国的朋友，从满清皇帝、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吴佩孚、曹锟直到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都是帮他们进行侵略的助手。

举世皆知，美国政府目前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是蒋介石。蒋介石是美国帝国主义最好的朋友，但蒋介石却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不是正好证明美国帝国主义者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敌人吗？

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所谓“友谊”的最好说明是杜勒斯和奥斯汀先生在这里所宣扬的对美国的所谓援助。美国政府有没有“援助”中国呢？有的。但是美国政府所“援助”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援助他们镇压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美国政府这种所谓“援助”的后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用美国武器屠杀了几百万中国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从来就存在深厚的友谊，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的却只是侵略。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和美国统治集团从来就没有什么友谊，有的却只是仇恨。这种仇恨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美国帝国主义这种侵略中国的政策已经走上了武装侵略的阶段，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正遭受着被破坏的危机，但是悲天悯人的杜勒斯先生，是谁在破坏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呢？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统治集团，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是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把美国的青年送到台湾海峡和中国领空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难道曾经有过中国的舰队开到美国海峡准备向美国人民作战吗？难道曾经有过中国飞机飞到美国领空轰炸美国的妇女和婴儿吗？难道提议考虑使用那罪恶的武器原子弹去毁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不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吗？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侵略已由历史上隐蔽迂回的形式转变为干脆露骨的武装侵略的形式。

台湾确定不移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解放台湾乃是对于自己的领土行使主权，是严格的中国内政问题，不容许任何外国政府干涉。但杜鲁门总统却公开派遣了美国武装力量，决心阻止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分明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干脆露骨的武装侵略，但是美国代表们和他们的喽罗们却说台湾的地位“是过去属于日本的领土之一，其处理，如其它过去属于日本的领土一样，依然是一个国际关心的问题”。这些美英集团的代表们忘记了台湾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台湾的居民是中国人，受到中国政府的管辖。只是到了1895年才被日本抢去的。它的处理不仅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早已决定，而且在战后实现已经5年了。美国代表奥斯汀先生说美国侵略台湾是为了使该岛“在军事上中立化”。但根据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来作为美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和侵略他国领土的理由。

说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在内战中对抗南朝鲜反动集团的反攻是一种侵略，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撒谎；但美国政府对于南朝鲜的武装侵略就是依靠这一个天大的撒谎来掩盖的。我们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们：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一次内战，那时林肯总统曾经领导过北方诸州的武装力量进攻到南方诸州去，美国代表是不是认为这就是北方向南方的侵略，林肯总统是领导这一次侵略的最大侵略者？我们还要问一问美国的代表，前不久中国人民有过同样的经验，1946年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破坏了国内和平，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内战，1948年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在打退了蒋

介石的进攻以后转入反攻，把战争推进到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去，美国的代表们是不是也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侵略？

美国统治集团可以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却是看得清楚真实的。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在内战中对抗南朝鲜李承晚反动集团的反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什么，侵略。真正的侵略者是藉口反对北朝鲜对南朝鲜的所谓侵略，把它的武装力量开到朝鲜去进攻朝鲜人民的美国政府、美国统治集团、美国帝国主义者。

美国统治集团企图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来掩盖它对于朝鲜内政的干涉，但是这种做法同样是骗不了人的。美国代表团惯于引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几个决议作为法律依据，但是所有这些法律依据根本就是非法的，不管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一支由美国军队和少量帮助美国的外国军队组成的正在对朝鲜人民作战的军队，其目的根本不是什么反侵略，因为朝鲜人根本不可能侵略朝鲜人；也根本不是为了完成朝鲜的独立与统一，因为世界上从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笑话：一个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要由另外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去强制地完成。不是的，这一支正在向朝鲜人民作战的军队，其目的是征服全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大陆，而且像我已说的那样，它已经开始在进攻中国大陆。

美国政府的侵略台湾和它的侵略朝鲜确是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美国政府的武装干涉朝鲜可以作为美国政府侵略台湾的理由，而是美国政府的侵略台湾和侵略朝鲜都是美国政府进攻中国大陆全套计划中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侵略了朝鲜、在朝鲜向朝鲜人民进行战争的那一批人，正是侵略台湾的同一伙侵略者。美国既然同时发动了对中国领土台湾和中国邻邦朝鲜的侵略，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同时，在志愿的基础上援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呢？我在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听到过无数这样的空话，说什么目前在朝鲜打仗的军队，没有任何意图侵略中国的东北国境，而且据说联合国和安理会多数会员国准备把这种保证写在决议案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还不放心呢？这简直是把中国人民当作白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愿意保证美国军队在朝鲜绝不侵略中国边境的国家，正是那些主张美国第七舰队留在台湾海峡继续侵略中国的国家。假如说有一个和美国敌对的外国，它的一支军队武装占领了夏威夷，它的另一支军队正在进攻美国的邻邦墨西哥，但这个侵略了美国夏威夷的外国侵略者却来向美国人民保证说：你们不要惊慌，我们在墨西哥的军队，绝不会侵略美国的领土。大家想一想，美国人民能相信这一个侵略者和它的助手们的保证吗？

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和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制止美国侵略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直接与间接的侵略行为。但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庄严，联合国对于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中国邻邦朝鲜的侵略行为有义不容辞的制裁的责任。

选自《联合国第五届大会》

阿卜杜拉·雅各布·比沙拉，科威特人。海湾阿拉伯国家委员会秘书长。早年就读于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和英国巴利奥勒学院，分别获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1971年任科威特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后为代表团团长。本篇是他在联合国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中国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

1971年11月15日

我作为亚洲集团11月份的主席和作为科威特的代表，极为愉快地欢迎作为伟大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

经过22年非法和无理的阻挠之后，10月25日（星期一），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这一进展的取得，是由于中国政府过去20年来表现了耐心、慎重和明智，也是由于在国际事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服从现实和接受事实的意旨。

正如外交官们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如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等紧迫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不论是谋求实现宪章中所规定的目标和宗旨的联合国也好，或者是有着不同制度和政策的世界各国也好，都少不了中国。

而且联合国作为反映世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和人民的愿望的一个组织，今天更带着普遍性了。对和平的谋求有了新的动力，对建设性合作的谋求找到了途径，和解与缓和的倾向获得了新的支持力量，我相信，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在这个新时代中，对话将代替对抗，妥协将代替固执，通融将代替极端。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没有实现的愿望之一就是看到一个他所说的“公开达成公开条约”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渴望这个时代的到来。

但愿后代能有这样的记载：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同其它国家一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而大力地、富有想象力地工作以后，伍德罗·威尔逊的未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

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她是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摇篮，这种文化以理想鼓舞着世界，并使世界的财富更加丰富多彩。富有精神价值和道义价值的丰富多彩的亚洲文化，应该大大归功于中国人对人类价值所作的令人鼓舞的努力。

值此机会，我的代表团代表亚洲集团，并以科威特政府的名义，在这愉快的时刻向伟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她的人民和她的所有领导人祝贺。我们希望在加强联合国的理想和崇高目标方面同中国代表团合作。

译自《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讲话》，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1版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米兰·克鲁萨克，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长。毕业于布尔诺大学，1948年起进入外交界，曾先后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欧洲办事处代表（日年瓦），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国际维和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部副部长等职。本篇是他在联大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正义事业的胜利

1971年11月15日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占有她的国家的合法席位的时候，我谨代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国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欢迎。我怀着满意的心情这样做，是因为在那些企图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人进行了 22 年的顽固的和非法的阻挠之后，联合国终于承认和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正义事业已经胜利了，并且像我们经常强调的那样，这尤其对我们组织本身有利。

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同历史事实和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相反，我们为做到这一点不得不进行如此长期的斗争。这再一次证实：宪章、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不可能被侵犯。对普遍性原则的忠实、尊重正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这不仅有利于联合国，而且尤其有利于这个组织必须为之服务的各国人民。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团的压倒多数在大会的第26届会议上投票，最终解决了关于完全和无条件地恢复中国的唯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它所属一切机构中的合法权利并驱逐不代表任何人的蒋介石分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动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

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强调我们的坚强信念：我们不久将能够解决那些妨碍在联合国实施普遍性原则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代表其发言的国家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有它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合法的独有权利一贯而坚定地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这一要求是根据中国人民通过 1949 年胜利的革命斗争所造成的历史实际。历史的发展已经完全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22 年来一贯坚持的原则观点的正确性。它也证实了我们这些国家立场的正确，我们曾经说过美国和它的朋友们极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只能有损于这个组织的工作，有损于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能。大会本届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和围绕着通过这个提案所进行的斗争，更清楚地证实了美国 and 那些支持它的立场的人们对长期拖延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个问题所负的责任。

在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上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时候，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将提高这个组织的效力，使之对于解决有关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有关裁军的问题，对于我们在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最后消灭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所有残余以及争取发展和加强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共同斗争中加倍努力，作出贡献。

译自《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讲话》，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1版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罗伯特·法克，荷兰外交家。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1945年进入外交界，曾在荷驻澳大利亚堪培拉、驻波恩使领馆工作过。1970年5月起出任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本篇是他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联合国向成为真正的、普遍的
世界讲坛迈出重要的一步**
1971年11月15日

我代表西欧和其它国家，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高兴地和已经发过言的人一起，欢迎到这里的会议厅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不管我今天讲话所代表的会员国集团中各个政府的态度和意见怎样，它们对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晚上所采取的历史性决议的意见是坚决一致的，当时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它们还一致认为我们所珍爱的这个世界组织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现实，到现在已经22年了，她的政府在这整个时期有效地控制了中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我们的组织中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我们的秘书长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就使联合国有一种不自然的气氛。我们的组织，用宪章的话来说要成为“一个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已经很清楚，没有一个世界组织能胜任这个基本宗旨，如果在它中间没有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的话——这个国家不仅代表了数亿人类，而且也许特别有着在世界的许多地区起重大影响的，古老而值得尊敬的文化。

我们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们来到这里的会议厅，无疑地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有更大的权威。特别是当各方面都表现出真正的政治家风度，在这里的所有会员国的政府都继续把接受联合国的宗旨作为它们的指导原则的时候更是如此。

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的代表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致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代表团的来到将有利于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加现实的世界组织。在我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生活和工作，将使我们的组织向成为真正的、普遍的世界讲坛迈出重要的一步。而在这个讲坛上，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能自由和平等地为所有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改善、为保护我们星球上的文明生活而工作。

在我的发言结束前，如果我能代表荷兰王国代表团再讲几句的话，我愿意向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事们说，我的代表团期望不仅在联大的这次会议上，而且当然在以后的年代里，在联合国内外，同他们在广泛的课题上进行合作和交换意见。我的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欢迎中国代表团，并且希望和预期我们的新同事们在参加我们的共同生活之后，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作出大的贡献。

译自《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
讲话》，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1版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迈赫迪·姆拉尼·桑塔尔，摩洛哥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曾在法国留学，曾任摩洛哥外交部非洲司、美国司、国际司和政治司司长、驻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大使等职。本篇是他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欢迎杰出的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1971年11月15日

自从10月25日（星期一）这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以来，联合国大会一直耐心地等待这个今天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杰出的代表团的到达，并最终在曾经被非法剥夺了2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上就座。这是本届大会里所有一向认为联合国的普遍性是联合国获得成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的代表们的不倦努力和不断的、坚定的行动的重大结果。他们一向认为，那个伟大的国家未能在理应属于它的席位上就座是再也不能容忍的不公正的事，它不能不危及我们组织的力量对比和损害国际范围内的任何协调一致的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涉及国际合作、经济发展、通商和人员互访，还是——更有理由的是——涉及解决使霸权宣告无效的问题，还有人民自决权、全面和彻底裁军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等问题。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包括我们本国摩洛哥在内，多年来，不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这一点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而且还在合作和贸易方面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常常成为友谊的最好基础。阿拉伯世界有着正义和人道主义的事业需要保卫。因此，阿拉伯国家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同第三世界的国家（它们是第三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肩参加它们正在进行的这场全面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为了争取自由，争取被压迫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争取全世界更好地共享繁荣。我们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国际安全的宣言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行事的。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的想法和行动是相同的，是同参加本组织的大多数友好国家协调一致的。

今天，代表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我们的工作，参加我们的艰巨任务，这肯定会丰富和有助于本组织的以下行动：通过使各国人民恢复合法权利，通过消灭侵略政策及其后果来发展全世界的和平；最后通过开诚布公的、互惠的和平等的经济合作来增进全人类的福利。

在这愉快的时刻，我谨代表本集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表示祝贺，我愿在这里向代表那个国家的代表团来到我们中间表示欢迎并祝愿他们取得成功。我还想提一下，我高兴地看到代表团的成员中有黄华先生，黄华先生过去在驻开罗使馆工作期间就已经是我们一位十分杰出和卓越的同事了。可以肯定，在他担任常驻代表期间，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关系仍将和以前一样。我愿向他保证，他将发现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兄弟国家的代表团都将本着同样的考虑，本着同样的襟怀坦白和开诚布公的精神、在联合国宪章的支持下，来实现我们的和平合作和促进友谊的目标。

译自《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讲话》，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1版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本篇是乔治·布什代表东道国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中美两国人民有着长远的友好联系

1971年11月15日

美国同其它国家一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乔副外长、黄大使及他们的同事来到联合国。

在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我们希望，他们的来到将对本组织协调各国的行动的能力作出贡献。人们对在最近几周内使大会发生意见分歧的那些原则问题有很深的感觉，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了艰苦的奋斗。不应该因这些分歧而看不到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在内——几乎都同意的一种看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美国人民同伟大的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好联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实现世界和平与正义。我们在这里将同抱有同样希望并愿意为实现这一希望而合作的人们共同作出不懈的努力。

译自《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讲话》，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1版

王德华 译 荣桃 校

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智利外交家。曾在智利、乌拉圭和德国就读或进修。进入外交界后，曾任驻萨尔瓦多、加拿大使领馆外交官，智利外交部新闻文化司、国际组织司司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本篇是他在联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联合国吉祥的预兆

1971年11月15日

我愿意宣布，拉丁美洲集团的主席将发言，但是我的代表团也希望能发言。

智利人民和政府兴高采烈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排挤、迫害和非正义的对待，现在这种情况得到了纠正，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以中国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资格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是表示我们这个组织和这个国际机构的前途吉祥的预兆。我们认为，这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并且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长期的令人厌倦的过程终于进入了本届大会，打破了世界上敌对的势力强加于它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这种敌对势力同在另一个时代入侵中国、瓜分中国、奴役中国和剥削中国的那种势力非常相似。在恢复那个代表团的权利的过程中，各国——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愿是起作用的根本因素。这些国家深信，我们促成了历史的转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可能走向解决像裁军、非殖民化以及非常穷的国家和非常富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到联合国来就好像他们是从月球或者火星上来的——是素不相识或神话般的人物——人们要知道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想些什么，他们做什么梦。事实上，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他们已经为他们自己找到了未来的立足点。

我们可以稍为回想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图画书里的中国苦力，他们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剥削最重的人，很遗憾，他们非常类似目前不发达世界中受到蔑视、剥削和陷于贫困的千百万无产者。如今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 and 革命活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

我们在欢迎人类四分之一的代表的时候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这样肯定会增加它的权威和效率。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合作下，普遍性将会进一步发展，新的国家将会进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希望，在南非和葡萄牙枷锁下的受苦的人民很快会拥有自由的国家并且来到联合国，我们对他们的苦难感到痛心，我们在联合国中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来到。

决心走自己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智利人民和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所代表的一场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致敬。我们向与苏联——又一个社会主义巨人和人类进步的支柱之一——并肩站立的一个辽阔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致敬。

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工业、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能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技术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俭朴的生活方式。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智利伟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年轻时参观过革命成功之前的中国一座城市的鸦片烟馆。他写道：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溶合起来。让我们引他的一首词：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遵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参加我们的工作的。这些原则的基础就是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和互利。我们知道，它是遵循万隆精神的。我们知道，它并不想得到一个核超级大国的特权，虽然它一定会履行它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义务。我们深信，它将会对国际安全和有效的和平作出巨大贡献，它将会帮助满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的迫切需要。

智利从一个不结盟国家的立场出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我们反对军事和政治集团，反对划分势力范围，反对出现卫星国。我们认为不应当为了某个大国的利益而建立国际关系。

我们认为不结盟国家有责任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一切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不管其制度如何。因此智利决不会支持将扩大世界上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的任何做法。相反，我们将始终准备促进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知道它们关系的疏远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悲剧，它们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将构成对和平、进步和加强联合国工作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贡献。我们知道，只有帝国主义才会从它们的分歧中得到好处。

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有两重性。它既是铁老虎，又是纸老虎。智利像其它小的附属国一样，正在为争取完全的主权、收回自己的天然资源和实行自决而斗争。但是它正在同一个恫吓、威逼和妨碍它的强有力的铁老虎进行斗争。

既然联合国正在变得愈来愈强大，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将被推翻，对人民的剥削将被互相尊敬和国际合作所代替。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担负的巨大责任以及在中国来到我们中间以后我们自己负有的责任。联合国恢复了活力，它正在得到新的活动范围，我们将能够满怀信心地希望这个组织真正变成世界决策中心，自由、正义和人民的进步将得到保障。

译自《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讲话》，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1版

王德 译 荣桃 校

本篇是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30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对若干国际问题的一贯立场

1975年9月26日

主席先生：

自从29届联大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笼罩着世界大部分地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亚非拉各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奋勇前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另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缓和的词藻掩盖不了严峻的现实。战争的危险明显地在增长。

本届联大要审议的问题很多，中国代表团愿意就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反殖问题

过去的一年，是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继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崩溃和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光荣诞生，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殖民主义在南部非洲的最后堡垒完全陷于坚持斗争的广大非洲人民和国家的围攻之中。

但是，老殖民主义还没有完全死亡，两个超级大国早就插手进来。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支持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殖民统治。而苏联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钻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力图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纳入社会帝国主义的轨道。

安哥拉的内战是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所痛心的。民族解放运动内部有分歧是正常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劝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殖民主义者赶走。所以，非洲统一组织对进行武装斗争的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都给予承认和支持，为促进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苏联领导以民族解放运动的老子自居，不顾安哥拉三派组织达成的团结对敌的协议，通过它的宣传机构，封这一派是革命的，骂那一派是反动的，蓄意制造分裂。它还向安哥拉的一派运送了大量武器，包含重型武器。这样就挑起了安哥拉的内战。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不甘落后，安哥拉的局势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中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安哥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安哥拉三派解放组织，我们都给予了军事援助，援助他们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我们知道他们有分歧，我们一直劝他们团结对敌。在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同葡萄牙达成独立协议以后，我们就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组织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这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苏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丝毫掩盖不了事实真相，恰恰暴露了它自己。

苏联挑起的安哥拉内战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就好在它是反面教材。任何一个革命运动都是难免经过曲折的。我们相信，广大安哥拉人民经过挫折和曲折，一定能够坚持团结，坚持斗争，挫败超级大国、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实现自己的独立和解放。他们的暂时困难和牺牲，将不仅大大提

高他们自己的觉悟，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非洲形势一片大好。正是由于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者被逼到墙角，南非的沃斯特才提出南罗少数白人政权同津巴布韦民族解放组织进行“对话”的主张。这绝不表明这些种族主义者的强大，只能表明他们的虚弱。他们企图通过这样的手法，来瓦解民族解放运动，保存白人反动统治。最近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一针见血地指出：“沃斯特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施展的缓和阴谋，是阻挠多数人统治和解除自由战士武装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诡计。”会议强调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号召津巴布韦人民立即加强武装斗争，并表示决心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同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战斗，直到把它们完全消灭。我们热烈支持这一正确立场。我们历来主张，用革命的两手政策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武装斗争是根本，不管谈与不谈，人民的武装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对付反革命两手政策的复杂斗争中，有时会出现偏差，走一些弯路。但是，人民会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南部非洲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最终一定能够赢得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

二、朝鲜问题

自主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多年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和平统一祖国，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和主张，并且在它的倡导下，在1972年就自主和平统一的三原则，同南朝鲜当局达成协议。1973年，联合国大会确认了这些原则。但是，由于朴正熙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背弃了这些原则，破坏南北会谈，朝鲜至今仍然陷于分裂状态。

今年，在印度支那人民的伟大胜利的冲击下，美帝国主义慌了手脚。它不厌其烦地重复朴正熙集团捏造的所谓“来自北方的南侵威胁”的谎言，人为地渲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甚至扬言将不惜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朴正熙集团更加猖狂地推行民族分裂政策，接二连三发布“紧急法令”，宣布战争状态，加紧镇压南朝鲜人民。似乎朝鲜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实，这完全是庸人自扰。现在看清楚了，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制造借口，欺骗世界人民，使美军继续赖在南朝鲜不走，把朝鲜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朝鲜半岛如果有什么战争危险的话，那绝不是来自坚持自主和平统一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是来自不断叫嚣“胜共统一”的南朝鲜当局。

今年，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声称“愿意”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但是，这个决议草案只字不提撤退在南朝鲜的外国军队。显然，它的企图是打着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幌子，使美军留在南朝鲜合法化，制造“两个朝鲜”。美国妄图把朴正熙集团塞进联合国，就是这个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清楚，这样的提案，不管它讲得多么好听，根本不可能导致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这个提案。

我们一贯主张，朝鲜问题应当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阿尔及利亚、中国等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撤走打着联合国旗帜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由朝鲜停战协定的实际当事者签订和平协定来代替停战协定。这个提案还提出了南北双方消除紧张、防止军事冲突、促进形势正常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这个

提案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它不仅符合全体朝鲜人民的迫切愿望，而且有助于根本改善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局势。

联合国军司令部是一定要解散的。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非法的，是美国的一个侵略工具，实际上，它也早已成为一个美军司令部了。

但是，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同撤走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联系在一起。不然，光是换一个名字，其它一切不变，这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军队不管以什么名义继续驻在南朝鲜，都是违反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原则的，只能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本来应该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的三个月内就加以讨论和解决了。由于美国历届政府的阻挠，一拖就是 22 年。为了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 17 年了。现在，在朝鲜北方没有任何外国军队，而美国军队却还赖在南朝鲜不走。美国究竟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呢？

朝鲜不能永远处于停战状态。美国代表提出的由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建议召开停战有关各方的会议，来讨论维持停战协定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朝鲜停战协定已经存在 22 年了，还要准备维持多久？同时，谁都知道，朝鲜停战协定的有关各方，实际上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已撤出朝鲜，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各方也都已风流云散，这个会议如何能开呢？至于在这个会议上探讨召开更大范围的会议来谈判更加根本性的安排，岂不是更加不切实际吗？1953 年停战后，根据停战协定规定，本来是应该召开一次高一级的政治会议来解决朝鲜问题的。但由于美国的破坏，连预备会议都未能开成。后来，到了 1954 年，朝、中双方又在日内瓦作了很大努力，推动召开高级政治会议，希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得以实现。当时，美国代表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拒绝将来重新就朝鲜问题进行任何新的讨论。这样，美国就一手关闭了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大门。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由朝鲜停战协定的实际当事者进行协商签订一项和平协定，来代替停战协定，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20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朝鲜不断发生紧张状态的根源是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因此，签订和平协定，代替停战协定，撤走全部美国军队，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

美国说，南北朝鲜之间没有一个正常的国际边界，停战协定及其所规定的非军事区万万不能改变。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朝鲜只是处于暂时的分裂状态，朝鲜南北双方之间不应该有什么正常的国际边界，只能有一个临时的分界线。既然朝鲜南北双方都同意互不使用武力，而用和平方法解决统一问题，难道就不可能在和平统一实现之前，商定一些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认为没有停战协定，朝鲜就会打起来，这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草案，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能认真审议并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三、中东问题

自从 10 月战争以来，中东局势又陷于“不战不和”的局面。这是两个超级大国违背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在各方面进行激烈争夺的结果。

在这期间，埃及和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分别签订了脱离接触的协

议。最近，埃及和以色列又签订了第二个脱离接触的协议。但是，中东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主要在于两个超级大国。在 10 月战争以来的近两年内，关于如何解决中东问题，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提供了“全盘解决”和“逐步解决”的主张，并且竭力提高自己、贬低对方，把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朋友。其实，美国固然没有彻底解决中东问题的意图，苏联更谈不上有什么彻底解决中东问题的打算。请大家想一想，在 10 月中东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和以后，它连已经答应了的武器都卡住不给埃及，而且还要逼人还债。像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国家，怎么可能相信，它会真心诚意地支持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呢？

两个超级大国都需要在中东维持一个“不战不和”的局面，打一下，停一段；打是有控制的打，和是有控制的和。它们利用这种局面，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战略要地和石油资源。它们利用这种局面，贩卖军火、牟取暴利，以图减缓自己的经济困难。它们利用这种局面，试验新式武器，准备新的更大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

关于中东问题，20 几年来在联合国内外，达成过数不清的协议。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看，究竟哪一个协议得到了以色列侵略者的严格遵守，哪一个协议改变了中东的根本局势呢？没有，几乎没有。从根本上说，决定中东前途的，不是纸上的协议，而是人民的斗争。目前值得重视和警惕的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局势挑拨离间，企图破坏阿拉伯的团结。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千万不要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一贯反对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将继续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把反侵略、反霸权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裁军问题

裁军问题是个老问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的时候，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关心裁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欧安会以后，苏联领导特别起劲地叫嚷要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鼓吹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彻底裁军。这是利用世界人民的善良愿望进行政治投机。这是别有用心心的骗局。

一切尊重实际的人都可以看到，在欧洲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缓和，有的只是两个超级大国全面的、激烈的争夺。欧安会刚刚闭幕，苏联就侵犯了挪威的领空。难道这不是又一次证明所谓缓和仅仅是一句空话？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吹嘘什么把缓和加以扩大、加深和普及，这只能叫人笑掉了牙齿。

苏联最近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又鼓吹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削减 10% 的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这是苏联的自鸣得意之作。它的代表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向我们宣传过多少次了。但是，他至今没有告诉过我们，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究竟是多少。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花几年的时间。要真正按照苏联的建议，把军费减下来，更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苏联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成语说，叫作“画饼充饥”。真的要让发展中国家等待这种援助，岂不是

要“索我于枯鱼之中”？

中国对于裁军问题的观点是大家熟悉的。我们赞成裁军。但是，我们赞成的是真裁军，不是假裁军。我们反对假裁军，更反对苏联企图用裁军会议的帷幕，掩盖扩军备战的真相。现在，两个超级大国走向新的世界战争的步伐正在加快。在这个时候，不管用什么形式召开一次裁军会议，其结果只能制造和平假象，欺骗和麻痹世界人民，束缚广大中小国家的手脚。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关于世界裁军会议，中国坚持它早就提出的立场：会议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必要的先决条件。明确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决不是什么限制战略武器。必要的先决条件是，所有核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核大国即苏联和美国，必须首先承担明确的义务，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必须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火箭核武装部队，拆除设置在别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现在，超级大国连对无核国家不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最起码的义务都不肯承担，又怎么能说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帝国主义的裁军烟幕放得越多，战争的危險就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经过了近7年的筹备，举行了近3年的大规模的国际裁军会议，讨论了成百上千的提案和建议，但是得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扩军，不是裁军；是战争，不是和平。这个会议唯一的作用，就是使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吃了大亏。

我们认为，联合国不应当重蹈国联的覆辙。

此外，像大家所预料的一样，苏联在本届联大又提出一个“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这是老货色，新包装，是它企图保持核垄断的又一个花招。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大家清楚的，我们就不准备重复了。至于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制造什么比核武器还要厉害的新武器，其目的无非是舍近求远，转移视线。让那些准备制造这种武器的人去讨论吧，不必拿到这里来吓人。

五、发展问题

自从六届特别联大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革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的合理建议和设想。石油输出国勇敢地顶住了超级大国的恐吓和威胁，坚定地把石油资源和确定石油价格的权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许多国家对跨国公司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主权的措施。各种原料生产国组织纷纷成立。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综合商品方案、价格指数化等一系列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在经济领域内，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形势一片大好。

对于发展问题，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立场是第三世界主张的，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主权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改革少数大国剥削第三世界的旧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另一种立场是超级大国主张的强调剥削国家和被剥削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国际分工”，力图维

护旧的经济秩序。工业发达国家和原料生产国家是不是相互依赖呢？是的。自从出现单一的世界市场以来，就存在着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问题在于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相互依赖。人骑在马上，也可说是一种相互依赖。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被骑的是马，而不是人。至于谈到“国际分工”，其实质同“相互依赖”是一样的。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这个世界就产生了新的国际分工，它使地球上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但是，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剥削美其名曰国际主义，这种观念只有社会帝国主义才想得出来。在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究竟存在不存在剥削，要不要结束这种剥削，这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对第三世界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工业发达国家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对话，另一种态度是对抗。自从石油输出国运用石油武器以来，一个超级大国不断对它们横加指责，挥舞大棒，甚至叫嚣要进行武装干涉，妄图压服这些国家。另一个超级大国从旁帮腔，说什么石油不能单方面提价，并且威胁说，石油问题的尖锐化将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爆发。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态度。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事实表明，这种态度不仅吓不倒人，反而加强了石油输出国的团结，坚定了它们的斗争意志。我们赞成对话。一年多来，第二世界的许多国家同第三世界一系列国家进行了多次对话的尝试，有的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结果。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的联系加强了。这是当前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好现象。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工业国家的转嫁危机，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善它们的贸易条件，发展民族经济，提出了综合商品方案、价格指数化，国际金融机构民主化等建议。这是完全合理的，是最起码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遭到了少数主要工业国家的反对。因为这触犯了它们所谓的自由市场制度，而这个制度据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们提出了一系列所谓“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实际上，当今的所谓自由市场，自从垄断资本出现以来就是不自由的。这个市场只是对垄断资本和工业大国是自由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自由的。例如，在60年代石油和许多原料的价格压得那么低，这是由于供求关系决定的吗？不是。这是大垄断资本人为地，也就是所谓自由地决定的。要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就必须触动这种损人利己的自由市场制度。否则，不管超级大国提多少具体方案，准备拿出多少钱，就其实质来说，只能是一种施舍，一种救济，最多只能减轻一点暂时困难，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剥削和控制。贫穷的根源依然存在。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仍然要继续扩大下去。

石油武器打开了经济领域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新局面。石油斗争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关键就在于坚持团结，敢于触动那些工业大国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各种原料生产国都应当组织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斗争。有人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一种垄断组织，一种卡特尔。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卡特尔、托拉斯、跨国公司是工业大国首先发明的，并且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呢？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进一步团结起来。确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最困难的国家，其它国家应当更多地帮助它们，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最困难的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遭遇，面临着共同的任務。把最困难的国家说成是“第四世界”是没有根据的，或者是别有用心。世界上没有什

么救世主。要发展民族经济，就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治独立是得来不易的，一定要发挥国家主权的作用，逐步地但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和一切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几百年的掠夺和剥削而形成的。要彻底改变这种秩序，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第七届特别联大是第六届特别联大斗争的继续。反剥削的斗争是长期的。团结起来，坚持下去，我们发展中国家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主席先生：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意简单地谈一谈我们对审议联合国宪章的意见。我们是赞成审议联合国宪章，并且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改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联合国内外的形势变了，联合国宪章当然应该作相应的修改，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这是常识。许多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宪章的某些规定提出了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例如：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缩小安理会的权力，改变安理会的组成，限制或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等等。我们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联合国宪章是用人的手制订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由人的手加以修改呢？但是，超级大国对于联合国内改变了的形势，惶惶不安。一个超级大国把联合国大会的民主表决说成是“多数暴政”。另一个超级大国更进一步，它一听到审议联合国宪章几个字就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大骂赞成修改宪章的人是“反动势力”。它唯恐它滥用否决权的特权被剥夺。我们奉劝这位“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安静一些，不要那么气急败坏。如果你确信你手中有真理，为什么怕人家反对呢？修改联合国宪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认为，只要大小国家本着一律平等的原则，共同协商，反复讨论，总应该可以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的解决办法来。如果有人还要蓄意阻挠，那只能使人们看得更清楚，谁是少数特权的维护者。因此我们主张，把审议宪章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选自《乔冠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
第30届会议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韩念龙，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1934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政治经济系。曾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新四军和华中、华东野战军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51年后，历任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第34届大会上的发言。

80年代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979年9月27日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第34届联大主席表示祝贺。我衷心祝愿，在你的主持下，本届联大的工作将取得积极成果。在这里，也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热烈欢迎圣卢西亚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相信她在国际事务和联合国工作中，一定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主席先生：

本届联大是本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届会议。我们即将跨入80年代。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感到鼓舞，也感到责任的重大。

过去的10年是不平凡的10年。第三世界进一步发展壮大，标志着10年来国际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又一批被压迫民族经过长期斗争，赢得了国家独立。广大新兴国家的人民。坚决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它们不仅在政治上要求完全独立，而且决心在经济上摆脱依赖地位和落后状态，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显著的成就。它们相互配合，加强合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它们还为反对大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军备竞赛，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广泛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世界各国加强联合，坚持斗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联合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两个大国想为所欲为地企图主宰世界命运是办不到的。

在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日益觉醒、力量进一步壮大的同时。西欧、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发达国家面临霸权主义侵略和扩张的威胁，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也在提高警觉，加强联合、充实防务。它们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形势的有利发展，也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形势发展中令人不安的一面。10年来，两个超级大国日益激烈争夺，造成国际形势不断动荡尤其是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更加咄咄逼人，侵略性和冒险性显著增长。它打着“裁军”和“缓和”的旗号，却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疯狂扩军，无论是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无论是在陆上、海上或空中，都力图夺取压倒优势，它凭恃着急剧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在全球推行“进攻性战略”。它越来越多地利用代理人，组织雇佣军，肆无忌惮地策动武装入侵和军事政变。为了包抄欧洲，极力控制战略要道，攫取战略资源，加速推行其扩张政策和称霸全球的战略部署，它正日益把侵略矛头指向非洲、中东、海湾和东南亚地区。种种事实表明，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是当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根源，是新的世界战争最危险的策源地。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议论着“更加动荡的 80 年代”，议论着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对人类的未来，我们是乐观主义者。80 年代既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相信，人民终归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但更重要的是变革现实。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霸权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和平不能等待，不能靠祈求来取得。和平只能用斗争来争取，用行动来保卫。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印度支那三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正义事业。面对印度支那局势的日益恶化，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不感到严重关切。我们认为，联合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首先要迫使越南立即全部从柬埔寨撤军，停止对柬埔寨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继而解决其它有关问题。在东南亚联盟 5 国的提议下，本届联合国大会将要审议柬埔寨局势问题。我们坚决支持东盟 5 国以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正当要求，外国军队必须立即全部从柬埔寨领土上撤走，这是解决当前印度支那问题的关键。印度支那问题，必须在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排除一切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由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自己解决。

主席先生：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国家自主和平统一的神圣事业，坚决反对制造“两个朝鲜”、妄图永久分裂朝鲜的行径。第 30 届联大通过的关于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的决议应该得到认真履行。美国应当从南朝鲜撤出全部军队和军事装备，停止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解散。这样做将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

最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舆论普遍承认要维护中东的稳定与和平，必须尊重阿拉伯的民族利益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这反映了真理所在，大势所趋。应该指出，目前这种趋势的增长，是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长期坚持正义斗争的结果。而最终实现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目标，也只有主要靠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强团结和持久斗争。但是，联合国组织在推动解决中东问题上，也应该起它应有的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这里，我们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强烈谴责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扩张和争夺，强烈反对超级大国在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阴险图谋，强烈反对以色列阻挠中东问题全面解决的蛮横态度。阿拉伯被占领土必须收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他们重返家园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必须实现，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世界各方能够互相谅解，恢复团结，共同奋斗，从而加速自己的胜利的到来。

主席先生：

迅速结束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已成为非洲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一年来，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在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又有了新的发展，给予南非、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日益沉重的打击。它们为了垂死挣扎，对内加强法西斯军事镇压。对外武装侵犯非洲邻国，并且不断玩弄政治花招，妄图用改头换面的

办法继续维持种族主义统治，保持既得利益。近几年来，国际上曾经提出种种关于通过谈判解决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倡议和建议，许多非洲国家为此作出了重大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由于种族主义势力坚持顽固立场，这些谈判迄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实充分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是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根本障碍。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应该对种族主义者施加有效的压力，积极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早日结束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统治。实现真正的多数人统治的独立，有助于稳定南部非洲的局势，排除外来势力的插手和干涉，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前国际形势对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十分有利。南部非洲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还会有困难和曲折，但他们只要坚持团结，坚持斗争，警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在非洲以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就一定能够战胜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势力的倒行逆施，赢得整个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

主席先生：

我们高兴地看到，去年的裁军特别联大以来，联合国组织和广大中小国家在争取真正裁军的斗争中的作用有了加强。今年，联合国先后召开了裁军（审议）委员会首届会议、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些会议的召开，反映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的强烈不满，同时表明，由少数国家控制裁军机构的局面正被打破。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这些会议，并提出了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建议等文件。我们一贯主张：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也不论是否拥有核武器，都有权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解决；再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把联合国当成为某些双边谈判歌功颂德的场所；再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把裁军机构当作他们手中任意玩弄的工具。

核裁军是人们十分关切的问题。我们一向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实现核裁军，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根本途径。在此之前，所有核国家都应该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至于如何实现具体的核裁军措施，正如不少国家代表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必须遵循这样一个重要原则，即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应当首先进行核裁军，在取得重大进展后，其它核国家再同它们一起按照合理的比例裁减核军备，直至最后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认为，这一原则是公平合理的。但是，那些抱住自己的核优势不放，而一味追求核霸主地位的人，却顽固地反对这样做，它们热衷于鼓吹所有核国家“同时”进行同样数量和质量的裁军，这显然是蛊惑人心的花招。试想，在超级大国拥有巨大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它们手中仍然有着大量核武器，随时可以打一场核战争的情况下，不论哪一种核裁军方案，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难道能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安全一些吗？显然，只有实现真正的核裁军，才能有助于国际安全，而真正的核裁军必须从大量裁减超级大国的核武库开始。苏、美两国签订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没有对战略武器的数量作多大削减，更没有在质量上作实质性的限制。这就是难怪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条约“同真正的裁军毫无共同之处”了。我们希望苏美两国能够采取实际措施，实现广大国家所要求于它们的真正的核裁军。

裁减常规武器是另一需要加以重视的问题。由于发动大规模的常规战争的危险增加，我们主张裁减常规军备应和核裁军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并结合起来进行。

今年是联合国“裁军 10 年”的最后一年。令人遗憾的是，不少国家曾寄予希望的“裁军 10 年”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却成为超级大国大肆扩军的 10 年。原因何在呢？有些国家的代表说得好，根本问题在于超级大国缺乏裁军诚意。这说明在裁军方面我们面临的任务仍是艰巨复杂的。

至于中国，我们一贯赞成真裁军，坚决支持一切有助于实现真裁军的合法主张，并愿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主席先生：

国际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是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以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困难，使它们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外债负担日益沉重，经济发展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能源问题也日益为各国所关切。许多发展中国家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的各种弊病，其根源就在于存在着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它们强烈要求对国际经济制度的结构进行根本改革。这一要求是完全正义的。是符合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

5 年前，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是指导关于各项经济问题谈判和对话的根本文件。但是，5 年过去了，这些谈判和对话有多少进展呢？很有限，基本上停滞不前。原因是大家都清楚的，最主要的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从不同方面进行阻挠。特别是今年以来，种种障碍更加增多。在第五届贸易发展会议和其它国际经济讲坛上，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有关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许多合理建议，都因此未获通过。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为了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取得进展，发展中国家日益认识到，必须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并且在经济上大力发展互助合作。今年 2 月，77 国集团部长会议通过的《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和最近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文件，为开展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制定了明确的方针，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意志和愿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不久前召开的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会议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我们相信，第三世界的团结斗争，必将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要有效地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就一定要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方面享有充分权利和真正平等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坐下来进行全面性的协商，打破目前僵局，探词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缩小贫国和富国的差距，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这是解决当前迫切的经济问题的正确途径。

不少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的重要性，它们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采取了增加经济和科技援助、支持成立综合商品方案及其共同基金等积极措施，这是值得欢迎的。在尊重独立、主权和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关系，这样做对发达国家本身也是有利的，而且有助于争取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共同事业。我们希望，更多的发达国家能够认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响应。

中国政府衷心希望，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决定召开的 1980 年特别联大，

将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对制定新的国际发展战略，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政府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主席先生：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这几天，我国人民正在热烈庆祝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节日。

新中国的诞生，永远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时代，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30 年来，我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事业得到了许多友好国家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借此机会，我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日的中国，与旧中国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发达。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遵照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今年起，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已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们相信，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将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我国根本的对外政策。我国人民正在从事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30 年来，我国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战争危险继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将一如既往，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推动着整个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帝、反殖、反霸、争取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我国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仍将这样做。我们将始终站在世界各国人民一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将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在 70 年代初来到联合国参加活动的。近 10 年来，中国代表团和其它会员国代表团一道，为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各国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自己的努力。随着 80 年代的即将到来，中国代表团衷心希望，联合国能充分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切实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有效的积极作用。中国愿意和其它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一道，为此而共同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选自《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本篇是钱其琛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40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振兴世界经济是人类共同愿望

(1984年4月17日)

主席先生，
尊敬的阁下们，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代表团在这樱花盛开的时节来到友好邻邦日本国，参加亚洲太平洋经社委员会第40届年会，感到十分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政府和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中曾根康弘首相阁下亲临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此，中国代表团表示高度的赞赏。

我还要对您，主席先生，当选为本届会议的主席，表示祝贺。我相信，在您和以您为首的主席团的主持下，亚太经社第40届年会一定能够获得圆满的成功。

回顾上届亚太经社年会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复苏，但持续三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损害尤为深重，近期内难以恢复。多数国家仍未摆脱生产不前、就业不足、贸易不振、债台高筑、发展资金严重短缺的困境。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所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处境最为困难。亚太经社秘书处今年2月出版的《概览》也反映了这一基本情况。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1933年世界发展报告》，虽然亚非拉不同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差异，但是都受到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在1981年仅为2%，1982年仅为1.9%，估计1983年的年增长率又有所下降。这种世界经济形势是令人不安的。特别是考虑到今年要对联合国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进行中期审评，联系到《战略》中的目标、目的和有关指标，更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这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

《国际发展战略》提出的“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振兴世界经济”，是人类共同愿望。面临上述十分令人不满的经济形势，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办？中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集思广益共同制定的《国际发展战略》指出了正确的途径。文件指出：“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求大幅度地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当前的差距，及早消灭贫穷和依赖的状况，从而对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和持久的全球性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战略》第7段。）该文件还明确指出：《战略》“是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作努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目的在于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17段）。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国际社会的集体智慧。中国代表团愿在此重申对《战略》的这些目标和目的的坚决支持。

诚然，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都知道，要发展本国经济，需要采取适当的国内措施；但是，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有利条件以及国际援助与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战略》不仅正确地强调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长远目标，还强调了需要对国际经济关系作出体制和结构方面的变革。这是完全正确的。此外，《战略》第96段还指出，“外来资金，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是

支持发展中国家本身努力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战略》第 98 段还明文规定，所有发达国家应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实现“议定的国际指标：即占发达国家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0.7%”。但是，正如 77 国集团不久前在贸发会议政府间高级官员小组会上所指出的，令人失望的是，发达国家 1981 年至 1982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平均额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33%，尚未达到《战略》所定的指标的半数。中国代表团了解，有少数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已达到《战略》规定的指标，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即使根据经合组织的正式统计数字，1982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平均额也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38%，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并没有达到上述 0.7% 的指标。中国代表团希望，那些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尚未达到《战略》规定指标的发达国家能够从振兴世界经济的大局出发，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政策，按照《战略》的有关规定，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并且执行关于停止贸易保护主义和取消现有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在这里，我们愿再次指出这样一个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道理，这就是，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不到好转，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振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既是振兴世界经济的要求，也是符合发达国家寻求经济复苏的自身利益的。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发展战略》和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 8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所规定的义务，也就是为改善南北关系、为振兴世界经济而尽义务的一项实际行动。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远见和政治意愿。

中国代表团赞成把“技术促进发展”列为本届亚太经社会年会的“主题项目”，并且将在审议该议题的特别全体会议上作专题发言。在此，请允许我结合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就科技促进发展这个重要问题，扼要谈谈中国代表团的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我们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科技正在愈来愈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10 亿人民正在同心同德地进行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把掌握适合中国国情的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看作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条根本途径。我们认为，当代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走向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科学的掌握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科技成就的合理利用。

第二，我国政府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了“振兴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重点加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同时也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个方针的实施，已经开始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正在一步步地结出丰硕的成果。

第三，过去我们讲科技促进发展，实际上考虑得较多的是科技促进工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但是从 1978 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在总结我国农业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发展政策，领导 8 亿农村居民进行了农村的体制改革，建立和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引导农民学科技，用科技。为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渴望取得科技知识。他们积极主动地与科研机构、院校基层技术站挂钩，努力学习和运用农林牧渔和经营管理的科技知识。农民热情学用科技的行动促进了我国农业近年来的持续丰收和发展。1983 年粮、棉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我国第 6 个五年计划拟定的 1985 年应当达到的指标。截至 1983 年底，全

国有 8 个地区(市)和 112 个县的农业总产值比 1978 年翻了一番。这的确是一个可喜的新局面。在良种的选育、病虫害的防治、动植物的防疫和检疫、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生产的合理布局、生态平衡的良性循环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如沼气的利用等方面,广大农民正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涌现了众多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以及“专业户”、“示范户”。这一切显示了在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正确方针的指导下,科学技术在辽阔的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并且正同我国大力发展农业商品生产的政策结合起来,预示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中国的单一的农业生产正在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变为包括科技、流通等方面的经济网络,展现出农村生产力的充满生机的前景。当然,这种变化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待于我国人民艰苦奋斗、促其实现。在科技促进发展方面,无论是促进工业还是农业的发展方面,我们都愿意向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介绍经验体会,同时我们愿意虚心地向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和经验。我们希望并且相信,这种交流和相互借鉴将有助于亚太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

一年来,亚太经社会在组织、协调和推动本地区国家间的经济社会领域友好合作方面,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基勃里亚先生阁下,以及秘书处的其他官员、专家、工作人员,不辞辛劳,一年来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中国政府很重视同亚太经社会及其秘书处加强友好合作关系。一年来,我国政府有关部委应邀派出官员和专家,参加了亚太经社会举办的 48 起会议和活动,其中主要的有:第 39 届经社会年会,亚太铁路部长会议,几个职司委员会的会议,及农业发展委员会会议等。此外,中国有关部委还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密切合作,利用我国对经社会的捐款,在中国举办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其中包括:农业信贷考察、提高铁路营运效率座谈会、农村道路建设养护座谈会及旅行考察、干旱和半干旱土地管理考察、关于经济特区在出口加工中的作用的讲习班,以及发展中国家技术方案政府间协商会议等。执行秘书阁下和副执行秘书中川浩二先生阁下还分别专程来华,参加了其中三次会议的开幕式。通过这些务实的交流活动,增进了与会各国的相互了解与友好合作,起了交流经验和相互借鉴的积极作用,大家都感到有收获。特别是上述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合作方案政府间协商会议,是一个新的尝试,通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良好成果,会议期间达成了 32 项合作项目的协议。中国愿与有关国家一道继续作出努力,使这些合作协议得到完满的执行。这将是我国同有关国家在“技术促进发展”的事业中,用实际行动作出的一份贡献。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下,不断加强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即南南合作;并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在这里,我愿意指出,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组织安排本地区国家间的上述种种务实的交流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中国政府愿意继续支持秘书处为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友好合作而进行的工作。同时,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愿意同本地区的众多友好国家一道,为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增进亚太国家的友好合作,为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并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为推动《国际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的振兴,而共同作出不懈

的努力。中国代表团衷心祝愿第 40 届年会取得成功！

选自《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
1984 年，第 31—38 页

吴学谦，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上海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格致公学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工委书记。1949年后，任团中央国际部副部长、部长，团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2年后，任中共中央联络部西亚非洲组组长、局长、副部长，国家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本篇是他在第42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因素依然存在

(1987年9月23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新的积极成果。广大第三世界和众多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影响不断增强，显示了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要求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行真正的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美苏继续进行对话，东西方关系出现一些缓和的气氛。然而，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因素依然存在。军备竞赛还未停止，而且正日益向外层空间和其它高技术领域发展。“热点”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地区冲突还有升级的危险。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有增无减，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和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致力和平、谋求发展的国家，不能不感到严重关切。

制止军备竞赛，消弭地区冲突，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实现有效裁军是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从1985年美苏恢复日内瓦军控谈判以来，我们一直希望它们通过认真谈判，达成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不损害其它国家权益的协议。现在，美苏关于中导问题的谈判已取得了进展，双方达成原则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双零点方案”。我们认为，对话总比对抗好，缓和总比紧张好。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欧亚安全同等重要。美苏如能正式达成中导协议并付诸实施，彻底销毁它们部署在欧亚两洲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将是朝着削减核军备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要实现真正裁军，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消除了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之后，美苏的核武器也只减少不到5%，它们各自仍然拥有可摧毁世界多次的核力量。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应当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外空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大量裁减常规军备。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中求得发展。裁军任务是紧迫的，但裁军谈判进展十分缓慢。中导谈判尚且拖了近6年之久，关于削减战略武器或其它裁军问题的谈判就更困难了。照这样下去，现有的大约5万枚核弹头何时才能全部销毁？上述裁军目标何时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强烈希望美苏尽快实现大幅度裁军，达成中导协议之后，继续就其它领域的裁军问题进行认真谈判并达成协议，切实付诸实施，而不要止步不前，更不要一方面达成中导的协议，另一方面又竞相发展更加尖端的新型武器。

为了推动裁军，中国代表团于去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项提案，并在会员国的广泛支持下获得通过。这两项提案强调拥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应当率先大幅度裁减核军备和常规

军备。这是裁军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所在。在当今的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库和常规武库的是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也只有它们两家。如果它们能率先大幅度裁军，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就会大大减少。

中国不仅在裁军问题上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而且采取了一系列裁军的实际行动。从 1964 年中国开始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单方面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还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中国尊重并支持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自行协商、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区或和平区，先后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有关附加议定书。近年来，我们还主动停止了大气层核试验，裁减军队员额 100 万，压缩军费开支，并将一批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将部分军事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裁军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各国的正当权益和合理主张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真的考虑。任何裁军协议都应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安全，而不应损害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安全。

最近结束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经过各方努力，一致通过了最后文件，对国际社会提高对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赞成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因为这符合有关国家和世界和平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要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首要的是必须停止对别国的侵略扩张，结束对别国的军事占领。外国军队必须迅速地、无条件地从它们侵占的领土上撤出去，恢复被侵略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想以“政治解决”为名来维护侵略扩张的既得利益，是行不通的。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必须停止侵略，尽快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联合国大会多次就此通过了决议。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其它主持正义的国家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也作也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在柬埔寨不谋求任何私利。我们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就是维护国际关系准则，反对侵略，主持正义。我们认为，联合国历届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应当认真执行。我们支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东盟和联合国秘书长为谋求公正合理解决柬埔寨问题所作的努力。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 8 点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应当成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我们相信，只要越南在国际监督下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柬埔寨人民将会在众望所归的伟大爱国者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解决他们国家内部的问题，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并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自由选举选出自己的新政府，使柬埔寨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这将有利于这一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一俟有关各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愿意同其它国家一道，参加有关的国际保证。

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因为喀布尔政权宣布“停火”而停止，实际上，对抵抗运动的围剿，对无辜平民的杀戮和对巴基斯坦的侵略仍在继续。只要外国侵略军不撤走，抵抗侵略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人们清楚地看到，所谓“先保证，后撤军”或“先和解，后撤军”，只不过是拖延从阿富汗撤军的托词。如果苏联真想政治解决，就应当执行联合国历届大会的有关决议，尽早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这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也是医治这个“流血伤口”的

唯一办法。我们支持巴基斯坦等有关国家和联合国为公正合理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的努力，希望阿富汗早日恢复独立、主权、中立和不结盟地位。

我想谈谈对两伊战争、中东问题、南部非洲问题、中美洲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我们对两伊战争一向采取中立、劝和的立场，推动他们尽快罢战言和，致力和平建设，努力发展自己，而不要在战争中消耗彼此的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一致通过的 598 号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尽快结束两伊战争的强烈愿望，为和平解决两伊冲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赞赏联合国秘书长为实施决议作出的可贵贡献，支持他继续进行这一活动。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推动这一决议的全面实施作出自己的努力。从早日结束流血冲突、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愿望出发，中国政府再次呼吁两伊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合作，认真执行 598 号决议，谋求两伊争端的全面、公正、合理解决；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在海湾的军事卷入，以避免冲突升级，让海湾沿岸各国自己协商解决海湾问题。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可行途径。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此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会议。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南非、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南非有影响的国家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的斗争，进一步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实行有效的制裁，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 435 号决议，使纳米比亚早日得到独立。

一个多月前，中美洲 5 国首脑会议签署的《在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的文件，对缓和这一地区紧张、动荡的局势具有积极意义。这是中美洲各国和平意愿的体现，也是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和平斡旋的结果。我们衷心希望所有有关方面尊重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使已经达成的协议得到顺利实施，使中美洲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早日实现和平与稳定。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只有通过减少南北之间军事对峙，增加双方的接触和对话才能得到缓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相继提出的在朝鲜半岛实行北南双方分阶段裁军、撤出美国军队及举行朝鲜北、南和美国三方外长会谈等建议是建设性的，合理的。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响应。

一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相互间经济摩擦加剧。发展中国家由于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面临空前严重的困难。

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南北互有需要，相互依存。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越来越穷，势必影响世界经济，当然也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发达国家应当努力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主张：

- 一、发达国家采取措施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出口商品多样化提供资助，稳定并提高它们的出口收入。

- 二、发达国家履行它们的承诺，减少并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它们还应扩大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应充分考虑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

三、发达国家尽早达到联合国规定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它形式的资金，国际金融机构也应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积极向他们提供条件优惠的资金。

四、债务国、债权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要共同承担债务责任，通过持续对话商定各种可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五、在贸易、资金、援助和债务等方面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以特殊优惠照顾；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去年特别联大一致通过的《非洲经济恢复和发展行动纲领》。

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7届大会就发展资源、商品、国际贸易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进一步开展南北对话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希望本届联大在审议有关问题时能在此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我们主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持和加强对话，共同努力，在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南北关系，以加强国际合作，振兴世界经济。

中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也可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回顾我国9年来的历史性变化，重申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本方针政策，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大会将作出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部署，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1987年9月24日

李鹏，中国国务院总理。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就学于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和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1948年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1955年回国，任丰满发电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调度局局长、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供电局革委会主任、北京电业管理局局长。1979年后，任国家电力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国务院总理。本篇是他在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995年3月11日)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会议筹备委员会和部长级会议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赞赏！对东道主丹麦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环顾全球，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冷战已经结束，总的形势走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呼唤着各国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保护环境、控制人口、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安置难民、缓和种族矛盾、解决宗教纠纷、提高妇女地位、增进儿童福利，以及禁止吸毒贩毒和防止艾滋病蔓延等，这些问题无一不具有跨越国界的影响，它们的解决无一不需要国际上的广泛合作和共同努力。

本次首脑会议的召开，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社会和睦作为三大主题，对于动员国际社会解决全球社会发展突出问题，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各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着眼行动，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跨世纪的国际合作。为了履行大会即将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实现大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中国政府提出5项主张，愿同与会各国共同探讨：

一、坚持各国和平共处，维护全球社会稳定。人类的社会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国际争端应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称霸，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愿意同各国政府一道，促进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为全球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努力加快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两者应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贫困、增加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必要的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从本国实际出发，统筹兼顾，重视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政治民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三、相互尊重彼此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每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发

展水平、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各有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也有很大差别。世界多样化是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彼此应该相互尊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中国不赞成以任何形式或借口干涉别国的内政。各个国家寻求走自己道路的努力应当得到鼓励，这样才能激发无限生机，促进人类进步。

四、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不断扩大国际合作。人类发展到今天，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全球社会经济日趋一体化。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当然有赖于各个国家的自身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地区性、全球性的广泛合作。在国际交往中各方自然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应考虑和照顾对方的利益。应当提倡平等协商，反对强加于人；提倡优势互补，反对相互排斥；提倡互利合作，反对动辄制裁；提倡着眼长远，反对目光短浅。中国愿意同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和其它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在加强全球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富国承担更多责任，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不发达国家，部分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从历史看，富国的发达在许多方面都是以穷国的贫困为代价而取得的。人民长期贫困，生活在最低标准线下，往往是导致社会动荡乃至剧烈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社会问题虽然发生在穷国，但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富国也将受到影响。穷国发展了，市场规模和容量扩大，也会为富国的持续发展增加后劲。发达国家应当从人类进步的共同利益出发，公平、合理地解决债务问题，在贸易交往中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并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在促进全球的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16年来致力于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也相应发展，国民经济16年来年均增长9%。我们在只占世界7%的耕地上，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16年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7亿多人。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平均寿命达到70岁。目前我国仍有8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国政府决心在本世纪末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全国80%的地区普及9年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在改革中蓬勃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在逐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稳定，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我们把办好自己的事情，使12亿中国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中国对联大1992年通过的谋求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社会发展的47/92号决议，给予积极坚定的支持，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迎接这次首脑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报告》，介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提出了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立场和初步目标。为了履行对这次大会的承诺，中国政府还将制定后续行动计划。中国要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我们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为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出努力，以此作为这次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

主席先生：

一个新的世纪正在走来，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美好的新世界带进 21 世纪而奋斗！

选自《人民日报》，1995 年 3 月 12 日

